

## 第二卷目录

第十二章 戊戌变法.....	1
一、馬士：論戊戌变法.....	3
二、賴德烈：論变法运动.....	6
三、費正清：論戊戌变法.....	9
四、克萊德：論百日維新.....	11
五、費納克：論戊戌变法.....	13
六、兴登：論戊戌变法.....	16
七、道格拉斯：論戊戌变法.....	17
八、克勞斯：論維新运动.....	21
九、傅吾康：論戊戌变法.....	24
十、杜巴比艾：論戊戌变法.....	29
十一、白柳秀湖：論清末的改革运动.....	30
十二、矢野仁一：論戊戌变法.....	32
十三、宮崎市定：論戊戌变法.....	36
第十三章 美国的門戶开放政策。义和团运动.....	40
一、馬士：論門戶开放政策.....	44
二、丹涅特：論門戶开放政策.....	46
三、賴德烈：論瓜分运动和美国的門戶开放政策.....	51
四、宓亨利：論門戶开放政策.....	54
五、拉铁摩尔：論美国門戶开放政策的意义.....	59
六、拉铁摩尔：論門戶开放政策.....	60
七、克萊德：論門戶开放政策.....	62

八、克萊德	論 1900 年美国对中国的政策	71
九、費納克	論“門戶开放”政策	73
十、費納克	論“門戶开放”政策的意义	76
十一、伯斯	論門戶开放政策的由来	76
十二、伯斯	論海約翰的对华外交与門戶开放政策	79
十三、伯斯	論美国的門戶开放政策与东北問題	82
十四、海思	論門戶开放政策	84
十五、魏尔特	論門戶开放政策	85
十六、斯温	論門戶开放政策	92
十七、鈴木俊	論門戶开放政策	92
十八、宮崎市定	論門戶开放政策	93
十九、馬士	論义和团运动的起源	94
二十、馬士	論八国联军	108
二十一、馬士	論义和团运动的后果	111
二十二、丹涅特	論义和团运动兴起的原因	112
二十三、施达格	論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和性质	116
二十四、施达格	論义和团运动	127
二十五、賴德烈	論义和团运动	134
二十六、賴德烈	論义和团运动与美国对华政策	136
二十七、賴德烈	再論义和团运动与美国对华政策	137
二十八、費正清	論义和团运动	139
二十九、克萊德	論义和团运动	140
三十、費納克	論义和团运动	141
三十一、伯斯	論义和团运动与中美关系	146
三十二、翟理斯	論义和团运动	148
三十三、怀德	論义和团运动	149
三十四、道格拉斯	論义和团运动	150

三十五、道格拉斯：論八国联軍 .....	154
三十六、琼 斯：論义和团运动 .....	159
三十七、胡 特 生：論义和团运动 .....	161
三十八、高 第：論义和团运动的后果 .....	162
三十九、馬 伯 乐：論义和团运动 .....	164
四十、杜巴比艾：論义和团运动 .....	172
四十一、傅 吾 康：論义和团运动 .....	173
四十二、内藤湖南：論义和团运动的教訓 .....	177
四十三、稻叶君山：論义和团运动 .....	178
四十四、高桑駒吉：論义和团运动 .....	180
四十五、桂田文三：論义和团运动的后果 .....	181
四十六、白柳秀湖：論义和团运动 .....	182
四十七、小竹文夫：論义和团运动 .....	183
四十八、和田 清：論义和团运动 .....	186
四十九、宫崎市定：論义和团运动 .....	187
五十、矢野仁一：論义和团运动 .....	189
<b>第十四章 辛亥革命</b> .....	<b>196</b>
一、道格拉斯：論辛亥革命 .....	199
二、琼 斯：論辛亥革命 .....	202
三、馬 上：論辛亥革命 .....	205
四、宓 亨 利：論辛亥革命 .....	206
五、賴 德 烈：論清政府的统治与辛亥革命 .....	207
六、賴 德 烈：論西方的影响与辛亥革命 .....	210
七、費 正 清：論辛亥革命 .....	216
八、克 萊 德：論辛亥革命的背景 .....	220
九、克 萊 德：論金圆外交与辛亥革命的兴起 .....	221
十、克 萊 德：論辛亥革命 .....	224

十一、費納克：論清政府預備立憲	225
十二、費納克：論辛亥革命	226
十三、伯斯：論辛亥革命	239
十四、愛斯嘉拉：論辛亥革命	241
十五、杜巴比艾：論辛亥革命	241
十六、比倫：論辛亥革命	246
十七、高第：論辛亥革命的原因	248
十八、高第：論辛亥革命的意義	250
十九、克勞斯：論辛亥革命	254
二十、克勞斯：再論辛亥革命	258
二十一、傅吾康：論辛亥革命的意義	260
二十二、內藤湖南：論辛亥革命的本質及其後果	263
二十三、稻葉君山：論辛亥革命	265
二十四、稻葉君山：論武昌起義	267
二十五、白柳秀湖：論辛亥革命	268
二十六、矢野仁一：論辛亥革命	271
二十七、矢野仁一：論辛亥革命的意義	274
二十八、和田清：論清末的改革與辛亥革命的背景	275
二十九、和田清：論辛亥革命	277
三十、小竹文夫：論辛亥革命	279
三十一、宮崎市定：論辛亥革命	283
<b>第十五章 五四運動</b>	286
一、賴德烈：論五四運動	288
二、費正清：論五四運動	290
三、小竹文夫：論五四運動	298
四、佐野袈裟美：論五四運動	303
<b>第十六章 其他</b>	305

---

一、費正清：論解放后中国的历史学 .....	307
二、三上次男：論中国近代历史（战后日本中学历史 教科书里的中国近代史） .....	310
三、市古宙三：近十年来日本历史学界研究中国近、 现代史的一般状况 .....	329
四、北村敬直：論近代中国社会經濟史研究 .....	341
五、加藤祐三：論一九五九年日本研究中国现代史的 动态 .....	364
六、郝克欧：中国历史参考文献評論 .....	381
附录：研究中国历史的外国資产階級学者小傳 .....	440

## 第十二章 戊戌变法

编者按：这里选录资料十三篇，反映欧美和日本的资产阶级反动学者对戊戌变法的看法。

戊戌变法是在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企图瓜分中国的情势之下，资产阶级领导的改良主义运动，参加者包括一部分接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官僚、地主和小资产阶级分子。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戊戌变法运动的领导者，企图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幻想依靠封建统治的最高皇权来取得政治权力，实现他们的政治主张，逐渐使中国成为一个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不仅没有群众基础，而且害怕和反对正在兴起的农民革命。戊戌变法运动的领导者提出了外国侵略的危险，并企图摆脱这种危险，但是他们不敢正面号召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他们幻想振兴内政以消除外患，并且企图依靠某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来反对另外几个帝国主义国家。这些情形，就注定了他们不可能得到成功。他们在受到清政府统治集团中顽固派的进攻之后，一下子就失败了。

外国资产阶级反动学者在中国历史研究中，一贯地反对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而对改良主义运动则采取赞赏的态度。他们论到戊戌变法运动，一致赞扬光緒皇帝的热情，夸大变法的作用，說戊戌变法是“激进派”仿照明治維新实行的所谓稳健革新运动，只是由于领导者缺乏经验，处事轻率，过于性急，所以失败了。例如高第說：維新派最大的錯誤就是要在一个太短的时期内，使中国全

然改观，要同时把所有的政府机构都抓在手里，要一举而肃清所有的弊端。丁韪良說：这个年轻的皇帝显出他是一个有希望的学生，他下了一連串的維新詔，使得保守分子皇皇不安，因而激起反动。赫德說：皇帝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他的顧問康有为和其他人等都缺乏工作經驗，他們簡直是以好心腸扼杀了进步。馬士說：运动是康有为和皇帝两个人的創作。不論宗旨怎样美好，原則怎样崇高，是一定要归于失敗的。道格拉斯說：甲午战争以后，士大夫要求变法图強，而光緒皇帝則站在这个运动的前列。百日維新，要彻底改变旧体制，允許人民表示意見，淘汰冗員，增設十二部，一切都仿照西法，聘外人諮詢协助。克萊德說：維新派缺乏經驗，光緒皇帝的意思是好的，但是他在感情上是不稳定的，在理智上是不专一的，他对改革的困难和以太后为代表的守旧势力沒有充分的了解。兴登說：可惜維新派缺乏經驗，西太后发动政变，反对維新，变法运动遂成泡影。克劳斯說：維新运动的目的是适应外国制度和思想，来改变中国的原則。亲外和仇外現在成了党派的标志了。傅吾康說：維新运动的领导者倘若有比較多的政治技巧和远見，对西太后不采取一个錯誤的反对陣势，而設法爭取她过来，接受他們的思想，那末戊戌变法可能成功，因为西太后并不是绝对拒絕維新运动的。杜巴比艾說：光緒皇帝热情有余，但非实际的政治家。滿洲貴族害怕改革威胁他們的特权，乃利用太后打击这个意志薄弱的皇帝。白柳秀湖說：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感到急需改革政治，于是产生一种穩健的革新論，仿照明治維新，实行改革。政变斬断了穩健革新的根苗。矢野仁一說：戊戌变法是维护祖宗成法的，也就是维护中国这个德治主义世界帝国的組織制度的力量所扑

外国资产阶级反动学者崇揚戊戌变法运动，夸大光緒皇帝个人的作用，其目的是要在旧中国宣傳改良主义思想，反对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他們企图拉攏收买旧中国的封建官僚地主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分子走改良主义的道路，借以瓦解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意志，梦想維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統治地位。

## 一、馬士：論戊戌变法

除掉在一年多以后着手进行的那个安排皇位继承問題以外，反維新运动如今已經完成。西太后已可安枕无忧；維新的领导人已經被处死、遣戍边疆、放逐、革职或被迫反悔；广东派已經被打倒，絕對再爬不起来了；并且在帝国范围内变帝国的法，矯正明显的弊端和不合时宜的事物，而同时还把清朝維持下去的这种大有可为的企图，已經归于失敗。失敗的理由是明显的。运动是康有为和皇帝两个人的創作，一个是空中楼阁的幻想家，一个是毫无經驗的懦弱者；他們只获得在北京和在本省的广东人的积极支持，这一派革命党人的支持在所有其他各省都引起人們对运动的怀疑。在有地位的政治家之中，他們只得了一个广东人張蔭桓的积极支持，張之洞給予一种精神上的贊許；刘坤一却保持冷淡的中立态度。正如上文所說，維新的金字塔是倒置的。帝国所有的力量，对于这个运动都消极地或积极地严陣以待。农民倒欢迎租稅的减低或苛扰的蠲免，否則他們就要求別管他們的事；商人們或許足够开明，可以欢迎弊端的改革，但是害怕混乱发生；官吏所自出的士紳阶级則憤慨于既成习俗的修改；士紳和官吏們同样对于官吏特权



和薪俸的削減感到惊惶失措；像李鴻章这类政治家却认为既定制度是帝国唯一可行的制度；以綠营为代表的那一部分军队拒不肯被消灭；滿洲旗丁受到被迫工作的威胁；滿洲士紳和貴族看出滿人权势已受到威胁；宗室和近支王公看出滿洲皇权的基础已被危及；西太后看出她自己的生命在危險中，并且看出她四十年当政所获得的一切会全部翻案，尽管这一切是血迹斑斑，尽管是腐敗的，但仍是基于健全的和有政治風度的原則的。凭着这样的支持并遭到这样的反对，任何維新运动，不論宗旨怎样美好，原則怎样崇高，是一定要归于失败的。

### 外国人对于維新运动及其失败的意見

外国人的意見，照已經发表过的看来，一般都称赞康有为的方案，但是指責他的輕率。法国史学家〔高第〕說：“維新派的最大錯誤就是要在太短的一个时期內使中国全然改观，要同时把所有的政府机构都抓在手里，要一举而肃清所有的弊端。……在日本，虽然有封建制度需要打破，但是沒有若干世紀的傳統要推翻。”<sup>①</sup>一个美国作家为了“列强如此不重視这种危机的性质”而惋惜；他对于英、美公使沒有給予帮助，表示懊喪——“一个千載难逢的珍贵机会被丢掉了；把这个偉大的危机說成是与外国人毫不相干的一次‘滿洲家族的口角’，竟变为时髦之談。”<sup>②</sup>但是另一个美国作家总结这个局势說：“这个年輕的皇帝显出他是一个有希望的学生，他下了一連串的維新詔諭，使得保守分子皇皇不安，因而激起反

<sup>①</sup> 高第：《中国与列强关系史》，第413頁。

<sup>②</sup> 胡恩溥：《中国在激变中》，第1卷，第150頁。

動。”<sup>①</sup> 寫西太后小傳的作家們〔漢蘭德和白克好司〕有以下的言詞說明了她的展望：

“光緒的統治已經過去了；他所剩下的僅不過是一個皇帝的尊號罷了。他曾經有過他的機會；凭着青年人和新思想的热情，他曾經和上層的黑暗勢力作過一番殊死之爭，可是他失敗了。……慈禧曾經讓她的侄兒任便行事，她曾經引退而讓他主持國政；如果他把國家弄得鼎沸不安，如果她順從公意而重執國政，這是天命，並不是她的過錯。”<sup>②</sup>

在中國的外國報紙是同情維新黨的——“維新黨的計劃太輕率了，太危險了，每一個步驟都需要一位強者的勇氣……袁世凱的遲疑陷他們於失敗和死亡的深淵。維新在中國並沒有死去。一個巨大的家庭糾紛掩蔽了它，但它還是生氣蓬勃的。”又說“烈士們的鮮血將是新中国的種子”。最後，那位在半世紀的從政期間作為中國的堅定不渝的朋友的人<sup>③</sup> 在一件不打算公開的信中表示他的意見如下：“皇帝的方向是正確的，但是他的顧問康有為和其他人等都缺乏工作經驗，他們簡直是以好心腸扼殺了‘進步’——他們把足夠九年吃的東西，不顧它的胃量和消化能力，在三個月之內都填塞給它吃了；這樣它就暫時被扼殺了，但是將來它一定會有它的適當的代表人物重新顯露于世。”

（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三卷，第163—165頁）

① 丁韞良：《中國的覺醒》，第172頁。

② 漢蘭德和白克好司：《西太后治下的中國》，第211頁。

③ 指赫德。——譯者

## 二、賴德烈：論变法运动

中国人所作的挽救帝国瓦解的两次努力之一，是由那些想要大部分按照西方的方式在中国进行改革的人们作的。改良派人数很多，而且他们有各种不同程度的激进思想。中日战争以后许多中国人深信他们必须采用西方的某些方法。这些方法曾使他们的敌人（曾被认为远不如他们强大的敌人）这样容易地打败了他们。改良会组织起来了，其中有些成员很有势力。伟大的总督張之洞，一时曾是赞助者之一。他在《劝学篇》一书中（该书主要是各种不同作者所写的文章的汇集），虽然强调对儒家学说和对皇朝的忠诚，但主张采用某些西方的新方法以免帝国像印度、安南、埃及与其他国家一样失去其独立。据说这本书销售了一百多万本。

比張之洞更为激进的是一位年轻人，后来被称为孙逸仙或孙文。他于1866年11月12日生于离广州四十哩的一个村庄，是个佃农的儿子。他十三岁时由其移往夏威夷的大哥的建议及支援，赴檀香山受西方教育。1879年，他在檀香山被其兄送入一所圣公会主办的学校读书。他在该校约三年。他坚信基督教的真理，其兄感觉惊惶，即遣送他回国。孙回到他的本乡后并没有放弃他的新信念，反而把当地庙里的偶像毁坏，为了这件亵神的事，他不得不逃往广州。在广州他结识了一个美国基督教传教医师。不久他又开始学习，这一次他是在香港学习，并且主要是，虽然不是完全是，向基督教传教士学习。在这里，他受到洗礼；1892年他在这里得到一张医学文凭。他开始在澳门行医。他在该地组织了维新

會，會員大部分是教會學校訓練出來的人。葡萄牙當局不久就命令他離開澳門，這很可能是因為他與葡籍醫生競爭。他回到廣州並呈請北京創辦農業學校。這個請求並未獲得批准。他接着參加組織一次反滿叛變。計劃被發現了，孫的某些朋友被捕處死，而他自己則逃往香港（1895年），後來到日本。孫此時是海外華僑中的流浪者，他設法取得華僑的支持來推翻清朝，建立一個共和國。有一次，在1896年，在倫敦，中國公使館逮捕了他。如果不是英國政府由於一位以前曾到過中國的傳教士的要求而主動迫使中國使館釋放他，則使館很可能會遣送他回中國而處以死刑。他繼續他的反滿鼓動，所得的結果，像我們將要看到的，是驚人的。

還有一個改良派，當時比孫逸仙更為著名，他是康有為。康也是廣東人，生於1858年，因此，比孫年長。他完全受的是中國式的教育。但是，他吸收了漢學傳統，有力地批評了比較古老的經典著作在歷史上的可靠性。他堅持主張正統學者所尊重的經典中，有許多是為王莽及其首相（大約在耶穌誕生的時候）所偽造借以為他們的社会和政治綱領找到根據的。他因此攻擊同時代的保守思想，並且證明孔子不是一個保持舊傳統的人而是一個創造性的倫理領袖和政治家。改良派能從孔子方面得到靈感和指導。因此，他設法說明，他自己的激進意見能在孔子身上找到支持。他也把孔子看做是一個宗教改革者，並且協助設法在日後促進一種新孔教的嘗試。他擬出一種激進的社会和政治哲學。這種哲學大部分是他自己的哲學，他的綱領包括最後廢除國境、官吏民選、取消家庭、孩子的教養與老年人的扶養由公共機關負責。他公開地說他的哲學是以《禮記》中的一篇為基礎的。他欲將中國的古書當作解決當前問題的指南來讀。必須說，康沒有想把他的全部綱領立刻

付諸实行。作为当前的步骤，他主张采取比较更为温和的措施。

在改良派压力之下，上述三人只是其中比较突出的；在馬关条约与 1898 年夏之間，省政府与中央政府及私人方面作了或计划了許多新的改革。教导西方学科的学校成立了。铁路也计划兴建了。

改良派找到光緒皇帝做拥护者。光緒的体格不是强健有力的。他蛰居深宮，在太监們中成长，并且常处在专断的慈禧的監視下。他没有活潑的个性，也没有与外界的直接接触，足以使他成为皇朝及帝国所需要的那种领导人物。但是他感觉到必须做一些事，并且急切地閱讀当时的文章，包括康有为的书籍在內。1898 年夏季，他以康有为为亲信和顧問进行了后来所說的百日維新。在那年 6、7、8、9 月中，一道上諭接着一道上諭頒布进行改革。

与后几年的彻底的改革相比較，这些上諭没有一个是有任何特别激烈的主張的。但是，与当时官場的保守主义相比，它們是惊人的。其中有些是下令改变文武官考試制度，制訂学校体制，包括一个研究新旧学問的京师大学堂；成立譯书局；鼓励建筑铁路；进行陆海軍改革，把官职外的其他职业开放于滿人，及取消許多挂名职位。

上諭不可避免地激起了暴風雨般的反对。那些由于信念或利害关系而与旧秩序不可分的人，及虽然願意改革但认为皇帝行动太仓猝的人出而反对。朝廷中两派的竞争使得局势复杂起来。其中一派以江苏人为领导，倾向于贊成变革以挫折其敌人；而另一派，主要是北方人，采取保守的立場。

（賴德烈：《中国人：他們的历史和文化》，第410—413頁，孙瑞芹譯。）

### 三、費正清：論戊戌变法

只要皇朝和它的傳統制度能够維持下去，中國的自得其所的自給自足和因循墮性所得的懲罰，便只在它的邊境上顯露出來，在那里傳統上屬於中國的各小邦次第為帝國主義奪去了。日本接收了琉球群島，俄國有一個時期進入中亞細亞的伊犁地區，法國強占安南建立了法屬印度支那，英人奪取緬甸，朝鮮開放與外國來往。當這些不祥的發展，繼續有損於中國一度曾引以自豪的在東亞唯我獨尊局面的時候，採取激烈行動的壓力逐漸增加；但是，只有在災禍近在燃眉的時候，制度上的改革才能行得通。直到日本於1895年出人意料之外打敗了大清帝國，歐洲列強又緊接着在三年里勒索了租借地和特權之後，中國才試圖作真正的制度改革，即使在那時候，目標仍不是根本的改革，而只是想用外國式的方法來加強“自強”。改良派所持的立場仍舊是中國社會的基礎不應改變，而法律和制度是可以變的，並且必須變，才能對付西方。

因此，1898年的改良派僅是維新派而不是革命者，他們仍只要“傳統範圍的改變”。他們以極大的勇氣，和甚至更大的樂觀情緒，希望肩負中國傳統的人們能夠刷新傳統以適應當代的需要。

這些人中最著名的是性急的廣東人康有為。他是一個聲望很高的學者，以他的《孔子改制考》一書震驚士林。這個破除偶像的解釋把孔子描繪為伸張民權遏制君權。這本書的出版激起某些學者要求處康死刑，因為他面目雖儒，其心則夷。

康有為的主要論據是，中國應該改革，不然就要滅亡，而且溫

和的改革还不能挽救它。他一心忠于皇朝，而且对西方所知极多，关于西方的知識他完全是从翻譯得来的。他相信在改革时中国应特別学习日本，因为日本的經驗在時間与空間上比西方国家的經驗更为接近。这导致康鼓吹立宪政治。他組織了一个雛形的政党自强会，来散播这种主張，当时同他合作的是另一个广东文学家梁启超。梁主編《自强报》。

这批人于1895年中国被日人打得惨敗后获得了追隨者，并且引起了皇帝的注意。康为了使皇帝明了情况，准备了奏折而且写了两本书。他的陈述具有这样的說服力，以致年輕的皇帝在1898年短短百日的期間中，借他的协助頒布了一系列惊天动地的改革諭旨。

这些以皇帝名义发表的著名文件，下令改革科举制度、行政和許多政府机关，諭旨的目的是欲建立近代政府的各个新部門，同时肃清旧政府中的冗員和贪污。在有关医学、农业、教育、刑法、警察、邮政、矿业、商业、陆海軍、发明及出洋留学的諭旨中，皇帝不受拘束的大权，很少有象这样生动地表現出来的，至少是在紙面上。

1898年的百日維新引起大小官員的惊愕。維新派心目中的宪政，几乎是不会限制統治者的权力的，尽管他們主張法治。但是这一点并不重要，事实上有过多的官吏感到这些突变是一种太切身的威胁。业已退休十年的慈禧太后，凭借軍人的拥护，造成一次政变，廢除了皇帝，宣布再度听政，并廢止他所頒布的一切詔諭。六个維新派人物被处死刑，康梁逃往日本。

沒有一件事能更有效地說明通过由上而下的逐步改革使中国近代化的无望。从那时起，政治革命的努力同宪政改革的努力平行前进。

(費正清：《美国与中国》，第 147—149 頁，孙瑞芹譯。)

#### 四、克萊德：論百日維新

中国人曾努力設法摆脱这个危机<sup>①</sup>，但未获成功。中国在1898年不是沒有政治改革者，其中之一就是康有为。他是广东人。以“当代圣人”見称。他对西方的政治思想有广泛的（如果不是深奥的）知識，而且他深感在政治上有刷新的必要。康經過多年从事著作及鼓吹維新工作后，于1898年到北京任工部主事，这正是列强夺取租界地及企图划分它們的势力范围的时候。康震惊于中国軟弱无能的景象，向天子呼吁效法彼得大帝来担当皇帝改革者的角色。

“若徘徊迟疑，因循守旧，一切不行，則幅員日割，手足俱縛，腹心已剖，欲为偏安，无能为計。”

接到这个呼吁的君主是光緒皇帝。他是一位还不到三十岁的青年。他是由于他伯母慈禧太后的策略而得到君主地位的。甚至在光緒皇帝成年以后，这位崇高的妇人仍然繼續控制他。那末，如果他在康的奏折中看到了維护他自己的权力和把他的国家从灭亡中拯救出来的方法，是不足为奇的。

1898年6月11日出現了第一批上諭，預示著名的“百日維新”的來臨。中国在国外将有能干的外交代表。官吏奉令推荐“不圍

<sup>①</sup> 指 1898 年列强瓜分中国的企图。——譯者



于頑固的保守主义的狭小圈子里”的人。中国将有新秩序，在新秩序中，全国将团结一致向进步迈进。高级保守官吏被劝到欧洲寻求教育。上諭接连地迅速頒布。旧教育制度将代以“实用”的课程；新式学校和学院将在各省設立；运输及矿业部門将在北京建立起来；军队将改組；无用的官职将取消；外国关于政治与科学的著作将譯为中文。从6月9日到9月为止，頒布了四十道上諭，试图把旧的人民改造成新的人民。他們的失敗是不足为奇的。維新派缺乏經驗，且年輕的皇帝絕不是第二个彼得大帝。毫無疑問，他的用心是好的，但是他在感情上是不稳定的，而且在理智上也是不专一的。他对于建設性改革的实际困难及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反对他的守旧势力沒有充分的了解。

維新派认为，如果不把守旧的反对派排除，則他們的改革計劃肯定要失敗，因此他們图謀捉住太后和她最亲信的顧問及北洋军队司令荣祿，也許还要处死他們两人，虽然在这点上证据是矛盾的。但是，陰謀被发现了；康和某些維新派逃亡；9月21日太后再度掌握政权。企图进行的改革由于維新派的性急的愚笨、皇帝值得欽佩但是指导錯誤的热忱、大多数守旧派的坚决反对，最后还由于昏睡的人民大众不为对維新的任何通俗的了解或对維新的願望所激动而遭到失敗。許多維新派立刻受到处决。但是领导人康有为和梁启超逃到英国的香港。在香港他們能安全地讀到把他們凌迟处死的上諭。光緒皇帝成为摄政太后的俘虏，又活了十年。他能这样生存下来是由于下述原因：列强的干涉，摄政者怕触怒南方的自由主义派，以及欲掩盖中国再次为一位妇女所統治的事实。

在1898年将要結束的几个里，在北京的外国人常把光緒的改革作为一件指导錯誤的热忱的事而予以漠視。照这样的看法，

中国保守者决心走他們自己的道路是比較容易理解的。虽然如此，太后从未停止声明她对于改革的热情。以实际結果来判断，这种热忱不是很大的。主要的結果是用有問題的方法来招募更多的人到軍隊里，并且由太后举行一次会来招待駐北京的外国外交官的夫人。夫人們注意到太后的“和藹可亲”，如此而已。慈禧自己将是比光緒更为热忱的一个維新者，到現在还无证据。

（克萊德：《远东》，第270—272頁，孙瑞芹譯，呂浦校。）

## 五、費納克：論戊戌变法

这些連續的震动以及逐漸滲入的新思想使中国产生了一个改革派，并短期地登上了京城的政治舞台。几乎所有的拥护改革的人都来自揚子江流域和南方各省。在国外最著名的改革家孙中山，是一个革命的广东人。他的父亲据說是个改奉基督教者，他自己也是基督徒。他曾在夏威夷和香港的外国人所办的学校中受过西方的教育。1895年，孙中山領導广州起义，未能成功。結果清廷悬賞緝拿他，他只得逃亡国外。然而，在早期的改革运动中的更为重要的人物是康有为。他当时被称为“当代圣人”。他也是广东人，但和孙中山不同，他不是革命者，而是主張逐步建立君主立宪制度，并立即着手改革現存的政府机构。在官員中，有两个人突出地对改革感到兴趣，那就是揚子江流域的总督張之洞和刘坤一。張之洞著《劝学篇》，使人們注意到变法的必要，这部著作就使他在当时明确地委身于改革的事业。很多比較年輕的官員，包括滿人和

汉人，也同情于变革的主张，至少在他們体会到只有牺牲官僚阶级和士大夫阶级的特权才能实行改革以前，他們是同情于变革的主张的。

然而，如果没有滿清宫廷中的条件，改革派（广东人是它的领导者和主要支持者）是不能够着手实行它的纲领的。光緒帝在若干年以前就已达成成年，“老佛爷”业已归政給光緒帝并退居頤和园。但是統治权的轉移只不过徒有其名。絕大部分的重要官員們都要到頤和园去覲見她，接受她的指示，而当感到需要的时候，她就毫不躊躇地干預国家的事务。朝廷中最重要的一派，所謂“北方派”，并不隱瞞他們的信念，认为她将重新訓政。另外一派是所謂“南方派”，以光緒帝的师傅为首，在1898年的时候，在这一派的領袖們看来，似乎他們就要失势了。若干年以来，这一派离开了慈禧太后，并倾向于支持光緒帝。这一派在北京的領袖們并不是改革家，但是他們逐步地被迫支持改革运动，作为在爭夺权力中保持他們自己地位的斗争的一个部分。

光緒帝本人在甲午战争以后表示倾向于改革。那时他对于西方的思想、制度和風俗习惯表现出很大的兴趣，这种情况表明，如果一旦使他同改革派的領袖們取得直接接触，使他轉而贊成改革，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这件事到了1898年6月方才实现，那时光緒帝的师傅翁同龢把康有为介紹給他。翁同龢所以要采取这个步骤，可能是由于恭亲王死了的缘故；恭亲王是慈禧太后的追随者中支持翁同龢最有力的人。恭亲王是一个重要的滿族政治家，具有溫和的見解，多少年来他在北京政府中發揮着一种“平衡輪”的作用，抑制着太后和皇上，使他們不要各走极端。

光緒帝立刻就处于康有为的影响之下，并立即在他的指导之

下着手實行一項改革的綱領。在 1898 年夏季發出許多上諭，改革了教育和考試制度、設立了譯書局、廢除許多領乾俸的職位、推進了軍隊的改組、並且着手實行許多其他的革新。

从一开始，光緒帝的活動就遭到嚴重的反對。後來，這種反對更為劇烈，最後反對者請求慈禧太后出來干預。改革者們深怕太后會出來干預，他們力勸光緒帝保護他自己和改革的事業，對“老佛爺”採取行動。最後他被說服了。改革者們以為袁世凱（以前曾任中國駐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以後曾任中華民國總統）是同情於改革的，邀他參與計議。他被任命為直隸總督<sup>①</sup>，並奉命前往天津，統率在那裡的軍隊向頤和園進軍，逮捕慈禧太后。袁世凱不但沒有這樣做，却反而把他的軍隊同他的“把兄弟”總督榮祿<sup>②</sup>（他是滿人，是慈禧太后的親戚和忠實的支持者）的軍隊聯合起來。他奉慈禧太后的命令逮捕了光緒帝，<sup>③</sup>光緒帝從此被囚禁，直至十年以後逝世時為止。這樣就使得第一次改革的企圖歸於失敗。康有為逃出北京，居于日本，在那裡從事把君主立憲制介紹到中國來的運動。他的追隨者有很多也逃走了，但是也有一些被逮捕並殺死了。整個改革的時期恰恰一百天。改革運動的失敗使政權落入了保守分子手中，並且為對於當前局勢的一種根本不同於改革派的反應鋪平了道路。

改革運動是中國人民在變化了的生活條件和列強的積極侵略面前對滿清統治的無能的一種反應。人民的不滿幾乎從十九世紀

---

① 此時袁世凱只由直隸按察使提升為侍郎，管理練兵，並未被任命為總督。——譯者

② 此時袁世凱的位分，絕沒有資格同榮祿結拜為“把兄弟”。——譯者

③ 此亦與當時情形不合。——譯者

初就已经显示出来了。这种不满在十九世纪中叶特别明显，当时爆发了太平天国叛乱，仅仅由于太平天国领袖们自己的愚蠢和外国人对于清政府的帮助，才使清朝免于颠覆。暴动、海賊、盜匪，所有这一切在十九世纪下半个世纪大规模地发生着。清政府在1842年、1858—1860年和1884—1885年都被外国打败。最后它表明甚至不能够保护它的属国以抵抗日本的侵略。很多的官员是腐化或没有能力的，或是既腐化又没有能力；应该用于国防的经费被移作私人用途和宫廷享乐之用。官职被用来作买卖，这种交易直接与总管太监有关，并且通过他与慈禧太后有关。对于满清统治者和他们的官员的指责是严厉的，也是应该的。这种日益高涨的不满浪潮原来是会直对着他们冲击的，但是外国人从1869年至1899年的行为，转移了人民敌视的方向。对于“瓜分中国”的第一个内部反应，是按照西方的方式从事改组和改革，来加强中国的力量，以便抵抗外来的侵略。上面已经提到，这个运动失败了，其原因是内部的情况使它有失败的可能。当保守分子重新掌握政权时，他们只能提出一个解决办法，即恢复到以前的孤立的状态。“驱逐外国人，一切的困难就可以克服了，”这是他们的口号。如果回忆一下1840年至1899年间所发生的种种事件，就可容易地看出，为什么他们能够利用鼓励排外主义的方法来转移人民对于统治者们的缺点的注意力。

（費納克：《現代東洋史》，第158—160頁，呂浦譯。）

## 六、興登：論戊戌变法

1898年的所謂“百日維新”是由那一年的瓜分运动所促成的。

年輕的光緒皇帝接受翁同龢和康有为的劝告，不顾慈禧太后的反对，主張联日，并采納君主立宪政体。这个風行一时的維新法令试图改革政府制度和教育制度，裁撤冗員，集中中央对各省的控制权力，采取西方的生产方法，按照德国的方針建立征兵制的軍队。可惜維新者缺乏經驗，負責实行維新法令的官員遭到反对。慈禧太后迅速发动政变，掌握大权，百日維新遂化为泡影。

义和团之乱以后，慈禧太后也做了一些关于变法維新的表面文章。虽則当时还有些保守，但她提倡改革，如允許汉滿通婚，派遣滿族青年到外国留学，在北京建立了一所京师大学堂等。在軍事上，則试图认真地建立一支三十六个师的征兵制的軍队，并按英国方針重建海軍。中国在政治方面，广泛地比較研究了各国政府組織，最后选择了日本所采用的德国宪法。1908年，頒布九年計劃以實現这些变革。但这次維新尝试又因1908年慈禧之死与1909年摄政王解除有才能的袁世凱的职位而失敗，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窒息了大清帝国的一切計劃。滿清政府的維新無論如何是太少了，太晚了，虽然它終于認識到了必須維新，但他們缺少經驗、智慧和必要的行政机构以推行有效的計劃。

(兴登：《中国与日本的主要問題》，第121頁，林海譯。)

## 七、道格拉斯：論戊戌变法

自从八十年代初期以来，特別在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以后，对細心的观察家來說，明显的是，中国士大夫階級中为改革的願望所

鼓舞的人正在日益增多。皇帝站在这个运动前列的这一事实使改革愈为重要。如所周知，天子通过广学会所译的书籍略知欧洲的学问；虽然他所得到的知识一定是肤浅的，但也鼓舞他提高帝国的政治地位和改善人民的社会状况的愿望。

因对日本的损失重大的战争而蒙受的国耻，在他思想上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印象。他决心尽其全力来消除已成为与帝国有连带关系的软弱无能的耻辱。当然，可以想得到的，皇帝在进行他如此开始的愚昧和无能的十字军战争中，会被引导到许多的和重大的错误中去。他与许多强大的力量斗争着，而且他的装备是很不完全的。虽然如此，但是他勇敢地奋斗，并且如果他找到比他的顾问更聪明更机灵的顾问，则他也许最后会成功的。他处于一种至尊无上的地位，他的廷臣经常告诉他，他的一言一行就是法律，因此他是在这种思想下成长起来的；即他只要发一道命令，人们就会顺从他。他知道，在一切行政事务上他的命令是通行全国的，并且他相信，他只要说一句话就可以改变中国历史的整个过程并扭转民意的潮流。

他心中深信有改革的必要，但有这种肤浅的思想；改革可以用颁布上谕来强加于国家身上，尽管这些上谕可能与人民当时的意见相反。结果是颁布了一系列上谕。由于他不明了世界情形，他希望通过这些上谕改革帝国。起初几道上谕之一，主要是涉及军队的效率。在国家被日本人打败以后，这是很自然的。这道上谕命令采用新式武器和西方组织，并采用一种改善过的制度来挑选军官；并照外国学校的办法设立高等和初级学校，以便使国家走上进步的道路。

他对他的臣民说：这些问题久已在他心中，但是他经常遇到官

員們的阻撓；他們在回答時提出空洞而不切實際的建議。事實是，他繼續說：“士無實學，工無良師。強弱相形，貧富懸絕，豈真能制挺以撻堅甲利兵乎？朕惟因是不定，則號令不行，極其流弊，必至門戶紛爭，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積習，于時政毫無裨益。”

這些事實很難為一個驕傲的士大夫國家所接受。皇帝繼續對他的臣民說，他雖然感到應按照時代的需要而作變革，但是他們應記牢先聖良言，並以此為基礎而制定更新、更有利的方法。皇帝接着勸他的臣民拋棄阻撓進步的泥坑，“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為雄。”他最後表示真摯的希望，“博采西學之切于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將此通諭知之”。

相當長的時期以來，以康有為為首的一個贊成改革的運動在廣州進行着。康是負有聲望的學者，且已博得“當代聖人和改革者”的稱號。他的話絕對為他的門徒所服從。這些人因為一致矢忠於國家的真正利益而團結一致。這個改革者的名聲傳到了京都。他的事業獲得皇帝的師傅翁同龢的支持。在這位要人的贊助下，他得到一個御史的協助使他引起皇帝的注意。皇帝回答這位御史的奏折時頒布一道上諭，命康觀見，但是，作為第一步，康先被邀列席總理衙門的一次會議。會議歷時三小時，衙門所有的成員都出席（1898年1月）。在這次會議中特別強調的改革是採取一個合法組成的司法制度，如果沒有這個制度，一切都將沒有用處。

這次會議後的第二日清早，議事記錄呈給皇帝閱看。他命令康把他特別要向皇上提出的各點寫進奏折。在奏折中（這是這道上諭的結果），康建議應效法日本徹底改變它舊的政府體制；應准許人民表示他們的意見；應取消舊型的官吏而易以年輕能干的人；應設立法律、度支、學校（有外國教習）、農、工、商、鐵路、郵政、礦



务、游会、陆军、海军等十二个新的局，一切都照西法，有外国人供諮詢并予协助；应在科学基础上重新整頓稅收，使国家稅收能达到七千万两銀子。

这些彻底的改革計劃获得总理衙門大多数成員的贊同，但是为恭亲王和荣祿所反对，他們认为这些計劃是革命性的和幻想的。但是，皇帝对康的提議极感兴趣，并接見他同他談話。在觀見中“当代圣人”詳細地闡述他为帝国的真正利益所建議的政治改革。談話历二小时。皇帝倾听他的意見并仔細地研究他所发表的《日本明治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記》两书。在书中他推荐目前的日本天皇和彼得大帝是应该效法的榜样。这次觀見后皇帝又接連同他談話。在許多机密的討論中康得以發揮他对于改革的意見。

这些諮詢的結果不久就明显了。皇帝接着頒布了一系列諭旨。其中之一是廢除八股文为考試的标准。在其他諭旨中，亲王和大臣們因为沒有迅速筹办京师大学堂而都受到申斥，铁路官員奉令从速建筑已批准的铁路綫。仿照上海农业学会的方式設立了农业局；兵部和总理衙門奉令呈报軍官考試方法的改革方案；又頒布了全国性的版权法和专利权法。学校和高等学堂設立于各省城、县及其他城市，經費由招商局、电报局及广州彩票局負担；凡人民所建立而未在礼部备案的一切祠堂以及其他庙宇都将改为学校和高等学堂以傳播新学。大臣們受到警告說，在皇帝困难的时候，他們应对他老实和坦白。以《时务报》为名的一張上海報紙被宣布为政府的机关报。戶部奉令“仔細地研究立刻廢除买卖一切官級是否得策”。全国文人被号召精讀張之洞的《劝学篇》一书。設立学校和高等学堂作为京师大学堂的輔助学校。丁建良博士被派为

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又下令在上海設立譯書局，把西方的科學、美術、文學及教科書譯成漢文供學校採用。北洋軍隊奉令在京、津舉行大檢閱，皇帝和太后將親自參加。又令裁撤多餘的衙門和冗員。

（道格拉斯：《歐洲與遠東》，第323—328頁，孫瑞芹譯，呂滄校。）

## 八、克勞斯：論維新運動

同西方文明和文化接觸時對中國一部分最有才幹的人必定會發生影響。這種影響的目的是適應外國制度和思想來改變中國的原則。

這些開明人士是所謂維新運動（新學）的代表者。他們同時組織了一個政黨。政黨的領導人康有為是黨綱的主要制訂者。

他們的動機決不是景慕歐洲文化或耶穌教道德而欲拿這些來代替他們的民族觀念。外國教會假定中國維新派有這種願望是嚴重的錯誤。我們在外交方面也基本上誤解了近代中國的意圖，包括對狡猾的李鴻章個人和北京宮廷的措施在內。

康有為是個純粹的儒家學者。對這樣一個人只能希望按照中國人的原則和利益的動機來行動。他所計劃的改革是為了中國人民及其利益而合乎時代地重新改造中國，接受西方技術上的成就只是達到這個目的的一種手段。

中國只欲學習并接受歐洲的外表上的改良。儒家道德看來是凌駕一切的，無需再有改進。中國自己的文化體系絕對不應動搖。中國人以極尖銳的批評來看待一切外國東西。歐洲人在倫常上的

弱点恰恰被认为是估計兩方斗争中的一个因素。

这些思想是慢慢地并且作为与欧洲接触的当然結果而成长起来的。但是，它們必定立刻与本国的其他观念相冲突。

对一个合理的改革綱領不利的是：中国人的自私的高傲自大，主要是誤解技术上的优点，企图把国内一切不幸归咎于外国人的干涉和对滿人統治的阴謀（在阴謀中凡与列强的糾紛都被利用来抵抗清朝）；由于欧洲的欺侮而遭到損害的民族自尊；对于全局缺乏了解，而欧洲人自身的不智举动，关系亦屬非輕。

所以中国改革思想的发展并不是直綫的，而是曲折的，五花八門。好的意图掺杂着許多紊乱不清的事情和誤会。

維新綱領最初是康有为在 1888 年 12 月 10 日上皇帝奏折中作为一种方案提出来的。在奏折中对中国的弱点和面临的危机作了叙述，这个奏折沒有能达到皇帝手里。

对日战争以后，皇帝和皇太后看到了康有为于 1895 年 5 月 29 日奏折中所提出的警告。在奏折中，康批評了国家現行制度并提出改組各方面的建議。康有为明白地說明中国的国家思想按照其旧的形式是不能維持下去的。他主張应完全改变对西方国家的本质的看法。

各省巡撫奉令根据这个奏章提出意見。但是，同时，匪夷所思的改革思想引起了极尖銳的反抗。保守派官吏的代表們被康有为詆为不学无术的人，乞援于皇太后，他們的反对贏得上風，結果康有为于 1895 年不得不毫无結果的回到广州。

当中国人于德国占領胶州接着发生列强割占土地以致怕国家将被瓜分的时候，康有为于 1898 年又回到北京。此时他在机智的文章中竭力鼓吹他的維新計劃，但是在政治方面他是拙劣的。

他的意見為年輕皇帝的高齡的師傅翁同龢所支持。不久這個勇敢的維新家與光緒建立了私人關係。這種關係將來有極重大的後果。到此時為止還沒有一官半職的康有為在部中獲得了一個位置，並為一般行政部門擬訂了改革計劃。

贊成和反對進步的兩派在北京進入公開的鬥爭。年輕的皇帝與他的擁有極大權力的嗣母之間的衝突迅速地導致 1898 年 9 月的政變。但是，就在慈禧勝利以後，改革思想仍繼續發生作用。

維新派開始行動時頗為穩健。但是，維新運動愈強，它的性質愈趨激烈，由於方式的改變，它當然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反對和反應。

“親外”和“仇外”此時成為黨派的標志。“親外”實際是以欺歐洲人為根據。代表進步的人士中是外國的朋友的僅是少數例外。維新的事業恰恰在仇外的土地上成長起來，而近代化目的是在於使中國能以同樣的武器更好地保衛自己。

康有為一派大部分是年輕人。作為沒有實際經驗的理論家，他們很快地建立了一條激進路綫，逐漸把維新思想擴充為革命思想。這種發展主要是由於 1898 年政變後以暴力和血腥鎮壓維新派促成的，以致擁護進步的人不得不離開祖國。他們從而更強烈地受到外國思想的影響。

既然此事大部分與未成熟的理想家及狂熱的人有關，則他們的頭腦為美國、日本及英國的口號所迷惑，是毫不足奇的。

激進的維新派從國外進行宣傳，而上海外國人的租界也成為他們的陰謀的中心。他們的代表熱情地鼓動反對滿人的統治，並且把自由思想發展為一個未來國家的模糊形象。這樣，維新和革命有了間接的、起初絕未想到的聯繫。

維新运动起初的领导人；很快就毅然背棄了連他們的年輕一代也轉變而加入的激进革命党人。康有为后来坚决地攻击孙逸仙的方針。

滿人守旧派看見他們自己的利益受到进步运动的威胁，便竭力反对并不妥协地敌視激进的維新派。反对皇朝的傾向愈在人民中显露出来，統治階級必定愈坚持旧原則并努力使現存的状态維持不变。

每种改革都表明是滿人統治的危机。因此，皇室极大多数的王公和滿族的高級官吏都站在反动方面。对他們來說，傳統或近代化問題同时标志一場異族統治和中国国粹的斗争。特殊的是，滿人好象是民族傳統的拥护者。

自 1898 年政变以来，慈禧太后仍是宮廷和政府的領袖。她現在明显地贊成反动綱領，而光緒帝由于喪失自由也沒有任何政治影响了。

在极端派之間进行調停是穩健派的一項任务，穩健派于“义和团”事变后成功地貫徹了它的計劃。杰出和最有影响的人物如李鴻章和張之洞，都努力把中国人的观点和为国家謀福利的近代要求包括于一个共同的綱領之中。

（克勞斯：《东亚史》，第 117—120 頁，孙瑞芹譯。）

## 九、傳吾康：論戊戌变法

随着欧洲商人和教士到中国的是愈来愈多的西方思想。鴉片战争后不久，个别学者和官吏已經設法获得关于西方人的較好的

知識，並指出，中國能從他們的物質文化上學到許多東西。在六、七十年代，一批開明官吏不復否認中國必須努力利用並輸入西方的技術成果，特別是在軍事方面的成果，當然主要是為了利用它們來抵抗並擺脫外人的控制。除這點外，他們看不出西方文化中有什么值得追求的東西。“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一句著名的格言。但是，在比較年輕的官吏和文人中有為數不多的人意識到，中國對外國經常暴露出來的軟弱，除了缺少槍炮和軍艦外，必定另有更深遠的原因。他們得到信念，如果不欲使中國在短期內因外國的壓力而完全滅亡，則不僅在技術方面，而且在國家和社會組織上有許多東西必須根本改變。這個維新運動（這是一般人所知的名稱）的領導人是一個來自華南廣東的高級候補官員<sup>①</sup>，名康有為。1895年他與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創立了一個會，研究西方成就和中國改革的可能性（強學會）。分會和其他有同樣目的的組織及傳播他們思想的報刊迅速地在中國其他各地創辦起來了。康有為已經在1888年向皇帝上了一個關於改革的奏折；但是，因為它的超乎尋常的內容，為有關當局所扣留而沒有上達到指定地點。1895年中國被日本打敗後，他上了第二個奏折。當時正聚集在北京的來自各省參加會試的二千名以上舉人都在奏折上簽了名。奏折抗議批准和約並要求徹底改革國家機構。不久以後康上了第三個奏折。這個奏折通過皇帝的師傅翁同龢才到皇帝手中，因而對他發生了一個深刻的印象。這個奏折發給各省總督和巡撫，康有為本人也被派為工部主事。同年他上了第四個奏折，但因敵視改革的官員竭力反對他，康在北京繼續呆下來象是不甚適宜，所以就回到故鄉，

<sup>①</sup> 康有為最高的官銜是工部候補主事，位僅正六品，是中下級官員，不能稱為高級。——譯者

并在那里积极活动，发挥和传播他的思想，而且获得成功。直到1897—98年外交形势照他所陈述的方向迅速尖锐化时，他才通过第五次上书而使皇帝倾听他的改革计划。在情势的压力下，改良运动最后成功地博得皇帝接受它的思想。1898年6月康有为得到皇帝召见的命令；从那时候起，他和他的一批同道的人实际上成为皇帝的顾问。

1898年的事变绝对受了皇帝同皇太后之间存在着剧烈矛盾的影响。太后在皇帝未成年时期代替他领导政府，甚至在他成年(1889年)后，还将政权保留在她手中。她是一个积极能干，但是好揽大权不顾一切的人。一个绝对矢忠于她的小集团，在宫廷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除了这个集团以外，她的话事实上比懦弱而比较不积极的皇帝的話更为有力。如果维新派在皇帝和一批特别接近他的人方面找到同情的話，这不仅由于他们对国家幸福的关怀，而也因为他們希望借维新运动的帮助巩固皇帝和他的追随者的地位并击退，或者如果可能的話，排除皇太后和她的小集团的力量。这件事的结局，并不是为了如何解决维新与反动之间的矛盾问题，而是为了皇帝与太后之间的矛盾问题。使冲突尖锐化的还有某些反满倾向。这些倾向，虽然不是康有为方面，但是在维新运动其他刊物上，有时候非常明显。

对维新运动說来，这个错误的敌对形势，康有为和他的朋友可能没有正确地认识和估计到其影响的敌对形势，就成为一种灾难。在大约一百日的短短期间里，由维新派所慫恿的皇帝諭旨不顾所有其他政府官署的反对纷至沓来。这些諭旨如果一一实现，将意味着整个政体的根本变动。他们计划把皇太后完全排斥于政府之外，必要时采用暴力手段。这种仓猝而未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使

太后領導下的反对派迅速地发觉了他們的計劃。通过政变，皇帝被武装暴力地拘禁起来，并且幽閉于三海里的小島上以終其余年。皇太后亲自执政。頒布了逮捕維新运动領導人的命令。康有为，后来几次出面的梁启超及其他几人幸运地搭外国船逃往香港或日本。其他六人被捕并立即正法。在維新运动牺牲者之中，最著名的人物是湖北巡撫的儿子譚嗣同；他也有逃亡的可能，但他虽然明知当前的命运，却仍留在北京。据說，他对劝他逃亡的朋友說：“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聞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

康有为和他的集团首先认为接受西方的实学和技术的成就对中国还是不够，所以改变全部政治制度是絕對必要的。但是，紳士階級和屬於維新运动的代表而与太平天国革命領導者相反的有教育的上等階級的观念，仍深受中国傳統的儒家世界和国家观念的影响，而不能有与儒家傳統完全决裂的思想，因此，他們轉到符合于儒家认为神圣的經典著作，想在其中找出挽救中国目前災難的道路。研究經典的結論是如此的：在最近二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原有的傳統被人敗坏伪造了。因此回到上古时代真正的典型极为重要。康有为和他的朋友在这方面发现經典著作中有新的哲学；嗣后，他們对孔子和他的学說的观念变为同几百年来官方认为正統的傳統解釋大相徑庭。他們想在經典著作中找出提到他們所羨慕并希望輸入中国的許多西方的成就和制度，例如，人民以国会形式参加政府，专门訓練和組織职业官吏（当时的中国官吏虽然有极緊張的訓練，但只是一般的而不是专门的），及类似近代的学校和教育制度等。俄国在彼得大帝下的改革和日本自1868年以来的明治維新特別而且常常被提出来作为外国的榜样和先例。当时所有的



人也許都共同体会到，一个无足輕重的小小島国，开始时象中国一样是听凭外国处置的，怎样在不到几十年里变成为一个近代化的、强大的国家，而且它已經在世界政治上开始起着作用。在百日維新的短短期間里，維新派德意頒布的皇帝諭旨系有关依照西方的典型研究科学，特别是实行技术研究和教育。改进农业生产方式，按照西方榜样实行軍事訓練，在北京設立一所大学。革新学制、取消現行的选拔高級官吏的傳統考試制度，制訂并公布政府每年的預算。裁汰无所事事的衙署，罢免反对維新的官員的职务等等。虽然在太后領導之下的反动势力胜利以后，所有这些命令均宣布立即廢止，但是新思想因維新上諭和維新运动的宣傳活动而傳播到各地，且在年輕学子中，也就是知識分子中，获得了一定的反应。在接着下来的年代中，一大部分在維新諭旨中頒布的、但后来取消的改革計劃，以比較慎重的形式重新頒布且逐漸实行。維新运动基本上为日后的革命准备了道路。

尽管一切个别的評論說維新运动的特点是“資产階級資本主义的”，可是人們到今日还认为它是革命的重要先驅，并紀念那六位在反动势力下牺牲的人，特别是譚嗣同。譚嗣同在思想上超出維新运动中最激进的人。除其他的东西之外，他还否定傳統的、严格的家庭制度，主張解放妇女，贊揚民主，反对专制。他相信所有这些原則可以溯諸孔子学說的原来內容。但是，尽管提出这一切批評，譚仍旧是淵源于傳統，因此基本上不同于五四运动的思想領袖們。他們是想否定中国整个傳統的。

据中国共产主义历史学家的意見，維新运动必定要失敗，因为它只是紳士中的一个比較小的集团所进行的，而不是以一个强大的人民运动为基础。这个批評肯定地不是沒有理由的，但是，即使

沒有广大的人民运动，如果其领导人有比較多的政治技巧和远見，并且对太后不采取錯誤的反对方式而設法爭取她接受他們的思想，維新运动也許能够成功。因为太后本身原不是絕對地拒絕維新。經過 1898 年的經驗后，她当然感觉到維新运动全部是針對她自己的地位的，因此，她最后同她周圍最激烈的反动者联合起来。随后发生了 1900 年的事件。如果 1898 年的維新嘗試成功了的話，便不可能照同样方式发生这次事件。

（傅吾康：《一百年来的中国革命，1851—1949 年》，第 71—79 頁，孙瑞芹譯。）

## 十、杜巴比艾：論戊戌变法

1898 年是現代中国研究者选为研究工作出发点的一年。事实上，因为此年中国初次試行种种改革而終归失敗，于是不可制遏的反滿运动即由此萌芽，其后逐漸壮大，不久遂演变为 1911 年的革命。

1898 年正是光緒帝在位之时，他在西太后的权势之下，是一位徒有虛名而无实权的皇帝。他天資聰敏，明达西洋事物，了解自己的国家不能再如此酣睡下去。同时不幸的甲午战争的慘痛教訓，以及战后的馬关条約（1895 年），俱使有識之士感到悲憤。

因此，光緒帝决心改革中国旧式的政治組織，他在如此的考虑之下，乃录用卓越的学者康有为，康曾著述过关于彼得大帝改革俄国的书籍，写过关于現代日本的論文。此乃从来未有的适意的人选。康有为是此时代的改革者之一，他并不想拋棄有悠久历史的

傳統，然希望解救民众。他认为不应单由皇帝来代表国家，应由国民全体来代表。他的弟子称赞他是中国近代唯一的学者，是“当代圣人”。輔佐他的是門人梁启超。

光緒帝和他的輔佐者着手拟定改革計劃，公布关于改革軍隊、民众教育及农业、矿山、铁路、言論等等許多的上諭。

可惜光緒帝空有值得贊賞的热情，而不是能够貫徹此种計劃的实际政治家。滿洲貴族害怕如此改革将危害他們的各种特权，乃利用专制暴戾的老太后来击败这位意志薄弱的皇帝。他們应用阴謀詭計，在开始改革的1898年9月，发动宮廷政变，使軟弱的光緒帝不得不同意退出政治舞台。康有为于极端危險之中逃亡国外。

（杜巴比艾：《中国近代史》，第10—11頁，傅仲涛譯。）

## 十一、白柳秀湖：論清末的改革运动

根据从前在日本发表的中国国民革命史記載，滿清政府觉悟到急需改革政治，是在1900年义和团事变之后。此乃一致的意見。

如此，則对于叙述后来袁世凱如何背叛中国的国民革命，阴謀变更国体，自即帝位这一段历史，即有些交代不清之处。我认为，滿清政府真正感觉到专制、保守的政治不好，是在德宗光緒20—21年（明治27—28年，1894—1895年）甲午战争遭受到悲慘的失敗以后，岂不妥当？日本在此次战争中所以能获得举国一致的光輝成果，中外人士都认为是立宪、議會政治所結的果实。中国人有見于此，于是就产生了一种穩健的革新論，主張中国亦須仿效日本明治維新，首先采用君主立宪制，具备近代工商业国家的各种机构，

立下富国强兵的基础。在国民革命的前夜，登上政治舞台充当此运动领导者的，乃是广东人康有为。

康有为与孙文同是广东人，他虽生长在自郑成功、洪秀全以来充满了对满清革命空气的环境里，其救国之策却与孙文完全不同。他完全是以一个清朝忠臣的身分，为挽救爱新觉罗氏的中国于灭亡的深渊，乃倡导应效法日本明治维新，从根本上实行改革庶政，以完成近代国家的机构，是为目前之急务。对于满清政权未有比此更适当而稳健的有利的意见。虽然如此，以西太后为中心的满清守旧派，眼见康有为得德宗的信任，逐步开始实行其新政策，不胜嫉妒，乃企图乘该年10月19日天津举行北洋陆军阅兵典礼之际，诉之于武力，实行废立，用以一网打尽康有为一派的维新人士。事已至此，维新派亦不能束手以待保守派之来。西太后之侄荣禄<sup>①</sup>是当时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领北洋三军，拥有最大的兵力，成为满清政权之爪牙。德宗认为目前天下足与荣禄的兵力相对抗者，是直隶按察使兼督北洋新建陆军的袁世凯。乃于10月19日拂晓召袁入宫，授以机密，托以杀荣禄、幽西太后于颐和园内的大事。此时袁立即受命行事。退出宫中之后，乘第一次火车去天津，即往见荣禄，而以帝之密旨告荣。荣禄闻此大惊，立刻晋京，谒见西太后，告以帝之密谋。西太后当夜召集皇族、大臣于宫中，发兵包围宫城，执帝，反而幽帝于南海小岛瀛台之中。康有为预知情势迫切，遁往香港，梁启超于克服种种危险之后，才亡命到日本去了。谭嗣同等六人则被捕处死，是为清末戊戌政变。

自此次政变以后，德宗在以西太后为中心的守旧派严重的监

<sup>①</sup> 西太后姓叶赫那拉氏，荣禄姓瓜尔佳氏，二人并无宗族关系。——译者

視之下，与外界断絕一切交往；在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冷酷的禁閉之中生活有十年之久，于公历 1908 年 11 月 14 日去世。

由于戊戌政变，悲慘的被斬断了根苗的滿清时代的中國穩健的革新意見，正如一般中國國民革命史所說，到了 1900 年义和团事件发生以后，才再度抬起头来。义和团事件后之翌年 9 月，湖广总督張之洞、两广总督刘坤一二人連名向朝廷提出改革政治的意見(变法会奏)。此即近代中國的立宪运动的开端。据他們的主張，鉴于日本銳意采用西洋文化，不过三十余年間已建成輝煌的立宪法治国之先例，中國政治必須改革，应以創立立宪議會政治为目标，从速頒布預备刷新庶政的法令。

他們的会奏当时被认为是最适时宜的，北京政府当局大受感动，由 1902 年至 1905 年間，繼續頒布了关于刷新庶政的一些法令。派留学生往日本及其他欧美各国，同时招聘外国教师，对国民施行西洋式教育。于此后三、五年間，派往日本的留学生約一万二三千人，聘請来的日本教师約六百人。于是，中國要求革新政治之声漸次高漲起来。在实际工作中，拚着身家性命以求革除积弊的忠实人士亦不少。派往海外的留学生因太求速成，其所学得的新知識多不能用于实际的政治。

(白柳秀湖：《明治、大正國民史》，第 85—89 頁，傅仲詩譯。)

## 十二、矢野仁一：論戊戌变法

为求国家强盛，中國开始想到必須改变国家的制度和組織，单

凭模仿西洋的炮船兵制无济于事，这还是甲午战争以后的事。从这时起，中国有人开始唱出变法改制或变法自强等等論調。继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在光緒 23、24 年間（1897——1898年），各外国在中国煽起了爭夺利权的竞争，使中国受到刺激而变法的風潮也随之更加高漲，终于在光緒 24 年演成了光緒皇帝著名的戊戌新政。当时光緒皇帝要設置制度局来改变国家的一切法制；廢除科举，建立京师大学堂，在全国各地設立高等学堂、中等学堂、小学堂和农务学堂；設立官书局，編譯各国的政治、法律、史傳等等书籍；发行官报；撤銷繁冗官衙等等。主要目标在于启发民智，洞开言路。

戊戌变法几乎在沒有看到什么实际成效以前就发生了戊戌政变而归于失敗了。若仅就自甲午战争以后兴起的变法改制論开始一直到戊戌变法为止这一段时间內的經過情况来加以考察，則戊戌变法仿佛是中国的大势所趋，沒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它的发展；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更广泛、更冷靜地观察中国的大局，又觉得当时中国的大势依然是被“祖宗的成法不可变”的思想支配着。戊戌变法，是抱有变法改制思想、拥护表面上說是“亲政”而实际上处于西太后監視之下不能自由治事的光緒皇帝的极少数志士們，和以西太后为护符、以“祖宗的成法”为盾牌、企图扼杀一切变法活动的多数王公大臣之間展开的一場斗争。因此，它的失敗應該說是必然的。戊戌变法是被維護“祖宗成法”，也就是維護中国这个德治主义世界帝国的組織制度的力量所扑灭了，也可以說是被这种組織制度本身的力量所扑灭了。戊戌变法的目的在于改变旧的政治組織，建立新的政治組織。他們所要廢除的旧的政治組織，是以天子本身的“德”和受之于天的“位”以及由这种“德”和“位”产生出来的天子的尊严为原动力，以求自然治化的政治組織；他們所要建

立的新的政治組織，是以启发民智、洞开言路为基础，以求国家富强为目的的政治組織。这个目的本身就可以令人想象到中国天子的尊严已經丧失了。怎么能够設想一个失去威严的天子，在輿論暢达的时候还能够繼續維持他的政权呢？因此，戊戌变法即或在其发动当时不立即失敗，到了輿論暢达的时候是否还能够成功？这是很值得怀疑的。只是戊戌变法如果不在其发动当时立即失敗，或許会使那些认为依靠滿清皇帝和滿洲朝廷来改变国家的組織制度比較容易达到变法自强的目的的人們，不致于在失望之余对滿清皇帝和滿洲朝廷丧失信心，而终于跑到革命党那方面去；同时，也不致于产生不推翻滿洲朝廷、不廢除清朝皇帝，就不可能改变国家的組織制度，不可能达到变法自强的目的的思想。从而，即使有少数抱有排滿主义的革命党人掀起革命运动，或許不致于那么简单地就把一个偌大的大清皇朝推倒了。

戊戌变法失敗后，光緒 26 年（1900 年）发生了义和团匪乱，即所謂拳匪事件。这个事件表明：已經仿效了西洋的船炮兵制并认为有必要实行新政的滿洲朝廷庇护和支持了人民的排外仇教运动，或者是想假借这种运动来把在中国的外国人和外国势力一举蕩平。这就更好地证明了当时的所謂新政并不是朝廷在自觉的基础上实行的真正的新政。戊戌变法既已因为反对它的反动势力占压倒优势而归于失敗，那么在它失敗以后又发生了拳匪事件，这也應該說是自然的趨勢。如果上面仅有朝廷的支持而下面沒有地方官員和士紳、民众的附和，义和团恐怕不会鬧得那样声势浩大。幸好当时張之洞、袁世凱、刘坤一、端方、李鴻章等地方督撫把光緒 26 年 5 月 20 日（1900 年 6 月 20 日）以后的上諭当作伪諭，不肯盲目附和朝廷，对排外运动采取不协力的态度，一意致力于自己所轄地

域的和平；倘非如此，义和团不知要鬧成多么大的变乱了。义和团匪乱的结果，造成了八国联军攻占华北，西太后和光绪皇帝蒙尘西安；满洲朝廷必须对庇护和支持拳匪变乱的过错向外国表示悔改，并做出悔改的保证，于是就形成了所谓清末的变法。策划戊戌变法的人们还有发奋图强的心愿，策划清末变法的人们则连这样一点心愿也没有。由于满清朝廷干下了类似阴庇拳匪变乱的行动，所以在外国的胁迫下不得不对庆亲王、端郡王、毓贤等祸首大臣加以严惩，使国家蒙受了极大的耻辱，同时又不得不向外国解释说：庇护拳匪变乱，并非朝廷本意，朝廷的本意在于变法和施行新政，只是朝廷在端郡王和庆亲王等顽固派的挟持下才在无意中庇护和支持了他们。清末的变法就是在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实行的，可见并非出于朝廷的自觉自愿。清末的变法虽然不是出于朝廷的自觉和自愿，但是国家既已遭受了莫大的耻辱，再也不能不痛感变法图强的必要了，因而一旦变起法来，倒也相当严肃认真。不料这一变法，反而成为促进满清皇朝灭亡的原因了。

前面已经说过，作为这个德治主义世界帝国的组织制度的“祖宗成法”的改变，其本身就意味着朝廷威严的失墜。满清朝廷从前说“祖宗成法”不可变，对戊戌变法横加阻挠；到后来由于国誉受到损伤，国权遭到损害，受了极大的耻辱，又不得不改变态度，出尔反尔地实行改变“祖宗成法”的变法，真是向天下暴露了它的浅识短见，丧尽了朝廷的尊严。

我甚至认为戊戌变法如果不失败，清朝的寿命也许还会再长一些；拳匪乱后满清朝廷如果不实行变法，那么它的命运也许还会更长一些，我以为满清朝廷自从同外国发生关系、证明它已经不再是统治天下的世界帝国的时候起，就已经扎下了必定灭亡的根子。



因此，清朝的灭亡并不是突然的，只是变法更加速了它的灭亡而已。中国历代皇朝的灭亡，都证实了“有德者民心归服，受命于天，统治天下”的这种政治理想；清朝的灭亡则是因为这种理想已经灭亡而灭亡了，或者可以说是与这种政治理想同时灭亡了。因此，清朝的灭亡不单纯是一个皇朝的灭亡，而是意味着中国这个世界帝国的灭亡，这恐怕是对于清朝灭亡的最好的挽词了。

（矢野仁一，《近代支那論》，第526—534頁，鄭念之譯。）

### 十三、宮崎市定：論戊戌变法

日本与中国俱为外国势力所迫，不得不放棄閉关自守的政策，采取开国通商的方針。两国的不同点，只在于日本有攘夷論者，同时亦有开国論者与之对抗；中国則未有真正的开国論者，同治中兴之后，李鴻章等进步主义者虽主張輸入欧洲文化，然此仅是在尊重本国文化的基础上輸入外国文化，认为只要学习一些外国的技术就够了。因此，在接受近代文化方面，中国落后于日本。及至甲午战败之后，中国在国际上处于更不利的地位。于是一部分知識分子开始认为中国不但須学习技术方面的欧洲近代文化，并且政治的根本方針亦需要有所改革；否則，中国将在国际竞争場上完全失敗。此即康有为所倡导的变法自强运动的观点。

康有为生于广东，中国近代国学中的第一流学者，早年和西洋文化有所接触，而深知其价值。他在政治上，认为法国式的革命不适于中国，中国須在君主統治之下，实行相似于俄国彼得大帝及日

本明治維新一類的大改革，執行反映民間輿論的歐洲式民主政治。此種思想起初被認為是一種危險思想，為政府所嚴禁。及至甲午戰敗，列強勒索租借地時，政府內部亦有人贊成此說。至戊戌年（1898年）4月皇叔恭親王病死，光緒在政治上無人掣肘，乃任用康有為實行政治上的改革。

戊戌年6月至9月百日間，光緒帝紛紛降下政治改革的詔諭，如連綿降下的春雨一般。試觀其內容：設大學於北京，設中、小學於全國各地，以培養人材；設譯書局，翻譯西洋書籍；停止科舉制度，考試政治、外交、經濟、理學、工學等學科，以作任用人材的標準；整頓軍隊，實行新式操練；獎勵發明以促進工農業的發展等等，其改革涉及各方面。但是接受此諭旨的官吏既無實行能力又無誠意，諭旨雖下，只是空文，反而引起政治上的混亂。這樣，光緒帝的改革終於失敗。由現在看來，其理由如下：

首先，康有為的政治改革思想，是以皇帝為中心，以日本明治維新為其典範。然而日本明治維新時代的政治條件與中國戊戌變法當時的政治條件大相懸殊。明治維新是以江戶幕府的崩潰為其前提條件，促成明治維新的是西南雄藩的實力，運用此實力的是明治政府。維新的理論根據是王政復古，日本過去的历史對於王政復古的論點早已發揮了巨大的作用。至於清朝，是外族建立的征服王朝，維持此王朝的實力是滿洲的武力。在清朝建立征服王朝的初期，滿洲人代表一種革新的勢力，擔當改革明朝腐敗政治的任務，至光緒帝時，滿洲人已完全貴族化，代表最頑固的勢力。如果真要改革政治，必然觸犯他們的既得權利，甚至危害他們的存在。但是光緒帝的改革卻絲毫未觸及滿人的權利，並予以有意的迴避。然若仍舊保留此等保守勢力，所謂的政治改革亦僅及於政治的末

节而已。其实即如此細微末节的政治改革，亦遭受到反动派的摧殘。

其次，康有为等想首先着手改革的是汉人社会。目标在于改革官吏制度，改革旧科举制，以任用具有新知識的人材。这对于汉人的保守势力是一大威胁。当时因經過长时期的清朝統治，滿汉几乎一体，汉人的保守势力与滿人的保守势力密切結合着。所以康有为如果从汉人社会着手改革，滿人与汉人将要联合起来反对他，乃是当然的道理。

最后是皇帝实力的問題。自宋以来，中国皇帝有专制独裁的权力，这是事实。可是那也不是象魔术师那样的，念一念咒語即能办到任何事情。此种独裁君主原是靠官僚与军队来支持，皇帝虽可罢免每个文武官僚，而对于文武官僚全体則毫无能力，皇帝反而是官僚与军队的代理人。如果皇帝危害文武官僚和军队的权利，他們便要起来反抗皇帝，皇帝即从群臣中孤立起来，陷于自灭之境。由此看来，独裁君主反而是官僚与军队的傀儡。光緒帝尚有家族关系問題。光緒是同治的从兄弟，据清朝慣例，从弟不能继从兄之位。可是同治帝的母亲西太后极力排除反对論，硬立光緒继同治为帝。光緒帝幼时，西太后再度垂帘听政，至光緒帝成年之后，方撤帘还政。后来发生了甲午战争，西太后对此虽亦有責任，然主要的責任仍在光緒帝。西太后因此对于光緒帝的政治措施大为不滿。

光緒帝的政治改革，在保守派占多数的政府内部，遇着强大的反对势力，因此西太后有意干涉。光緒帝觉察到这点，以为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必須采取非常手段，乃召李鸿章的部下袁世凱由津入京密議，企图用他的兵力幽禁西太后。然而袁世凱将此密謀泄漏給西太后，西太后反而执光緒帝，加以幽禁，于是进行第三次垂帘

听政。光緒帝的改革几乎全未实行，一般称之为百日維新。光緒帝所任用的維新派，俱作为叛逆者受到了处罰，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等逃亡海外，这就是戊戌政变。

(宮崎市定：《戊戌变法》，見京都大学編《东洋史》上卷(中国史)，第 391—394 頁，傅仲涛譯。)

## 第十三章 美国的門戶开放政策。 义和团运动

編者按：这里选录資料五十篇，其中十八篇是关于美国的門戶开放政策的，其中三十二篇是关于义和团运动的，代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的資產階級反动学者对于这两个问题的看法。义和团运动以后，美国的門戶开放政策又增加了新的內容，美国反动学者在誣蔑义和团运动的同时，对門戶开放政策又作出了新的解釋，所以我們把这两个问题的資料汇集在一起。

美国門戶开放政策是十九世紀末帝国主义在中国疯狂地夺取租借地、爭夺路矿特权、分割势力范围的情势下提出来的。1899年美国第一次提出对华門戶开放政策时，它在中国的势力，还不及其他列強。它剛战胜西班牙，在菲律宾的統治基础还不稳固，沒有力量与其他列強爭夺中国。美国提出这个政策，承认其他列強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和既得特权，同时要求与列強处于同等地位，共同分享在中国的一切权益。第二年7月，正当义和团反帝斗争处于高涨时，美国第二次提出門戶开放政策，虚伪地主張“保持中国領土和行政完整”。美国企图依靠已超过其他列強的經濟实力，在門戶开放政策的掩蓋下，逐步排挤和压倒侵华对手，把一个“領土和行政完整”而又全部对外开放的半殖民地中国最后变为美国的独占物。确定門戶开放政策是美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步骤，反映了壟断資本家侵略中国的阴險手法。外国反动学者却把門戶

開放政策說成是美國對中國的友好政策。例如馬士說：門戶開放政策是美國害怕中國被瓜分而設法予以防止的政策。寇亨利說：門戶開放政策是為了阻止中國的被瓜分，但并不阻止勢力範圍的繼續發展。賴德烈說：門戶開放的原則，日後有極重要的意義，由於這個或其他原因，中國沒有被瓜分。義和團運動以後，美國對華政策阻止了列強瓜分中國，並保持了門戶開放。拉鐵摩爾說：門戶開放政策實際上阻止了劃分中國為殖民地的過程，是一種所謂制止俄國的主義，它事實上促成了由海道進入遠東貿易的國家的聯盟，以維持互相競爭的條件，並強迫俄國遵守那些條件。克萊德說：美國政府想通過門戶開放政策，要求在中國境內，尤其是在所謂勢力範圍之內，保證所有國家工商業的完全平等待遇。門戶開放政策使一九〇〇年末中國被瓜分的危險暫時再一次被阻撓了。費納克說：義和團失敗以後應該導向中國的瓜分，但門戶開放政策保持了中國領土的完整和各國商業上的機會均等。伯斯說：門戶開放的原則在於使中國保持領土與主權，維持條約及國際法所保障各友好國家的一切權利，和確保各國在中國貿易上的平等的原則。海思說：美國為中國之友邦，不求勢力範圍，而主張門戶開放。所謂門戶開放，意即開放中國各地，在平等的條件之下，各國的人民得以進行貿易與投資。斯溫說：英國和美國主張門戶開放政策，以阻止中國整個的瓜分。魏爾特說：美國的門戶開放顯然不是要獲得物質的利益，它是美國反對英帝國殖民主義的一種表現。宮崎市定說：門戶開放政策主張各國的勢力範圍內，一切國家在通商、航海上享有平等的待遇。‘如果要貫徹這一政策，勢力範圍的存在即不合理，當時中國感到主權喪失，因而歡迎門戶開放政策。’中國的恢復主權運動日趨興盛。鈴木俊說：門戶開放政策使中國得以免于瓜分。

外国反动学者用花言巧語对門戶开放政策作了种种解釋，其目的只有一个，即是否认帝国主义、特别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欺騙中国人民，为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作辯解。

义和团运动是在帝国主义加紧压迫中国人民，企图瓜分中国的情况下激起的以农民为主的自发的反对外国侵略和压迫的爱国运动。参加的基本群众是农民，其次是手工业者、城市貧民、散兵游勇、小商贩和水陆运输工人等等。清朝統治集团里的部分反动官僚曾用形式上支持义和团的手法削弱义和团运动反封建斗争的鋒芒，并企图控制义和团运动。1900年6月义和团进入北京，帝国主义即出兵干涉。清政府曾对帝国主义列強宣战，但这只是被形势所迫而作出的对人民的一种欺騙手段。清政府不仅沒有作战的准备，而且还在繼續与帝国主义勾勾搭搭，甚至采取措施鎮压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最后在帝国主义八国联軍殘酷鎮压之下，才宣告失敗。外国反动学者論述义和团的著作，一致否认八国联軍是帝国主义鎮压义和团运动的侵略战争。他們对义和团运动作了种种歪曲和誣蔑。例如翟理斯說：拳乱开始发生时，据說是由于民众与基督徒之間的糾紛而引起的。怀德說：义和团者本非政治上之組織，特借政治以达其破坏之目的耳。义和团与列強肇衅之事，本可立召瓜分之禍，其所以不至于此者，則以是年10月英德两国协定一条約之故。胡特生說：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压迫，在中国产生了一种強烈的爱国感情，在一部分統治階級中間形成維新运动，在另一部分則酝酿成一种要以屠杀手段驅逐外国人出中国的排外运动。戊戌变法失敗以后，一般保守主义者有了机会，他們与一种名叫义和拳的秘密社团发生联系，排外运动遂一发不可制抑。賴德烈說：

义和团是民兵团体。义和团騷动的原因很多，实际上一切促成全国不安的因素均存在着。施达格說：义和团从开始时，既不是革命的团体，也不是邪教的团体，而为一忠实的志願民团，因政府和人民的合理諒解而得以存在。义和团冲突是中西文化冲突的結果。他认为：中西文化互不相同，两者各自分离各自独立。西方物质的进步使中西不能长此隔离，西方自然的进步与扩展，并非錯誤；中国保存旧有的良好文物也不能輕易菲薄。西方的侵略或中国的拒絕西洋的革新事业，都不能說是有意为恶。中西政府不过是根据各自的政策，表示两种不同的自然景象。人类彼此間的关系上，誤解、驕矜、愚蠢都是些不可避免的因素，所以义和团运动，就是自自然然发生出来的。我們对于中国和西洋都不能加以非难，但庚子事件的主要責任却应落在列強及其正式或非正式的代表們身上。費正清說：义和团暴动具有傳統的农民叛乱的特点，但是缺乏太平天国运动的目标。它是秘密会社里的狂热的成員所领导的，他們后来受到仇外的官吏和紳士的支持。这是一种自杀性的徒然举动。克莱德說：义和团为一种盲目的、无知的爱国主义所鼓舞，沒有提出建設性的改革綱領。和田清說：戊戌政变之后，守旧排外的風气盛极一时，山东义和团兴起，标榜扶清灭洋，杀害外人，清朝不但不加彈压，反而暗中鼓励，遂酿成所謂义和团之乱。矢野仁一說：“拳匪”之乱的本质是中国社会本身經常存在着的騷扰精神。宮崎市定說：义和团是秘密結社，西太后在背后支持义和团，使之襲击外国人。小竹文夫說：戊戌政变后，反动的守旧派当权，这些人的排外感情日益反映到当时政府的对外政策中，其結果产生了义和团事件。洼田文三說：戊戌变法失败以后，西太后左右只有些冥頑不灵的保守派，动辄与时务逆行。他們相信用义和团事变这样野蛮暴举，可



以驅逐外人，挽救六十年来的失敗。白柳秀湖說：鴉片战争以来，白人对中国的暴行，已使中国人忍无可忍，1900年西太后一派的保守党便利用这种情势，指使义和团以遂其排外的政策。內藤湖南說：八国联军时，天津建立了都統衙門，执行着各国的联合統治。只要中国人肯拋棄国家独立的面子，这种都統統治对中国人是最幸福的。

外国反动学者对于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的想法，正反映帝国主义和它的文化策士在群众运动在战争与和平問題上的反动观点。他們不敢正視群众运动，誣蔑义和团为“拳匪”，为“暴众”。他們不願承认战争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种性质，不敢承认帝国主义与中国人民之間的战争，在帝国主义一面是侵略的、非正义的而在中国人民一面是革命的、正义的。他們的目的不仅是要誹謗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瓦解中国人民的斗志，而且要掩盖帝国主义的侵略面目，抹煞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矛盾，緩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

## 一、馬士：論門戶开放政策

美国曾經站开。它在1898年忙于对西班牙作战，在1899年忙于应付菲律宾的叛乱；但是舍此而言，国外侵略和割让不接壤的外国領土的要求也是和它的一貫政策互相抵触的，可是馬琴力总统的政府看見势力范围在中国的建立，不禁有些惊慌，在这些势力范围地区，别国为它們的臣民要求，并且获得了专有特权的让与，而美国人却在那些地方硬被排斥在铁路和矿山的开发事业以外；

但是一向致力于“門戶開放”政策而这时更加倍致力于此的英国所不能担任的工作，显然是美国力所不能承担的。资金，工程与工业人才，以及铁路与采矿材料等的供应，这时在帝国的某些省份要屈从于利益关系国的否决权，至于在其余一些省份，主要由于英国政府的行动，还似有可能；但是对于铁路和采矿设备以外的无限制商品交易，各处都还没有关门，美国政府就着手来维护这个門戶的洞开。

海約翰在1899年9月6日行文美国駐英、法、德、俄等国大使，又在11月13日和17日分別行文駐日本大使和駐意大利大使，訓令他們从各該派駐国政府取得一項正式保证，声明各該政府在它的不論什么样的势力範圍內，

“一、在中国任何所謂势力範圍或租界地內的通商口岸或既得利益，無論如何不得加以干涉。

“二、关税只应由中国政府按照中国协定稅則征收。

“三、它的本国臣民不应享有任何优惠的港口捐或铁路运输的利益。”

列强都給以所想望的保证。俄国以“关税問題的決定是中国本身的事”一节作为保留，但否认有任何“为它本国臣民要求任何排斥其他外国人的特权的意圖。”德国声明它“不但从一开始就主張，而且实际上在它的中国租借地內对于貿易、航运和商业还最彻底地实行各国絕對平等的待遇；”又說，“德国对远东的政策在事实上就是門戶開放的政策。”法国声明，它“希望享有中国全境內各国公民和臣民的平等待遇，特别是在关税、航运稅、以及铁路运输稅方面。”这三个国家中沒有一国表示任何要放棄在它們的利益範圍內为它們的臣民所主張的开发和发展資源专有特权的意圖。其

它各国則毫无保留地表示同意了。

在世界史上，沒有一个象中国領土这样广袤，人口这样众多，而又同隶于一个政府之下的国家——沒有一个拥有它的面积和人口十分之一的国家——曾經遭到这样一連串的侮辱，或这样多的受人輕視的证明，就象中国从1897年11月到1898年5月这六个月中所遭受到的那样；可是我們更不妨說，也沒有一个国家曾經这样地理应遭受它的厄运；沒有一个国家曾經在糾正行政上的公认弊端方面，或在組織由具有許多优良品质的坚强民族居住着的一个极其富庶的地区上的資源方面，表現过这样的无能。有一些爱国的中国人已經感觉到这一点，但是，虽然有很多人认清局势中的事实，但是想得出办法的却寥寥无几；而且那寥寥可数的几个人，在国家陷入更深的屈辱以前，还对于国家發揮不了任何作用。列强現在正心滿意足地期待着中国迫临的瓜分；它还得陷入那样深的一个屈辱阶段，以致列强会害怕它被瓜分而設法予以防止。

（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134—136頁。）

## 二、丹涅特：論門戶开放政策

英国需要一个同盟。日本未必会躊躇不肯参加，海約翰如果能随意作完全自由的选择，也許会贊成这种办法，虽則貝里斯福的計劃，在細則上是极可非議的。貝里斯福的計劃会将中国驅入俄国的怀抱，并挑起一場想起来都很可怕的战争。但是保护中国而不是毀灭中国的一个同盟却頗有可取。那些口若悬河大談其在美国

外交关系上以独立行动最为有利的人们，并不能从1899年以来美国和东方的关系中臚列出多少事实，来作为他們的論据的确证。若就在当时作为支持由海約翰明定範圍并由其他两国加以同意的一个共同对华政策來說，英、日、美同盟一定会比因而势必成为全无必要的那个1902年的英日同盟要可取得多。

在这危急之际，海約翰的特殊貢獻，并不是門戶開放政策的发明，因为那是和我們对华关系一样悠久的，而却是外交技术的运用，竟能在实际上既不求諸武力，也不求諸同盟，就使門戶开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证。这虽不是一个适当的办法，但是却很难以看出，在那种环境下，怎样还能够筹划出任何更加有效的办法。促致海約翰的努力得以成功的两个因素是：美国新近的軍事成就以及美国的一支龐大远征兵力的出現于远东和在国内保有龐大的預备軍；美国在华利益和英、日的天然一致以及和德国的可能一致。虽然并没有条約义务的痕迹存在，可是几个月以来，日、英、美之間却一直进行着相当程度的“互相让步”。美国在朝鮮王妃被戕之后，并没有想在朝鮮进行干涉，并曾經召还一个反日的美国代表；日本曾經撤回它对兼并夏威夷的抗議；英国曾經在西美战争中偏袒美国；这时美国政府則正在美国反英和亲布尔人的情緒并非不大的情形下，尽最大的努力在英布战争中維持最严格的中立。海—龐斯佛特条約正在談判过程中，并且英国曾經表示願意有所让步，以促成由美国独有而不是英、美共有的一条地峡运河的工程。一言以蔽之，美国这时已經又完全走上和西华德合作政策相似的一种合作政策了。

但是海約翰是和維廉·西华德类型很不相同的一个，当他轉而注意中国問題的时候，他并没有取法西华德对日本的那种驕

武政策，而是取法蒲安臣的那种比較直接、坦白、平和及独立的方法，蒲安臣曾經力求以協議的办法，挽救中国于列强的蚕食鯨吞。在1899年9月6日，他訓令美国駐倫敦、柏林和圣彼得堡的各代表即約瑟夫·綽特、安魯德·怀特和查理曼·陶威尔以有关在华商务权利的内容相似但文字不同的建議，征詢各該派駐国政府的意見。他針对各該国就一切国家在平等条件上的貿易自由一事业經发表的各項口头和书面声明，要求作下述内容的“正式宣言”：

“第一、决不干涉在中国的一切所謂‘势力范围’或租界地內的任何約开口岸或既得利益。

“第二、凡起卸于、或装运到上述‘利益范围’以內的一切口岸（‘自由’口岸除外）的商貨，不論属于何国，一律适用目前的中国稅則，并由中国政府照章抽稅。

“第三、不得向往来上述‘范围’以內任何口岸的他国船隻，征收比其本国船隻更高的港口稅；也不得在它的‘范围’內所修建、控制及管理的铁路綫上，向他国公民或臣民运經上述‘范围’的商貨，抽收比它本国人民运經同等里程的同类商貨更高的運費。”

这些建議受到了即时的注意。这些建議对于任何一个送达国都不是全部可以接受的。就連英国也想訂出几項例外，以适应它本国利益的特殊情况。可注意的是，虽然通牒中拟議把这项宣言适用于一切租界地，可是沙士勃雷勋爵却未将在九龙新租界的地方置于同意之列。英国为了一切实际目的，的确把这块地方看成是香港割让地的一部分了。其所以沒有采取割让而采取租界的形式，乃是为使德、俄、法不得据为先行，以便将它们各自的租界地变成真正的領土割让，以这唯一的一項在原則上无关重要的情形

为例外，英国同意了这项宣言（11月30日）。德国声明（12月4日），如果别国同意，它“不会提出異議。”法国终于11月22日被征詢意見，在12月16日作复。俄国在两天之后，发表了一项令人不可捉摸的宣言。被征詢意見在别国之后的日本和意大利，分别在12月26日和1月7日，立即予以同意。商談的消息在1900年1月3日向报纸披露。

曾經得到些什么呢？并不象想象那样多。美国并没有得到比它依据各条約中“最惠国”条款所已經享受的更多的事物。铁路和采矿的优先权益絲毫沒有受到妨碍。虽則美国明白約定，它不承认势力范围，可是复照却件件都变成了重申有这类范围存在的一个机会。在中国整个海岸上，再沒有一个良港可供美国租界为口岸，如果它想这样作的話。1900年3月20日，海約翰国务卿声明，他視那几国的宣言为“最后的定局，”即：維持門戶开放、由中国繼續抽收关税、所以也繼續在势力范围内行使主权权利，这样，停止帝国的瓜分自是理所当然的了。被认作是由柔克义起草的海氏通牒，无论是就其中略去的各点，或是就其中臚列的各点而言，都是意义深长的。由于其中所略去的各点，这些通牒标志出一些实质上的权利的放棄，这也許是美国貿易商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中本来已經計及但未能如願以偿的。这些通牒已經被大家錯貼了标签。它們并没有获得一种彻头彻尾的門戶开放。但是它們却防止了帝国的立刻被瓜分，因为列强已經允准給予中国的收稅主权权利以承认，它們也防止了任何象貝里斯福勛爵所建議的以外国人为官佐的那种警察計划的付諸实行。

如果被认作是一种純粹为应付特殊情勢的一时权宜之計，海氏通牒是大可贊賞的。就这一点來說，它們确是一个成功。作为

一个长久之策，它們却是不大足取的，因为它們并没有获得所希望的門戶开放，它們也沒有防止住列强間新的威胁性协定，特别是英日同盟。美国的确错过了一个为它本国利益和中国利益服务的偉大机会，但是失敗之責也不能归咎于海約翰。

門戶开放政策在美国政治上已經变成这样富有魔力的一个詞句，因而按照它在1899年的实际情形来下一个定义，乃是理所应為的。根据六十年来的历史以及各种环境和通牒的本文，茲下定义如下：美国仍墨守这个政策，而只有西华德曾經作有例外——单独行动而不是联合行动的那样一个例外。可是这种单独行动，并不是毫无合作余地的。美国政府放棄了在中国租借一处象胶州或旅順口之类的口岸的权利，因为所有的良好口岸不是已經被租借，就是被不割让协定取去了先占权。美国对于投資方面的門戶开放，并没有提出任何特殊要求；美国并没有寻求投資这样多的現款，使它值得为了別国已經取得的建造铁路或經營矿山的优先权而作一番口舌之爭，美国止于在美国商人已經发生了利害关系的那一部分中国地方，要求貿易方面的門戶开放，那一部分地方也就是南起广东、北至滿洲以西的一帶地方。至于朝鮮方面，美国在政治上或商业上都沒有利害关系，对于在中华帝国傳統領域內的极南端已經被法国勾划出了一个殖民帝国的所在，以及1860年俄国已經开始瓜分中国的黑龙江沿岸地方等情，美国始終沒有作过一次抗議。

設若列强不答应海氏的建議，美国政府究竟会怎样办？这虽然是一个臆度的但却也是一个有趣的和重要的問題，看来似乎是明明白白的：美国絕不会用武力来强求对門戶开放政策的承认，或是防止帝国的瓜分。在另一方面，中国的瓜分果真一旦开始，美

国國內必会有有一种反对袖手旁观而不参加分赃的极其强烈的情緒。考虑到海約翰所力予陈說和力加反对的一切，他的工作即使不被认为是一个堂堂的胜利，至少也应该被认为是一件重要的外交杰作。美国并没有很多的收获，正如此后二十年中所暴露出来情形那样，但是它所得到的，却也沒有付出任何代价，既沒有因此而承担任何义务，也沒有以任何实际的让步作为酬答。

（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第 545—549 頁。）

### 三、賴德烈：論瓜分运动和美国的門戶开放政策

在(馬关)条約簽訂以前，至少有一个中国顧問已經知道不会让日本保持它所拿到的一切。条約于 4 月簽署，翌月，法、德、俄三国对日本运用这样的压力，以致几个月后它把辽东交还中国，作为交还的条件它接到了一笔增加的賠款。法俄联合起来同英人和德人竞争借款給中国的权利。

列强不久开始为它們自己划分租借地和势力范围，且用建筑铁路特权来加强和扩大它們的立足点。因为这是一个創造帝国的时代，且在八十和九十年代非洲大部分已經被土地占有热的欧洲政府所划分，中国的繼續独立和領土完整的前景是悲慘的。

德国以一个德国天主教傳教士在山东被杀为借口占領了該省最好的海港胶州，而于 1898 年 3 月从中国获得了以九十九年为期的租借，它开发了灣里的口岸青島成为一个近代城市。它要求且得到了从青島建筑到內地的铁路和开发該省矿山的特权。俄国曾



想获得胶州，但未成功而取得了在滿洲的立足点。这个立足点同它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从中国并吞来的領土相連。

在德国同中国簽訂租借胶州条約的同月，俄国获得以二十五年为期租借辽东半島南端，包括旅順大連在內的借約。早些时候，中国曾于1896年应允当时正在修建西伯利亚铁路的俄国，建筑一条直接穿过滿洲北部的連接綫，这条路綫比起在俄国境內的沿黑龙江、烏苏里江的路綫可以更直捷地通达太平洋。中国也答应通过俄国的銀行来筹集修建长城以北各铁路的款項，这一铁路系統就是后来称为东清铁路的，俄国为它自己划定所有与俄国接壤的中国土地。这一政策后来由在1917年成为沙皇的继承者的共产党人以一种比較不明显的形式繼續下来。

法国把它在印度支那日益成长的帝国的触角向北伸出，直入中国。1898年4月它获得了以九十九年为期的租借广东的广州灣的借約，且得到了中国不割让东京边界上任何行省的全部或一部給第三国的保证。法国又要求而且被給予在这些省里建筑铁路的特权，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东京到云南昆明的狭軌铁路。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日本侵略期間，这条路成为进入华西的一个重要工具。

1898年4月日本有意义地要求中国不要把它最近获得的台灣对岸的福建省里的任何領土割让給另一个国家。中国回答說它不会把該省任何地区給任何列强，这样表明是不拟让日本把这地区作为日本的一个势力范围。

1898年比国人借法俄的支持获得了用借款来筹資建筑北京至汉口的一条战略铁路的合同，而且設法取得对于把該路扩充到广州的計劃的控制，虽然在这点上他們为中国人所阻撓。

作为中国对外貿易和开放中国于外界的带头者，英国不放心地注視着这个瓜分威胁和因此而将会在中国的許多地方由它的勁敌对它的商人和銀行家树立壁垒的可能。作为一种部分的保障，特别是对它当时认为它在亚洲的主要敌人俄国，英国于1898年获得了辽东半島对面的威海卫的租借，租期“以旅順口在俄国手中为限。”它又在1898年以九十九年为期取得一項土地租借权，扩大了1860年割让給它的香港对面大陆上九龙的土地。1898年2月，在租借狂潮掀起的前几星期，它正式接到中国政府的保证，接連揚子江的任何省不会割让給任何列强。这似乎可以保证它繼續进入中国本部中心的市場了，英国也企图把揚子江流域划为它的資本修建铁路的一个独占地区。它这样做，部分是通过从中国方面获得特权，部分是通过同德俄協議在它們彼此的势力範圍內，对于修建铁路相互尊重。在爭夺中国地方的这些不祥岁月里，还有不少其它的铁路特权被划定，但是沒有一个比以上这些更暗藏着瓜分中国的可能性的。

美国为了从这个似乎垂死的中国身上分享預料可以到手的財物只做了很小的努力。的确，有些美国人也曾企图获得某些修建铁路的特权，但是在实际修筑中沒有什么結果。可是美国方面并不缺乏兴趣。美国向西推进，橫越北美大陆直抵太平洋的梦想中，有一部分就是开发一般认为龐大的中国市場。而且正在1898年当欧洲列强爭夺着租借地和势力範圍的时候，美国并吞了夏威夷和菲律宾。这样，美国大胆地进入了太平洋，插足在中国的大門口，象它二十年前开始在薩姆亚暂时所做的那样。

那个久已成为西方擴張主义者目标的神秘的中国市場，是这个吸引力的主要部分，特别是在占有菲律宾群島的时候。在当时，

如果中国被瓜分了，新的占有者們几乎肯定地会建立差別待遇的壁垒的。麦金萊总统当美国打败西班牙后公开地主張并吞至少一部分菲律宾时坦白地說，这是为了扩大美国的貿易，且宣布他的政策是为美人和其他国家在远东“开放門戶”。

这似乎是美国的官方文件中初次使用这个名詞。这名詞后来成为美国在远东，特别是在中国政策的基础，至少有些英国人不是不願美国闡明这个原則，因为它会加强他們的傳統政策。他們从这个政策退却，只是由于一种打算在中国被分割时，能为他們自己保留一些东西的願望。

部分由于一个曾在中国海关服务的英国人的建議，由当时任国务卿的海約翰署名的通牒于1899年9月份送給欧洲主要列强和日本，請他們給予正式保证，在他們各自的勢力範圍里他們不干預任何通商口岸或既得利益，中国政府不仅应征收稅餉而这些稅餉应照海关稅則，且不应給他們的臣民任何优惠的港口稅或铁路費率，通牒也請列强合作，相互取得这个保证。門戶开放似乎是温和的原則，但其具体应用却受到冷淡和迴避的反应，可是，这样提出来的原則日后将有极重要的結果，而且或者是由于这个或者为了其他的原因，中国并没有被瓜分。

（賴德烈：《中国近代史》，第87—91頁，孙瑞芹譯。）

#### 四、宓亨利：論門戶开放政策

列强在中国爭夺特权（其結果有使中国被瓜分的可能）几乎不可能不激起华盛顿出来行动。在蒲安臣任駐北京公使（1861—1867

年)以后的一世代中,他所培植的合作政策由于空虚而死亡。在十九世纪末叶,美国必须决定在中国单独干——有被挤出局外之可能——与至少对合作伴作行动之间作一个选择。它选择了后者。1899年9月6日,巴黎条约批准书交换之后不到五个月,海约翰国务卿训令美国驻英、德、俄大使在下列各点上从这些国家的政府方面获得正式保证,在它们各自的利益范围或势力范围内。

第一、对于在所谓“利益范围”或租借地内的任何通商口岸的既得利益,无论如何不加干涉;

第二、中国现行的税则,应适用于在“范围”以内的一切通商口岸(自由港除外)装船或卸下的一切货物,无论其属于何国,而且应征的税项应由中国政府征收。

第三、不得对于开往这种“范围”内任何口岸的另一个国籍的船只课以较征自本国籍船只为高的港口税,又由各该国在“范围”内兴筑、管理、经营的铁路对于其他国籍公民或臣民的货物,应与各该国本国公民在同样距离所运输的货物征收同样的运费。

11月13、17和22日又分别向日本、意大利和德国政府要求了相同的保证。

所谓海约翰的门户开放政策并不是新的东西;它一开始就是推动美国公民和他们本国政府的最惠国政策具体应用的一种复述。这也不是海约翰所主要负责的政策。麦金莱总统早在照会递交五个欧洲政府和一个亚洲政府以前的一年,就用了海约翰在他的1899年照会中未曾用过的“门户开放”的名词。它甚至于也不是美国的政策。英国巴麦尊勋爵在他1840年2月20日给两位义律的训令中曾告诫他们,要牢记女王陛下政府不欲为其臣民获取不应同等地扩充适用于每一其他国家臣民的任何独占的贸易特权。

与此有相互关系的 1843 年的英中条約載有最惠国一款。而且英国商会联合会代表貝賜福勳爵当他旅行中国和日本时,于 1898 年在上海一次演說中曾用“門戶开放”这名詞,并声明它是英国内閣的政策。他后来在日本鼓吹以門戶开放原則为基础的一个商业同盟或諒解,并且提議一个英、日、美、德的联盟,附有“关于中国完整的具体諒解,以使門戶能繼續开放。”

当海約翰任駐倫敦大使期間(1897 年 4 月到 1898 年 9 月)首相兼外交大臣沙士伯理曾正式向他提出成立英、德、美同盟的願望,并且建議以維護中国的完整和門戶开放为同盟的目的之一。大使个人贊成这个建議,但認識到它是不能實現的,因为美国政府永远不願在国际关系中提供交換条件,或者担負維持中国完整的协定中所載的那种責任。

关于美国正式闡述門戶开放原則的直接原因,其最重要的是 1899 年夏举行的两次會議:一次是前中国海关英国籍稅务司賀璧理同海約翰国务卿,另一次是賀璧理同海的朋友和顧問柔克义。在 7、8 月举行的这些會議中和后来,賀璧理在口头上和書面上提出建議。这些建議构成柔克义于 8 月 28 日向国务卿海約翰提出的一項备忘录中的具体建議的基本內容。海約翰把建議包括于他的 9 月 6 日的通牒中。

賀璧理、柔克义和海約翰的工作无疑地使欧洲大陆国家在中国的行动放慢了。这一行动有利于美国,不下于有利于中国;否則华盛顿就不会象他們現在所做的那样地卖力。虽然“范圍”和“利益范圍”等名詞是放在引号里的,但它們的存在明白表示美国已經不加抗議地承认了它們。中国也沒有被征求意见,或邀請参加来使它自己的門戶开放。义和团运动爆发后,美国政府于 1900

年12月請日本同意它租借福建沿海的一个儲煤站，因为該省屬於日本的“利益範圍”，当东京表示異議的时候，华盛顿就不征求中国的意見而放棄了这件事。

相当明显，1899年規定的門戶開放政策主要是为了阻止眼看即将到来的瓜分中国，但并不是阻止“利益範圍”的繼續发展。关于后者，曾經有过諾言和含糊的措詞，在这些“範圍”內不得有外国人的团体享受优惠的地位。这些諾言的实际价值是什么，只能待時間来证明，但是，至少在保持中国使它不因自己的軟弱而为列强所瓜分方面已作了一个开端。再者，美国在作它作了这种开端时，沒有让与什么东西，也沒有締結使它牵入糾紛的同盟。

1899年9月，当海約翰国务卿第一批关于門戶开放的照会交給列强的时候，义和团的目标肯定地变成为反对在华北的一切外人和他們的利益。1900年7月，在使館和北堂教堂被义和团圍攻的时候，法国政府提議列强应在維持中国的領土現狀方面取得協議。次日，海約翰国务卿发出一个通电給美国駐柏林、巴黎、倫敦、羅馬、圣彼得堡、維也納、布魯塞尔、馬德里、东京、海牙和里斯本的代表，在通电中他“就目前情况这样解釋美国的态度。我們堅守我們于1876年开始的同中国和平相处，增进合法的商业，和保护我們公民生命財產的政策。……如果對我們的公民有所損害，我們要使負責的人們絕對負責，我們認為北京的情况实际上是无政府状态，大权和責任事实上已移轉到各地的省当局，只要他們保护外人生命財產，我們認為他們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我們設法仍同他們和平友好相处。總統的目的，是同其他列强一致行动：(1) 同北京恢复交通，和拯救处于危險中的美国官員、傳教士及其他美侨；(2) 期待中国各地給予美国人生命財產以一切可能的保护；(3) 保卫美国一切

合法的利益；(4) 协助防止騷扰蔓延到帝国其他各省，和这种灾难的重演。預測达到最后这个結果的方式，当然是太早，但是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寻求一种解决办法以促成中国的永久和平和安全，保持中国的領土和行政完整，保障条約和国际公法所担保給予友好国家的一切权利，并为全世界維护与中华帝国各地进行均等及无私貿易的原則。”

海約翰国务卿的照会在提到“同中华帝国各地进行均等和无私貿易的原則”时，可以找到門戶开放政策的扩充。此外，爱护亚洲国家的独立的旧政策因具体闡述美国的目的是“保持中国的領土和行政完整”——这一点已經明显地預示于 1868 年的西华德、蒲安臣条約中——而加强。用“一致地”一詞以代替“合作地”的例子也是值得注意的。

尽管他們表示同意这个政策，有几个列强抓住以后几个月中所提供的机会来作侵略行动，最显著的是俄人在南滿和天津的行动。在天津他們夺取了一个一千亩地的租界。接着比、法、意、日、奥相继要求新租借地或扩展他們旧有的租界，次年英国人和德国人作同样的要求。美国自 1861 年以来就在天津拥有一个租界，但是从未接管它，美人害怕将被排出于該地的貿易之外，現在考虑接管早先划給他們的地区，最后是决定并入英租界，但保留随时可以收回的权利，这样，曲解經濟机会均等和中国的領土和行政完整原則的意义，和在外交上阻止它們的应用的可能性，从一开始就是显明的。

(宓亨利：《近代远东国际关系史》，第 133—137 頁，孙瑞芹譯。)

## 五、拉铁摩尔：論美国門戶开放政策的意义

最后的危机由于門戶开放政策而被推迟，这个政策是美国国务卿海約翰于1899年在他致条約国（这些条約国可能欲瓜分中国为各别的殖民屬地）的一系列通牒中所提議的。門戶开放基本上是美国永久政策的进一步发展，这个政策可以称为“利用”帝国主义的政策，它胜过积极的帝国主义的政策，那就是說，美国沒有带头搶夺中国的領土或以法律上的无能加諸中国人身上，但是，它要求任何其他国家从中国欺詐得来的东西不應該为該国所单独壟断，而应与一切来者共享。

門戶开放的通牒并未提議帝国主义国家应停止对中国的要求，它們只表明了“我也要分享”这样一个要求。那就是說，不管任何国家在中国所取的是什麼，它必須为美国的商业和企业留一个开放的門戶。这种办法的实际效力是把瓜分中国为殖民地的过程停止了。代替这种过程的，是发展了一个向中国政府提出国际联合要求的一致程序，这說明了美国久已坚持的遏制日本在中国的帝国主义侵占的政策优点和弱点。美国誠然相当有效地遏制了日本，但是遏制从未以显明的反帝国主义的文字表示出来，因为美国所要阻止的是日本获得独占的权利、特权和領土控制。

門戶开放政策不是美国的一项孤立的声明，而是一个折衷方案，用来控制各国的竞争。事实上，方案的初稿不是由美国国务院拟訂的，而是由一个英国人名賀璧理拟訂的。賀在中国海关服务，



因此，名义上是中国政府的雇員，虽然实际上他是国际管理中国最重要的稅收来源的机构中的一个行政人員。

十九世紀最后十年的竞争因沙俄是由陆路直接进入中国的唯一国家而趋于复杂。这种情形引起了調整由陆路侵犯中国及由海道侵犯中国之間的竞争的企图。日本于 1895 年战胜中国后，俄、德、法三国出来干涉以限制日本向中国所作的領土要求；后来发生了义和团叛乱以及国际軍隊侵犯中国以鎮压叛乱的事情。

（拉铁摩尔与艾丽娜·拉铁摩尔合著：《中国簡明史》，第 121—122 頁，孙瑞芹譯，呂浦校。）

## 六、拉铁摩尔：論門戶开放政策

門戶开放主义在改变游戏的規則方面是部分地获得成功了，因为游戏的性质正在改变。它当时是制止俄国的主义，至少在英国方面是这样的。最近的历史著作对它是起源于遏制俄国扩张的政策实际上都置之不談，这是奇怪的。貝賜福勋爵于 1898—1899 年冬代表英国商会协会周游中国，随后赴美国鼓吹采取門戶开放政策，他說得非常坦白。在他写的叙述他的使命的《中国之分裂》一书中，他在每一頁上都提到俄国占领中国領土可能会結束其他各国商人的机会的危險。

福斯特·杜勒斯（他是最清楚地論述門戶开放主义的起源同俄国方面的关系的美国历史学家）在他的《中国与美国》一书中引 1898 年的美国报纸来解釋当时的局势說：“中国局势中的真正危險来自俄国，它在滿洲百折不撓的前进預示它的帝国主义行为将控

制全部华北。”他又說，海約翰国务卿的目的“是反对任何方面对美国貿易的歧視”，而“英国也許曾希望把美国拉进一个主要是針對俄国的共同政策”。但是，当海約翰不准备使美国在中国承担一个主要是針對俄国的政策的义务的时候，其他美国人开始对俄国感到不安。亨利·亚当斯(海約翰的朋友和国务院的“内幕人”)是那些为俄国向中国“冰河”般的前进而感到惊动的人士之一。

門戶开放的方案事实上促成了(虽然不是通过具体的宣言)由海道进入远东貿易国家的联盟，以維持互相竞争的条件，并强迫俄国(它是在商业上能利用陆路容易地进入中国的唯一的国家)遵守那些条件。为了使这个政策发生效力，必須擯棄吞并，因为如果允許吞并，則俄国能吞并邻接的領土，把它合并到自己的版图里去，因而拥有一个优胜的地位，使其他国家的竞争成为徒劳无功的事。換句話說，門戶开放把竞技的規則这样地重写了，尽可能地使得俄国(尽管它同中国之間有比美国与加拿大之間的边疆更长的一条陆路边疆)好象只能从海路进入中国那样行动。

在所有接受門戶开放通牒的国家中，以日本最为热心。象中国一样，日本当时仍受“不平等条約”的束縛，但是它对中国已經打了一场胜利的帝国主义战争，它的一部分胜利的果实为俄国(得到法国和德国的支持)所剝夺，因此，它能接受支持而作为反对俄国扩张的一个哨兵。数年以后，由于英国保持中立而偏袒日本方面(这里所謂“中立”是按照这个字的爱尔兰意义<sup>①</sup>来說的)，美国肯定地对它<sup>②</sup>不保持中立，日本打败了俄国。

日本接着开始表現一种互相矛盾的能力，即既成为旧制度的

① 通常指由于吝嗇而造成的相反的意义。——編者

② 指美国支持日本进行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編者

一部分(这个旧制度使亚洲处于控制之下),而同时也是新过程的一部分(这个新过程最后使亚洲不受控制)。作为海洋国家中最永久地反俄的国家,日本对門戶开放制度的运用来说是必要的。作为亚洲的一个强国,而且如此接近亚洲大陆,以致它享有俄国所享的同样的邻近的地位,日本破坏了門戶开放。当取得支持以反抗俄国对它有益的时候,日本与主張門戶开放的国家合作;但当日本的控制擴張到全滿洲并进入华北的时候,日本便进一步地壟断了商业机会和一切资源的开发而排挤其他拥护門戶开放的国家。

(拉铁摩尔:《亚洲的形势》,第27—30頁,孙瑞芹译,吕浦校。)

## 七、克萊德:論門戶开放政策

据说門戶开放主义的起源,最初見于美国国务卿韦白斯特給赴华特命全权大使顾盛的訓詞。訓詞中声明,中国让給其他国家人民的特权和經商便利条件如果比让給美国人民的为多,則美国就认为沒有和中国繼續保持友好的可能。第二年,美国政府在和中国締結的条約中取得了最惠国待遇,“就这样,奠定了門戶开放政策或机会均等政策的基础。”

1897年和1898年在历史上是不名誉的年代,欧洲列强爭向中国租借沿海一带的軍事要地,又設置“势力范圍”保护自己,事实上将形成中国解体的危机。这种由“势力范圍”所造成的严重局面,預示着一切通商貿易的机会均等主义都将归于失敗,甚至中国領土的完整也受到威胁。保持着“势力范圍”的国家,在其“势力范

圍”內，在經濟上占有統治地位。這種情勢將在中國境內造成許多互相競爭的王國，其結果只能引起激烈的國際競爭。英國鑒於這種情況，1898年在下議院通過決議，擁護在中國商埠自由貿易，不加限制的主張。

海約翰於1889年9月30日就任美國國務卿。他曾做過駐英大使，深知英國擁護通商貿易的機會均等政策。現在既當了國務卿，就必須制定政策，解決美國在華利益的問題和中國遭受“勢力範圍”嚴重威脅的問題。當時的時局要求迅速採取行動，於是海約翰於1899年9月6日向倫敦、柏林和聖彼得堡發出他的第一次通牒，接着又在11月13日向東京，17日向羅馬，21日向巴黎，發出類似的通牒。這些通告中措詞雖然略有不同，但由美國駐日大使遞交的通牒中的一段建議，却是每個通牒所共有的。其文如下：

“先生：本國政府對於美國及其他各國的工商業，在中國境內——特別是在歐洲列強在華的所謂“勢力範圍”內——的貿易與航行必須保證完全平等的待遇，素具至誠志願。既為此項志願所鼓舞，本政府認為當前是向德英俄三國提議此事的最好時機。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不在國際上引起爭端，而又重建商業上不可少的信用，本政府認為在中國有“勢力範圍”的國家，應對下列事項，予以正式承認：

一、各國在華所獲“利益範圍”、租借地及其他既得利益，彼此不相干涉；

二、各國“勢力範圍”內的港口，對他國商品，遵照中國現行海關稅率收稅（自由港不在此例），而此項關稅，須由中國政府征收；

三、各國“範圍”內的港口，對於他國入港船舶，不得課以高於本國船舶的入港稅，各國“範圍”內的鐵路對他國貨物所收運費，也

不得高于本国同样货物的運費。……”

对于美国国务卿的这个建議，日本外交大臣青木子爵于 1899 年 12 月 26 日答复道：

“大使先生：……我敢向閣下保证，日皇政府对貴国所提公平正直的建議表示同意，如其它有关各国均接受此項建議，日皇政府也必接受无疑。”

凡接到海氏通告的各国，都作了友好的答复，仅以其他各国必須协同一致作为保留条件。只有俄国，对于入港費和铁路費的統一，保持沉默。1900 年 3 月 20 日，海約翰收齐所有复牒后，便通知各列强，美国已根据大家的同意，作为最后定局的決議。

在 1900 年的义和团事变中，美国代表对华的态度是以海約翰国务卿 1900 年 7 月 3 日向列强所发的一份电报为指导的，这份电报宣布維持中国領土的完整。这次美国所表明的态度和一年前所采取的立場是密切結合的，但除此以外，并没有更多地涉及“門戶开放”問題；实际上領土完整的宣言可算是維持“門戶开放”的手段。7 月 3 日的这一通告，不过是陈述美国政府态度的东西，不能当作暂时的条件看待，因为它只是片面地宣布政策；更不能把它当作 1899 年通牒的主要部分。英德两国于 1900 年 10 月 16 日也締結盟約，保证維持中国領土的完整。对于英德两国政府所发出的通牒，海約翰于 10 月 26 日的答复中，重新肯定了美国所持的貿易平等和保持中国領土完整的主張。在俄国对海約翰 1899 年 9 月 6 日通牒的答复中，莫拉維夫伯爵虽曾特別涉及并保证中国的关税，但对铁路運費和入港費問題却避而不談。在以后几年，日俄战争的酝酿期中，俄国在滿洲的种种活动，前面已經讲过了。

1905 年 1 月 13 日，海約翰又向数国发出涉及“門戶开放”和中

國領土完整的通牒，強調美國“保全維持中國領土完整和東方‘門戶開放’的廣泛政策”。通牒中強調指出的這兩點應當加以注意，因為在以後闡明“門戶開放”主義時，這兩點很重要。

以上是講“門戶開放”主義提出的經過，現在講它在滿洲的實施。1906年開始的幾月中，美國國務院連續收到遠東美國商人的急電，報告日本阻攔他們取道牛莊進入滿洲，但日商則可自由進入滿洲。因此美國國務院便命駐東京的代理公使威爾遜請日本政府對此事加以密切注意。日本政府雖然未聽到這種不同待遇存在，仍答應注意此事。與此同時，英國駐日大使也代表他的國家向日本政府要求在日俄兩國撤兵期間，取消貿易限制。

美國國務院於1906年3月24日通知威爾遜說，據國務院駐華機關報告，在滿洲的日本當局企圖在軍事占領期間乘機建立日本商業勢力，以便在撤軍以後，外國商業在滿洲很少或根本沒有插足的余地。因此，美國向日本政府提出，美國對滿洲門戶開放問題表示憂慮。日本外務省答復說，對外國人的暫時限制是由于軍事需要，至於“門戶開放”政策，在滿洲仍然是要遵守的。日本政府的立場在4月12日給華盛頓的備忘錄中說得很清楚，它說，在和議告成後，馬上允許外人進入日本軍隊占領地區是不可能的。接着又強調指出這種辦法是臨時性質的，並莊重宣告日本政府尊重門戶開放政策的誠意。備忘錄還進一步表示了日軍完全撤退前開放滿洲的決心。

此後不久，美國國務院又得到報告，說英美煙草公司的貨物到大連和沈陽後必須繳稅，而日本運輸煙草者則可免稅。此外，在牛莊設立徵稅機關，而在俄滿邊境和日本租借地中的大連則不設立，這又促使美國起而催促中國、日本和俄國，在貨物進入滿洲的地方

設立稅关,或者就把牛庄开辟为自由商港。

日本主和派战胜軍閥的侵略倾向的最終胜利,实现于 1906 年 3 月西园寺首相自滿洲回国之后。这场胜利,是日本打算尽快撤退滿洲駐兵,履行它尊重“門戶开放”宣言的又一公告。所以当时的美国大使莱特对于日本政府处境的困难,也表示深切諒解。同时日本也知道,如果它表现出違反“門戶开放”主义,日本国家的声望将会受到損害。在采納这一自由政策时,日本将被认为是屈从于压力而不是出于自己的判断和自己的意願。

1906 年的头几个月中,美国在上海商业团体成員的激动情緒,繼續增长着,这是不足为怪的。日俄战争中,各国在滿洲的商业利益久被遏抑,战争一結束,各国商业团体自然刻不容緩地想恢复他們在华北的商业活动。但因日軍司令所定的軍事限制,这事不能在一朝一夕办到,而消息傳來,公开控訴日本当局故意拒絕英美商人进入滿洲,而对其本国商人,則允許入內营业,这簡直是以軍事为借口,实行专利壟断,美国商人自然便如中風一样地激动起来了。为了把滿洲的实况报告給美国駐北京公使柔克义,再經過他轉达华盛顿起見,三个美国商人代表上海美商,于 1906 年 6 月到滿洲进行調查。到滿洲后,日本当局給他們各种調查上的便利,7 月 2 日,他們便将調查报告呈交給美国公使。这个报告非常有趣,不仅因为它的內容确实,而且因为有些作者意在反对日本,从报告中断章取义地摘引一些离开上下文便会引起誤解的句子作为他們的证据。

牛庄是各国在南滿貿易必經的地方。关于这里的情况,美国調查人員报告說,在日本人的治理之下,秩序井然。并說:

“此間管理商埠的日本当局,并不干涉中国制度下的普通关税

行政……我們也沒有發現日本人干涉普通貿易的行為；而从前供給軍用的各種設備，現在已收歸遼河一帶舟車運貨之用。惟入口商業，極為清淡，因存貨不多，內地銷路也不暢旺。”

此外，日本人曾被指責，對於從牛莊進入內地的貨物征收很重的厘金，這種厘稅是以前所沒有的；而日本商人由鐵路運貨，却可免稅。關於這件事，調查者說，雖然日本政府給予種種調查的便利，但仍不能證實。

調查者認為已經獲得了關於滿洲市場所能獲得的可靠證據之後，又寫道：

“我們經過詳細調查認為，如果想求得滿意的證據，以證實目前日本政府借其軍政或民政之手，有意干涉或阻礙其他國家在中國這一重要地區實業之開發，如果不是不可能，至少也是極不容易。”

然而其他大多數國家的商務團體，仍認為在滿洲的日本人破壞貿易機會均等主義，因此仍抱仇日態度。8月9日，外相林權助子爵接見某最有勢力的報紙的記者時宣稱，他的國家將嚴格遵守機會均等主義，並說雖然按照條約，日本有權在滿洲實行軍事占領直到1907年4月為止，但滿洲某些地方仍可盡早在9月即行開放。在此期間，美國公使萊特曾和林權助子爵進行幾次談話，對這位日本大臣的“坦率和公正”印象很深。這位美國公使對於日本的政策，沒有懷疑，就是說，他深信所有各國在滿洲通商貿易機會均等是日本的既定政策，而且日本將維護這一政策。這種見解在由柔克義公使從北京發給美國國務院的電報中得到了證實。柔克義與在中國發生的事件保持着密切的接觸，因此他能對列強所抱的目的，尤其是日本所抱的目的，進行公平的判斷。儘管眾口一致譴



責日本，柔克义 10 月 11 日的报告中还說，虽然日本在南滿市場竞争很大，但美国和其他貿易的国家大規模参加竞争的机会，仍旧很多。然而日本奉行“門戶开放”政策的問題，要等到滿洲日軍完全撤退以后。接着又宣告在大連立即設立海关，这两件激动众怒的原因消除之后，才能为大家所諒解，不致引起各国的惊疑。

今天看来，“門戶开放”政策的历史，显然受了許多因素的影响而复杂化了。对于海約翰原牒的解釋，就是爭論的根源。中国領土完整的原則，被人与“門戶开放”主义相混淆，并且有人把它看成是“門戶开放”主义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批評者对于这个主义的定义沒有弄清，結果不仔細的著作者便把与“門戶开放”毫不相干的行动，也当作違反“門戶开放”的事件加以描写。最后，在 1921 年的华盛顿會議中，显示出了日美两国对“門戶开放”主义解釋上的根本紛歧。因此，对于当时“門戶开放”主义所处的真正地位，应当进行討論。

1899 年海約翰“門戶开放”通牒之所以提出，是因为美国政府想在中国境內——尤其是在所謂“势力或利益范圍”之內——保证所有国家工商业的完全平等待遇。为了希望实现这一点，就要求占有“势力或利益范圍”的列强和其它各国正式承认三項特别条件，这三項就是前面已經說过的：商埠利益，互不干涉；中国税率，大家遵守；铁路运费、入港費彼此一律。其后，于 1900 年 7 月 3 日的通牒中，海約翰国务卿又以这种方式，将美国政府所持的对中国領土完整的态度通知各国。从技术方面看，这次通告和 1899 年的通牒毫不相干，甚至也不能把它当作一种国际磋商或暫时的条約，因为并沒有要求复牒，而各国也沒有象对那次“門戶开放”的通牒一样，給予复牒。这种观点，由于 1905 年 1 月 13 日发出的循环通

牒着重說明了美国对华政策中維護互不相同的兩項原則，而更加明确有力了。起草这个通牒的人，显然也具有这种見解，因此不但在通牒中特別提到中国的“門戶開放”，而且也特別提到中国的領土完整。

由于解釋不精确和使用了普通術語，“門戶開放”一詞至少在通俗的意义上被人解釋为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全部內容。这种解釋不論理由如何，都不能成立。海約翰国务卿关于“門戶開放”的原牒中曾清楚地、毫无疑义地指出了各国应当承认的是哪些条件，在美国看来，承认这些条件，便是一种有效的“門戶開放”。其次，“門戶開放”通牒并不是要形成一种反对任何在华特別利益的協約。通牒承认既存的所謂“势力或利益範圍”，只是要在那些要求享受特权的“範圍”內，保证某种行动不致发生。至于这里所說的特权虽沒有明白确定，但大部分是与铁路权和采矿权有关。总之，“势力範圍”和“門戶開放”是并行不悖的，其仅有的改变不过是列强在各自的“範圍”內須受海約翰国务卿 1899 年通牒中所列的三項特殊条件的限制而已。

控告日本違背“門戶開放”，既无证据，某些作者便轉而搜尋違背“門戶開放”的精神的事件。从法律的立場來說，能够认为是違背“門戶開放”主义的精神的行为，只是对于海約翰原牒三項条件的精神故意加以阻撓使其不能实现的行为。这一点是无可爭論的，因为那三項条件的实际意义十分明了，这就使人相信，假使“門戶開放”主义的範圍比实际所确定的大，“势力範圍”的存在便和它不相容了。

在本章所述的时期中，实际上直到 1921 年为止，日本对于“門戶開放”主义的解釋，确是遵照海約翰 1899 年 11 月 13 日发給駐

在东京的布克的通牒中的見解而行的；从技术观点看，通牒所要求日本的，也只是对那措詞确切的三項条件的充分遵守。再就美国而言，1905年1月，美国政府似乎也沒有将“門戶开放”和中国領土完整这两种原則混在一起的意思，因为当时在通牒中这两种原則被指明是截然分开的两件事。不过我們沒有证据可以說明当时美国国务院是否已扩大了对海約翰原牒三項条件的解釋范围。可是到了华盛顿會議，日本代表于1922年1月18日在太平洋远东問題委员会上的演說中說，“門戶开放”主义自从海約翰国务卿創立以来在应用上已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說当初无论是它的主旨或是它应用于中国領土的面积、范围都是狭小的。而在另一方面，当时提交該委员会的決議草案，其中对于“門戶开放”主义的規定，已和1899年的范围完全不同。对于这种陈述，委员会主席休士在答詞中說，海約翰国务卿当初在他的建議中提出几条确定的原則时，对于他所主張的政策的范围和目的，是說得很清楚的。因此美国便不能把該決議所載关于“門戶开放”主义的陈述視为一种新的意見，只視为久已为人所承认，而二十年来已为各列强所拥护的原則的更确切的表述。由此可见，“門戶开放”問題在它的应用上，无时不受各国对它所作的种种解釋的影响而复杂化，在美国和日本之間，对它的解釋，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以下各章，还要考察日本在滿洲的活动，是否与其1906年和1907年所发表的声明相符合，那时关于这一点，还当討論。

（克萊德：《滿洲的国际竞争》，第209—224頁。）

## 八、克萊德：論 1900 年美国对中国的政策

美国駐北京公使康格虽然在1900年的上半年經常以华北的混乱情形警告其政府，但仍与各国公使合作向中国政府提出联合声明和抗議。这是与1899年海約翰邀請列强恢复蒲安臣时期的所謂合作政策的照会一致的。可是，在1900年3月至6月間，国务院完全改变了它的态度，放棄合作的思想，并告訴康格，他的国家将“单独并且不需要其他国家的合作而行动”。看起来华盛顿对在中国发生着的情况只有很少的理解。柔克义在北京公使館被攻的前夕对海約翰說，义和团运动不很可能“引起任何严重的糾葛”。国务院（当时它的方針还无法推测）接着又作了一个部分的改变，通知康格“他現在可与其他列强‘共同地’行动，如果有必要的話。”

虽然如此，在中国发生的事态的压力迫使海約翰对美国的政策再作一次更基本的說明。国务卿知道，某些列强，特别是俄国和德国，欲利用义和团事件来擴張它們的势力范围，并且在它們的势力范围里获得进一步的政治控制，如果可能的話。在組織国际援助远征队上的外交爭执已經显示出竞争是如何的激烈。因此，海約翰虽然于6月10日訓令康格說：“除了积极保护美国利益，特别是美侨和公使館外，我們在中国沒有其他政策，”但是他又于7月3日向列强致送通牒称：美国的目的是“寻求一种解决，俾可在中国获得永久之安全与和平，保持中国領土及行政之完整，保障所有条約及国际公法对友好的列强保证之一切权利，并保护全世界在

中华帝国各地平等、公正通商的原則”。

在美国政策的語言中，这个中国領土完整的原則并不是新穎的。它曾于 1853 年为馬沙利所表示过，并于 1862 年为蒲安臣所表示过。1899 年的海約翰政策沒有提到这个原則，即使沒有放棄这个原則的話。这个政策默認了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的现实。現在，在 1900 年 7 月，这个原則以新的和更强有力的形式被复活起来了。海約翰不仅請列强“尊重”中国的完整，而且也建議由列强作一个“集体保证”——这个保证沒有立刻到来，因为除了英国外，列强中甚至沒有一个答复 7 月的通牒。

但是，重要的一点是，到了 1900 年末，中国被瓜分的威胁暂时再一次被阻撓了。为什么如此？海約翰的通牒很可能有些心理作用，但是似乎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这个因素再一次地是列强間的竞争和相互猜忌，以及它們退出合作政策而从事双边談判。英国和日本慢慢地互相靠攏以阻止俄国在滿洲及中东的行动。德国在山东介于俄、英間的曖昧地位肯定地促成了 1900 年 10 月 16 日的英德协定，这个协定贊成門戶开放与中国的完整，但是这是一件无关痛痒的事，海約翰指协定为“对英国的一个可厌的恶作剧”。看来，他沒有意識到，如果是这样，則他自己及他在中国所试图做的一切同样是一个可厌的恶作剧。总而言之，列强沒有接受中国完整的見解。瓜分的事暂时停頓了，因为每个潜在的侵略者，害怕将随之发生的崩潰，躊躇着不願首先动手。可笑的是，在这个風雨暫息的中間，海約翰自己也加入到追求特权者里面去了。1900 年 12 月，他在美国海軍的压力下，要在福州以北，福建沿海的三沙島找一个海軍儲煤站。日本在被征詢时阻撓了这个行动。它提醒海約翰（可能帶着某些愉快的情緒），要他回想他自己最近所做的保持中国領

土完整的种种努力。这件事在以后的岁月里没有加强美国在远东方面的道义的影响。

（克萊德：《远东》，第 298—300 頁，孙瑞芹譯，吕浦校。）

## 九、費納克：論“門戶開放”政策

当列强在中国从事“爭夺特权”的时候，美国正在进行对西班牙的战争，不能采取直接行动。从美国的立场来研究截至 1899 年为止的发展情况，显然美国政府可以在下列三种办法中采取一种办法：第一种是承认列强在华所获得的进展而无所作为，听任各国的利益范围自然地变成为保护国，其结果美国对华贸易最后将被排斥；第二种是参与列强在华的竞争，并试图为美国划定利益范围；第三种是试图在列强的利益范围以内保护美国的商务利益。根据美国国内的普遍的信念，即美国的工业和资本必须向外发展的信念，第一种办法是不可能采取的，因为看来中国是世界上最大且有潜力的市场和吸收投资的地方之一。第二种办法也同样的不能采取。美国在远东的传统政策是不排斥其他国家的。在它同远东各国的多次交涉中，美国政府没有一次是为美国或其国民追求特殊利益的。它过去始终为本国要求“最惠国”待遇，并且愿意看到它所获得的任何利益由一切同中国有贸易关系的国家一体均沾。它是愿意同别的国家从事竞争的，但是竞争的条件应该是平等的和没有歧视的。它和拉丁美洲的关系是这样，它和远东的关系也是这样。因此，如果美国企图在瓜分中国中分得一份，将严重

地違反它过去的政策。如果在中国采取这样的办法，将比在其他地方采取这样的办法更为明显地違反它过去的政策，因为自 1842 年以来，美国政府几乎始終如一地竭力主張保持中国的領土完整的必要。长期以来，它曾經疑慮英国是否会牺牲中华帝国以扩大它的殖民地，并且以批評的眼光注視着英国在远东所采取的每一个行动。后来，当蒲安臣任美国駐华公使的时候，他和美国政府倡导树立了一种合作政策，这个政策是以需要加强并保存中国这个国家的共同認識为基础的。

剩下的是第三种办法，但是需要作出某种具体的表示。需要走的总的路綫是清楚的。美国的广泛的利益仍然是保持中国的領土完整。但是一系列的行动业已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如果要把通过租借协定而丧失的領土交还给中华帝国统治，并說服欧洲各国放棄在同一的时间所获得的經濟利益，单靠口头的抗議是不够的。如果有采取行动的意志，这事可由同中国有貿易关系的国家（英国、德国、美国，也可能加上日本）采取联合行动来完成。但是当美国政府感到必須采取行动的时候，德国在对于中国特权的爭夺中已經起了突出的作用，英国也是如此。英国半官方地表示了对于合作的願望，但是这种合作須建立在由从事合作的列强共同控制中国的軍隊和財政的基础之上。这样的合作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因此海約翰国务卿不得不独立地拟定一个政策。美国政府在著名的“門戶开放”的通牒中說明了这个政策的要点。

1899 年 9 月 6 日美国向英、法、意、德、俄、日諸国政府发出照会，……（此处系引用照会原文，說明“門戶开放”政策的三个要点，此項材料在有关书籍中可以查到，故略去。——譯者）。这样，美国的政策是承认現狀（包括若干国家对于利益范围的主張，以及租

借地的建立)并获悉各国在其利益範圍內的明确的态度,以保证美国公民在这些範圍內有完全均等的商业机会。“門戶開放”政策是一种商业上自私的政策,以实际拟定和提出这个政策的情形來說,它并不是直接建立在保持中国的独立和完整的願望之上的。它承认了利益範圍的概念,并且可以推断,它也将承认这个概念发展的邏輯的結果——并吞中国的領土,如果这个被并吞的地区內的美国的貿易利益被充分保护的話。

然而,这两个概念——“利益範圍”和“門戶開放”或商业机会的均等——是根本矛盾的。建立利益範圍的主要目的是尽可能获得在該地区內建筑铁路、开采矿山和从事工业开发的独占权利。<sup>①</sup>再者,当利益範圍逐渐地变为势力範圍,或变为保护国的时候,在政治上控制該地区的国家几乎一定会应用它的控制或势力以壟断該地区的經濟发展,只要这种經濟发展能够对它有利。換句話說,“門戶開放”政策,如果能坚持实行的話,将对于範圍的概念起一种限制和修正的作用,而最后将要求把这个概念扩大,包括保持象中国这样一个国家的独立和領土与行政的完整,以便保持商业机会的均等。

(費納克:《現代东洋史》,第154—156頁,呂浦譯。)

<sup>①</sup> 著者原注:除这些外,还应补充一点,这就是:希望在万一系列瓜分中国时,能提出对該地区的領土要求。



## 十、費納克：論“門戶开放”政策的意义

从邏輯上來說，义和团暴动及其失敗應該加速列强瓜分中国的运动。其所以沒有这样，主要是由于美国政府于 1899 年所采取的态度，当时美国政府企图保全中国使它不为欧洲諸国家所瓜分，以保护潜在的美国商务利益，由海約翰宣布了“門戶开放”的政策。这个政策导向保持中国領土的完整，因而导向保持各国商业机会的均等。在各国同中国談判 1901 年条約的过程中，这个政策再度得到各国的承认。义和团的失敗标志着中国积极反对变革的时期的結束。中国人認識到如不沿着近代化的道路前进，中国就将在国际上失去它的作为一个独立国的地位。

（費納克：《中国近代宪法发展史》，第 49—50 頁，呂浦譯。）

## 十一、伯斯：論門戶开放政策的由来

进入二十世紀以后，中国人看到西方国家通过金融帝国主义的辦法在中国追求它們自己的利益，就如同比他們早一代的人曾經看到它們为擴張商务而作的斗争一样。中国的面积几乎和欧洲相等，拥有一个人口稠密的农业区域，滿布着若干交通便利的都市，似乎是給投資者提供一个乐园。在华北的城市之間的郊野是很平坦的，流經这个地区的河流是很少的。它是铁路建筑工程师

的理想的福地，因為建成鐵路以後，可以獲得巨大的和繼續不斷的財富。追求特權的人和物色便宜貨的人帶着裝得滿滿的錢包群趨北京。他們結交合適的人物；他們本國的外交家和中國的官員。他們慷慨地招待，並且謹慎地分送禮物。他們竭力探聽他們的對手們在做些什麼，並且隱瞞他們自己的成就和前途，甚至對他們自己的秘書也隱瞞着。個人的利益是很容易同國家的利益相一致的，對於利益的追求促使在外交上採取炮艦和最後通牒的方法。中國的利益是附帶的和次要的，就如半個世紀以後在雅爾達的情況一樣。

國際間的借款是有利益的交易。例如，如果一家英國公司在英國的利益範圍內獲得一項建築鐵路的合同，這就暗示一家英國的投資行號或銀行曾經派遣代表到中國同中國的官員們進行談判，或者它在倫敦的總辦事處曾經直接同中國駐英公使辦理交涉。在任何的談判中，個人的接觸起很大的作用。在合同簽訂以後，在英國的英國公司將以相當於五百萬美元的款項存入它自己的銀行或其他的銀行，並將給與在北京的中國政府或其駐倫敦的公使以一本支取五百萬美元（扣去佣金及其他費用）的支票。然後，根據借款合同，中國將向英國工廠訂購總額為五百萬美元（扣去所增加的費用）的鐵軌、枕木或機車。可以了解，有一家英國運輸公司將把這些材料運到中國，而且有一家英國保險公司將承辦這些材料的保險事宜。一般認為，當鐵路建成後，其所得進款，償付借款的一切利息和分期付款的費用，將綽綽有餘。中國將以支取其存於英國銀行中的款項的支票來償付一切的費用，並不需把現款匯往中國，甚至常常連支票也沒有離開過倫敦。國際借款的意思，就是多做了生意，並且給推銷員、銀行家、製造商、運輸商和經紀人帶來

了利潤。如果一家英國的投資行號簽訂了一個合同，英國的若干工廠將得到訂貨，而英國的投資者將獲得利潤。如果一家法國公司獲得成功，同這筆交易有關的每一個法國的國民都將獲得一分利潤。這種情況說明了為什麼國際間對於借款給中國的競爭是如此的劇烈，為什麼外交家們常常須聽命於追求特權的人。這種情況也說明了為什麼中國人感到他們被他們的表面上的朋友們欺騙了和剝削了。

一個英國財團獲得了建築北寧鐵路（自北京至瀋陽）的特權；一家比國辛迪加獲得了建築京漢鐵路（北京至漢口）的特權；一家英德聯營公司（這家公司在競爭中擊敗了美國的競爭者）獲得了建築津浦鐵路（自天津至浦口）的特權；一家美國公司獲得了建築漢粵鐵路（自漢口至廣州）的特權；一家法國辛迪加獲得了建築正太鐵路（自石家莊至太原）的特權；一個法、比財團獲得了建築隴海鐵路（自洛陽至海州）的特權。在這些鐵路中，有一些始終沒有建築，有一些草草建成了，還有一些原來就是投機性質的財政計劃。每一個鐵路合同都規定任用外國的會計檢查員、經理、董事或工程師，其結果中國實際上無法掌握其本國的運輸系統。

各國追求特權者之間的競爭从一开始就如此的劇烈，因此為了確定利益起見，英國、法國、德國、俄國（和胆怯作風的日本）訂立了一系列的協定，約定把它們自己限制於它們的各自的利益範圍以內。各國之間所訂的這些協定也防止了中國實行以夷制夷的辦法。在這期間，各國擴充了它們的舊日的貿易特權。中國政府開放了若干新的口岸以便宜於進行貿易，並增開若干內河，允許外國汽輪行駛。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被擴充了，在很多通商口岸（包括天津、漢口、牛莊、廈門和福州等處）开辟了新的租界地。

列強是粗心的或愚蠢的，它們低估了中國人反应的劇烈程度。有一些中國人是“如此的憤怒，以至于發指背裂。”一個中國官員寫道：“不要想享受和平，每一個人應該努力保護他的家和祖宗的坟墓，以免被殘酷的侵略者所毀壞或搶劫。”另一個官員呈給皇上的奏折有如下的話：

“如皇上不當機立斷，或寧願遵循保守之常軌，則陛下之土地將被吞并，陛下之四肢將被束縛，陛下之臟腑將被割裂，而皇上雖欲保有皇位，或欲統治旧日帝國之一小部分，恐亦不可得矣。”

中國人日益增長的恐懼和仇恨集中于傳教士。中國人確信每一個外國人在內心里都是一個土地霸占者，傳教士都是外國政府派出來的代理人，而《聖經》則是炮艦的前驅。本地人信奉基督教的被看做是漢奸。鐵路也是特別受到反對的，因為鐵路通行權常常破壞墳山，而運輸的新方法使苦力、挑夫和船夫們失去了職業。

當瓜分中國之禍看來正迫在眉睫的時候，美國國務院舉着門戶開放政策出場了。這個政策的商務方面對於中國是沒有什麼直接的好處的，因為它們不過是把列強快要玩完了的遊戲規定了一些章程而已。

（伯斯：《遠東史》，第 89—92 頁，呂浦譯。）

## 十二、伯斯：論海約翰的对华外交与門戶开放政策

在 1867 年蒲安臣卸任駐華公使以後，美國對於遠東的興趣衰退了，對中國的貿易和貨運中美國所占的份額減少了，美國的內戰

使它不可能以顧問或資金来帮助中国的工业的和財政的发展。当美国的强大的經濟力量集中在国内的重建和复兴事业时，欧洲列强施展出全部的帝国主义的策略来加强它們在中国的地位。华盛顿知道列强在华爭夺特权的斗争，而且它新近在菲律宾赢得了坚强的地位，它是不甘心在一旁坐視的。它无意参加到这个竞赛中去；最好的奖品已經送掉了，而它并没有足够的威望、經驗或資金来取得它自己的特权。它的問題是找出有效的办法来保护它自己的利益，而不企图取消既成的事实。

自各国第一次同中国訂立各項条約以来，强大的貿易国家，特别是英国和美国，依靠了貿易机会均等或最惠国待遇的办法来保持它們在中国的地位。这种办法似乎已不足以应付无限制的活动的新浪潮了。1898年，貝思福勋爵——英国商会联合会的一个代表——在游历中国和日本途中提出警告說，中国的瓦解已迫在目前，并劝告英国、美国、日本和德国联合起来，对于中国的完整取得确定的了解，使得中国的門戶可以保持开放。当海約翰任駐英大使时，英国首相和外交大臣沙士伯理勋爵曾經同他討論过同样的意見。当海約翰就任国务卿以后，他同他的朋友和顧問柔克义，并且同訪問美国的在中国海关担任稅务司的英国人賀璧理商談了以后，他的关于門戶开放的意見就成熟了。

1899年9月6日，即在巴黎条約換約以后不到五个月的时候，海約翰訓令美国駐英国、德国、俄国大使請求上述各国政府在其利益范围或势力范围内对下列各項作正式的保证：

“第一，在中国任何所謂‘利益范围’或租借地內之通商口岸或投資事业，无论如何不得加以干涉。

第二，中国之現行关稅率，对于一切所謂‘利益范围’內之口岸

(除非为自由港)装卸之一切貨物，無論屬於何国，均为适用，其稅款应由中国政府征收。

第三，此种‘利益範圍’內之任何口岸，对他国之船舶，不得課以較对本国船舶为高之碼頭稅；又在此种‘利益範圍’內所敷設、管理或經營之铁路，运输屬於他国人民之貨物，所收運費，不得較其对本国人民經過同样距离所运输之同样貨物为高。”

11月13、17和22日，美国要求日本、意大利和法国作同样的保证。这些照会并没有要求取消“利益範圍”，但是它們打破了这些“範圍”的排斥他人的独占的局面。它們也減低了欧洲国家侵入中国的速度。这个結果既符合于美国的目的，也符合于中国的目的。英国立刻接受了这些建議，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有条件地同意了，但是俄国躊躇不决。俄国的躊躇使得各国一致接受美国的建議成为不确定的事。

随着义和团排外主义的日益加强，海約翰国务卿預見到軍事占領中国和分裂其領土的危險。他决定在討伐軍中同其他列强“一致”行动，以便防止这些后果。他感到保持中国的領土完整并提供給中国一个新的机会以便整頓其内部并实行財政的和行政的改革，对于美国的利益最为有利。

1900年7月3日，即义和团在北京圍困外国人的期間，海約翰国务卿对于美国駐柏林、巴黎、倫敦、羅馬、圣彼得堡、維也納、布魯塞爾、馬德里、东京、海牙和里斯本的外交代表发出一个通电，在通电中明确說明了美国的态度：

“吾人坚守吾人于1857年創立之政策，即与中国和平相处，发展合法之商业，保障美国人民之生命財產。……有害及美国人民者，吾人必求責任者負绝对之責任。……美国总统之目的，为……

与各国一致行动，(一)与北京通消息，救出在危險中之美籍官員、教士及其他人等；(二)給中国各地美国人民的生命财产以可能的保护；(三)防护合法之美国利益；(四)协助制止乱事蔓延至中国其他省份，并防止其再度发生。当然，現在預先策划达到这个最后結果的办法，为时太早；但美国政府之政策，在寻求一解决之道，使中国入于永远之安定与和平，保持中国領土与行政之完整，維護条約与国际法所保证給予友好各国之一切权利，和确保各国在中国各地貿易平等与公正之原則。……”

虽然各国表示贊同这个政策，有几个国家仍然扩大它們的要求并且对中国施加压力，想得到新的特权。在进入二十世紀以后，美国在其实現門戶开放政策的努力中，态度更为强硬了。

(伯斯：《远东史》，第127—130頁，呂浦譯。)

### 十三、伯斯：論美国的門戶开放政策 与东北問題

美国发现推行門戶开放政策要比宣告这个政策困难得多。列强对于国务卿海約翰照会的答复是推諉和不負責的，反映了它們沒有贊同保证商务机会均等或保持中国領土完整的意思。当一个閣員詢問海約翰，如果門戶开放政策受到反对，他将怎样来实行这个政策时，他回答道：“陸軍和海軍；国际的道义的力量不过是胡說而已。”海約翰自己也消除了幻想，并且在陸軍部和海軍部的压力下，于1900年11月要求在福建租借一个海軍基地，但未能获得成功。美国人同各国合作，参加了远征軍，以援救被义和团圍困在北

京的外國人，但一旦圍困解除，外交家們恢復了權力以後，一切的合作和自制的外貌都消失了。

1901年的條約中規定中國償付的賠償是如此的苛重，似乎列強从一开始就預料到中國將不能履行條約，並且將要求新的租借地或擴大舊租借地，以滿足它們的賠償損害的要求。俄國人在同中國人辦交涉時特別橫暴，從他們的行為看來，好像滿洲是他們自己的保護國似的。國務卿海約翰在1902年2月1日給中國的一個備忘錄（事實上，這個備忘錄是對俄國的一個警告）中指出，美國對於以開發礦山、建築鐵路、或發展滿洲工業的任何其他方面的獨占權或特權讓與任何國家或任何公司表示嚴重的關切。國務卿向羅斯福總統解釋道：

“我們對於俄國在滿洲並沒有任何敵視的態度。……我們兩年來的努力所獲得的成就（如果保證是可以算數的話）是：不管華北和滿洲最後將發生什麼事情，美國在那時所處的地位將不致比那些地區處於中國的無可爭辯的統治之下的時候更壞”。

海約翰宣稱：“沙俄現在的外交政策的特点是動搖不定、自相矛盾、有意規避和不友好，這在外交關係史上是少有的。”當俄國人派遣軍隊涌入滿洲時，他們否認有把任何的政治協定或約束強加於中國的意圖。海約翰又給總統寫道：

“應付一個以說謊作為一種科學的政府是一件極端困難和微妙的事情。……我們並不負有治療俄國人靈魂的責任，我們可以讓他們根據自己的意志去走向滅亡。如果他們僅僅是為了爭取時間而在說謊，則不久將發展成一種相當嚴重的局勢。”

部分地作為對俄國挑釁的姿態，美國於1903年10月8日同中國締結了一項條約，這項條約重新肯定了門戶開放政策，開放沈



阳和安东为商埠，并給予美国以在滿洲派駐領事的权利。由于这项条約，美国在滿洲获得了的权利和特权，同俄国在名义上所拥有的完全相同。美国新聞記者毛里斯·勞对于这件事有这样的意見：

“沒有花費一块美元，沒有調动一艘軍艦或一名兵士，沒有一个同盟，沒有在一个地方购进而在另一个地方让出，单凭坦白而誠实的外交手腕，他（海約翰）在俄国前进的道路上放下了这样的难以克服的障碍，使得俄国如果不同美国作战，或不付給美国以它可能要求的代价，就不可能把滿洲变成俄国的地方。”

毛里斯·勞預見到由于滿洲而引起的一場美苏冲突“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也不是不可能的，”因为他认为俄国在滿洲的外交政策犹如以一个通紅火热的火鉗放在一桶炸药上面一般。他沒有預見到由于日本对俄国的胜利，美国的地位将会有所改变。

（伯斯：《远东史》，第371—372頁，呂浦譯。）

#### 十四、海思：論門戶开放政策

**势力范围** 1898年，欧洲列强图謀瓜分衰弱之中华帝国，已昭然若揭。俄取滿洲，德取山东，英取长江流域，法取长江以南之区域。此项区域，列强各已划出，以备中国瓜分时，即取而并合。同时，各强国皆視此种区域为势力范围。势力范围者，为一种区域，其資本家有独占之让与权，筑造铁路，开发矿产及其他为本地人所不能举办之大企业。欧洲之資本家視中国为不竭之金庫，地中藏有煤铁及其他矿产，其三百兆居民，皆甚勤儉，願在低工資之下工作。外国之資本家，能雇用中国工人以开掘矿产，建造铁路，或工作于

工厂者，似皆可获得大利。此即欧洲各强国何以急切分享利权之原因也。

**美国之門戶開放政策** 然美国则进而为中国之友邦，不求势力范围之划分，而主张門戶開放政策。所谓門戶開放者，意即开放中国各地，在平等条件之下，各国人民均得貿易与投資，对此不自私之政策，英国首先贊助，其他列强亦表面上予以同意，以彼等皆早已划定其势力范围。

（海恩等：《近世世界史》，第 599 頁。）

## 十五、魏尔特：論門戶開放政策

到了 1898 年，“門戶開放”这个表示各国在华商业机会均等的名詞已成一般的通用語。它所代表的原則是古老的、导源于立約以前的岁月中，当时来华的各种国籍的商人可以一律自由享受中国按照它自己的条件在广州和沿海所給的貿易便利。1842 年英国与清廷簽訂的南京条約，在談判的时候沒有使用“門戶開放”这个名詞。但是各国貿易机会均等的原則是明白地为中英双方所承认的。它是英国和美国直到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之末一貫坚持的政策。在九十年代中，大多数在华拥有利益的列强，厚顏无耻地以只为自己的政策代替了共同事业的政策。卜魯斯、蒲安臣和卜魯斯的继任者阿礼国所热烈鼓吹的合作政策并不是一个全心全意的利人主义試驗。如果真是的話，它倒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这一类型的政策。基本上，它的目的与“門戶開放”的理想相同，就是它設法

通过联合行动来保护一切合作者所已經获得的利益和特权，并共享未来的任何权利。这个协定并未排除中国的完整和幸福；但是它的目标与其說是为了中国，不如說是为了取得各国能够維持一致行动的必要压制力量，为了防止任何一国占其他各国的便宜。中国的利益同外国在华的利益可能会偶然符合，它們有时或者会平行，但是它們很少或者决不会趋于一致，它們一般是不同的。

从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一直到八十年代，合作政策經常受到的威胁是英法在华南的競争和政治侵略，是他們为了通过他們在东南亚的屬国来发展对中国貿易所作的种种努力。关于法国在东京和安南及英国在緬甸的侵略已經說过，但是应注意的是，法国人首先在1885年和1887年条約中違反了各国貿易机会均等的原則，他們在这两个条約中取得了对于以下各点要求的承认：(1) 东京与云南及广西两省的陆路貿易减征关税；(2) 中国在这地区建筑铁路时，中国必須向法国經營此項业务之人商量办理。这意味着法国安南铁路的展扩到中国境内。由陆路边界进入中国的法国貨享有不同的待遇，和由于法国控制通往内地市場的一条陆上路綫所造成的商业壟断威胁，是合作政策正在被推翻的一个明显的信号。英国人被迫采取守势，不得不要求对等的特权，乃于1886、1890、1893和1894年的协定中，为緬甸和中国及印度和西藏之間的边境貿易获得他們所希望的类似的特权。梧州和南宁的辟为商埠，因此而使西江开放于海洋貿易，是針對法人把貿易移轉到他們所計劃的铁路的企图的一个猛烈的打击。随后就发生了1897—1898年的种种事故，当时中国被那些很强大、很蛮不讲理、能够坚持滿足他們自己的要求的国家当作合法的掠夺物。中国那个小鯽魚塘已經发展成了大梭魚的独占場，其中有些比其他的更为野蛮，但都是些大

接魚，因此，也是以掠奪為目的的。

英國採取的不妨礙或者不干預其他國家的相同利益而又保護它自己在華貿易的政策失敗了。到了八十年代，它在南方反對法國——歐洲鉗子的南鉗——，到了九十年代，反對俄國——北鉗，而德國通過它開發山東的特權和拒絕承認英國揚子江流域的特殊利益，表示它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空想政策沒有真正的同情。互相爭奪利益使完全合作成為不可能，儘管中國寧願那些從它那里勒索去的特權都能成為大家的利益，但是掠奪者們在分贓時的你爭我奪是太明顯了。中國人有很好的理由相信，歐洲列強勒索特權的把戲對中華帝國的獨立是一個公開的攻擊，因為有些鐵路開發計劃帶有割讓他們的領土和損害中國主權的意義。形勢需要一個國際協議或保障，英美是可望採取那種看法的兩個國家。英國亟欲帶頭，但它被人懷疑。它會更要受人懷疑，如果人們知道早在1898年初隨時準備妥協的沙士伯理正在暗地里與俄人成立協議，彼此互相承認在華的勢力範圍，並且答應互不插足於對方的已獲承認的範圍之內。儘管它屢次聲明，它的對華政策一貫堅持門戶開放的政策，但批評它的人說，照力量、商業和條約看，它是處於一個業已滿足的國家的地位，並且指出，它的主張各國有均等機會主要是出於欲在和平中安享所得的願望，換句話說，合作政策可以為它帶來更大的利潤，因為由於這一政策，它可以從共同努力中，取得比起它業已享有的更多的東西。對於製出無限數量的各式各樣商品的一個高度工業化的國家，這些國外市場是生存所必需的；一種自由貿易，或者門戶開放而不是貿易戰爭的政策，也就是能指望取得最優厚利潤的政策。在最近的爭奪中，它所獲得的決不是微小的；它們包括租借威海衛、租借九龍的大片土地，修築

約占所有铁路让与权总里程百分之四十的铁路, 开采和經營山西、河南、直隶和浙江的矿产, 开放西江直到南宁, 修改內河行輪章程, 中国保证——这是对英国利益最为重要的——决不用租借、抵押或任何其它名义割让揚子江流域各省的任何領土給任何国家, 并且书面答应, 只要英国的貿易占优势地位, 海关总稅务司应为英国人, 这些特权中有些显然是有利于各国的, 但是大多数无法用那个理由来辯护, 虽然它們都可以用保护英国既得的貿易利益为理由来辯护。

虽然如此, 还是由一个英国臣民同时也是中国海关稅务司的賀璧理在一系列行动中首先发动。1899年春賀璧理休假离职, 去美国巴尔的摩在他的妻子的家庭过夏。当他在美国的时候, 他同柔克义重溫他們远在1884年开始的友誼。柔克义最近任美洲司司长, 但也是海約翰比較亲信的远东事务顧問。柔克义和賀璧理对中国均有敏銳的、同情的兴趣。他們就最近发生的事端討論了門戶开放問題。賀璧理在这个問題上的見解打动了柔克义, 以致柔介紹他給麦金萊政府中的国务卿海約翰。賀璧理的一番話对海約翰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印象。他承认美国最近对西班牙的胜利和菲律宾的取得已使美国人对世界、特别是对中国产生一种新的看法, 但是他知道在采取賀璧理的美国应带头設法在門戶开放政策上取得国际協議的建議以前, 必須先說服小心翼翼的总統。

在1899年7月底离美赴欧前, 賀璧理写了一封长信給柔克义。他在信中劝美国应促請一切列强注意中国的情势, 并且在說明它自己沒有任何并吞土地或树立一个势力范围願望的同时, 表示它决心不牺牲它以条約取得的任何权利或特权。他建議美国政府邀請每个欧洲列强作出一項担保: (一) 中国协定稅則应无差別地适

用于进入它的势力范围里的貨物；(二) 在这种势力范围里的任何通商口岸应不受干涉。賀璧理以为，这样一种办法会保护通商口岸中現存的既得利益，且可保证正当商业的机会均等。它不会为矿业或铁路建筑保证机会均等，但是，这样的均等实际上从未存在过，因为过去这样的让与一般总是給那些最会行賄的人的。他爭辯說，美国在这件事中能比任何其他列强少受怀疑而行动，且如果采取主动，它也不会被人指責为追随英国的领导。

賀璧理因柔克义的鼓励向他提出关于該問題的一項备忘录，日期是1899年8月17日。在这个文件的序言中，賀璧理以美英商人的代言人的地位宣称，这些商人主張維持門戶开放，換句話說，主張保证机会均等的繼續存在，这是一切国家直到最近为止按照天津条約在通商、航运、开矿和修建铁路方面所同样享有的。他接着說明，虽然英国一貫鼓吹維持門戶开放，保证在中国貿易上均等待遇的唯一政策，但它不得不承认德国在山东和俄国在滿洲所建立的势力范围而修正了这个政策。在山东和滿洲，两国在矿山和铁路方面已經获得了特殊的、且实际是独占的权利，这些权利的給与对中国的領土管轄权隱藏一个严重的威胁，而且可以容易地导致差别的征稅。无論如何，在指定的地区里，就开矿和铁路企业而言，机会均等已不复存在。

情况既是这样，則能够做到的最多也不过是为商业和航运保证机会均等。为达到这点，賀璧理称，主要的是“贊成門戶开放政策的国家应約束它們自己，并向其他列强取得如下的保证：各国在它自己的势力或利益范围内，(1) 在这样范围内的任何通商口岸或既得利益，无論如何不得加以干涉；(2) 除非在它里边开放的口岸被宣布为自由港，中国現行的或以后修改的协定关稅率应适用于

装船或卸下的一切貨物——無論这种貨物屬於何国，而且应征的稅捐应由中国政府征收；(3) 这种势力範圍内的任何口岸，对他国的船只，不得課以較本国船只为高的港口稅，又在各該国势力範圍里，由各該国兴筑、管理、經營的铁路，对于任何国家的貨物，应收与各該国自己公民在同样距离所运输的貨物同等運費。

柔克义于1899年8月28日对海約翰所作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备忘录，是賀璧理的备忘录的一个扩充，且巧妙地使其論点适合美国的观点。有了这个备忘录在他手中，加以同年8月15日沙皇宣布大連为各国商船自由港的諭旨，和德国最近对胶州作同样宣言的行動这两件事，海約翰就能够說服总统同意美国应采取主动。海約翰随即于1899年9月6日发出通知——由柔克义起草——給美国駐倫敦、柏林、巴黎和圣彼得堡的大使，稍后，致駐意大利和日本大使。这些通知无形地承认势力範圍的存在，它意味着不应再去惹动开矿、修路和投資的麻煩問題，但特別要求正式承认在任何所謂势力範圍或租借地内实行門戶开放政策所包含的商业机会均等。每个列强将被要求发表一个正式宣言，它将不仅遵从通知中所規定的三項門戶开放原則，而且要“出面支持凡是主張在中国有势力範圍的各国发表同样的宣言。”当說明它的目的时候，通知中只順便提到中国的領土完整，其目的被解釋为保护美国公民在这些势力範圍内的利益，在該地为世界貿易保持一个公开市場，消除危險的国际磨擦泉源，及“因此促进各国在北京联合或协调行动以贊助为加强中国的完整所迫切需要的行政改革。整个西方世界对此事是一致关心的。”

各国的答复不完全是全心全意的接受的。沙士伯理在确认接到照会时提醒祝德大使說，英国所一贯奉行的政策是“为它的臣民

或所有国家的公民关于在华商业企业取得均等机会的”政策，女王陛下政府沒有脱离这个政策的意向或願望。两个月后，沙士伯理同他的同僚磋商后，在他的正式回答中声明英国政府准备按照所希望的意思发表一个宣言，适用于“威海卫租借地以及英国今后可能在中国以租借或其它方式取得的一切領地，和它現在在中国所有以及日后所有的一切势力范围之内，如果其他的有关国家各自发表一項同样宣言的話。”这个答复就它所提到的来看，是令人滿意的。但是对于1898年1月租借的九龙領土却一字不提，这就使海約翰推測这个遺漏的用意何在。英国官方宣言同意是以其他列强加入拟議的行动为条件的，这是英国无意放棄任何东西的一个明显证据；法、德、日、俄等国的答复也規定一个同样的条件。德国宣称，它自己对中國工业的发展願在同样的条件下遵从同样原則。俄国当局起初对海約翰的提議感到厌恶，但最后象他們欧洲的同僚一样給它以同样冷淡的祝福。

现实的海約翰認識到，半块面包总比沒有面包为好，因此，在他致美国大使的訓令中，把这些答复（尽管他們有許多限制），当作最后而肯定的，把列强的意見紀錄在案，是一无所失并且是可以大有收获的。三个月以后，当义和团运动有使中国糜爛和招致列强瓜分中国危險的时候，他接着在1900年7月3日发出通牒。他在通牒中声明“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寻求一个能够（在其他事件中）保存中国的領土和行政完整的解决方法”。那个通牒为10月1日的英德协定所贊同。

鉴于美国对华貿易在1898—1900年这个时期約占它的世界貿易总額的百分之三这个事实，美国拥护門戶开放政策显然不出于获得物质上利益的企图。它基本上是美国反对那种原来是英国殖



民帝国主义的一个表示。这种帝国主义似乎于 1898 年已为欧洲各大国接受认为是适用于中国的。美国人在十八世紀曾不仅为政治独立而且也为經濟独立作战而获得胜利。那个反对外来統治的斗争使美国成为每一个为了自己的領土和自己的經濟生存而战的民族的維護者。海約翰在写他的門戶开放照会的时候，是按照美国傳統的真正精神而行动的。

(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 718—723 頁，孙瑞芹譯。)

## 十六、斯温：論門戶开放政策

中国人受西洋文明影响的結果使他們陷入了进退維谷之境。他們憤恨数千年的酣睡被惊醒了。中国人缺乏統一的組織，所以不可能联合反抗。列强遂开始分割中国的广大的領土。1862年法国夺取了交趾支那、柬埔寨和安南，把它們联合起来成为法国人所謂印度支那。俄罗斯开始南下黑龙江找寻西伯利亚铁路的出路。在这个普遍的土地爭夺中，德国得了胶州灣和山东，英国取得了威海卫，英国和美国主張“門戶开放”政策，以阻止中国整个的瓜分。

(斯温：《世界文化史》，第 462 頁。)

## 十七、鈴木俊：論門戶开放政策

各国在中国沿海各地，划定了势力范围，投下巨額資本，在中

国兴办工业企业，使中国原来的工业、手工业紛紛破产，完全淪为列强的殖民地。列强为猎取在华利益，竞争日益激烈，甲午战争之后，一时甚至发生了瓜分中国的議論。美国在美西战争之后，以門罗主义为国策的外交政策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此时，美国势力已經扩展到太平洋西岸，然而在侵入中国市場方面却迟了一步。因为欧洲各国及日本已經巩固了它們在中国的地盘。美国无从插手，于是高唱門戶开放政策，乃于1899年9月，以国务卿海約翰(1838—1905)的名义，照会日、英、德、俄、法、意等国，提議实行开放中国的門戶，保全其領土以及机会均等，用以保持国际間的共存共荣。然而这时正当拳匪到处蜂起局势日益險恶，使这一提議結局归于无效。这一政策却使中国得以免于瓜分，中国人因而感謝美国，美国人对华的經濟活动亦因而易于进行了。

(鈴木俊：《东洋史要說》，第160頁，傅仲涛譯。)

## 十八、宮崎市定：論門戶开放政策

中国領土內既有行使外国主权的租借地，类似于独立国的租界，允許外国資本修筑铁路，并承认其在铁路沿綫矿山的开采权，有时甚至承认有駐兵权，于是产生了外国的势力范圍。帝俄划定滿洲，德国指定山东，英国指定长江流域，法国以云南、广西一带为势力范圍。在其势力范圍中，列强主張有优先权，不許他国在其势力范圍內获得权利。因此，外国的政治經濟势力深入中国内地，中国乃成为各国的半殖民地。

世界各强国中，唯有美国在中国沒有势力范圍。为使美国人

民在各国势力範圍內不受排挤，乃以国务卿海約翰的名义，提出門戶开放政策(1899)，主張在各国势力範圍內，一切国民俱应在通商上航海上享受平等待遇。如要貫徹此政策，則势力範圍将失去存在的理由。当时的中国人已感觉到因为国家丧失了主权，受到許多痛苦，因而欢迎門戶开放政策，恢复主权运动，乃日趋旺盛。

(宮崎市定：《門戶开放政策》，見京都大学編《东洋史》，第388—390頁，傅仲涛譯。)

## 十九、馬士：論义和团运动的起源

### 义和团的組織

书面中提到义和团，这是第一次。一年以前，大刀会在江苏北部和山东西北部积极发动叛乱；但是在毀坏了一些教会和在乡村造成許多苦难之后，叛乱便被鎮压下去了。在1899年5月間，一种同样的叛乱发生于直隶省南部，也同样地被鎮压下去了。在所有这个时期中，山东省西部是混乱繼續发生的場所，九月初才知道这些叛乱是由“义和拳”操纵的。义和拳这个名称能有两种解释：从文字上来看，——已見之于各种官方的文件中，——它表示“义与和的团体”或是“义与和的拳头”，后者是公认的字样。实际上，这个团体是一种“体育会”，以打拳和体育鍛炼作为它的表面的目的。所以，它常被称为“义和团”。在它的旗帜上有四个字的題辞作为标记——“兴朝灭洋”。它的党羽們須經過各阶段的秘密入团式和神秘的仪式；最高級的傳授者由于有死人的灵魂附着身体而

能使刀、矛或槍彈不入，他們在進行攻擊時表現了很大的活躍。當月月望的那天（5月19日）被選定為攻打山東西北部恩縣教會的日子；但是北京和天津方面發出給巡撫的嚴厲命令，叫他們有效地保護洋人，義和團於是改變了他們的目標而攻打中國教徒的村莊了。

### 義和團為官吏的同情所支持

在所有被擾亂的地區內的官吏們似乎對義和團表着同情，或是罪惡地加以忽視，充其量也不過是束手無策，襲擊天天在進行，而襲擊者是受着紳士們的有組織的掩護的。中國的基督教徒被強迫燒香並在廟宇的神象前下跪，但是，不管他們是否屈服，他們所有的可以被拿走的東西都被搶走了，甚至為了準備過冬的糧食也被搶走，而當時由於歉收的原因，從長城起遠到黃河的地區都普遍鬧着災荒。但是對於這些搶劫者卻絲毫沒有採取行動予以制止；誠然，在10月初，在山東省西南的曹州府鎮台因為逮捕了大刀會的門徒，曾經同他的六名衛兵遭到暗殺。可是軍隊卻曾被派來鎮壓這種普遍的騷亂，有一支軍隊與一隊義和團相遇，後者被驅散了，一百名被殺，若干名被俘虜。這對秩序的恢復曾經給以希望；但是省撫卻把府、縣都革職，召回軍隊，並把逮捕過義和團的捕頭鎖鑄着押解濟南府。於是義和團們明白了，巡撫對於他們的那個團體並不是不友善的，而對於攻打他們的人卻是痛恨的，他們的行徑受到了鼓勵。至於軍隊，不管駐紮在什麼地方，都奉到命令，除非得到巡撫的明確的指示，不得開槍，這些命令抵銷了以前發給各知縣要保護洋人、維持治安的那些訓令的效力——“現在沒有一件

比中国当局既不能又不願‘治理’山东这个事实更确实了”。

### 义和团的活动增加

义和团繼續着他們的襲击。这些襲击是正常地組織起来的，有一份曉諭是这样写的：“义和团：着你在九月初七聚齐。兴朝灭洋。有人不服从此令者，头顱遭殃。”德国使館在 11 月間报告柏林說，“‘紅拳’（义和拳）和‘大刀’教派的党羽們現在是在一种对山东政府和人民进行叛乱的状态中，并在許多地方从事搶劫。”“有一次，10 月 18 日在山东北部，他們被从直隶派来由袁世凱的弟弟袁世敦所率領的軍隊打散，六十名被杀，一百名受伤，其中包括数名‘枪刀不入的人’在內。”但是他們的行动仍然繼續到年底，在本质上总是反对基督教的，并且总是打着“灭洋”的旗帜；在义和团与教民之間經常发生着战斗，而軍隊却袖手旁观；对于本国人的基督教徒的虐待是“极端殘忍的”，人們被拷打，房屋被毀坏，教民被迫叛教，这个运动已經扩展很远而至直隶。

### 1899 年 12 月 31 日杀害伯魯克案

在 12 月 31 日英格兰教会牧师伯魯克从泰安回到他在平阴的傳教所，在济南府西南五十哩的毛家鋪被一群强盜所謀杀。强盜的首領們被证明是大刀会分子，并且他們有五天的工夫在組織一个排外的变乱。在第六天，他們看見了伯魯克在他的归途中，他們赶紧扎上了紅头巾，冲向前去向他攻击；在攻击中他受了伤。他們于是把他的衣服完全剝去，在那极冷的天气中把他綁在外边。在

夜間，他們把他帶到毛家鋪，他到達那里的時候，由於赤身露體和受傷，已經筋疲力盡了。他就在这里逃去，但不久即被抓回，並且被斬首。這種暴行不過是一年多以來在山東省對基督教徒所進行的戰爭中的一個高潮而已，但是它激起了當局的普遍的譴責。帝國政府由西太后的親筆宣稱那是“實深悲痛”；它指出一再宣布過的“所有國家都可以在中國宣傳他們的宗教”這句話，並且指出關於此意的“一再頒發過的命令和禁令”，它命令“殺人犯必須捕獲並加審判。”這個照辦了。並且在2月28日在濟南府把被捕的七個人由臬台當著英國領事甘伯樂的面加以審判，在這些犯人中，兩人被處死刑，一人終身監禁，一人監禁十年，一人監禁兩年，一個旅店店主被釋放，因為他曾仁慈地給伯魯克飲食並替他松綁；村里的地保也被釋放，因為他是被大刀會所威逼的，這並不是說他受到這被捕的六人的威逼，而是受到在背後沒露面的數百名的大刀會分子的威逼。賠償費為九千五百兩，這是作為紀念死者的費用的，而不是作為償付血債的費用。當地的知縣被控訴到皇帝面前。

### 毓賢對於義和團的興起所負的責任

“毓賢是主要的罪犯，除非這個人首先被處罰，我們不能堅持對低級官吏們的處罰，因為他們實際上是在他的命令之下行動的，”這是英國公使的評論。毓賢——一位皇族，為西太后所特別袒護的人，滿洲人反維新派的附和者，因此極端排外並反對一切改革——在1899年3月奉派為山東巡撫。5月26日、6月5日和11月21日的朝廷諭令，着所有官吏抵抗外侮，其意固在對付意大利的要求，亦在對付德國在山東的侵略，這就在毓賢的肩上加了一個

特別重擔，那就是要把山東的德國人局限於適當的範圍之內。他是個滿洲人，在治國的觀念上不及普通的漢人官吏，他從一開頭便接受了這樣的思想：制止洋人最好的方法就是使他處境不安，這也是董福祥和許多地位更高的人們的思想。接連地經過夏季與秋季，上海的新聞記者，一般都是美國傳教士，他們指出。那是巡撫毓賢，只有他一個人，使恢復治安成為不可能；就是他支持士紳們仇恨洋人的態度，是他阻止了地方官吏保護受害者的熱誠，是他禁止軍隊採取行動，是他用某些技巧釋放了義和團的头目。中國人的意見也支持這種信念。在一封從濟南府的一個中國人發給他在上海作官的兄弟的信中確切地說明毓賢教唆了義和團；他實際上對義和團和大刀會曾經說過，“去殺搶，並且消滅一切洋人和教徒，雖然結社是朝廷明令禁止的，我願赦免你們的這種罪。”這位中國人寫了許多義和團搶掠的例子以後，寫道，毓賢曾經對他的官吏們說過，“把所有的傳教士和他們的教徒們的請願書都視作廢紙；”信中又加了一句“倘若他要攻擊洋人，為什麼不打發義和團到膠州去對付德國人呢？”

### 袁世凱接替毓賢為巡撫

受到直接影響的洋人是美國、英國和意大利的傳教士以及德國的傳教士和工程師；而美國的傳教士則首當其衝。美國使館感到這種危險，一再提請總理衙門注意，對山東的紊亂情況有採取有力措施的急切需要，並且對於此事要發給巡撫以“絕對的、不容誤解的命令；”最後那位公使要求將毓賢撤職，“倘若這位巡撫不願意或不能夠控制暴徒和保護人民，他應當立刻撤職，派能夠而願意的

人去接替他。”中國政府照辦了，12月6日的一道諭旨把毓賢召回北京，派袁世凱代理他的職位。義和團的運動繼續擴展着，但是敘述一定要暫時中止，以便談論一下皇帝的命運。

### 廢棄光緒帝的最初各項企圖

在反對維新的運動中，光緒帝的生命在實際的危險中，即使生命可以保全，他的旦夕被廢似乎只是為了怕外國的干涉和在保守派中對他有利的那一系的存在而避免了。在1898年12月13日，西太后表示了一個要用覲見的方法來與外國意見達成妥協的願望，皇帝與西太后第一次接見了美國、英國、法國、德國、俄國、奧國、荷蘭和日本使節的夫人，貴重的禮品賜給每位夫人，一個有利的印象產生了。但是廢君的問題並未放棄。在9月初——在專事勒索的剛毅要結束他的出巡的時候，在義和團興起於山東，而成為真正的危險的時候，在榮祿與慶親王之間的互爭變為明顯而兩派的御史爭向皇上呈遞彈劾，互相攻訐的時候——在這種危機之下，廢君問題確切地決定了，擬議中的光緒帝的繼任者為溥儀，他是載瀾（按：系載漪之誤）——慶親王的朋友和擁護者——的一個九歲的兒子；最初的步驟是在9月4日單獨用皇帝的名義下詔說明他的健康情況不佳并向西太后請求准許讓位。中國的一種習慣是一個官員要想辭職須連上三次說明健康不好的辭呈，頭二次要被拒絕，在第三次的呈請中才得到他所要的最后答復。皇帝這項請求第一次被拒絕了；但是據報俄國從滿洲準備調派大批軍隊，這是一個不祥之兆。漢人官吏呈遞了許多奏折反對任何廢君的企圖，並且榮祿的力量也足以使這種決定延緩。



## 继续煽动

滿洲王公、貴族和各旗坚定地站在庆亲王方面，荣祿現在实际上陷于孤立，从这时起，他在西太后左右議事的影响迅速地减退。可是，他对庆亲王的优势仍然坚持斗争；但是后者現在找到端王載漪为其联盟，載漪是嘉庆帝的第三个儿子的孙子，第四个儿子的嗣孙，他是慈禧的坚强的党羽并且在朝廷中是个新起的人物；他原是貝勒（三級王爵），在 1894 年晋升为郡王（二級王爵）。在 11 月間，一个重新提出的廢君的建議是被大部分滿人所支持，但是为一部分滿人和許多有势力的汉人包括李鴻章、刘坤一和張之洞在內，所坚持反对。李鴻章的反对可能就是 he 虽然保留着軍机大臣职位（按应作大学士——譯者），但在作了北洋大臣之后，却奉派为辽远的、职位較低的代理湖广总督（系两广总督之誤——譯者）的一个因素。在 1 月 1 日光緒帝下了一道很重要的詔书——“現在朕躬違和，所有年內及明年正月应行升殿一切筵宴均着停止。”

## 溥儀被选为同治帝的假定继承人

中国六十年甲子的庚子年，即光緒二十六年，西历 1900 年，是滿洲大清朝代命运有关的一年。那年的閏月是 8 月，年份为庚，又遇到閏 8 月，这一向被人们认为是对于朝代充滿着災害的。这个恶兆从以下的事实看来更加令人惊心动魄：虽然“庚”年每十年逢到一次，但是从 1680 年直到 1900 年，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年又遇到这样的一个不祥的閏月。再者，在 1898 年，中国百日維新的那

年元旦，是西曆1月22日那日發生日蝕，日蝕的中綫經過拉薩到內蒙古，在北京日蝕達六分之五……這預示人民有災害。這些惡兆如此緊接着發生，一個是對人民有關係的，一個是對皇帝有關係的，在人民的心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但是西太后是會被任何一個惡兆所阻擋的，因此在1月24日單獨用皇帝的名義下了一道詔書，在這個詔書中他引叙了他是由於作為咸豐的繼子而為皇帝的這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所以他的兒子要被過繼給同治作為他的繼子，他已經虛弱無力有一年之久（從1898年9月開始）；“……敬念祖宗締造之艱，深恐弗克負荷，且追維入繼之初，恭奉皇太后懿旨，俟朕生有皇子，即承繼穆宗毅皇帝為嗣，此天下臣民所共知也。乃朕痼疾在躬，難于誕育，以致穆宗毅皇帝嗣續無人，統系所關，至為重大。忧思及此，无地自容，諸病何能望愈？用是叩懇聖慈于近支宗室中，慎簡元良，為穆宗毅皇帝立嗣，以為將來大統之歸。再四懇求，始蒙俯允，以多羅端郡王載漪之子溥儀，承繼為穆宗毅皇帝之子。欽承懿旨，感幸莫名，謹當仰遵慈訓，封載漪之子溥儀為皇子，以綿統緒。將此通諭知之。”第二道詔書冊封溥儀為先皇同治的繼承人。第三道詔書任命崇綺（同治的岳父）為太傅，徐桐（漢軍旗，具有頑固的排外觀點）為少傅，隨侍大阿哥，或稱太子，那時他已十四歲。西太后又下了一道諭旨：“元旦日皇帝（獨自）到寧壽宮叩賀，之後，我到皇極殿受太子和所有王、公、貴族叩賀。”

### 光緒帝未被廢，但被棄置；廢君的决定延期

光緒帝沒有被廢，但是他被迫承認他作為皇位的繼承者的不合法，這種不合法的情形在1875年就有許多滿人和漢人認為是

“祖宗的慣例和一向遵守着的继承法的破坏”。这个弱点，当它合于慈禧的計劃而需要被忽視的时候便被忽視了。但是現在她的計劃改变了，所以它又重新被提出了。可是光緒帝自从他继位以来算是称职的。由于守孝三年，他得了作为同治的嗣子的应得的地位，并且他已經在位二十五年了；这些事实引起广大帝国人民的同情，并且夹杂着人們对西太后的深刻的不信任，因为人們觉得她在晚年是濫用她所篡夺得来的权力的。广东省是反对她的。但是敢怒而不敢言，她为了要控制广东省，便采取措施要逮捕或暗杀康有为；各省的維新派没有一个不忠于皇帝本人的；大多数汉人官吏也是如此。刘坤一奉召到北京去，对他被控各事进行答辯，但是行期一直延迟到春季；張之洞受到示意，着他請假到北京，但是他婉却了，因而受到斥責。奏折雪片飞来，有一份在1月26日由經元善和其他一千二百三十人联合签名的电报从上海拍給皇帝，向他保证他們的忠心，并請求不让位。这种集体式的奏折共收到了四十六份，发生了效力，使慈禧犹豫而采取中間路綫。1月29日发出四道諭令，規定在8月6日庆祝皇帝三十岁誕辰的程序：第一道禁止举行任何特殊的仪式；第二道禁止高級官吏請假来京祝賀；但是第三道对于照例的恩科却令其举行；第四道規定須穿七天全副朝服，就是在誕辰的前三天和后三天。

### 頒发了一件不祥的鼓励义和团的諭旨

1月4日的諭旨对于伯魯克被杀案是用一种安撫的口吻的；但是在11日另行发出一道諭旨，美国的使节对于这道諭旨声明說：“对于它的奇怪的措詞，我个人是有些担心的；”法国的代表认为它

的詞句的特点是“含糊不清，模稜兩可”因而是“語意雙關”；但是，英國公使只說道：“其中有些部份是可以疑懼的。”這道諭旨先說：“邇來搶劫之事在各省都大為增加”，並說這是由於“壞人和叛徒們的幫會和社團”，然後便命令“對於這些團體的性質和目的須加以區別，”為了搶劫和暴動而成立的那些組織是不能容許的，但是“倘若是守法而忠誠的人民聯合自保，或是各村聯合互相防禦，這是老百姓實行守望相助的天職。”官吏們倘若不能如此的加以區別，便是未盡他們的職責；”對於傳教士和教民應公平待遇並加以保護；但是“保護或防守他們的家園是人民的天職……安靜與和平於是可以實現……實所殷盼。”

### 對毓賢的恩寵加深了對義和團的鼓勵

從山東和直隸南部再傳來的報告“證實了一般的意見”即這個諭旨……被義和團和大刀會認為是袒護他們的，並且給他們許多鼓勵……他們的人數逐日增加並有發生更嚴重的麻煩的危險。一般人更進一步的相信，西太后已經決定“董福祥應當實行他的把所有洋人驅逐到海里去的計劃”，要達到這個目的，她認為義和團是一個很有用處的聯盟。這些信念，由於在北京給與毓賢的接待，在洋人乃至義和團的心目中都加強了。1月16日的京都報記載宮廷消息說，“毓賢到達北京，被召見了，西太后並賜以福字的匾額，”總理衙門解釋說，這不過是照例酬答勛勞而已；但是美國公使對於處置山東叛亂失之太寬一節，立刻提出抗議，他聲明說，“朝廷對巡撫毓賢的表揚，必然為這樣的一些意見提供了理由。”

### 各國使團要求取締義和團

直接有關的各國使團是美、英、法、德和意的使團，他們更為感到驚恐之後，便在1月27日向總理衙門提出一個同樣的照會，吁請注意那道諭旨的模稜措詞，並且要求另發一道諭旨“下令指明對義和團和大刀會予以全部取締”，並且可以“在諭旨中清楚地說明，凡屬於這些團體的或隱藏其分子的，都是違反中國法律的罪犯”。這個問題對於使團是很急迫的，但是中國政府並不覺得如此，因為它正忙於解決繼承皇位和慶祝新年等更重要的事務；但是一個月之後，在2月25日，各國使團被通知，已經發出了一道諭旨命令直隸總督和山東巡撫取締那些團體；在3月1日，直隸總督按照給他的命令發出一道布告。在3月2日，各國使團在與總理衙門舉行的會議上，提出另一份照會，要求把這個諭旨在京報上發表；但是在3月7日，以與先例不合這個照會被拒絕了，使團在3月9日的照會中用更堅持的口吻再度提出他們的要求。美國公使表示他的意見說，“中國政府不是故意地，就是由於怕發生普遍的叛亂，對於這件事一開始便公然玩忽，並且完全破壞了條約上的義務，”所有這五位公使都同意勸告本國政府在北直隸灣進行一次海軍示威。

### 袁世凱任巡撫時的行為

對於袁世凱的行為的意見是分歧的。從他的精力，他的廣泛的對洋務的知識以及他在李鴻章手下所得到的長期訓練，對他的期望是很大的；所以美國政府就被導致得表示它的信念說，“派袁世

凱為山東巡撫，在該省可以展開一個新紀元；”但是那些在現場的人們却感覺到“幾乎單純地只有失望”。隨着時間的前進，那些“在現場”的人們開始看到他似乎是企圖做他所能做的事，但是他的手被北京發來的限制的命令以及在他手下的官吏們的暗中阻礙和冷淡的支持束縛住了。在中華帝國，一個省的表面上的專制的統治者，總是很奇特地處在一種從上面來的冷淡的不同意和從下面來的暗中的敵視的影響之下，從他在3月14日由署理巡撫升為山東巡撫的這個事實看來，他是沒有逾越北京命令範圍的。中國政府不存好意可以由它對於毓賢的寵愛看出來；毓賢是明顯地由於美國公使的建議而撤去山東巡撫之職的，那位公使對於西太后加毓賢以恩寵曾經提過抗議，而現在他被任為山西巡撫了。英國和德國公使提出抗議；美國公使認為這個舉動是“不友好的”，並且警告中國的大臣們說“他的任命將會引起麻煩”，這個警告獲得美國國務院的批准。

### 對中國官吏們的賞罰

這個時機被選定為重新發動反維新運動的時機。在2月22日，西太后下令逮捕在各省的二十名維新派分子，被迫在江蘇常熟原籍家中養晦的光緒帝的太傅翁同龢也在內，但是因為他生病的原故，逮捕延期執行。據報，另有幾張名單預計要隨之而來，包括人數在四百名以上；這是剛毅和其他反動分子搞的，但是榮祿不以為然；人們希望這種迫害只要劉坤一表現出他的力量就可以馬上停止的。在3月9日，有五名主張維新的翰林為了不稱職，盜用公款，“失掉正義感”，“居心叵測”等罪狀被處極嚴厲的刑罰；這件事被認

为是“西太后和她的新近的顧問們的极端排外情緒的明证”。在3月20日，为了皇帝的誕辰，下了一道諭旨，公布了一張加恩賜爵的长的名单；李鴻章奉准在补服上綉龙，徐桐賞戴三眼花翎（通常是王公用的），王文韶和刘坤一奉命为太子少保。刘坤一拜命后随即晋京，在4月5日被召見，7日再被召見。他得到了西太后和在場的亲王們热烈接待；他被强烈地要求去采取步驟“消除”維新派；但是他答复說那是“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工作”；但是明显的是，他是唯一可以維持江浙，及在他管轄下的其他各省的治安的人，不管他一再請求退休，他奉命回到他在南京的职务。他在5月9日又重新到职視事。对維新派的迫害已經停止了，4月15日的京报公布了取締义和团和大刀会的上諭，外国的軍艦“返回原防”。

### 帝国普遍不安

不安的情緒波及到每个地方。在2月間得到消息說：在距离騰越二百哩的蛮卡有两名屬于英屬緬甸边界委员会的凱德尔和苏滋兰被当地土人所杀，領館人員里頓受伤；但是这件事上並沒有象在1875年发生的謀杀案那样具有重大的政治作用。2月間在河南发生了“普遍不安的情况”，特别是更直接地反对政府和富人。在湖南，倘若廢君問題繼續进行，更有发生总起义的危險，但是在刘坤一——他仍在南京——的影响下，当时該省还保持着安靜。在湖北，民間普遍傳說当年将要发生叛乱。在云南傳播着这句话“磨快你的刀，准备即将到来的战斗”，其意特別在反对法国铁路計劃。在广东，官吏們显然在积极准备对付“在夏季的大叛乱”。在浙江，台州府又发生了教民間旧有的爭斗，并且有一个天主教徒受了重伤。

在直隸，“義和拳運動靜靜地伸張到該省的北部”，並且據報有八千名端王的軍隊已經“加入了義和團”；在5月初，武裝的義和拳襲擊了距北京八十哩的保定府附近的天主教教民的村莊，殺死和活活燒死的教民約有七十人；兩天後，他們用同樣的方法進攻了距北京僅四十哩涑水縣的基督教教民的村莊。在山東，除了所有的義和團對教會和教民的攻擊外，還有對於德國鐵路工程的攻擊。最可怕的一次是在2月2日，當時有五名鐵路工程師被來自高密的一幫武裝匪徒從他們的工地上驅逐出走；在三天之前，有通訊員被中國知縣警告不要去到高密附近。

### 德國報紙對於綏靖的保證

正當着義和團在山東搶劫各教會的教民和德國工程師的時候；正當着朝廷秘密地在鼓勵義和團的時候；正當着皇帝受着被廢的威脅的時候；正當着維新派又被追查迫害的時候——在這樣的一個時候，在上海的德國機關報抗議在上海的英國報紙“關於中國的事件傳播極不可信的謠言，其性質是要使歐洲的人民相信中國不是即將發生革命，就是它的政府制度將要總崩潰”。它譏笑恐懼主義者的報告，它把這種報告指為“野狐禪”，它宣稱這種報告用電報拍到外國是為了達到影響股票市場的目的；它反對這一種要“搖動對中國現況的信心”的企圖。

### 警告排外起義的通知

5月初從北京發出一份更為真切的通知，它告大眾說，有一種



要消灭所有在中国的洋人并从外国手中夺回所有租界的秘密計劃；其主要的首領是西太后、庆亲王、端王、剛毅、赵舒翹和李秉衡；在这个运动背后的武装力量全部是滿洲軍，——庆亲王的軍队五万人、端王的軍队一万人，剛毅率領的禁卫軍一万二千人——并把义和团充作援軍；这个計劃的实行是迫在眼前。所有上层的汉人都知道这事并且警告了他們的外国朋友，但是被取笑了。外国使团已經要求取締义和团，因而用沙土迷了眼睛；荣祿現在已經决心站在皇帝的一边。

（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第 188—204 頁。）

## 二十、馬士：論八国联軍

### 北京受到的懲罰

北京受到屈辱了，它遭受到象一般亚洲城市被亚洲軍从攻克后所經常遭受到的痛苦——不过，現在的侵略軍却是些西方軍队。强壮者都逃跑了；不太强壮的人如能找到交通工具的話也逃跑了，但是交通工具是缺乏的；許多滿洲貴族和无数的妇女都自尽；成千成万的人在以屠杀为乐的疯狂放蕩下被杀了；留下来的幸存者象被鞭打过的猎犬一般在犬舍里畏縮着。北京城曾經被搶劫，最先被义和团，其后被中国軍队，但是他們不过搬取了表面上的浮油。外国軍队現在却着手对它洗劫了，虽然是暴乱地，却是有步驟地在干。最初，他們散布到城內各处，随心所欲，不管地区。其后，每个分队在指定由它来維持治安的地区进行搶劫；在最后的阶段，各司

令官們曾試圖在當時無秩序的狀態中裝出建立秩序的樣子，設立各種戰利品貯藏，並命令所有劫奪到的物品都應交給戰利品的總管。日軍大概是照辦了，但是西方國家的各分隊的戰利品貯藏是不曾達到一個大的數額的；因為這些軍隊都不受管束，把北京和它裡面所有的人和財產都看成是由他們任意擺佈的戰利品；所以，天津如此，北京更甚。由於中國破壞了國際法並向世界挑戰，世界也反過來在對待這個破壞法律者時不承認它自己的法律。

### 聯軍占領北京，頒布戒嚴令

在8月16日的會議上聯軍的司令官們把北京城劃分為若干地區以便占領和維持治安，每一個國家——日本、俄國、英國、美國、法國為援軍的各該國的部隊所代表，在三個城中——皇城、內城和外城——得到一個指定的地區，而美國又在一個時期內繼續供給衛隊把守紫禁城的城門。有一隊德軍，人數為一千二百人，在8月23日到達，另有一千人可望在幾天內達到，當即由指定給俄國的地區內劃分一部分給了他們。日軍“直驅國庫（戶部）搬了二百萬到三百萬兩銀子送到日本使館”；他們又為本國政府奪取了內廷綢緞庫和谷倉。有些地區在一二星期內比較地恢復了治安，在另一些地區內，不安的情況繼續了若干星期之久，但是在所有地區內，外國軍隊在頒布了戒嚴令的情況下將這個被征服的城市加以占領。

### 8月28日武裝隊伍穿過皇宮

在占領紫禁城的問題上達到了妥協。大家同意不應占領，但

是在8月28日外国军队的各分队由他們的使节和使館人員們伴同着进入了紫禁城各門并穿过各殿；各使节和高级官員并且檢視了大內各室。军队是依照以下的組織进入的：八百名俄軍，八百名日軍，四百名英軍，四百名美軍，四百名法軍，二百五十名德軍，六十名奧軍，六十名意軍。俄軍担負进行正式入城式的責任，他們的司令官李涅維將軍檢閱了各分队——英国分队除外——并且接受他們的敬礼；在入城的时候，各分队一面前进，一面互相欢呼，“和其他日軍分开游行的由水馬大佐率領的一小队肅王府保卫者尽兴地欢呼，这也是应当的了。”各使节、秘书和高级官員們对于所到各室都很感兴趣，可能除了少数的小小紀念品外，他們对于各室里的物品都很謹慎地予以尊重。在9月8日，俄国海軍提督阿烈克謝也夫偕同一小群人对皇宮作了再一次的訪問，据記述所載，“自从前次訪問以后，所有小的物件都已移去；中国侍者都穿上了制服并且人数增多了。”瓦德西伯爵在10月到达北京后，在中国皇帝的宮殿里建立了他的司令部。

### 帝国屈辱已极

帝国已經降落到这样的深淵里了。在1842年，中国屈从于一个条約，这个条約是被作为結束战争的最便宜的方法而接受下来的。在1858年和1860年，它降到一种屈服的地位并被迫让与了侵害它主权地位的許多权利，但它却免了許多耻辱的标志。在1895年，它被一个它认作次等的国家所战敗，并且受了很大的侮辱。現在，在1900年，北京朝廷和政府向全世界挑了衅，由于侮辱和威胁了各国正式任命的使节的生命，由于整批屠杀了无罪的傳教士和

他們的眷屬，由于野蛮地攻击了在北京和天津的洋人，他們已經触犯了国际法。为了这些犯法行为，惩罚已經加在那些犯罪的官吏，加在曾經是屠杀和破坏的积极代理人的軍隊与义和团的身上；但是，或許在感情上是有罪，而并未积极参加屠杀的老百姓們却受到义和团和中国軍隊的可怕的摧殘，然后又落在外国軍隊的手里受难，这些外国軍隊是为了他們本国同胞中有些遇到危險和有些遭到屠杀而激怒了的。帝国所受到的耻辱为以往各次战事后所未有，因为它不但丧失了威望且而也坏了名誉；朝廷受到了流亡和自觉无能的惩罚；行政方面，包括在北京的有罪的滿人和在南方的比較有远見的汉人，現在不得不进行一次外交战，其結果是使国家受到了更深的屈辱。

（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302—306頁。）

## 二十一、馬士：論义和团运动的后果

仲夏时节疯狂的勃发，因为王公大臣的支持而更加严重，由于这一短暫的橫禍，中国就不得不支付沉重的代价。它曾經派遣头等专使，其中有一个是皇帝的嫡亲，去为委任公使的可耻的謀杀道歉；它曾經自己对于它的最高級大臣行刑，处以死刑和革职；它曾經停止考試，而考試是它的学者們賴以飞黄騰达的天然門路；对于因彈压它的反对文明的叛乱而起的費用，它曾經負担支付一笔要束縛住它的手脚四十年的款項；它曾經接受在它的都城建立一个外国堡垒和一支駐防軍，因为根据举世的意見，派遣公使到它的

朝廷要能保持住安全，这是唯一的办法；并且，在其他次要的让步以外，它还曾經在原則上同意它在 1854 年和 1856 年以及从 1870 年以来所一再不断地反对的条約的修改。中国在同西方国家直接发生关系的七十年以后，經歷了一系列的步驟——1842、1858 年、1860 年、1885 年、1895 年——而到了現在 1901 年，它已經达到了一个国家地位非常低落的阶段，低到只是保持了独立主权国家的极少的属性的地步。如果它的皇帝要保持神圣的地位，如果它要作为一个国家繼續存在，显然它必須改变从 1834 年到 1900 年所遵循的行动方針。

（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 3 卷，第 382—383 頁。）

## 二十二、丹涅特：論义和团运动 兴起的原因

在中国境内那种积漸而臻于义和团事件的动乱情形，已經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七十五年来，異族的滿清朝代已經逐漸失去了汉人的效忠和信任。汉人对于滿人并未因其为異族或征服者而特別怀有恶感，但是滿人政府的腐敗无能使他們不配作为統治者。捐稅有增无已，而政府既不能維持帝国境内的治安，又不能在捍卫国家、抵御外侮方面有絲毫成就。山賊、海盜和革命分子繼續不断地騷扰貿易所必需的秩序。1839—1842 年、1856—1860 年、1894—1895 年几次在外强手里的丧师辱国，再加上外国人其他无数的誅求勒索，使中国耗去了大量的錢財，丧失了若干土地的情形，揭露

出滿洲人实不能克尽厥职。在 1853 年以后，滿清朝之所以在中国当权；既不是由于本身的精力充沛，也不是由于他的臣民效忠，而是由于列强曾經願意它蟬联下去，否則滿洲人也許会不能苟全于太平起义之中了。

中国人似乎并不曾因外国人是外国人的緣故，便对他們显加仇視。中国人喜爱对外貿易，因为它有利可图，他們恨外国人，只是因为外国人的出現于中国，增加了他們的捐稅，扰乱了他們的和平，更因为外国人的領事裁判特权給了外国人一个社会、宗教和經濟上的特权地位。外国人可以規避掉許許多多苛重的地方稅捐，因而这些稅捐也就更加重地落在中国人的头上。羅馬天主教教徒已經归于外强的保护下，基督教教徒也略有这种情形。在 1860 年以后，法国傳教士深入內地，索还教产；这些教产都是早在两个多世紀以前沒收的，并且久已归諸那些认为产权沒有問題的合法业主所有了。主教和神甫要求和知县平行是一件經常使人忿恨不平的事。教民的态度往往是傲慢无礼，不能容忍的。而且，鴉片貿易虽未为民众所指責，却使得少数心地公正、能以公德心和爱国心为职志的人士，义憤填膺。同时，那些限期办竣而且往往无理的索偿和索偿的要求，虽說由北京給付，却取之于地方，这又在中国人民最敏感的神經上，也就是他們的錢財上，触动了他們，并激起了他們的忿懣。在特权上最受到反滿运动威胁的官吏和紳士們，于是赶快把民間这种不安的情緒轉嫁于外国人。

总之，滿清政府和外国人不断地招惹和刺激中国人的反抗。中国人怎能会那样有耐性，我們不禁为之惊奇。

列强支持滿清政府，并不是因为它们尊重它，而是因为它们不敢冒險，听任革命成功，以致不是造成帝国的分崩离析，就是树立

起一个强有力的新中央政权，而这样一个政权，在恢复秩序和促进全国发展之余，也很可能会建立起一个反抗外国侵略的强有力的阵营。对于列强来说，以支持一个它们所能威胁、控制的懦弱政府，自是最为有利。各外国政府的政策就是要迫使中国人依从外国人的每一项要求，而只以不造成为革命成功的原因度。中国的懦弱无能、四分五裂，才使得领事裁判权、低到不合理程度的税则以及千百种类似的特权，有继续下去的可能；象日本在逐渐摆脱列强掌握之际，也就越来越能够避免这些特权了。对中国最有力的帮助，也许就是列强彼此之间的猜忌。

如果列强认清在 1894—1895 年的战争中，日本竟会战胜，并且认清由于中国战败的结果，中国人民竟也会暂时脱离它们的间接控制，大约它们早已会出面干涉，并将日本人赶回他们三岛上的老家去了。他们所希望的是中国的胜利，借以杀日本的威风，以便重置日本于它们的势力之下。但是马关条约揭露出满清政府已经被削弱到完全没有复兴之望。其中也表示出，日本不但准备过问朝鲜半岛，而且还想插足于亚洲大陆的其他地方。

中国的懦弱、日本的野心勃勃、欧洲在政治上的互相颉颃以及欧洲放款人资金的积压等情形，在列强之间造成了一种利于狼奔豕突的局面。口岸的租借、势力范围的取得以及不割让协定等都相继而来。满清政府正受着列强的嘲弄，中国人民则把自己看成是当前和未来的牺牲品。他们势必要付出代价。中国人民所以准备攻击满洲人，并非因为他们满洲人的缘故，而是因为他们正滥用借口来抽捐征税。他们内政不修，疆土不保。中国人也准备反对外国人，并非因为他们外国人，而是因为他们是扰乱大局的辅助的力量。

在中日战争之后，如果列强同心合力帮助中国，本可给予维新运动以支持，俾得产生一个较好的政府，并使中国人民走上进步的道路，但是列强各怀二心。只有美国愿意有一个强大的中国，可是美国的关心究竟有限得很。因而西太后抓住了这个机会，她也不是显然排外的，但是她却有足够的聪明，看清要维持满清朝代和她本人的势力，最大的希望就在于根除或逐出外国人。这个计划，如果行之有效，当可恢复她的政府既已丧失的威望。由于列强之间彼此的猜忌和它们的贪得无厌，每日给她提供贪婪成性的新鲜事例，正好堕入了她的计谋。外国人之所以能留居中国，完全是靠了1842年以来络绎不绝的外国兵船的“赤裸裸的武力”，自港脚鸦片贸易商以至于最无私、不倦的基督教传教士，无不如此。在这些炮口和它们所瞄准的人民之间，有一大群外国人，其中很多是寻求和平的人，在他们的举止言行上是诚实和善的，但是不论怎样公正不阿也掩饰不住背后支持着他们的那些大炮，而且这些大炮还正在逐月增多之中。无知和迷信到令人难以相信的人民，被逼到了铤而走险的地步。当外国人还坐观成败的时候，西太后“老佛爷”就巧妙地使这团怒火从她本人和她的王朝转移到外国人的身上。这种怒火，尽管有一些可怕的现象，仍不失其为中国人民固有活力的证明。这样，满洲人又苟延了几年。外国人却变成了牺牲品。就集体来说，他们固然罪有应得；但是正如屡见不鲜的情形一样，惨遭牺牲的个人却也是同样无辜的。

（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第550—553页。）



## 二十三、施达格：論义和团运动的 起源和性质

解釋义和团运动之第一人，是吳桥知县勞乃宣。他在 1899 年和 1900 年之交，曾作一小册子，說明义和团运动的性质。根据他的解釋，义和团在十九世紀初叶就已出現，与白蓮教、八龙教、紅拳会，以及同样之邪教的和革命的組織，互有联络。这些会社，在 1808 年，都被嘉庆帝明諭禁止。义和团在初成立的时候，絲毫沒有反基督教的趋向，其目的純粹是带革命性的。經過九十年的光景，义和团仅仅在直隶山东境內暗中存在。直至 1898 年，始重整旗鼓，而为一个活动的，且反基督教的团体。

勞氏的解釋发表时，袁世凱适为山东巡撫，并且努力压制义和团的扩展。勞氏解釋义和团源流之作，也得到袁世凱的同情，于是他把勞氏的《义和拳教門源流考》印出，散給山东的人民閱看，借以警告人民，不要附和义和团。

可是这个解釋，完全与許多重要的事实不相符合，我們絕對不能視之为可靠的說明。首先，我們决不能相信，一个根据邪說而带有革命性的秘密会社，会組織起来，仇視基督教会，因而引起官厅的压制举动和外国的埋怨。这种事情，和中国秘密会社的历史背景完全相反；并且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未之前聞。

宗教的秘密团体攻击基督教，只有一次文献可征的例子。可是这次的攻击，其动机并非反宗教。在 1895 年的夏季，福建古城的“吃菜党”，杀戮了一群基督教的傳教士。在审判凶手时，证明

“吃菜党”攻击傳教士的緣故，是因为傳教士曾經慫恿福建巡撫移駐軍隊于該党最有实力的地方。誠然，哥老会常常引起排外的举动；但哥老会純粹是革命的团体，不带宗教的意味。其攻击外人之根本的宗旨，是使清廷对外交涉发生困难。

有些作者尝替劳乃宜的著作辯护。他們以为义和团原先是邪教的、革命的；但是后来却为慈禧太后及其臣屬所收服，轉而仇恨外人。贊成这个解釋的人——此与事实相反，总以为义和团的組織，起初是叫做义和拳会（会是秘密会社之普通的名詞），后来清廷承认这个团体，就把会字取消。义和团实际上虽然吸收了所謂大刀会，但不能证明义和团是称为会的。

除吳桥知县劳乃宜主張义和团本为一秘密会社外，只有1900年6月6日上諭中，和6月17日以后南方各督撫所发表的宣言中，曾經提及。6月6日的上諭，所言不尽真实。所以这里提及的嘉庆朝查禁秘密会社的事情，与上諭說明义和团的組織是訓練他們自卫的技能，不必加以阻止，这两件事，并不能证明任何东西。6月17日以后，南方各省的督撫，因为要避免义和团傳播到他們的境內，說义和团是叛徒，并且說义和团是源于秘密会社。不过这种宣言，并无推求正确的历史的意思，我們不能拿它来解釋义和团运动之源流与性质。

明恩溥有更切实的证据，說明义和团不是白蓮教的旁支。他说过：“山东曾有六时教之組織，乃白蓮教之余裔，时为官厅所击散。然在該会党所流行之村庄中，始終与义和团毫无关系。”

据我們所知，外国人在中国第一次用义和团这个名詞的，是1899年10月14日，美国駐山东龐庄傳教的博恒理，他在一封通信中提及：“一月以来，此为予等初次受城中遣来之軍士防卫，以抗

义和团之可能的而又危迫的攻击。所謂义和团，即拳术或玩拳者。其組織初称神拳，系一群青年結合之团体，从事角力与练身术。其目的在联合大众，反对附近的外国人。伊等假‘扶清灭洋’之美名，故会众日增，現已侵入龐庄附近矣！”我們可以看出，博恒理描述义和团时，并未提起革命的或者秘密会社的事情。他沒有把会字放在这个团体的名字上。他并且把該团体初次出現的时期，定在他写信之前一日，<sup>①</sup>就是說，在慈禧太后命令改組地方民团的时候。博恒理在山东傳教有二十年之久，而他写信給傳教部的秘书时，还声明他是第一次用义和团这个名字。

博恒理固然是引用义和拳的名字之第一人。同时，直隶东南部的耶穌教会，关于义和团的名字，还有更早的报告。住在杜家屯的伊索勒，在1898年10月25日的日記中，曾有一段記載：“在早晨六时，有人告余，‘义和洛儿倫’（一种仇敌的教派）已經起事。此等叛逆，以头帕长靴，为其标记。其武器为小銃与长叉。其旗帜系黄色而鑲以黑边，上标‘扶清灭洋’四字。其目的系在該年初期发动广泛普遍的革命，同时招兵操练，并与官吏商妥，只攻击基督教徒。”伊索勒和博恒理一样，在中国住得很久，他在1882年就到中国。他描述此仇敌的党众，与其同时的基督教徒所記載的相異之点，仅在其最后的目的之不同。伊索勒日記中，所載义和团的名字，虽然是被法国人公认有拳字意义的“Kinen”，但在法国杂志上，誤印为“Kiuen”是可能的事情，这也可以表示他們对于这个組織，是不十分清楚的；而且其記錄系得自当地受惊的教徒之口。

拳民这个名詞，山东讲英語的傳教士，在認識义和团之名以前

---

<sup>①</sup> 指1899(光緒25年)10月14日。——譯者

的几个月内，无论是单独的或者是在各种記載里，都會用过。在1899年10月2日的《字林西报》外埠新聞栏内，有一篇通訊，注明9月21日天津发。在这篇新聞里，拳民的名字，第一次出現。一周后，山东临清的通訊中，也提到这个名字，日期也是9月21日。虽然，拳民的名字，在教会通訊中，还有人用得更早。1899年1月13日，博恒理致函美国傳教部的秘书，把拳民和大刀会，混为一談。他并且描述这个团体的組織：“拳民为临清以西之人民，因天主教的糾紛而起，8月中重新猝发。但旋为風昌知事率兵击退……此会社頗似德国之体操家，在练身术上，附以唯神論。伊等視教师为一种媒介，且多为年青力壮之人，在教师指导之下，练习拳术。伊等常幻想，以为在受神灵之支配。因此，伊等声称不受外物之伤害，且妄自夸大，以为有莫大之体力与技艺。”博恒理和其他的美国傳教部的會員，在后来的通訊中，常常提到“拳民”、“神拳”、“梅花拳”等字样。

在义和团的名詞还没有用过的前几个月中，拳民二字就通用起来。而且这名字，似乎足以描繪义和团之练身的活动，所以为人采用。当傳教会知道中国的名字时，他們随即把拳字放在第三字地位上，而譯为义和拳会。从此以后，人人都知道这个名字了。

义和拳是北京外交通訊中所用的名字，就是在翻譯清廷的諭旨时，也沿用此名。但这并不是該团体所采取的名字，他們的官名，叫做义和团，或者是民团。其第三字以拳字来代替团字，不过是反对他們的人，有意用的一种双关語罢了。

团或地方民团，在中国地方行政上，是一种久經許可的团体。福开森在《論王安石》——宋朝中国激进的宰相，約在十一世紀末年——一文中，曾經就民团組織的淵源和系統，有所叙述。这种民

团，是王安石变法計劃中的一端。他說：“三年前之拳民运动，实根据团防之观念組成。所用名詞，均为王安石时代所遺留之称号。王氏此种改革計劃，頗有永久价值。其兵制預算之低微，实可称贊。”这些民团的宗旨，是防范盜匪，完全自願的。但政府却亦承认其为合法的团体。

在1898年9月5日，戊戌变法將終了之时，光緒曾頒一道上諭，如果能够实行，則这些民团势必不致成立，而將有一国家陸軍常备軍出現。照光緒的意思，此陸軍的常备軍和預备軍，都应挑选全国健壯的男儿，用西洋的方法，加以訓練教导。两广的当局，曾奉命举办軍备。其他各省，亦拟相继設立。这个雄偉的計劃，差不多全沒有实现，戊戌政变后，更根本打消此議。

慈禧太后比光緒和一般維新者略为实在一点。她想根据国家既有的习惯，来推行改革。——她轉而注意当时的团练制度了。在1898年11月5日，12月31日，和1899年3月17日諸上諭中，她曾有充实并改良地方民团的命令，并且訓令民团使用近代的軍器，其体操教練，也和正式軍隊一样。

慈禧太后，曾令两广首先試驗她的計劃。但是她又命令直隶、山东、山西、奉天四省，首先施行。如果这四省的試驗成功，其他各省，再陸續举办。这种分別施行的理由，很容易明白，因为光緒所依为左右手的維新派，在两广最有势力，而慈禧則完全信賴京畿附近的北方各省。对于带有革命性的南方，則絕不信任。慈禧之最直接的目的，大概是想充实地方的軍备，以維持內部的治安，使常备軍能集中于京都的附近。但是从上述的几道諭旨頒布后，慈禧又期望那改組过的民团，可以作为正式軍隊的輔翼，以防御外人的侵略。

义和团于是成为地方自卫之合法的团体了。并且从1898年11月5日以后，更受了朝廷的认可和鼓励。不幸，朝廷之鼓励兵制，却产生以下不良的结果，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很自然的。其时中国的军队，其征集的方法，在习惯上，是招收些土匪和私贩者，以及社会上一班不安分子。讲到义和团，显然也有吸收暴徒和无赖之徒的趋势。而且自从朝廷鼓励民团，使之防御未来的外患以后，民团乃吸收许多私立的团体，这些团体，因为有排外的举动，都曾经引人注意。

为义和团所吸收而未經朝廷批准的諸团体中，以大刀会为最著名。叙述义和拳的記載最早的也在戊戌政变以后。而大刀会的出现，则早得多了。博恒理于1899年5月間，从龐庄的通訊謂：“两年以来，有大刀会成立。其秘密的宗旨，頗似一种謀乱。天主教士，时与之发生爭端。”数月以后，山东南部的主教安治泰，也有通信，提及1897年11月1日韓理和能芳济两神父遇害之事：“韓、能两神父遇害事之疑云，近漸消散，茲已发现凶手为大刀会之会员。两年以前，在江南省及山西省，亦发生相同之事。”

博恒理对于大刀会的事情，在1900年4月曾經变更态度；或者可以說是增加了新的材料。他在1899年龐庄傳教部的周年报告中，曾經很詳細的叙述拳民与大刀会的历史。在这篇报告中，他认为大刀会之初次出现，是在德人占領胶州灣以后。大刀会的組織，是一个爱国运动的团体，因韓、能两神父被害事而成立，并有抵御未来外患的宗旨。

关于大刀会的举动，在葛弗納神父的通信中，可以找出更有价值之直接的报告。这封信是1898年6月15日从直隶献县写的，內称：“大名府之勿特瓦神父处，曾派来一信差，当渠住在北面一百

八十哩之魏村时，晚間有匪众多人，攻击距魏村約数里之基督教徒的村舍。該匪众——大約系旧日白蓮教之部，今称十八會，或称大刀会——系来自夜間……。”

葛弗納虽謂这些肇事者，大約为白蓮教的一部分。然而那封信的后半，似乎是推翻这个臆測，并且证明这次的滋事，在开始时不完全是针对宗教的举动。

“三月初七(1898年4月27日)，为童生考試之期。諸生咸集于城內，时有杂乱之状。而大名府，則四壁貼有告白。有人以此告余，余乃遣老师前往揭取，并以之呈于地方当局。观此告白之語調，实甚清晰易曉(为稀有之中文)。布告：各省爱国志士，睹西人无法无天之行爲，已决于4月15日集合，屠戮西人，焚毀其居。其不与我同心一致者，男盜女娼。閱此告示，而不为傳播者，亦如之。完了。”

我們讀了葛弗納后半节的信，可知大名府之排外运动，并不是白蓮教或其他邪教的举动。魏村的情形，也許是偶然之事。反之，排外的工作，实在是社会上最純正的分子所为。孔門儒家子弟，因考試而聚于城內。其次，我們可以看出，在这告示中，并未提到宗教。它不过宣布大家仇恨西人之无法无天的举动。当地的教民，只是偶然的提到，指的是違背大众意見的人。

細究 1898 年 4 月末排外运动的动机，不得不先追述几个事变的日期。3月6日，德国經過四个月的交涉，租借了胶州灣。3月28日，俄人用同样的方法，租借辽东半島。4月2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門，接受英国最后通牒，允将威海卫租給英国，等日本軍隊撤完时，即开始借用。4月5日，英国公使又要求租借九龙，此交涉仍在进行。4月9日及10日，中国与法国交換照会，将广州灣租

給法国。此港在事前已为法国軍艦武力占据：

凡此种种事件，中国的知識阶级大都清楚。清廷2月4日承认借外債的消息傳布时，大家都已知道，这不过是中国外交困难的結果。因有此种的压迫，所以不能說中国这次的排外运动，是带有宗教性质的。中国人受了西洋人的侵略，大家都不期而然地仇視教士和教会的建設。因为列强侵犯中国之唯一的具體代表物，就是教士教会。誠然，如果列强侵略事业的代表物是铁路和电影院，那么这些东西，一定也会成为中国爱国志士所要破坏的目标了。

1900年春季博恒理和1898年葛弗納二人所得到的证明，足以使我們得出一个結論，就是：大刀会虽然是一种匪众所組織的团体，——在中国內地許多省分——但他們却絲毫沒有宗教的或革命的淵源，至少在山东直隶是如此。不过，大刀会在这些省分，固然有許多是得到地方官吏的贊助，毓賢做山东巡撫时，为贊助大刀会运动最著名之一人，可是他們并不是朝廷认可的团体。而会的称呼，在中国社会上，有非法团体的含意。所以义和团以合法团体而扩展，其結果使大刀会的分子，紛紛加入，以求一法律上的資格，因为不如此，他們无法获得。虽然大刀会的旧名称，依然为外国在山东的通訊員所采用，特别是在該省的南部，那儿大刀会最有势力。

劳乃宣所說义和团是从白蓮教分支演递出来，为一种秘密的和邪教的团体，如果我們认为与事实不符的話，那么，我們必須对这次运动中所表现的宗教現象，加以解釋。团民的符咒与法术，不可解釋的仪式，以及他們相信有超自然的力量諸事，使他們觉得不致受伤与不致被克服。有些义和团領袖，是佛教徒，而佛庙又为他們集会和行佛礼的場所。凡此种种事实，都足以证明而且能显然的表示这次义和团运动，在1900年的春季已带有宗教的色彩。——



不考虑其源流若何——然而从这些事实，还可以得着一个解释，和前此所讲义和团之性质一类的话，并不冲突。可是要作这种解释，有时不能不离开当前的事实，而作一种大胆的臆测。

西方讨论中国事物的作家，差不多一致地指出中国人的宗教自由。其集诸教之大成，尤为显著。在非知识阶级的民众中，可以看出儒家的思想与儒家的信仰，同时存在。例如佛教道教，以及为佛道两教所吸收的各种地方上的迷信，甚至在士大夫和官吏的儒家的论理中也时常采用佛家的信条，与道家的妙谛。所以我们可以说，就是一个严格的儒家，也可以带着拳民们的仪式和法术。用超自然意志之天然的信仰，来解释拳民们所有的信条时，则二者相差很远。

但是如果信仰神怪的定则，在知识缺乏的团体中，为一通常的发展过程时，则民团中的现象，还有特殊的理由，可以解释。在慈禧太后谕令扩充改进地方民团时，曾屡次吩咐这些志愿军，要用近代的军器和操练。当时中国的兵工厂，还不能供给正式军队以近代的军械，那么，民团自然更得不着新的军器了。他们仍旧用刀剑长矛，和一些极原始的火器。但是地方虽然不能供给民团以毛瑟洋枪，而又不能不顺从朝廷的意旨。这里，他们只有按照新操法的书本，施以分伍分连的操练，学习开步走，以及排列队伍的练习，这类操法，是德日的军事教练，训导北洋军队所用的。民团也如法炮制，勤加操练。在朝廷的意思，以为这些民团可为国家的防御军队；且其威武的精神，也可与“外藩的夷狄”们并驾齐驱。这里我们很容易看出，此类操练，在中国农民的心目中，很容易变成魔术的信条。以为只要大家用宗教的方式去操练，就可以得到超自然的力量，与枪炮不能伤害的妙用。

义和团的神怪說，一部分也可以直接或間接地从基督教的影響中，推尋出来。讀过傳教士通訊的人，就可以知道他們深信有神的力量存在。国家的进化，在他們看来，仅仅是真神与惡魔的斗争。遇到診好魔鬼纏人的事件，无论是耶穌教徒或天主教徒，都喜欢向人报告。而天主教徒們更期望——有时竟記載——有很森严的奇迹发生。至于中国民众，是邪教徒也好，是基督教徒也好，都承认有一种天然的力量在无形中指导西洋人。民团既奉命抵御外国的侵略，大家遂假定西洋人是受神明的保护，于是也期望本地方的神明，起来为祖国宣勞。

我們还有相当的理由，证明义和团的咒語和法术中，曾采用基督教所用的術語。1900年4月末，北京城所出現的告示，可以解釋这个推断。告示录后：

在北京某街巷，有义和团民若干人，于中夜突見一神明，由天空下降。神明初靜默若干时，于是众团民咸下跪而禱焉。旋聞神明出巨声曰：

“我乃玉皇大帝下凡，知尔等之心甚誠。我适已决心告知尔等，此乃大禍将临之时，尔等惟有听天由命。患禍之来，实自洋鬼。伊等到处傳教，設置电綫，修筑铁道，不信神圣之教，而污瀆神明。其罪恶之多，一如毛发之不可細数。故我大为震怒，而发霹靂之声！我日夜皆思及此事，設我遣天兵下界，諒彼小丑，亦难逃此厄运。职是之故，我乃頒行諭令，謂我将率領群圣群神，亲自下凡，凡义和团所在之区，必有神明暗助。我更将俾尔等知曉，凡三界正直之人，务須同心合力，共习义和拳之仪式，以期平定天怒。

“义和拳成熟之日，即洋鬼灭亡之时。天神之意，以为电

纜宜割断，铁路宜拆毀，洋鬼宜斬首。当彼之时，洋鬼之厄运临头，降霖之期尙远，一切皆对待洋鬼也。

“我此时命令尔等正直之团民，尔等宜万众一心，歼灭洋丑，以平天怒。此将为尔等有利之举。功成之日，霏風霏雨，均听尔便。

“我故令尔等广为傳播，俾众周知。”

此事为吾亲眼所見，故直书其經過如此。信仰者必获福；不信者，必获天譴。神明震怒之原因，系玉皇庙之被毀，并知义和拳民，均为虔誠之徒，而为彼祈禱也。

吾若誑語，天誅地灭。

当然，譯者想使他的譯文适当，以傳出这篇有趣的文字；所以不知不觉地就学着《旧約》的声韵。可是在原稿中，一定也有許多地方，和汉譯的《聖經》，有相似的地方。因傳播福音时，有街头宣傳和劝世文的散布，于是基督教的文字，就为中国民众所深悉。所以这中西語法相似的地方，与其說是偶然的，不如說是有意的抄襲。

普通傳說的义和团源流，無論是劳乃宜的解釋，或是后人修正的解說，都不承认拳民是一种民团，或志願的民軍。他們是奉朝廷的上諭而召集的，召集的区域，只限于朝廷所信賴的各省。在帶有革命性的揚子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絕沒有这种运动。嘉庆朝禁止秘密会社的諭旨中，所提到的論证，已为别的諭旨所推翻。志願民軍，实为一合法的团体，其仅有的限制，只是謹防不良的分子，有不名誉的事情发生。就是大刀会，虽然其名不佳，易使人怀疑，可是他們的宗旨，在抗御外患，因此也为地方官吏所批准认可。無論义和团运动将变到何种地步——或許要变到——在1900年春季的

开始时，它既不是革命的团体，也不是邪教的团体，而为一忠实的志願民团，因政府和人民的合理諒解，而得以存在。

（施达格：《中国与西方：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和发展》，第128—146頁。）

## 二十四、施达格：論义和团运动

辛丑和約的締結，在四个世紀以来的中西交涉上，开了另一个局面。四百年来的进步，在西方产生了許多变迁，自哥倫布和达·伽馬发现新航綫后，許多新国家新帝国，相继成立。北京外交团首席西班牙公使，在和議終了时，曾向中国代表声言，謂各国希望最近的事变，与时俱寂。可是西班牙現在已非“强国”，而且在近三年来，偌大的殖民帝国只剩下几块了。达·伽馬是在葡萄牙的旗帜下，开辟东来的路綫，而葡萄牙在北京會議席上，連代表都沒有派遣。

四百年来的光阴，在好动的西方人看来，似乎較为长远。但是就在东方，也发生过好几次变迁。日本已不得不放棄閉关政策与自卫政策了，并且模仿欧洲文明的外表、西方的政治理財法以及战器，使明治天皇在十九世紀末叶，得以成功。这在十六世紀，是丰臣秀吉失敗了的企图。日本在朝鮮境內，获得了在亚洲大陆上的立足点。日俄随后的冲突，足以证明东方民族中，已有一支效法西方文明而成功了。

只有中国还没有改变。西方的革新事业，与通商事业，在中国总是遇着反抗。中国对于自己文明的古远，总是高傲自滿，因羅馬

雅典还在村落时代，中国已有很高的文化了。加以中国常觉西方的方法和学說，总与中国圣贤所創的社会制度不相符合，所以更为执拗。在中国沿海一带，和外国船只可以航进的河流中，西人已經获得立足地点。南北的藩屬与边省，有几处都已为俄英法等国所侵占，但是中国在1900年，依然是未經改造的东方。甲午战后，光绪帝努力，——受思想新穎的团体所帮助——想使中国近代化和西洋化，但在这簡短的改革后，一切又都恢复旧观。

复古的趋向，在中国以及在各国与各时期，都已終止。在进步的道路，有西方率領。現在的西方，已更形强盛，不似商人受制于中国政府的时期了。甚至比签定南京条約、天津条約的时期，还要强盛。如果西方現在更要强盛、富足、人口稠密，則其需要亦必增高。这些需要的东西，中国都有，就是原料与大批的消费者。在中国方面，因欲保存旧有的傳統观念，自然会趋向复古。在西洋方面，因維持其进步的制度——即保存生命的本身——則希望中国不必复古。在这种矛盾的情况下，义和团运动，于以发生。

从中西方根本的冲突上看，不能归咎任何方面。冲突的原因，是中西文化，互不相同，两者各自分离，各自独立。但是西方物质的进步，又使中西不能长此隔离。西方自然的进步与扩展，并非錯誤；中国保存旧有的良好的文物，也不能輕易地菲薄。西方的侵略，或中国拒絕西洋的革新事业，都不能說是有意为恶。中西政府，不过是根据各自的政策，表示两种不同的自然景象。

虽然，义和团运动并非不可免的事变。我們只能假定說，在人类彼此間的关系上言，誤解、驕矜、愚蠢，都是些不可避免的因素，所以义和团运动，就自自然然地发生。我們对于中国和西洋，都不能加以非难。但是庚子事件之主要的責任，却應該落在列強及其

正式或非正式的代表們的身上。

在整个的十九世紀中，西洋人因为經濟的需要日漸增漲，所以时常在改变中国对外交际的关系。十九世紀下半叶，西方机械的——特别是軍事的——发展，非常优越。列强乃运用这种力量，以图在中国达到他們的目的。西洋人所以这样活动，实受政治家的鼓动。在使中国改变对外的关系时，應該了解——或企图了解——那种变更的結果。假定商业的扩展，对于西方各国有切身的利害，假定开明的利己心在政治的有机体上是道德之最高的形式，那么，世界的和平，也盼望这种利己應該好好地发展。可是这个条件沒有实现。列强每在中国达到目的时，总是不顾他們的政策在中国以至在世界上，将产生何种反响。他們都以为对待中国只需武力，并且认为中国人民，向来极不活动，列强尽管为所欲为，决不致引起抗議或仇恨的事情出来。馬夏尔尼在十八世紀末叶出使中国的結果，使十九世紀的海靖、寶納乐、馬迪訥等采取了这样粗暴的方法。

中国和西方一样，也非常自傲。虽然初来中国的敌人曾受到相当的尊敬，可是不久，中国就把西洋人看作夷狄之民。这时西洋人为中国所注意的，只不过是优越的軍器罢了。中国因为不能抵抗西方的軍队，所以不得不去履行条約上的束縛。这些条約，中国政府不能而且不願意去实践。中国人民和地方官吏也都不願履行。列强則时出怨言，說所訂的条約几等于零。中国方面，对于西洋的国际公法，向来不十分理会。他們以为解决問題，应合乎公道礼法。西洋对于中国礼法的标准，也是茫然。他們仅仅看到要中国履行条約，只有运用武力。

庚子夏，列强因見戊戌改变的意义已完全消失，乃深信中国民

众的惰性已达极点。各国的外交使臣，对于慈禧与其群臣反抗西洋的势力一事，都不十分注意。他们以为这不过是中国宫廷偶然的密计，或者充其量不过是光绪帝和康有为提倡革新的反动。中国调集军队来京，以资防御外国，各国也不大理会。只有董福祥的军队到京城时，大家才注意起来——这个时期，是中国引起西洋人惊恐之心，使其借口召集使馆卫兵进京。清廷提倡民团的上谕与地方外交的上谕，列强也没有注意。1899年3月15日的谕旨，完全是因天主教僧侣阴谋的成功而发。1899年春夏之交，中国拒绝意大利的要求一事，足以表示中国的新生精神，而西洋也忽略过去。中国政府因感受近来的羞辱，与民众间日渐不安的状态，乃决定抛弃外交上的权术，准备在必要时，以武力作后盾，反抗任何侵略的举动。

这些足致纠纷的征兆，观后来的事变，非常明显，西洋各国，全没有顾到。西方的政治家，看不见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他们以为瓜分一个“东亚病夫”的财产，是不会引起反抗的。列强只在那里商量如何瓜分，并使大家得着平均的利益。美国则不愿参加这种毒谋，声言各国对中国条约上的利益，必须尊重。这就是1899年底“中国问题”的概况。那时，关于义和团运动的传言，已屡有所闻了。

北京的外交团，对于当时的形势不甚了解，所以努力使中国制止义和团变乱。他们最大的错误，是没有认清中国政府的性质及其拥有的权力。当时，外交团都深信中国的皇帝有专制的无限的威权，所以他们提出许多中国政府无力实践的要求。所要求的既不能实现，于是就运用最后通牒，——以海軍示威及其他軍事上的表现为后盾——强迫中国顺从。还有一个同等重要的错误，是他

們对于这次运动的性质和原因，沒有彻底的了解，他們对于民众仇視外人的原因，不加理会，反相信义和团为一叛逆的秘密会社。因此，认为中国政府有意地在寬恕这初起的叛逆，盼其能消灭所有的傳教事业。此外，外国的代表，又輕信报告，把义和团的搶掠和本地教民的遭遇，言过其实。这些报告，半由傳教士送来，——本来甚不可靠——半系根据教徒的傳說，后来往往写成相反的消息。如果报告可靠，則各国在京城的要求，有些还可以說得过去。中国政府，从地方官方面得到不同的——而且常是更正确的——报告，乃深觉列强实在是寻找借口，再来欺侮中国。

北京的外使，根据这些錯誤的見解和不可靠的消息，制訂一种很不幸的政策。自1月第一次联合照会起，至6月9日西摩援軍出发止，外交团每一个步驟，——無論个人的或团体的——都足使騷动加剧，而促成最后的災难。外交团的压迫和軍事上的威吓，使中国的专制政府不得不接受一部分的要求。这种外国的示威，如果引起侵略的恐惧，中国人民对于其政府的威权，就逐渐不尊敬了。5月31日，保定府的“铁路上的外国人員”与义和团的冲突，使北京沿海一带的騷动状况更形复杂。这次冲突，外国的代表自然都沒有責任，但是从此时起直至6月10日止，这次的事变，都有可避免的机会。西摩援軍离开天津向北京进发后，中国政府和外交团已无法控制。在当时的情况下，战争的爆发已成不可免的事情。当时的問題，只不过是騷乱地域的范围而已，这次冲突，能够限于北方数省，实系揚子江流域各督撫的力量，也是——只此一次——外国政府应承中国要求的力量。

自大沽炮台失陷后，中国人民受守旧官吏的贊助和指导，向傳教士和本地的教民大肆攻击，以泄积憤。北京的公使，在街市被



击毙，公使館受长时期的圍攻，这些激烈的举动，外人将永不遺忘，实难以原宥。可是这些举动，并非有意的图謀，实系中国民族久受侵略，已至忍无可忍的时期，突然的爆发起来。故西方經營租界地的政府，以及中国的人民和官吏，对于庚子事件，双方都应分負責任——就是对純为中国人民的凶烈之举，也是如此。

1900年12月22日各国政府致中国的照会中，有謂中国“殊悖万国公法，并与仁义教化之道，均相牴牾”。这种說法不仅指出过去数月的事变，中国的違反“文明”，——此名詞西人始能了解——为其历来反抗进步的表示，并且希望中国对于此点能加补正。

中国違反国际公法和人道的行为，很容易懲罰。高級官吏的处分，騷乱中死去的数千人民，以及三十九年間償清每年二千万两的賠款，已經足够。中国政府又禁止参加排外团体，——軍隊自不在此例——和把此次事件所受的处分，張貼全国。此外，使館設置卫兵，北京至秦皇島一带，外国駐兵約万人左右，足以提醒中国人民，知“公理即强权”，并使中国此后不再向西方各国挑战，——除非中国轉弱为强，有战胜之望。

在拟定章約与最后和約中，处分主犯的文字，占很多的篇幅。这里，对于使中国不再反抗进步的部分，也应注意，因为对于后来頗有影响。条文中，有謂中国——为保障此次新賠款与以前之旧債款計——在后此三十九年中，应将財政管理权交与外人。在庚子賠款未償清以前，中国政府，如未經列强允許，不得更改海关的制度，或其他的財政事务。中国政府，必須允許采取进步的政策。此外，中国又受外人之迫，修改商約。結果，許多西方的革新事业都介紹进来，使中国的經濟生活为之一变。最后，总理衙門取消，另設外务部，位居六部之首。中国的外交事务，从此与西洋的观念

一致了。百余年来，中国缺少一种集中的外交行政，实为西人不满意的一大原因。现在这方面已经成功，慈禧近来所努力的地方分权的趋向，已经得到相反的结果。从此，中国已有一负责的外交机关，各国代表可随时来交涉一切了。

辛丑和约后，清廷并没有维持长久的时期。十年又一个月后，中国革命运动爆发，清廷被迫退位，中华民国成立。袁世凯为第一任大总统，尚能维持表面上的统一。但1916年袁世凯死的时候，民国已经陷入分裂的状态了。

从此，中国的半无政府状态，实由旧官吏的腐败无能，以及欧战爆发与日本的阴谋有以致之。这些因素，都足使中国日益混乱。但是中国的分裂，还有其他根本的原因。西方各国，经奋斗的结果，使清廷处于降服的地位。同时，又使清廷渐趋中央集权。这一个结果，是清廷的复亡。——“受命于天”，已经穷尽。但是推翻满清的运动中，却又带着一些反中央集权的微波，模仿西洋而建立一统的民国，——虽受西人的赞助——终以未得人民的拥护而归失败。

约在二千余年前，秦始皇在漠北建筑万里长城，以防胡人的侵略。结果，长城并没有达到秦始皇的目的。北方民族的侵入，仍是无有已时。而且中国在某几个时期，还受制于鞑靼。可是北方民族每次的南下，都为中华民族所同化，中国依然存在。

秦始皇——有人称之为中国的拿破仑——又欲废除旧日的封建制度，而建立中央集权的政府，他亲握全权。为达此目的起见，他于是焚书坑儒。但秦代灭亡时，——中国史上最短的朝代——旧的文学、旧的传统与旧的政府制度，又复兴起。始皇以后，中国政府曾经过多次的变革。有时趋向集权，有时则又分裂——为期

甚短——而成列国。可是每一次的鼎革，中国的制度总有一部分和周代的文物相近。

义和团运动，和秦始皇的长城一样，是无用的拒外运动。义和团既已失败，则中国人民又将和已往一样，努力同化外来的势力。不过，此次侵入的因素，只是思想与机械，并非一种民族，所以同化作用比较难些。中国当前的大问题，是如何使这些新思想、新机械融化于社会组织之中。在这个难题里面，旧的政府，已经瓦解。但根据中国的历史，可以看出中国人民，终必达到这次的同化作用，而此改革过的中国社会制度，必与三千年来的文物，很为相象。

(施达格：《中国与西方：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和发展》，  
第 274—286 页。)

## 二十五、賴德烈：論义和团运动

到了1899年年底，华北的情势变成特别不祥；1900年，一般称为义和团的暴动爆发了。

骚动的原因是很多的。实际上一切促成全国不安的因素都存在着——对于列强强占领土的愤怒；对于传教士干涉诉讼的痛恨；对于教会在内地取得财产，对于教士排斥久为中国人所尊重的制度和风俗及对于信奉这些破坏教义的基督教徒的愤懑；外国人（包括不机敏的教士在内）在感情上对中国人的触犯；由于误解基督教风俗而招致的侮辱；那些由于铁路、汽船及邮局而失业的人的不满；相信铁路有碍风水及铁路每一个转弯的地方埋葬有一对中国男童女的謠言；保守主义，特别是在官员及受过教育的阶级中的

保守主義；“不肖淫亂之徒”的存在，他們準備隨時利用任何機會來從事殺人、劫掠的勾當；最後，慈禧太后及許多高級官員所領導的反動運動。

（中略）

象 1900 年那樣大的一個劇變不可能沒有後果而就平靜下來。隨後發生的事情同暴動本身幾乎是一樣的重要，如果不是完全同樣重要的話。這些事情中的某些事情，特別是關於外交和商務關係的事情，我們無需談及，但是其他的事對在華基督教會有密切關係，在這裡至少必須一提。

在西北許多地方義和團所造成的恐怖由外國軍隊來繼續執行，只是現在遭禍的人不是外國人和中國基督教徒，而是他們的敵人与無辜的旁觀者。德國皇帝於 1900 年 7 月 27 日對派出鎮壓義和團的第一支軍隊演說時曾說道：

“不要饒恕，不要生擒俘虜，讓所有落在你手中的人任憑你擺布。正如匈奴於一千年前在阿提拉領導之下獲得一個名譽使他們仍舊活在歷史傳統里一樣，我希望，德國的名字能在中国這樣成名，以致將來沒有一個中國人再敢側目看一個德國人。”

這些話很可能是在對德國公使之死感到憤慨之下而說的。但是，它的大部分不僅是德國的軍隊而且至少是某些別國的軍隊在華北的行為的一幅圖畫。北京被劫，執行懲罰的軍隊被派到周圍地區，部分地是為了拯救仍在被困的基督教徒和外國人，部分地也是為已經遭受的破壞索取賠償。中國的東北被外國兵士當作一個征服的國家，這些兵士常常恣意於歐洲軍隊在蘇伊士以東發泄出來的情欲。它對於殉教的基督教徒的英雄行為是一個可痛的結果，尤其是因為大多數的軍隊信奉傳教士和中國基督教徒為了擁

护它而死的宗教，思之更为可痛。

教士在利用局势来促进他們的利益上不是完全无罪的，对于他們的极端控訴是批評他們的人所捏造的，但是控告有些事实根据。虽然大多数的中国教徒有一个可以信任的記錄，但是少数人屈服于那些在援軍来到前离京逃走的人遺棄的財富所提供的引誘。有些耶穌教士利用了这样容易获得的掠夺物来救济中国教徒的急需。

(賴德烈：《基督教在华布道史》，第 501—502、519—520 頁，孙瑞芹譯，呂浦校。)

## 二十六、賴德烈：論义和团运动 与美国对华政策

正式处理义和团暴动的外交解决，是經過冗长的談判及列强間許多爭辯后于 1901 年达成的。条件苛刻，但不象有些国家所要的那样苛刻。美国政府在帝国領土完整及中国应支付它有力量偿付的一笔賠款上运用了一种稳健的影响。英德协定——法、美、意、奥及日本全部或部分地予以同意——設法阻止領土的取得或門戶开放政策的破坏。

(賴德烈：《中国人：他們的历史和文化》，第 417—418 頁，孙瑞芹譯。)

## 二十七、賴德烈：再論義和團運動 與美國對華政策

反應變成更激烈了，最後成為某些群眾的一種盲目的行動，這種行動曾獲得少數官吏的支持，要把外國人和他的一切可憎惡的方法都驅逐於中國之外。這個運動主要是在北方，以義和團或義和拳見稱的民兵團體為矛頭。從義和拳這個名稱上，和從他們的鍛煉上，他們被外人名為“打拳的人”。他們有這樣的口號如“保國滅洋”和“扶清滅洋”。同民團相結合的有滿布於中國的秘密社會成員，和樂於有暴力和劫奪機會的鬧事分子。根據長期的傳統，義和團相信法術能使他們刀槍不入。他們對外國人的子彈也要使用這種法術。

早在 1899 年義和團就已在殺戮著中國教徒，認為他們是可恨的外國人的受騙人和工具。但是，到 1900 年夏，瘋狂才達到它的最高峰。為了保護他們北京使館人員，凡國組成的一支軍隊設法開往北京。它們受到攻擊而不得不折回天津。為了保護該城的外人，一支代表六國的軍隊攻占了保衛由白河進入天津的炮台。西太后和他的某些顧問同義和團一致解釋這是一個開戰行為。慈禧下令殺死國內所有外人。北京和附近的外人均集中於使館里。他們大部分是在靠南面城牆的一區和一個天主教堂里抵抗圍攻。使館人員曾考慮過遵照中國宮廷的訓令離城並且接受護送到海岸，但德國公使被一個自稱遵奉命令的中國兵殺死，這就使他們決定留京。8 月中，當一支由各國糾集的派遣隊從天津打到北京的時候，使館

才得解圍。老佛爷随即带了皇帝出逃，但在出逃前，她把皇帝的宠妃擲于井內以发泄她的怨恨。她和朝廷在西安避难。西安在过去許多世紀中曾是中国光荣的都城，以长安著称。

在这个期間，义和团在中国其他各地攻击着外人和中国基督教徒。在北京和东北，生命的損失特別大。在有些地方，特別在有一个疯狂仇外巡撫的山西省，官吏們支持义和团，其仇外的程度甚且超过他們。几千中国基督教徒和几十个傳教士丧失了他們的生命。內地大多数外人到口岸避难或离开中国。

有些地方的外国軍隊，在鎮压运动和营救保护他們的侨民上象义和团一样野蛮。北京的許多地方被搶劫，成千上万的居民要末自尽，要末被屠杀。外国支队解放了其他地点的被圍外人；当他們这样做时，他們采取了惩罚措施。

中外人士中头脑比較冷靜的人們，預先防止了一次如果沒有他們的举动必定会更加惨重的破坏，統率天津附近外国艦队的海軍提督声明他們的目的是，只对义和团和反对营救使館的派遣队的那些人使用武力。揚子江流域和南方的总督們宣布他們遵守条約和保护外人生命財產的意思。这一次中央缺乏控制的傳統，和各省当局享有相当程度的行动自由证明是一个优点。中国大部分地区沒有理睬北京对西方和日本的宣战。这样，生命損失大大地减少了，而一个更可耻的失敗被防止了。

义和团爆发对中国的后果是足够严重的，俄国派遣軍隊到滿洲，名义上是为了保护他們的侨民和恢复秩序，但显然，繼續它的控制，公开的或隱蔽的并吞却是它的目标。美国害怕几个月前面临瓜分中国的危險可能成为事实，設法要阻止它。1900年7月3日国务卿海約翰致列强一个通牒，声明他的政府的目的是“与其他列

强共同行动”，恢复秩序和保护它的公民的生命财产，和“寻求一个解决，以促进中国的永久安全和和平，保持中国領土和行政的完整，保护条約和国际公法所保证給予友好国家的一切权利，和为世界捍卫与中华帝国的各部分平等而公平貿易的原則。”他比他上年9月的通牒走得更远。很可能照会在減輕列强的要求上只有很少的作用。象以前的通牒一样，它的重要性主要是由于美国怎样承担了一个政策，而这个政策在将来的几十年代里将使它更深地卷入到中国事务中，和对它自己和中国的重要后果，可是，不管是不是因为海約翰的行动，中国再一次避免了瓜分。

（賴德烈：《中国近代史》，第93—96頁，孙瑞芹譯。）

## 二十八、費正清：論義和團運動

在1900年，与国外的革命党人和維新派的运动同时进行的，是国内皇朝为时已晚的改革的努力。在这个以改革它的缺点来挽救它自己的努力中，清政府因1900年义和团的暴动而感受一种迫切的刺激。这次暴动具有傳統的农民叛乱的特点，但是缺乏太平天国运动的社会的目标。它是由秘密会社里的热狂成員所领导的，他們后来受到仇外的官吏和紳士的支持。这些官紳們激烈反对帝国主义的公开侵略，和与它比起来不那么惊人的、在外国教会和治外法权保护下兴起的基督教徒和他們的党羽这一新階級。最后清清的亲王們也支持了义和团勇士的这种依仗刀枪不入的法术来驅逐洋人的慘烈而迷信的做法。

最后是外国軍队的武装挑釁，部分地造成了排外暴动的爆发。



在这个突然而来的狂热中，义和团在华北和东北杀死了二百四十二个傳教士及其他外国人。在 1900 年的盛暑中，他們包圍了北京使館里的外国侨民有两个月之久，可是攻击从未进行到底，因为領導的滿人意識到它是一种自杀性的徒然举动。华南的中国官吏立刻声明說，这是一个国内的叛乱，而不是北京所称的对外战争。皇朝借着这种托詞又拖延了十年，虽然辛丑条約和赔款更增加了它的耻辱。但是列強們滿不在乎地沒有要求或支持真正改革。它們再一次利用它們的势力支持了有利可图的但是衰落的现状。

（費正清：《美国与中国》，第 154—155 頁，孙瑞芹譯。）

## 二十九、克萊德：論义和团运动

从远的方面来看，义和团的暴动在中国的政治前途上起着一种极深的影响。它加速了滿清朝代的灭亡和民国的建立。在这方面，它是中国革命发展中一个有力的步骤。的确，义和团为一种“盲目的和无知的爱国主义”所鼓舞，而他們的贊助人和拥护者毓賢这个滿籍的山东巡撫，除了一个“盲目的反动政策”以外，没有什么使他出名的。义和团沒有提出建設性的改革綱領。他們只把中国的灾难归因于“洋鬼子”。洋鬼子必須同他們的机器和发明、“他們奇怪的和不容異教的宗教、他們的使人不能忍受的优越架子”，一道被消灭。可是，虽然具有一切弱点，缺少建設性的綱領，盲目狂热和反动，义和团运动毕竟是中国日益增长的不安、对外国侵入和剝削的憤恨以及欲从事抵抗的意志的一个明显的征象。义和团

对这点只有很少的認識，如果有任何認識的話，这是不足为奇的。奇怪的是清廷对它的了解是这样的不完全，而列强几乎对它絕不了解。在义和团运动与辛亥革命之間的十年里，清廷完全不能摆脱内部衰落的梦魇，而列强由于一心一意地从事于特权的爭夺，致使中国的完整更进一步地消失到外交幻想的云雾里去。

（克萊德：《远东》，第 301—302 頁，孙瑞芹譯，吕浦校。）

### 三十、費納克：論義和團運動

事实上，他們<sup>①</sup>不过利用了一种已經显露出来的普遍情緒，在 1899 年全国各地都爆发了排外的暴动。列强以往的行为已足以充分地說明这些暴动的原因，但是我們来更仔細地研究发生磨擦的原因，来看看为什么中国人除掉排外以外，也同样地反对基督教，或許是有好处的。明显的解釋可能是这样：外国人都自称是基督教徒，而在內地的傳教工作也強調这种关系。但是最初发生的一些暴动，其起因和所針對着的，由于中国教徒甚至多于外国教徒。因此，敌意所以增长，可以从本国教徒的地位和行为以及教会对于他和非基督教徒的态度这方面去寻找一个解釋。本国教徒被人們看做是背教者，他們利用信奉基督教的办法来寻求外国人的帮助和一种特权地位。他們不但奉行着奇怪的教仪（这种教仪本身就常常引起了反对），而且，更为重要的，他們放棄了某些过去的風俗

<sup>①</sup> 指清政府中的保守分子。——譯者

习惯，并且对于圣贤的教训表示不够尊敬。人们认为这是他们接受了外国教义的直接后果。而更有实际重要性的，是他们常常拒绝捐助与乡村娱乐和庆祝节日有关的费用，他们拒绝的理由是：这些节日是异教徒的节日，对于他们的新信仰是有所触犯。由于这些庆祝是公众的事情，由于这些庆祝构成了调剂单调的乡村生活的少数形式之一，对于它们的任何反对会造成磨擦，就是不足为奇的了。再者，某些人不予捐助，就增加了其他人的经济负担。除此之外，可以怀疑本国教徒在他同他的同胞们接触当中有时会由于他的新信仰而采取一种优越的态度。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就不得不触犯了他的同胞们，他们感到坚持信奉旧的和久经考验的信仰是并不低人一等的。

除掉这些引起磨擦的原因以外，还有一种普遍的信念（这种信念在1900年在中国内地仍然是强烈的），这就是基督教徒常常举行奇怪的狂饮的秘密祭式并做出不人道的行为，如把小孩的眼睛挖出等等。虽然经过调查，这些传说是没有根据的，但并不能减少这些传说对基督教徒引起敌意的力量。

但是，或许同引起纠纷的任何原因同样严重的，是天主教士们常常（耶稣教传教士有时也是如此）为了他们的中国教徒而干涉诉讼，企图把外国人的特殊地位的外衣披在他们身上。教士们更进而要求在他们同官员们交往当中应该受到特殊的礼遇。这就更加深了很多的官员们原有的敌意，并且引起了其他官员们的敌意，使得他们纵容人们对于本国教徒的迫害和对于教会的攻击。

因此，可以轻易地用基督教徒们（包括本国教徒和外国教徒）同中国人的公私关系来解释1899—1900年各地的暴动。除此之外，加上列强的侵略和因此而引起的对于瓜分中国的恐惧，排外主

義的發展就是易于理解的了。當然，列強對於中國的進攻在 1899 年已被阻止，但是由於列強的要求是於 1899 年提出，而於 1900 年將以前所獲得的特權付諸實施，更使人民充分地領會到 1897—1898 年的事件的後果。

起初的騷動是首先在各省發生的，雖然在 1899 年北京的局面曾如此的嚴重，因此有一個時期外國人增加了公使館的衛隊。中國朋友們公開地告訴外國人說，正在着手實行一個策劃好了的運動，要把他們和他們的勢力從中國驅逐出去。然而他們拒絕注意這個警告，認為這樣的行動是不能想象的。當然，對於全國各地發生的事件，他們向總理衙門提出了抗議。但是外國人對於聚攏來的烏雲沒有給予嚴重的注意，到了 1900 年 5 月，一支比以前更為強大的軍隊才被調到北京以保護各國使館。

排外運動在山東省得到最大的發展。報告有組織的團體所犯暴行的公文接連地送到北京各國公使館，在這些團體中最強的和最著名的是義和團。義和團從山東省蔓延到直隸省，在 1900 年初，團民開始在北京城內練習他們的教儀。從最初出現的時候起，他們就得到朝廷的強有力的支持，在各省的官員中也得到支持，但是直到開始圍攻各國使館時，朝廷才最後公開地支持義和團。清政府同初期的義和團運動的正式關係始終沒有得到充分的證實，但是清政府同末期的義和團運動有關係則是完全清楚的。

當義和團更進一步地控制了北京時，各國公使館被置于一種可以說是半圍困的狀態，同外界的交通大部分被切斷。由於這種情況，各國乃企圖增調軍隊來京，以便保護各國人民。當提督西摩率領聯軍自天津開往北京行至中途時，各國派往華北的艦隊的司令官們作出決定（只有美國人沒有同意），強行開往天津。於是大

沽口炮台被各国舰队炮击。这个事件事实上使各国政府同中国之間处于战争状态，并使得政府军队和朝廷同义和团公开地合作起来，这样，提督西摩率领的远征军之所以未能到达北京，这个事件是要负大部分的责任的。这个事件对于居住在北京各国公使馆中的人也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因为半围困的状态此后就变为有充分组织的攻击了。

对各国公使馆的围困，从1900年6月开始，一直延续到是年8月，8月間各国所派远征军到达北京，解救了被围困的外国人。这就使得义和团在全国崩溃。揚子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官员們拒絕参与这个运动，并且違抗了朝廷的“驅逐外国人下海”的命令，取締排外的示威运动，因此联军所控制的仅仅是北方地区。因此1900年的暴动不能被看做是一种真正的全国性的运动。

当联军快到北京时，滿清朝廷从北京逃走了，就象它在1860年在同样的情况下所做的那样，外国人控制了北京。于是中国的将来的問題以一种尖銳的形式再度提出来了。列强似乎可以采取三种不同的政策。他們可以沿着甲午战争以后数年的方向来完成瓜分中国的事业；他們可以建立一个获得国际的支持的新的朝代；他們也可以使滿清回到北京并且支持它从事于改組、現代化并加强它的政府。

美国带头說服了其他国家采取第三种政策，这样就使清朝增添了十一年的額外的生命。在各国公使馆被围期间，国务卿海約翰在一項发交美国駐外代表轉致各国政府的通牒中宣称：“美国政府之政策，在寻求一解决之道，使中国人获致永远之安定与和平，保持中国之領土与行政之完整，維護条約与国际法所保障給予友好各国之一切权利，和确保各国在华貿易平等与公正之原則。”他

并且宣布列强应采取合作行动，以便与中国政府达成一项解决办法。这个政策宣言是完全回到 1857 年所建立的政策，并对于蒲安臣的合作政策作了正式表示。美国的原則最后被其他的国家所接受，这些国家在公使館解圍之后就開始共同拟訂对中国政府的要求，虽然他們的意見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正是由于各国間缺乏一致的意見，而不是由于中国政府不願意达成一項解决的办法，才使得談判拖延到 1901 年的夏季，那时最后簽訂了条約，这一次的乱事正式告一結束。

中国企图驅逐外国人的結果是：（1）同意支付賠款四亿五千万两，以关税和盐稅为担保，这使它的財政問題严重地复染化了。（2）将进口稅增至切实值百抽五，这完全是为了使它能够应付賠款的支出；此外，并規定将部分地按值抽稅的办法改为完全地按件抽稅的办法。（3）处分它的某些官員，有的处以死刑，有的处以其他刑罰。（4）外国軍隊永远駐扎北京城內，以保卫使館，由北京到海的地区由外国派兵駐守。（5）設立外务部以代替总理衙門，并按照外国人的意見修改外国使节觀見皇帝的礼节。（6）在曾經发生过排外暴动的各城鎮停止文武考試五年。（7）禁止輸入軍火二年，如各国以为仍应續禁，得再延长二年。这些是条約的正式条款中所規定的。

从未来发展的观点来看，保守分子对于列强侵略中国的反应的这种崩潰具有更进一步的重要后果：一个后果是开始了一个保守分子的改革的时代，企图使中国强盛并保存滿清朝代；另一个后果是使欧洲冲击中国的方針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費納克：《現代东洋史》，第 160—164 頁，呂浦譯。）

### 三十一、伯斯：論义和团运动 与中美关系

美国国务院发出的关于門戶开放的照会并没有廢除各国的利益范围，而且它們在推迟于1900年夏季达到其最高潮的义和团秘密团体的排外暴动方面，也没有发生什么重要的影响。二百个以上的傳教士被杀死了，教堂被焚毀了，北京被义和团占领了。外国人在若干地方被圍困，并处于时断时續的攻击之下达一百天之久。在战斗中，德国公使克林德和日本使館書記生杉山彬被杀。各国派遣了一支由一万五千名兵士組成的国际远征軍（美国人也参加了这次远征軍），方才解救了被圍困在北京的外国人。中华帝国的朝廷又一次被逐出北京，北京城被搶劫了。当华北沸騰着排外运动时，中国的劳动者們却与联軍合作，而中国南方的总督們則同意在他們各自的区域内保持和平。

談判和議对于中国來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不仅因为中国不願意，也因为列强之間不能对于所提出的要求取得一致的意見。有的国家不願推翻滿清皇朝，但是有的国家并不反对把中国完全打垮。最后所訂的条約于1901年9月7日签字，强迫中国償付四亿五千万两賠款，于三十九年内付清，实际上几乎把它所有的稅源抵押出去，作为担保。这笔賠款被按照比例分配給胜利者：俄国百分之二十九，德国百分之二十，法国百分之十五，英国百分之十一，日本和美国各百分之七。在条約中，中国政府承认在北京的中心地区保留一个特别的使館区，并且承认列强有派兵駐守从北

京至山海关沿铁路重要地区之权，以便保持自首都至海口的自由交通。中国政府并从事談判，以修訂它同各国所訂的通商航海条约。

这个时候，中国同十九个国家訂有最惠国的条约。中国建議同时同这些国家举行一次圓桌會議，但是一般的意見贊同分別举行談判。觉醒了的中国利用了国际間的猜忌和竞争，而且或許利用了模糊的良心的責备。同英国所訂的条约是于1902年9月5日签字的；同美国和日本所訂的条约同时于1903年10月8日签字。当其他的列强向中国提出特別要求的时候，中国不願繼續談判了。中国停止了談判，以后再也沒有恢复。

英国和美国同中国所訂的条约代表了新的观点。它們繼續規定了商务的条例，对于这些条例中国必須遵守，但是它們強調了这样的意見，即如果中国的內部状况有所改善时，这些規則可加修訂。这些条约对关税和貿易作了新的規定，并且規定在宗教信仰方面，对于傳教士和教徒予以充分的保护。其他的規定是企图引导中国走上改革的途徑：币制和鑄币、版权法、司法行政、矿业規程。这个“改革”的字眼是从外国人的利益和便利这一方面來說，而不是从中国人这一方面來說的。

中国人深深地感到，虽然在这些規定的实质方面是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但是在制訂这些規定的手續方面，却是事事可以反对。中国人希望取得实施这些办法的权利，可是希望这是由于他們自己的自由意志，而不是由于在他們的大門以內的外国人以不正当的外交手腕把义务强加在他們身上的結果。

（伯斯：《远东史》，第92—93頁，呂浦譯。）



## 三十二、翟理斯：論义和团运动

这年秋季，所謂拳乱开始发生了。据说，是由于民众与基督教徒之间的恶感，特别在山东，有广泛的不安。无论如何，这种不安因为外国在中国最近夺取領土而加剧。这样，原来是拥戴明室后裔为傀儡領袖的一个周期性的反满起义失去了它的目标而成为一个残忍的仇外暴动。使館被圍的故事已經被人从許多观点上描写过。大多数人都知道他們所欲知道的关于 1900 年夏季两个月中的一切，残忍的炮击集中于狭隘地区里的一千余外国人和他們的妇女儿童，以及山西省城中不分男女儿童惨杀傳教士的事情。不論这个运动的起源如何，很少疑問的是，它作为慈禧太后的共謀被滿人接受为歼灭在华所有外人的一种手段。鉴于太后为她自己所創造的非常地位，不能相信她不能用一句話或甚至只是一个手势来制止对使館的包围。她没有这样做；使館解圍后，她在一生中第二次——她曾于 1860 年随威丰往热河——无耻地出奔以求安全。在这个期間，她于回答山西巡撫奏折时下了一个密諭說：“杀死一切可以找到的外国人，即使他們准备离开你的省，也必須杀死他們。”第二道更紧急的上諭說：“我命令你把所有外国男、女、儿童立刻处死，不要让一个人逃走，借此，我的帝国得以肃清这个有害的腐敗的根源，而我的忠誠臣民得以恢复和平。”上述第一道命令曾发給各省高級官吏，如果不是由于两个中国官員上奏反对义和团政策，并因而触怒太后，則結果可能是在全中国乱杀外侨。这两个人秘密地把“杀”字改为“保”字，除山西巡撫外，各省官員一

般說來是照这个意义来执行这个上諭的。山西巡撫上了第二个奏折，結果引起上面所說的第二道上諭，究竟有多少外国人因这一字的修改而得保存他們的生命，是不能說得具体的。如果她这个殘忍的命令更完全地执行，太后也勢不能这样容易地逃避責任。这个把戏不久被发现，袁昶和許景澄这两位英雄立刻被斬首，虽然袁昶于 1898 年曾向太后提供情报，使她得以破坏謀害她的性命的阴謀。

（翟理斯：《中国与滿洲人》，第 114—117 頁，孙瑞芹譯，呂浦校。）

### 三十三、怀德：論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者本非政治上之組織，特借政治以达其破坏之目的耳。义和团之乱为中国内部之事，非茲篇所宜詳記。顾吾人在申論国际状况之中，正不妨一忆及赫德氏之言。1900 年当团匪圍攻北京使館之时，赫德氏曾有論著，其中有言曰：“斯役盖为此后一世紀变局之开端，而为远东将来历史之主要事实也。”斯言可謂深切有味矣。

义和团与列强肇衅之事，本可立招中国之瓜分；其所以不至于此者，則以是年 10 月英德两国訂立一条約之故。条約內容略謂两国不得利用此紛乱时机，在中国領土上取得土地之利益，惟对于通商口岸，仍維持門戶开放之政策，如他国欲取得中国土地上之利益者，無論用何方法，两国須商定对付之策云云。职是之故，各国过分之要求，皆因而阻止，而中国亦得有正当之保障矣。

（怀德：《中国外交关系史略》，第 17 頁。）

### 三十四、道格拉斯：論义和团运动

随着这个立場的改变，整个帝国对于外国人和据信是他們所贊成的一切趋势在感情上发生了一个完全的轉变。中国人是这样习惯于絕對服从他們的官吏，以致只要他們的統治者說一句話，他們就乐意做他們命令要做的任何事情。因此，皇帝政策的良好影响一消灭，人民的态度就完全改变。騷乱情緒和暴动的消息来自全国各地，敌視首先主要指向天主教士和他們的信徒身上。他們被控訴干涉司法程序并僭取不屬於他們的特权。

第一次暴动发生于江苏省。运动迅速地蔓延到邻省安徽、山东和直隶。在临清，同天主教关于一块土地的爭执在当时不利的影晌下发展成为暴动。一座礼拜堂受到攻击而被毀，邻近几村中的基督教团体被解散而且遭到暴力对待。

我們已經叙述过胶州、旅順和威海卫的割让及喀西尼协定是怎样从軟弱无能的中国政府勒索出来。西方夷人似乎是无法抵抗的。可是，在另一方面，意想不到的成功的一綫曙光振作了中国人的精神。意大利政府提出在浙江海岸租借一个口岸的要求被中国人成功地拒絕了。这个外交胜利鼓舞了中国人的信念：如果他們拒絕了早先的領土要求，列强或許会遵从他們的决定。

但是，它还不止于此。它向中国政府暗示，通过各省总督的加强，能一反最近数年的屈服政策而使列强安于他們的本位，这个看法的改变不久就有了具体表現。一道密諭发給各省大員，命令他們“注意帝国不要遭到損害，如果外国行将侵略，无須等待呈报北

京即以武力抵抗。”同时臭名昭著的剛毅奉命訪問各商埠，并对总督和巡撫強調組織民团保卫沿海的必要（这些民团后来与义和团合并了）。照这个官吏的吩咐，大量金錢从各省勒索出来以购买新式的强有力的武器，且公开地說，这是由于为了支持一个仇外运动之用。

义和拳，或称义和团，現在开始重新出現。在十九世紀初，在这个名义下的一支队伍（也称“大刀会”）一时曾騷扰了帝国的安宁，在以后及比較和平的时日它起了民团的作用。就在这个假面具下，它为 1898 年的反动派所发现。中国的秘密会社具有可以随时改变外貌的变色龙似的品质。本世紀初的拳民在“白蓮教会”、“大刀会”的形式下及忠誠的团或民团的队伍中保持了他們的組織，因此，近代的拳民依照北京当局的命令同民团合并，并不感到有什么困难。同他們一道进行搶劫的团被称为义和团，这是为了恭維地模仿拳民曾以之命名的义和拳这名字的。响应了这些及其他动人的事业，这个时候群情激昂，对外夷的一切要求和主張都加以反对。政府已放棄了領土和商埠，并且把大块土地抵押出去作为建筑铁路和开发矿产之用。当时已通行的铁路只有两条：从北京經過天津和山海关到牛庄的一条（該綫将与北京附近的芦沟桥至汉口的铁路相接）和上海到吳淞的一条短綫。但是，除了这两綫以外，已經給予外国以建筑二十多条铁路的特权。这些铁路将从各方面，从西伯利亚的边界到緬甸的边境橫跨全中国。某些最富饒的矿区已經租給銀公司，这些銀公司在提出它們的要求时恣意蹂躪中国人的感情。福公司在山西省获得了开发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田的权利。在其他方面，东、南、西、北各方面，中国正在根据外国人的利益而被开发，虽然外国人試圖說服中国人，他們自己

的利益也同样地要求改变现状。

中国人有一句話，远水救不了近火。欲說服他們，将来所得到的利益会补偿他們目前所遭受的領土損失，这是困难的。不但人民有这些看法，而且帝国的統治者們也有这些看法，他們盲目地欲努力恢复尽可能多的已失去了的領土。他們在悲痛之中回想到他們的典籍。在那里他們讀到他們的古圣人曾警告他們，“夷人”所要的(当时象現在一样)是中国的土地。他們以命令各省当局教导人民学习康熙帝关于去除听从孔子以外任何其他学說的恶习的圣諭的办法，来努力执行这个格言。

在这些教导的影响下，对傳教士及他們的教民开始比在和平的时候更恶毒地表示敌視，特别是在山东省。該省最近很是不幸，它曾是德国侵略的地点，且曾为两个在他們的同僚中以极端仇恨外人著名的人所連續地統治。当李秉衡因德国教士被杀而被革去巡撫职的时候，他的继任人是毓賢。毓賢的历史是經常攻击外国人以及他們所主張的一切。就是这个人当他任山西巡撫时，亲自在他的衙門里監視对欧洲傳教士、男、女、儿童等的屠杀。

山东省仇外風气因这个官員的保护和支持而愈益加强。开始发动着的义和团运动因此大为兴旺。騷动在各方爆发。人民开始宣布，把外人驅逐到海里的时候已經到来。在邻近临清城的一个村里，当地人起来反对天主教教民，并毀坏他們的礼拜堂。全体教民被解散。虽然軍队被召鎮压暴动，但是他們的协助是否有任何价值，实屬疑問。义和团获得巡撫的欣然支持。巡撫在致总理衙門的公文中把基督教徒形容为在一切事件中的进攻者；他甚至橫霸地通过总理衙門发一封信給美国公使康格，請他訓令傳教士約束中国教徒并使他們不要鬧事。他报告总理衙門，把上面所說的

攻击天主教民的事說成是基督徒所做的，他說基督徒是为义和团設置埋伏。

在沂州府附近，三个傳教士被攻击并受到粗暴的对待。在同一地区，一个德国傳教士被打伤并被架到山里去。运动由于义和团現在免受懲罰而迅速蔓延。武装暴徒成群結队地散布到全省。一个知县因欲維持治安逮捕了六个暴徒，但受到巡撫的譴責，說他过分热心，令他釋放被拘的人。現在有名的袁世凱，当时在山东省內服务，且在一次交鋒中打败过义和团，他以杀死无辜人民的罪名受到降級处分；而义和团則被称为义民，他們为了自卫而抵抗基督教徒的攻击，在完全合法的情况下操练和武装自己。

在这个期間，諭旨接連出現于《京報》上，一反皇帝所宣布的政策，并且对开始在全国兴起的仇外运动予以种种支持。这些最富战斗性文件之一是于 1899 年 12 月发表的<sup>①</sup>，大意如下：

“現在时勢日艰，各国虎視眈眈，爭先入我堂奥。以中国目下财力兵力而論，断无衅自我开之理。惟是事变之来，实逼处此。万一强敌凭陵，胁我以万不能允之事，亦惟有理直气壮，敌愾同仇，胜败情形，非所逆計也。近来各省督撫，每遇中外交涉重大事件，往往豫梗一和字于胸中，遂至临时毫无准备。此等錮习，实为辜恩負国之尤。茲特严行申諭，嗣后儻遇万不得已之事，非战不能結局者，如业經宣战，万无即行議和之理。各省督撫，必須同心協力，不分畛域，督飭将士，克敌致果，和之一字不但不可出諸口，并且不可存諸心。以中国地大物博，幅員數万里，人丁數万万，苟能矢忠君爱国之誠，又何强敌之可惧，正不必化干戈为玉帛，专恃折冲尊俎

<sup>①</sup> 光緒 25 年 10 月 19 日对軍机大臣等的上諭。——譯者

也。将此通諭知之。”

在这个煽动性的上諭之后，还发表了其他同样激动人心的諭旨，而且产生了太后所欲的效果。义和团获得勇气和追随者。他們詐称有神奇的力量，使他們在无知人民的眼光中受到一种欢迎，从而有助于他們的事业。可是，相信义和团的假話的人不只是人民而已，太后對他們的刀枪不入的本領有絕對信心，且后来在宮中使他們表演他們的魔力，她看到表演后深信他們所說的是真实的。

（道格拉斯：《欧洲与远东》，第 332—338 頁，孙瑞芹译，吕浦校。）

### 三十五、道格拉斯：論八国联軍

在这个期間北京的情势每况愈下。居民对外国人（就是賽納乐爵士也这样說）不再客气了。名义上是奉召入京保护外人的皇軍，对街上出現的任何欧洲人，用石头或言語来侮辱他們。郊区事态呈現一种更为險恶的面貌，在保定府从事铁路工作的一批外国雇員，为了保全他們的生命而不得不逃走。他們登船后一路打到天津，但只有残余的人抵达目的地，其他的人在途中被杀。

这些仇外情緒的征象是这样严重，即使使館也不能置之不理。外国代表电告大沽口的海軍提督，請他們加派卫队到京。总理衙門对这个請求采取一种无辜受害的天真态度，并且向公使們保证董福祥的軍队完全能够而且情願保护旅京外侨的生命。但是，各国使館最后已經知道总理衙門的成員的諾言和表示是需要打折扣的，他們坚持他們的要求。为了答复这个要求，三百四十个不同国

籍的兵士开进北京，駐于各使館里。

永清县两个教士，孙(Robinson)、孟(Norman)被杀的消息——孟氏曾避入本县知县衙門而被他交給暴徒——給局势带来一种新的恐怖，并引起对离北京十二哩的通州的美国教士的安全的严重忧虑。一份来自这些陷于危險的人的求助电报，在美国公使方面，除了建議雇用中国兵保卫外沒有得到其他反应。在这些情形之下，一个美国教士承担了营救工作。他在北京雇用了車輛并跟隨車輛到通州。在通州，他發現他的同胞仍然活着，虽然在极危險的状态中。他們尽可能快地启程回北京。这个英勇的教士对于使二十四个美国男女儿童到达比較安全的北京一事引以为慰。这个营救工作并不是进行得很快，因为几乎在同一个时候，通州附近的一个天主教村庄遭到劫掠后被毀，許多教民被杀；其他邻近的两个村里有三、四十个教民被处死。

义和团与皇軍采取一致行动，已經是一个不可能再隱藏的事实，而臭名远揚的义和团領袖端王的被委派負責总理衙門，給予这个同盟以一个正式的承认。北京事实上已被包围着，西摩水师提督于6月10日应使館請求統率一支由一千八百名左右的陆战队和水兵組成的援軍从天津出发，这支不强的队伍动身时希望于几小时内到达北京，但事实证明，他們注定不会看到京城。从天津出发后几哩內一切都順利，但再向前进，他們發現铁路已被义和团拆毀，他們同皇軍一道占領着整个乡村地区。不久情况就明显了，以这样一支小队而欲冲破敌人密集的队伍是不可能的。因此决定后退，但很快地就发现了，退路已被切断。这支队伍以不屈不挠的精神面对敌人；但是人数是这样的悬殊，使它对义和团的密集队伍不能发生影响，他們完全依靠人数的众多把这支远征队层层包围起



來。遠征隊伍設法與天津聯繫，但是信差不是被殺，就是被俘。最後有一人比其他人幸運地到達天津，結果天津派出一支援軍幫助西摩，他終於6月26日折回天津。

西摩將于6月10日出發營救使館的消息在北京引起鼓舞；當晚許多僑民到車站希望能歡迎到遠征隊。次日，日本使館書記生杉山抱着同樣目的到車站去。前一日失望的歐洲僑民遭到擠滿在車站上的中國軍隊及其他人的嘲笑，但是情勢急轉直下。杉山先生于11日出現時，立即為董福祥的兵所捕，他被“從他的車上拉下來，受到許多侮辱之後，用槍刺死或刀砍死；他的心被挖出來，據說還被送給董福祥；他的頭被掛在一根旗竿上。切斷的尸首蓋以泥土就丟在那裏。雖然日使館二等書記官為了這件事曾到總理衙門去，但並沒有找回屍體。”又據說，端王曾公開地為這件卑怯的謀殺事件向董福祥道喜。

這是使館被圍期間第一個流血的外國人。但是幾天以後，對中國教民或被疑為教民的人的大屠殺開始了。“殺死外國人”的呼聲充滿了全城。在回答陸續向總理衙門遞交的激烈的抗議時，中國大臣們仍說這些暴行是土匪所犯的，他們仍在竭盡全力鎮壓。13日，中國人正式開始攻擊使館區，攻擊目標為奧國使館和美以美會住宅。在這兩個地點攻擊部隊遇到陸戰隊的抵抗，陸戰隊上刺刀向他們沖擊，雖然義和團曾自吹可以刀槍不入，但陸戰隊迫使他們逃走了。

事情現在已經達到這樣一個階段，即中國政府必須決定遵循的政策路綫。如所周知，皇太后贊成決戰。當她已召開大臣會議討論情勢的消息傳出以後，一般人都感到事情已經決定。6月16日，所有滿洲王公、貴族及六部九卿的高級官員在宮中開會。太后所

采取的路綫不久就明确了。开会时，她同聚集的大員們这样說：“外国这样地欺侮我們，迫害我們，使我們不能再忍受了。因此，我們必須團結起来打到底，从而挽救我們在世界人士面前的面子。所有我們的滿洲王公、貴族及大臣都一致决心作战到底。我同意他們的愛國的‘選擇’。”

这篇激烈的演說受到在場滿人的大声喝采；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中国人反对对西方宣战。他們接連抗議，认为这样一种不顾死活的冒險是不智的，并且指出认真相信义和团的魔术力量是愚蠢的。最后皇帝跪下哀求太后在她使国家遭受这样一个大禍之前深思一下。但是，对一切这样的劝告，她置若罔聞，甚至踢开跪在地上的皇帝。

这次會議的結果，是頒发一道对外国宣战并歼灭中国境内一切外国人的上諭。會議的两个成員——他們的責任是把这道杀人的上諭傳達給揚子江流域的总督——自动地担負起改“灭”字为“保”字的責任。为了这个罪行，他們立刻照太后命令被处死刑。“这是和藹可亲的老妇，她不久前曾和寶納乐爵士夫人和康格夫人接吻，并不断地說都是一家人，都是一家人！”

但是，虽然事情已到了这个地步，使館仍与总理衙門保持着官方往来。衙門的官員繼續向外国代表保证沒有危險，而且他們也有保护使館的实力和意志。这些話是在歼灭洋人的上諭的事实面前說的。沒有在其他方面作任何隱藏事态真相的嘗試。义和团在北京街上操演，口中說要杀死一切外国人的話。中国皇軍公然以攻击使館为目的，开入京都。

在这些情况之下，外国代表开会討論局勢。除了德国公使克林德伯爵外，他們一致认为必須离开北京，但是，會議決定在采取

任何这样一个步驟以前，請求与总理衙門的亲王們有一次集体会面。这个提議沒有接到答复；接着，克林德伯爵宣布他决定自己单独到衙門要求会谈。伯爵在带了翻譯但沒有卫队的情况下开始执行他不幸的使命。他沒有走了很远，一个負責街上軍站的軍曹对准公使放枪，立刻杀死了他。亲見这件謀杀事件的翻譯也受了伤，不过，还是逃到距出事地点約三分之一哩的美以美教会。

在这件事发生以前，总理衙門曾向外国代表提議过，他們和他們的職員应在中国卫队保护之下离开北京，并且在这問題上曾有過些交涉。但是，現在依靠这样一个不顾信义的敌人来保护他們的念头被放棄了，对使館的包圍就此开始了。在这个时期，大沽炮台（海軍提督們曾认为大沽炮台是阻碍营救京津侨民的）已被占領（6月17日）。某些方面曾认为这是迫使中国政府摊牌因而导致这次战争的行动，如果沒有这次行动，战争或許是可以避免的。但是上述日期說明，在外国攻击大沽炮台以前，中国已經决定歼灭外国人了。

除了樊国梁主教和他的追隨者在北堂教堂外，北京所有外侨都集中于几个使館里。当中国人正在提議使館職員应离开北京的时候，他們向奥国人和法国人的前哨开火。在这里詳細地重新叙述使館被圍的經過是不需要的。只要說克林德被杀后，中国当局所帶的友好假面具已被拋棄，对各国使館、肃王府（中国教民集中在这里）和北堂（在樊国梁主教领导下，一群法国軍官和陆战队、意大利兵、教士、修女及中国教民聚集在这里）进行坚决的攻击，就已經足够了。6月26日，义和团和皇軍合攻这些障地，他們在外国人所筑的防御工事周圍建起堡垒，从堡垒中，他們按时向他們以为已經注定死亡的敌人开枪放炮。他們认为外国人已經注定要死了，这是自然的，而且如果他們完全利用他們的机会，他們必定不可避

免地会消灭被圍者。但是，为了某些不可理解的理由（可能因为有些負責的人不想使列强陷于絕望境地），他們当猎物似乎已在他們手中的时候，沒有使用他們的全副力量，而且屢次把大炮从控制防御工事的陣地上撤走。当从天津开来的一支国际援軍前进的消息傳來时，中国人这种搖摆不定的态度更为明显。在8月14日，即使館解圍的前几日，他們随着局势的发展，时而开炮轰击，时而派人赴使館慰問并致送食物。

一支援軍将于7月20日由天津出发的消息曾傳到北京，但这件事并未实现。直至8月4日，由一万名日本兵、四千名俄国兵、三千名英国兵、二千名美国兵和几百名法国和德国兵組成的一支远征軍向北京前进，在前进中他們常遇到皇軍和义和团的抵抗，但是因为他們的人数比西摩的支队为多，装备也比較好，他們不难克服他們的敌人。他們在楊村、河西务、通州附近及其他地方与敌人交战，每次都把敌人击潰。在获得这些胜利中，日本軍隊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們的組織和装备被认为优于任何同盟国的軍隊。他們在炮兵方面的优越特別显著。灵巧，始終准备着，而且决不感到疲乏。他們为自己获得了特出的荣誉，在整个战役中博得他們的友軍和敌人的好評。

（道格拉斯：《欧洲与远东》，第345—352頁，孙瑞芹譯，呂浦校。）

## 三十六、琼斯：論义和团运动

慈禧太后恢复全部政权后廢除了大部分关于改革的上諭并宣

布对外国人将不再給予特权。她命令改組陸軍，并在各鎮、村成立民团。由来已久的赦免犯人和土匪的方法再一次被采用，而各种秘密会社的成員也扩充了他們的队伍，这些团体中有某些团体为排外宣傳及魔術家和術士所影响，他們对这些团体的成員保证，如果他們遵循某种体育的和神秘的操练，他們将不受子彈的襲击，被外国人称为拳民的“义和拳”就是这样兴起的。

义和团运动主要局限于北方各省，在那些省份里，民兵的組織走在最前面，而且饥荒情况产生了通常随之而来的无家可归的亡命之徒。許多事情取决于省当局的态度。在山东，当义和团攻击教士开始严重化的时候，巡撫毓賢被調往山西，以袁世凱代之，他維持了和平和秩序。但是，到了1900年夏季，义和团的騷动已經达到了惊人的程度，特别是在直隶。外国外交官屡次提出鎮压它的要求，而且从本国調使館卫队来京。滿清宮廷进退維谷，因为其中比較反动的成員支持义和团，至于慈禧太后的大臣中比較聪明的人，他們虽然对列强的力量有較为清楚的看法，但害怕，如果設法鎮压义和团，会使他們轉过来违抗朝廷。事态由于派遣一支由西摩海軍提督率领保卫使館的軍队而急轉直下。这个派遣队在天津附近被攻击而被阻止。接着，欧洲派来的海軍炮轰并占領了大沽炮台。中国正規軍队随即加入义和团而皇太后也宣布反对外国人。接着发生了北京使館和天主教堂北堂的被圍。在直隶、陝西、山西及滿洲，成打的傳教士和成百的教民被杀。列强集中了一支强大的援軍，这支援軍打到北京后解了使館的圍，但是慈禧和他的宮廷逃到西安去了。外国軍队进行了严厉的报复行动，而且有許多搶掠行为。俄国軍队涌入滿洲，他們表示了要长期占有滿洲的意思。在华中与华南，武昌的張之洞总督、南京的刘坤一总督及广

州的李鴻章總督維持和平并說服列強把义和团运动看做是一个叛变而不要正式宣战。这件事同国际間的竞争結合在一起，把中国从瓜分中挽救出来。

(琼斯：《中国》第2卷，第139—141頁，孙瑞芹译，吕浦校。)

### 三十七、胡特生：論义和团运动

这是使欧洲的外交界觉得惊駭的，忽然中国要起而决定其自己的命运了。自1894年以来，中国一向只是个被动的角色，凡是对它所提出的要求，以及加于其身上的条约义务，他无不承认履行。但是由于为日本所敗的耻辱，由于以后西方各国对它的压迫，终于在中国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爱国情感。这在一部分統治階級中間，形成了要依照日本的榜样从事維新运动的一派，而在另一部分人中間，則酝酿成为一种要以屠杀手段驅逐所有外人出中国，来恢复过去閉关主义与自給生活。

1898年，維新派領袖康有为的意見得到光緒帝的贊同，于是以皇帝的詔令，实施了許多行政上及教育上的改革。但是，因此引起了多数守旧派与特权者的反对，一个反动的政变把那些主張改革維新的政治家，都摧殘淨尽，光緒帝被幽于其宮中，而由皇帝幼小时曾临朝听政的慈禧太后，繼續掌握政权。于是一般保守主义者遂有了机会，要想救中国于苦难了。他們与一种名叫“义和拳”的秘密社团发生联系，这个秘密社团的中心原在山东，因为那里有一种强烈反抗德人的感情。后来由于宮廷人士的鼓励，这一排外运

动遂一发而不可控制，卒致发生殘杀外国教士、本国教徒，最后并有攻击北京外国使館及天津租界的事。于是各国海陆軍队登陆由天津馳向北京，途中不仅受到义和团的抵抗，还与中国正式軍队交战。到了最后，直隶全省为最高統帅德人瓦德西所統率的国际联军所占領。在这期間，滿洲方面也有义和团起而攻击外人，乃由俄国从西伯利亚单独出兵加以占領。俄国此种行动，本是为了各国共同的目的，沒有反对的理由，但是騷乱平定以后，俄国却逐漸明白表示要长期駐在滿洲了。欧洲其他各国之由辽远的海道出兵北京者，以騷乱事已平定，和平秩序也已恢复，都急于撤兵。而俄国則不然，以滿洲秩序尙未恢复为理由，竟无限期地拖延撤兵。

（胡特生：《世界政治中的远东》，第 117—119 頁。）

### 三十八、高第：論义和团运动的后果

慈禧同皇帝逃到西安去了。慈禧聪慧異常，必然改变她的政策，因为这个政策可能使她断送滿清的帝业，或使她丧失自己的性命。她畏首畏尾地試走改革的道路。1901年1月28日，她在亲信荣祿的协力下，草拟了一道詔諭，竭力詆毀 1898 年的改革者，并宣布她願意使輿論获得滿足，仿效西洋进行一些改革。1901年2月13日降旨为将来的振作作准备；1901年2月23日降旨修改清史稿，将 1900年6月20至8月14日的所謂虛假文件刪掉！她把前义和团首領端郡王的儿子溥儀黜革，溥儀曾被立为大阿哥即皇帝的继承人。虽然慈禧性格剛毅異常，而且在西安也很安全，但是这时她已为恐惧所籠罩。她的政策已游移不定了。8月19和20

日，她降了两道諭旨，要和外国人言归于好，但她同时惧怕外国人；她想要迁都，因为北京在她看来太靠近海了；她想迁到甘肃的兰州或西安府，但犹豫不决。末了，辛丑条约在1901年9月7日签订了。她在西安受到她的“顾问”荣祿的影响，又因北京方面李鴻章提出劝告，便决定回北京。她在1901年10月20日启程，由于随行人員和行李都很多，所以到1902年1月6日才返抵京师。

群众的仇外情緒尚未完全平息，由如下事例可見。甘肃的比国教会受到袭击；这或者是由于退居宁夏的端王和董福祥的慫恿亦未可知。1902年3月，广西发生暴动，这是被解散的士兵煽动起来的。在河南有基督徒十五人被杀。4月，直隶西南又发生騒动。4月26日，法籍耶穌会士罗慕勒在灤县被杀。8月，四川发生紛扰。8月15日，英国傳教士罗紹祖和罗国荃在湖南辰州被杀。翌年，即1903年，1月，甘肃和陝西北部又发生紛扰。3月京东玉田义和团又企图叛乱，但为总督袁世凱所粉碎。广州酝酿一次暴动，由于官方及时（1903）得到了情报而失败了。1906年和1907年6月在汕头和北海，1908年在云南，均曾发生了其他运动。云南的叛乱者被蒙自的提督击败。

1902年1月2日，中国政府各部大臣在庆亲王和王文韶的率领下訪問了外国使館。7日，朝廷由前門进入內城，在下午2时回到北京的皇宮。1月28日，皇帝和慈禧在乾清宮接見外交团。2月1日慈禧招待外交团人員的夫人們，会中外交团首席代表美国公使之妻康格夫人以宣讀方式向慈禧致詞。同日，降旨撤銷滿汉通婚的禁例。又降一旨，令选拔学生至外国留学。4月12日，直隶省联軍部队司令官在天津开会，决定将此城交还给华軍。联軍将在7月1日撤出大沽炮台，所以要求华方在該日前毀坏各炮台；



华軍將不得于北京——山海关（北宁）路两旁三十公里內建筑炮台。1902年8月，联軍把天津交还给华方。两江总督刘坤一曾和張之洞成功地維持了揚子江流域的和平。刘坤一突然在10月6日逝世。

为紀念1900年6月20日被义和团杀害的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而在北京建筑的贖罪碑，于1903年1月18日落成。該碑称“克林德碑”，就立在哈德門大街，是一种牌樓，即如西方的胜利門，有三个格門。碑文为德文、拉丁文和汉文，叙述这地方所曾发生的罪行。世界大战之后，这个碑就在群众喝采声中被摧毁了。1903年4月11日，在国事上担任了极重要角色的荣祿也逝世了，年六十七岁。继之领导国政的是庆亲王，但他立即发现袁世凱是他的竞争者。

（高第：《中国通史》第4卷，第243—245頁，張雁深譯。）

### 三十九、馬伯乐：論义和团运动

义和拳这一教門在山东是大刀会的一个支派；但也有人說它是白蓮教的一个支派。大刀会和白蓮教同屬於三合会或天地会。五十年前它們就产生了太平軍。义和拳在山东受到該省巡撫李秉衡暗中的保护，就是他們的党徒在1897年11月1日杀害了能芳济和韓里两神父，德国因此占領胶州为此案报仇。李秉衡被撤換了，但是他的继任者毓賢的反动与仇外并不在他之下。如果用强硬手段本来很容易就可以把义和拳镇压下去，但是他們感到暗中受

到鼓勵，便擴大他們的宣傳，不久便在山東和直隸擁有許多教徒。自 1898 年以後，他們公開宣布反對基督教，在光天化日之下舉着大旗行走，旗上寫着他們的行動綱領：“扶清滅洋”。他們的宣言說得更為清楚：“基督教徒攪亂了天下。他們靠着洋人，驕傲自大，侮辱小民，壓迫清朝，取消聖賢之教，蔑視各種神聖的關係。他們的首領們在我們神聖的廟宇的廢墟上建立起他們高大的教堂；他們欺騙愚昧的人，傷害青年，挖他們的心和眼配制春藥。”又說：“你們應趕緊組織軍隊，因為將有十三個國家進攻天朝；中國將大亂；……死人的骸骨將堆積成山，將血流成河。因此，無論男女老少應虔修神道，學得不死之術，以免戰災，避此大禍。”

朝廷應採取若何行動，起初猶豫不決，命袁世凱予以驅散（1899 年 10 月），並委任他代替毓賢為山東巡撫。但義和拳雖被趕出了山東，他們並沒有被解除武裝，他們反而向直隸和滿洲擴展，繼續宣傳；它們的宣傳空前活躍，是又恐嚇又勸說的。直隸總督裕祿，試圖安頓人心，便宣稱：“教徒與非教徒，全都是中國人，朝廷一視同仁。因此非教徒不應攪擾教徒，激起事端。基督教徒也不應當找借口，侮辱非教徒，更不應以虛假報告去激動傳教士們，由傳教士們代為辯護，以便在教士們的保護下獲得勝訴。”但是總督只是說說而已。如果他採取迅速而強有力的措施，他就能夠很容易地獲得了成功，並使北方平靖，就象在安徽的兩江總督劉坤一一樣，剛剛把義和拳搞得鴉雀無聲，使南方寧謐。但是這時直隸總督已經確知，整個朝廷傾向於仇外，感到義和團運動的重要性，有意垂青於它，並加以利用。意大利提出鹵莽的要求，使慈禧不再有任何猶疑，而任憑義和團自由行動了。

歐洲人似乎沒想到會有什麼危險。在公務上，他們對政治事

件并不感兴趣，似乎也未曾預見其后果。俄国人从性格和从利益來說是願意保持“現狀”的，清朝如果換了一个新政府的話，对它就不会那样亲切殷勤了。德国也抱着同样的想法。此外，英日两国似乎同情过自由运动，自然地感到不能轉向慈禧和她的党派那边去。法国由于国际政治的关系，又为着使法俄同盟得以巩固，則跟随着俄国，在外交上不能不支持俄国，或是最少对曾經破坏維新党派和把光緒帝廢掉的那些人們，采取“善意的中立”。各外国使館有一种差不多是公开的意見，认为一切加速毀灭中国的东西只能是对欧洲各国有利，使它們的希望可以更早地实现，它們的胃口可以更肯定地得到滿足。它們对局势，閉上双眼，不加理睬，而局势却是每况愈下，日趨險恶。它們对这次仇外运动的重要性及其将产生的危險，未能有所認識。它們很正确地在1900年1月27日給总理衙門提出內容相类似的照会，对各秘密結社的发展提出抗議，但是总理衙門在經過提醒之后竟在3月9日复文拒絕了它們的要求，尤其是拒絕在《京报》上公布禁止各秘密会社的命令。在另一方面，駐北京的各国公使曾要求本国政府在中国北方进行海軍示威，而英国政府当时正忙于南非脫兰斯瓦尔事件，宣称它认为这种示威的时机还不成熟。各国公使对示威也就不坚持了，而就象毕雄公使在4月24日給法国外交部的报告里所說的，滿足于“繼續向总理衙門要求采取强有力措施。”

不过，各方的警报越来越“紧急”了。1900年5月15日《香港电訊报》駐天津記者报道說：“慈禧太后和她所有的寵信公开地支持义和拳，因为他们相信，他們今天支援义和拳，将来义和拳运动展开后对他們自己将有极大的帮助。他們只是在等待时机成熟或是等待一个吉日，以便开始作战。外国使館对这一切毫不在意，預言大

禍將至的人們反而受到譏笑。但是在北京的人們完全輕視英國的力量，人們認為英國被南非的事件很沉重地壓住了，不能認真地考慮依靠它。”《字林西報周刊》北京本地籍通訊員在1900年5月16日發表的一封信說得更明顯了：“我把這個不太愉快的問題放在一邊，而另外談一個貴報的外國讀者應該嚴肅考慮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和每個外國人都有關係，並且在任何時候都可以發生。這個問題就是守舊派直認不諱的對一切外國人的仇恨——俄國人也許是例外。我完全誠懇地、嚴肅地寫這封信，向你們報告，目前有一個大密謀正在醞釀，要消滅在華的一切外國人，並以強力奪回他們所租借的一切土地。這個運動的主要首領是慈禧太后、慶王、端王（繼位者之父）、剛毅、趙舒翹和李秉衡。用來完成這目的的軍隊全都是滿洲人——這七萬二千人將成為復仇軍的重心。而在這次的大戰爭中，義和團將只是輔助的力量。這次戰爭已迫在眉睫，其急迫是在北京或他處的外國人所沒有想象到的。所有高級的中國人都知道這事；那些認為外國人是朋友的人們曾告訴外國人；但據我所知道，人們反而嘲笑這些人，而不感謝他們為西方朋友而焦慮。”該通訊員又說：“我現在要舉兩個例子，來說明義和團在列國監視下的北京受到的極大恩寵。……第一，有一個河北姓王的御史，近日覬見了慈禧。談到義和團的時候，慈禧告訴他說：‘你是直隸人，你是應該知道的，你對直隸的義和團的想法怎樣？你是不是真真相信，當行動的時刻到來的時候，義和團能實實在在參加政府部隊打洋鬼子呢？’——‘臣敢肯定他們會這樣做，陛下。此外，義和團教育成員的原則是：至死保衛天朝（清朝），殺死鬼子。臣深信義和團負有天命消滅鬼子。臣家老幼現在都念義和拳的咒語，臣等每一個人都參加這個會社，以保衛天朝，把鬼子扔進海里。如果臣有過去

所受有的权力的話，当时候到来，臣将欣然带着义和团在复仇軍里打先鋒。在时候还没到来以前，臣将尽所能帮助义和团組織起来，武装起来。’太后点头表示同意；在經過沉思之后，大声喊道：‘是的，义和团是个大的会社，但是我怕由于目前沒有經驗的人作領導，他們就在什么都沒准备好之前，急促采取行动，以致政府在对付这些鬼子的事情上陷入窘境。’她略停一下又說道：‘因此，这些义和拳需要有几个負責的人在直隶和山东指导他們的行动。’覬見完毕，第二天早晨便降旨，任命这位王御史为順天府尹，这就是說，一个六品官被多加一支花翎，升为四品京官。这样，王便有了他所希望的机会去組織、劝导和武装他的义和拳朋友了。

“我所要举的第二个例子，是要說明什么时候外国人就要碰到麻煩。自从1870年的天津屠杀以来，除了最狂热的保守分子而外，所有官吏都禁止人們使用‘洋鬼子’这个名詞。用这名詞被官吏听見的人，甚至要受笞刑。但是今天我們看到，这个名詞不但是义和团的呐喊，它甚且受到慈禧太后亲口的正式批准。

“至于荣祿，則已沉默多日。人們相信，他已决定，倘使在京的庆王、端王、剛毅、赵舒翹和在省的李秉衡的阴谋发生了什麼事故的話，他将紧靠皇帝身边。不但如此，他从心底來說，是英国人的朋友。这点我是知道的。不久以前，在一次六部九卿會議上，人們討論意大利和法国要求中国南方領土时，只有荣祿一人劝告政府要爭取英国的保护；他指出，如果俄国和法国以报复相威胁的話，美国和日本将会援助英国，但是他却受到庆王、端王、剛毅和赵舒翹的压制。剛毅說：‘英国搶劫圓明园，日本占台灣，美国对待去美国和菲律宾的中国人就象狗一样，我們有眼同他們算。我們同俄国沒有仇怨。尤其是如果法国支援俄国的話，这样将使我們更强

一些，雖然我們深恨法國。我決定同俄國建立最親密的友誼，因為如果俄國同我們在一起，我們就可以蔑視整個世界。只要俄國和我們在一起，英國便將孤立而俯首貼耳了。參加六部九卿會議的人都一致贊成這種看法，慈禧太后也是如此，她使勁點頭表示同意。榮祿便緘默起來，不再發一言。”

最後，在5月20日，京城牆壁張貼着揭貼，宣布在陰曆5月初，屠殺外國人。同一天，外國公使們開會，但是他們大多數反對我法國公使畢雄極明智的意見，拒絕派遣歐籍衛兵以資自衛。加之，5月28日總理衙門又提出了最令人鼓舞的保證，說要鎮壓各種秘密結社，并要求勿使歐洲籍部隊登陸。

翌日，一切都改變了。畢雄致電法國外交部說：“亂民在京郊燒了車站，毀了鐵路。他們就在城門口了；他們的許多共犯者就在那里等候着他們，已准备好隨時和他們聯合起來。鐵路上的法國比國人員，不能不撤退。鐵路上的一个法籍人員已受傷，其他諸員亦在危險之中。外交團已決定盡速召兵前來護衛。我已致電駐芝罘的孤爾折爾提督（法國遠東艦隊司令）請他立即派一只船前來，因有一百人必須登船。德、英、美、奧、意、日、俄諸使亦採取相同措施。電報有被切斷之虞。31日，英、美、意、俄、法、日諸國衛隊抵達北京。華方又再向公使們提出保證。公使們還未了解，清廷和拳民是一心一意的。但是其後，情勢日趨惡化了。5月31日，榮祿奉上諭整頓拳民，實則組織拳民之意。6月4日，六部九卿會議，決定听任拳民為所欲為。一位將軍，因過於熱心，把一群圖謀切斷京津交通的人驅散，竟受到了申斥。6月10日，極端反動而仇外的大阿哥的父亲端王被命為總理衙門之一員——名譽職。6月11日，日本使館書記生被殺。6月13日，終於開始屠殺本地籍

教徒，纵火焚燒教堂。

不过，在天津的欧人因担心北京外人的命运，已决定采取行动。16日，一支国际部队二千零六十四人，在西摩提督的指揮下，离开天津向北京挺进。人們相信，这样示威已足以引起清廷的注意。但是已經太晚了。这支纵队发现自己的力量不足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它不得不在6月26日退回天津，計死七十人，伤二百八十人。在这期間，外国諸提督从大沽海口致最后通牒給当地守軍司令，要求把他所防守的各炮台交出(这是6月16日的事)。华方在午夜过后不久开了一发炮，打中了一只船。这是华方唯一的回答。翌日，外人即令部队登陆；自晨五时半开始，外国的旗帜便飄揚在大沽諸炮台之上了。

这个消息傳到了北京，总理衙門便通知各使館，說已进入战争状态，并令外国人在二十四小时內离开北京(6月19日)。公使們要亲自向总理衙門提出抗議，但是有一个中国人及时地警告了他們，因此而未成行。德国公使克林德坚持前去，就在中途被杀。24日午后4时，二十四小时的期限已滿，华方便向外国使館开炮。翌日，慈禧太后用皇帝的名义发布上諭，向全国臣民說明其行动的理由。她要求向外国人作决死的战争，并在26日发布上諭，命令各省巡撫登記拳民，协助他們驅逐外国人。7月2日又下一道上諭，命令驅逐傳教士，并屠杀一切不正式宣布背教的基督徒。

这些煽动行为在北京发生了效果，但是在中国其他地区却落了空。由于湖广总督張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智慧与努力，华中与华南各省当局沒有响应上諭的号召。反之，他們在1900年6月26日在有关上海領事团的問題上，保证在这些地区“有效地保护外国商人和教士的生命财产”，只要这些人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的

話。所以实际上只有中国北方参加了这次的运动。在揚子江和南方沿海地区的欧洲人都沒有受到騷扰。

但是，北京使館和那里的欧洲人却是杳无音信了。因此，从远东各国口岸以至欧洲，便盛傳着令人悲痛的謠言。7月15日的《每日邮报》就傳布了这些謠言。幸亏在一陣血战之后，天津在7月14日落入我軍之手。在大沽炮台陷落那天，中国人就开始进攻天津的外国租界。8月3日，联軍首长举行軍事會議，决定向北仓和楊村进軍。8月5日、6日，該两据点为联軍所攻克。联軍依据日本山口將軍的意見，繼續前进。8月13日，联軍先鋒部队进入北京城，14日解放外国使館。

实际上，自7月17日以后，北京各外国使館已不再有急迫的危險了。荣祿显然因为天津的失陷着了慌，向外国使館建議休战，这建議为外国使館所接受。8月3日，法国公使致电法国政府，該电在12日才到达巴黎。該电称：“7月17日，炮击停止，枪声时作时停。华方对工事、木栅、障碍物等的攻击則仍在繼續进行，但是沒有死亡了。中国政府企图間接和我們商量要我們离开，我們不能沒有中国政府以外其他方面的安全保证而同意离去。我們的兵力、彈药和粮食已快要完了。华方已停止的攻击可能再次开始，因而可能使我們落入中国政府之手，任凭它处置。”荣祿比他的同僚們眼光要清楚些。他甚至在狂热高漲到最坏程度的时候，还努力給拳民制造障碍，这些障碍无疑使北京的外国人得免于丧命。他了解到，失敗是已經肯定的了，便努力策动和談。他无疑是和李鴻章协作的。李鴻章在7月10日受命为直隶总督。7月19日，华方致电在北京駐有代表的各国政府首脑，表示希望获得解决糾紛的途徑。



8月6日楊村胜利的消息开始引起了清宫的惊慌。8月7日，李鴻章奉詔以电报与各国談判。11日，清廷离京。当联軍进迫时，已成孤軍的拳民便在8月12、13两日的晚間向外国使馆进行猛烈的攻击。14日，联軍入北京，这时慈禧太后和皇帝正在逃向山西的途中。对事件应負責任的主要人物或是自杀或是逃匿了。

(馬伯乐：《中国》，第291—301頁，張雁深譯。)

#### 四十、杜巴比艾：論义和团运动

我們在第一編里，已經知道光緒帝所领导的戊戌变法派和西太后所领导的反对变法的滿洲貴族間有激烈的斗争。西太后及其忠实的同族人端郡王为了阻撓改革，阴谋在人民間挑撥对外的恶感，因为对外叫嚣可以緩和人民对他們的反感。这一阴谋却使中国陷入悲剧之中。他們开始煽动在以前任何时代均曾在中国領土上迅速发展过的秘密結社，特别是“拳匪”。因为清朝认为此举可以收得两重利益：一方面，使外国人陷于不安，另一方面，又将可能給朝廷带来危險的活动强加于无辜的人民身上。自从曾經繼續十五年(1850—1865)之久的太平天国之乱平定以来，怯懦无知的清廷，鉴于前車的复轍，不免有些胆战心惊。西太后与端郡王在认为已准备充分时，即摊开自己手里的牌来。人民已不隱藏为外国人所激发的輕蔑和憎恨。人民想起中国历来所受的各种侮辱、甲午战争、列国在中国爭夺权利利益等等。1900年6月10日，西太后在王公大臣面前，严肃地发布使外国人退出中国的命令。

6月13日，拳匪开始活动。网罗北京各种坏分子在內的軍队，

大杀傳教士及信奉基督教的同胞。德国公使克林德为中国兵所射击，當場毙命。外侨只有逃往其本国公使館內避難，不久各国使館即被包圍。列强在德国瓦德西元帅指揮之下，組織了国际远征軍，7月14日占領天津，次月即解除各国公使館的包圍。拳匪的大乱至此告一段落。然而中国为了西太后这一疯狂的举动不得不付出巨額的賠償。其后，列强即一再利用此次胜利进行侵略活动。

列强要求中国处罰禍首，端郡王被流放，与事件关系最深的人們被处以死刑，对于克林德公使的遇難，由清廷派特使往柏林謝罪，等等。德国要求在克林德遇害的地点建立紀念碑，也是值得注意的事件。然而拳匪之乱还产生了另外一个更重大的結果，即是帝俄拟乘机永远占領滿州。1896年帝俄已获得由西往东橫貫滿洲的铁路修筑权。其后在1898年乘获得旅順租借权之便，又获得連結此港和上述铁路的支綫修筑权，这就是所謂中东铁路。当义和团排外运动发生之时，帝俄借口保护这些铁路派遣軍隊，那只是表面理由，实际上是强行軍事占領滿洲的先声。中国当然提出了抗議，但是毫无效果。从此以后，帝俄即开始一步步經營滿洲，其結果，滿洲地方便成为各国逐鹿場。1900年拳匪事件的爆发可說是1904年日俄战争的根源。

（杜巴比艾：《中国近代史》，第66—68頁，傅仲涛譯。）

## 四十一、傅吾康：論义和团运动

由于两个不同的运动結合起来，1900年在北京和华北发生了以“义和团暴动”或“义和团叛变”著名的造成严重后果的事件。一

个运动起源于一个宗教秘密会社，另外一个发动于一个宫廷小集团。这个集团企图完全廢掉 1898 年已經被排挤出政府外的皇帝。

前面已經說过，十四世紀导致蒙古人被驅逐出中国及一个純粹中国人的明朝的建立的革命，溯源于“白蓮教”派。它是与巫术和迷信有关系的佛教、道教、摩尼教的人民宗教。明朝正式建立后，它为自己出身于“白蓮教”的明朝第一个統治者朱元璋所禁止。可是，它仍秘密地存在，且在清代重新出現。1796 年，它在驅逐滿人和恢复明朝的口号下发动了一次大叛乱，这叛乱蔓延到湖南、湖北、四川、陝西和甘肃，直到 1804 年才确被鎮压下去。“白蓮教”再度地被严禁；1813 年的一道上諭，把“白蓮教”中分出来的許多派別也禁止了。其中就有义和团。尽管发布了这一切禁令，这些派別中的大多数仍繼續存在，且自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以后，有些这样的教派，特別在山东，大量地出現了。原因往往是，由于政府的措置失当及农民已經不能生活的情况因自然災害而进一步加剧。这些秘密会社的共同特征是一种特別坚强的迷信。例如，他們深信，他們教里的人能通过某些法术发生不可思議的力量，可以抵抗枪彈而不致受损伤。各种叛乱运动——义和团最后混进去了——的目的，象所有这种性质的叛乱一样，起初是完全带有社会革命性质，針对統治的官吏，坦白地說，就是对紳士階級而发的。作为一个宗教派別，它們反对和他們信仰不同的人，因此，也反对基督教徒。此外，許多人看到在內地到处居住有外国傳教士——他們的举动不能为耶穌教創造同情——他們對他們所遭到的不幸，應該自己負責。这样一种状态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的，因为除了皇朝內部的沒落外，外人的侵入中国也造成了生活条件每况愈下的經濟后果。此外，一般人們也相信，外国傳教士从国内人口中不是最好

成分里招致来的耶稣教徒会借外国人的神妙影响迷惑非教徒。因此，义和团人常攻击教堂、外国传教士及本国教徒。地方当局一部分设法用暴力来镇压运动，一部分同它妥协。后面这种情况的发生，很少由于他们真正同情于义和团，而多半由于他们不能控制运动。通过机会主义的领导人和来自政治方面的影响，义和团的仇外性质逐渐强烈地表现出来，而他们的社会革命和排满倾向反而让位，以至最后完全消失，发展成为“扶清灭洋”的口号。从1895年起，在山东，或多或少为地方当局所容忍的义和团同外国教会之间发生了许多事件。北京政府深恐因此与外国引起纠葛，所以于1899年底派一个维新的积极的巡抚（袁世凯）到山东去，委以取缔义和团运动的责任，自此以后，运动的重心移转到河北省（当时称直隶）。在直隶，义和团大部分受到当局的容忍，如果不是受到保护的话。到了1900年，一个坚强的集团已经在华北对外国贸易最重要的中心天津立足下来。

通过皇太后1898年策动的政变（戊戌政变），皇帝固然被排斥于政府之外，但是，如果年老的太后一旦死去，皇帝就会重行执政。可以预料，他会向宫廷和政府中反动小集团的成员算账的，因为除了太后以外，这些人个个要对1898年的政变负责。为了预防日后这样的事情发生，反动小集团——很可能他们有太后的谅解——设法废去皇帝，或者根本地把他了结，而代之以另外一位亲王。于是，发生了宫廷的阴谋。中国皇室中，宫廷阴谋经常是很多的，而且它们基本上都是与反动或改革问题无关的。继承将退位的皇帝的人应是端王载漪的一个儿子，但是，由于在各省拥有重兵、因此无须顾虑他们个人安全的总督们的反对及北京外国使节的抗议，计划好的废立阴谋竟搁浅了。端王对于立他的儿子做大

阿哥應該是认为滿意的。这个失敗激怒了这个原来已經非常愚昧和反动的亲王使他特別仇視外国公使和比較进步的总督，并促使他同义和团結合。他想可以借义和团的协助及他們超自然的能力——他似乎深信他們有这种能力——把外国人赶出中国，并利用义和团运动来达到他个人的目的。除了其他人外，他是对宫廷在太后领导下同义和团联盟，并讓他們进北京城負首要責任的人。結果发生了遵照太后的命令对外人的敌对行为，外国使館被与正規軍联合的义和团包圍，北京城变成一个恐怖政权。許多平日证明是进步的和欢迎維新的，或不受端王和他的小集团喜欢的高级官吏均以叛国为名被立刻处死。沒有人敢出头反对他們，假使这个人不想牺牲他自己的生命；宫廷外的群众为宗教民族主义狂所迷而如疯如狂。在外国人中，日本使館一个書記生和德国公使是他們的第一批牺牲者。中国人自己也並沒有逃出恐怖。不仅所有能抓得到的教民或被臆測为教民的均被杀死，即凡与外人在任何形式上有业务或私人往来或曾有过往来的也不能幸免。民間称这些中国人为“二毛子”，外国人为“毛子”，因为欧洲人的毛发比中国人的毛发长得坚硬。

接着发生的事情，是北京外国使館的被圍和解圍。在瓦德西率領下的国际軍队的到达，太后和宫廷的出奔，外国軍队的搶掠北京，义和团的鎮压，宫廷的归来，所謂辛丑条約同它对中国的苛刻条件，这些对革命的历史不是基本重要的，因此在这里可以略而不談。而且在西方文字中，有許多关于这些事情很好的叙述可資参考。

近代共产党人的历史著作认为，义和团是一个自发的、針对外国帝国主义的运动，但是它缺乏組織和有远見的領導，因此反动的

宫廷小集团为它自己的目的而利用它。义和团反对外国人和与他们有关系的中国人的行动得到他們的同情，反对宫廷和政府同义和团一道行动的各省总督——据我們的看法，他們的反对不是出于对外国人的同情而是因为他們比較認識到这个行动沒有意义——在共产党人看来，他們是卖国贼。当时只局限于华北的这个仇外运动的剧烈爆发，因外国的干涉而消沉下来。但是，外人沒有因他們的行动而获得同情或尊敬，他們对中国的罪行记录反而更增加了。1900年的事件也給滿清皇朝一个新的沉重打击；它不能长久維持下去，以致于完全崩潰而后已。

（傅吾康：《一百年来的中国革命，1851—1949年》，第80—85頁，孙瑞芹譯。）

## 四十二、內藤湖南：論义和团运动的教訓

八国联軍时，天津暂时建立了都統衙門，执行着各国联合政治。象今日中国这样的情形，建立第二次大都統政治的时机，恐怕不会很远吧。中国人是一大民族，是一个統一的民族，然而各国在中国的权利也是頗为錯綜复杂。因此，我并不认为中国是可以随便瓜分的。然而我认为某种都統政治却随时均可实行。并且此种都統政治，只要中国人肯拋棄国家独立的面子，对于中国人到是最幸福的。将来在都統政治之下，我們在本論中所讲的国防的需要，将肯定地会消失。因为在都統政治之下，中国人可以享受比中国官吏更廉洁、更有能力的外国官吏的統治，不必增加負担即可以享受善政的恩惠。中国人現在既然要推戴袁世凱这样的人为大总

統，那就沒有理由反对都統政治了。因此我想：站在象日本这样对于中国时局有利害关系的国家的立場看来，討論中国要如何方能稳定的問題是无意义的。中国人民如果稍有政治上的道义心，重視本国的独立，即应有如此书本論中所述的結果；否則，即将出現第二次都統政治。只要有此觉悟，日本及其他外国应采取的步驟即可知矣。对于都統政治，君主制与共和制的問題，关于領土的問題，均不需討論；只有此书本論第三項以下內治的問題仍需要討論。但是我日本当此时机到来时，是否有救济中国人的准备呢？这不但要問政府当局，还要切实地問問我們国民。

（內藤湖南：《新支那論》，第7—8頁，傅仲涛譯。）

### 四十三、稻叶君山：論义和团运动

据荣祿致許应騤书云：“义和团亦称拳团，是以义和拳教匪为其核心。义和拳起于山东，始称梅花拳。李秉衡为山东巡撫时，不加禁止，而許其团练，时与官兵斗，李一切不問。……”荣祿又云：“去年（即光緒25年，公历1899年）九月底，直隶省民竟豎大旗，……某日奉上諭，盖令收集拳民，編为团练，以为国防之助，信为至善。然而办理苟不得其人，禍亦至大。……”又云：“拳民之发生，原激于义憤，今則民教互仇，勢不两立。彼等使政府卷入，奋然相斗，粉身碎骨，亦所不惧。其忠勇之气，固可嘉尚。然若任拳民与外人对敌，則是大錯。故僕意中，但利用其一时的狂热，以振作士气。真以临陣，决不足恃。其所謂法术，亦只虛声。如予以深信，毋乃太愚。如足下所知，凡有邪术者，結局无不成为謀反叛逆

者。近来傳聞拳民在天津大沽获胜，僕实未之信。中国南北人民，性质不同，南方現在会党林立，俱思蠢动，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况南人大抵嗜博奕，不安本业，无忠憤之气。驅之作战，犹如驅群羊与虎斗。北方之义和拳，起初并不以搶掠为目的，只是信教入迷。大抵北人朴实粗野，南人圓滑奸巧，尤不足恃。”云云。

此书作于义和团即将出現于天津北京，中央政府即将完全卷入的6月下旬。因为是榮祿，所以才能写出这样的信来。如书中所示，山东巡撫李秉衡对于拳匪，起初措置失当，毫无疑义。及毓賢继李为巡撫，頗奖励之。毓賢去，袁世凱来，則剿之。彼等为袁所逐，乃如潮水般涌入京津。当时直隶总督裕祿不但不排斥拳匪，反而予以欢迎。載漪、剛毅、徐桐等复招之入都中，称之为义民，遂有义和王大臣之名。拳匪遂臻极盛。他們姿意妄行。此时著者正在天津，亲受彼等包圍攻击，北京各国公使館亦陷重圍。教会被燒毀，牧师被杀害，电报铁路被破坏，甚至凡携带外国貨物者亦遭杀害。继日本杉山書記生被害后，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亦遭杀害。董福祥率領一队甘肃兵来到北京时，其狂暴达于极点。在此前后所下的詔书，究竟有哪些是真，哪些是伪，至今犹不明了。朝廷向各国宣战，同时命各省督撫，悉捕境內外国人杀之。幸而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張之洞不奉命，且与各国領事妥协，东南半壁得以保持和平。但是我們应注意，西太后在此次事变中态度始終不决。有时激励拳团，有时抑制之，遂酿成大禍，她也不得不因此而忍受一生最大的屈辱与痛苦。

（稻叶君山：《支那近世史讲话》，第300—303頁，傅仲涛译。）



## 四十四、高桑駒吉：論义和团运动

清国自甲午战争以后，有識者认为有改革政治制度之必要者渐多，其中遂有維新党人企图作急进的革新。于是，广东人康有为前后五次上书，纵論改革。因符合青年有为的清帝德宗之意旨，乃着手实行。然而当时朝廷的实权，不在帝而在頑固的西太后及保守派手中。因此，1898年9月帝与康有为等密謀，引直隶提督袁世凱<sup>①</sup>为后援，企图夺西太后及保守派之实权，以便进行改革。然袁默察事不易成，因将此計密报西太后。事露，帝被幽禁，康有为聞風逃走，仅免于难，其徒多被捕杀，革新事业遂遭挫折。西太后再度垂帘听政，端郡王等保守派輔之，于是清人排外思想复盛。会1899年夏，山东省有号称义和团的拳匪兴起，标榜扶清灭洋，专事迫害外国宣教师及基督教徒。复乘华北一带荒歉，1900年春流入直隶省，破坏铁路桥梁，剪断电綫，甚至破坏北京天津間的交通。西太后一派暗中与团匪私通声气，加以煽动。官兵反而协助匪徒，于是匪势益甚。因此，日、英、美、法、俄、意、德七国海軍陆战队将校等四百余人入北京，护卫各該国使館。清廷对于匪徒的暴行竟袖手旁观，不加镇压。日、英、美、法、俄、意、德、奧八国的陆战队二千余人在英国东洋舰队司令官西摩的指揮之下，由天津向北京前进，中途为清軍所阻，引还。是时各国公使館已陷重圍，日本公使館書記生杉山彬及德国公使克林德相继遇害，清廷遂对各国宣战，天津

<sup>①</sup> 袁世凱时为直隶按察使，并非提督。——校者

的外国租界亦为清兵所包围。因此，各国军舰攻陷大沽炮台，旋解天津之围，更进而攻陷天津城。其时列强俱决定派遣援兵，日本则命陆军中将山口素臣率第五师团参加，联军在总指挥官德国元帅瓦德西未到之先，已于8月自天津出发，日、英、美三国兵自白河右岸前进，俄、法、德、奥、意五国兵则自白河左岸推进。其后德、奥、意三国返天津，法兵留杨村，日、英、美、俄四国联军继续前进，入北京，解北京各国公使馆之围。是时清帝及西太后俱已蒙尘，逃往西安。因此联军遂进占北京城，复出略山海关及北塘。迨瓦德西元帅至，又夺保定。于是清廷遣庆亲王及李鸿章，在北京与各国协议，至12月订立下列条件：对杀害德国公使及日本书记生派遣谢罪使，处分元凶，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约九亿元），拆除大沽炮台，公使馆设置军队，占据北京天津间要地等，共十二项。以此恢复和平。至翌年1901年9月，始在议定书上签字。

（高桑驹吉：《中国文化史》第458—460页，傅仲涛校。）

#### 四十五、洼田文三：論义和团运动的后果

自通商以来中国外交可说是连遭失败，其以夷制夷的旧策虽然偶有成功，但都是意外的收获，并无足道。国际地位总是前进一步，后退十步。其中再没有象义和团事件那样荒谬的轻举妄动，并且留下非常严重的后果。事变前各国蛮横的侵略，实在是使懦夫奋起的真因。使列强敢于施其暴威，无非是李鸿章为弥补甲午战争的失败所作前门拒虎后门迎狼的措施的结果。请看在下关谈判

期間，張之洞尙且說与其把辽东、台灣割让給日本，毋宁給欧洲大国，可見全国徒为惋惜其敗北而丧失了理智，很少有人料及三国干涉后所得到的結果。康有为的变法自强，原是稽考俄国的勃兴史和日本发展史的由来，想采敌人之长补自己之短的用意，虽然頗合时宜，不幸康党缺乏有力人材，以致失敗，殊可深惜。百日維新后，西太后左右只有些頑固不化的保守派，动辄与时势逆行，他們相信用义和团事变这样极野蛮的暴举，可以輕易地驅逐外国人，挽救六十年来来的失敗，以雪国耻，可憫亦复可笑。虽然此时人材尙屬不少，在外者有張之洞、袁世凱，在朝者有恭、肃諸亲王等以学者兼政治家为人所共許且以此自任的人士；但是事变的主謀人西太后及其左右的宦官等十年来掌握实权，施行反动政治，遂激成革命运动，卒至造成今日混乱局面，清朝的灭亡可謂咎由自取。这不但是四亿人民的不幸，亦是东洋民族整个的不光采。

(注田文三：《支那外交通史》，第417—418頁，傅仲涛譯。)

## 四十六、白柳秀湖：論义和团运动

欧洲列强瓜分清国領土的野心，卒至引起1900年(明治33年)的义和团事件。自鴉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对于白人强暴无理的行为，已是再三隱忍持重，而現在已經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了。白人对于中国及中国人的輕慢凌辱日益加甚，到了这时候，不啻是在他們固有的强烈的排外思想火苗上加油。西太后一派的保守势力企图利用这种情势，操纵义和团以遂其排外的政策。1900年5、

6月之間，華北大飢，疫癘流行，此時有自稱為义和团的排外主義的亂民滋擾，與朝廷的保守勢力暗通聲氣。破壞北京保定間的鐵路，形勢頗為嚴重。然而朝廷不但不加以鎮壓，反而利用他們以求一舉達到攘夷的目的，至如端郡王則隱然有挾西太后而甘為匪首之概。先是，日、英、美、俄、意、德的水兵已來北京保衛各國使館，各國公使對此情勢，已各向本國政府要求增兵。6月10日，英國東洋艦隊司令官海軍中將西摩，率領各國陸戰隊共二千餘人自天津馳援北京，途中為官兵及匪徒所阻，失去前後的聯繫，各國公使館一時陷於重圍之中。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及日本公使館書記生杉山彬為匪徒所殺。6月21日，清廷對列強宣戰，列強軍艦乃聯合攻陷大沽炮台，解天津之圍，與西摩一隊取得了聯繫。在此前後，我陸軍少將福島安正及第五師團長陸軍中將山口素臣率兵會于天津，與列強兵力合併，于8月4日向北京進擊。8月14日，聯軍攻陷北京，解各國公使館之圍。是時，清帝已于8月13日與西太后蒙塵西安。清廷乃令慶親王及李鴻章與各國議和。

（白柳秀湖：《明治、大正國民史》，第321—324頁，傅仲濟譯。）

## 四十七、小竹文夫：論义和团运动

戊戌政變後，因為反動的守舊派佔據當時的朝廷，其排外感情，日益反映到當時政府的對外方針上面，其結果乃產生了义和团事件。

戊戌政變後，有名的、最激烈的排外家端郡王重新為朝廷所重

用，这就表现出当时朝廷的对外方针的实质。端郡王的任用和一般排外感情的强化，俱使当时旅华外人感觉到惶恐不安。适逢此时，直隶、河南、山东一带，黄河泛滥成灾，山东一带灾民土匪蜂起骚扰，与当时排外运动结合起来，遂轉化为排外性的暴动。当时山东方面已有人謠傳，朝廷已降驅逐外国人的上諭。于是，有不少教会学校为土匪乱民所掠夺；呼教民为“二毛子”而加以襲击；官吏若加以镇压，即被誣为被外人所收买，而受到种种侮辱。各处張貼排外傳单，山东一带完全处于骚扰状态之中。此时，美、德二国出兵，镇压此次骚扰，并强迫清廷罢免当时的山东巡撫，反而激起了中国人的憤恨。新任巡撫毓賢又是一位有名的排外家。

翌年出現的义和拳教匪，是一种公然标榜排外的邪教团体。他們之所以敢于发起这样的排外运动，当然也有痛恨傳教士态度强橫的因素，其实也有借排外的虛名，驅取愚民的同情，以擴張其教匪势力的理由。毓賢对此不但不采取任何镇压措施，反而因为朝廷对此默不作声，所以也公然采取排外的态度，因此义和拳教匪有如星火燎原，立即成为不可制遏的一大势力。他們起初只是破坏教会，杀戮教民，最后便举起“扶清灭洋”的旗帜，而完全政治化了。这本来是他們为了迎合当时朝廷的意旨而采取的举动，朝廷亦公开地保护义和拳民，見其势力猛烈，遂企图进一步利用其势力，一举从中国逐出此可恨的外侨及外国势力。

据当时的傳說，如果熟练义和拳棒，則枪炮不能入，刀劍不能伤。朝廷曾派大員前往調查，据称确是事实。于是，朝廷认为枪炮既不能伤，外国武力是不能战胜的，此乃天降拳民，将要扶救清朝于困苦之中。当时的朝廷是如何期待拳民，試观此后向外国宣战的詔书中，称他們为义民，就可以知道了。光緒 26 年（公元 1900

年)，由山东起，直隶、河南、浙江、江西、湖南、山西、四川、甘肃等省，俱弥漫着排外的乌云。

在清廷方面，西太后、端郡王等认为时机业已成熟，乃召董福祥入京，进行全国攘夷之战。5月，由拳匪及官军组成之大军，包围北京各国公使馆区域，企图一举屠杀外人。6月，公然向各国宣战，并发出攘击外人的命令。于是，日、英、俄、法、德、意、比八国为援救北京公使馆联合出兵。8月攻陷北京城，解除公使馆区域的包围。西太后及光绪帝早已逃往西安，命庆亲王、李鸿章向各国请和，结局与各国订立辛丑和约，规定：惩办端郡王以下各祸首，公使馆驻屯常备军，摧毁大沽炮台，赔款四亿五千万两。这就是义和团事件。

此时，不但北京及华北一带陷于战乱之中，即中国本部各地亦有骚扰，满洲、蒙古方面亦有压迫外人事件发生。只有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极力保护外人，是以未有迫害外人事件发生，山东巡抚袁世凯及李鸿章亦尽力保护外人。因此，中国领土才免于战祸。如果这些有识人士也附和朝廷，煽动人民排外，中国领土必陷于战乱，外国出兵，亦不会仅限于华北，其结果，或许招致中国的瓜分，亦未可知。

这次事件，是一群不许变更祖宗旧法的宫廷守旧的大臣们过分热心于保守中国旧文化，且又勾结邪教义和团匪而发动的一次特大的排外运动，也是中国旧文化最后的挣扎。但是此次反抗运动已完全为各国所压平，独裁帝国的尊严至此完全扫地，清朝今后的存在只是形式上苟延残喘而已，事实上可说是已经灭亡了。在另一方面，这时已经产生直接推翻清朝、建设新中国的革命党了。

（小竹文夫：《现代支那史》，第44—48页，傅仲涛译。）

## 四十八、和田清：論义和团运动

清国由于甲午战争失败的结果，和苦于列强的压迫，整个国家陷于困境。为挣脱此种困苦，产生了两种不同方向的运动。一种是变法自强的改良运动，另一种是用顽固的排外，以恢复闭关自守的违反时代的运动。至于采取洋法的长处，自同治中兴以来，即为一部分有識者所提倡，但未得到一般社会人士的同情。后来德宗皇帝亦认为有革新的必要，乃于光緒 24 年(1898 年)夏秋之間，任用康有为等实行急进的改革。德宗此时年仅二十八岁，虽然从十年以前就有亲政之名，但并无实权。在朝一般守旧人士俱不主張改革，因此在幕后的西太后再度出现于政治舞台，幽禁德宗，誅杀康有为一派人士，廢止新法，采取反动的措施，这就是所谓的戊戌政变。正在守旧排外風气盛行之时，山东有自称为义和团的匪徒兴起，标榜扶清灭洋，大肆杀害外人，特别是耶穌教徒。清朝不但不加以彈压，反而暗中加以鼓励，及至光緒 26 年(1900 年)，匪徒遂蔓延于直隶，不久进入京师，圍攻公使館区域。于是，日、英、美、俄、德、法、奥、意八国联合起来与清廷对抗，組織联軍，进陷大沽，取天津，破北京，解使館区之圍。西太后于是与德宗逃往西安，留下庆亲王及李鴻章，使之讲和。列强的憤怒一时达于极点，除要求誅禍首，遣使謝罪以外，还訂立各种严峻的条約，以保证将来。勒索賠款四亿五千万两，須三十九年方能还清，为害中国甚大。德宗及西太后于翌年，光緒 28 年(1901 年)正月回北京，这就是所謂拳匪之乱，我国所謂北清事变。此时南方各省，有两江总督刘坤一、

湖广总督張之洞、两广总督李鴻章、山东巡撫袁世凱等，极力安撫地方，始終維持和局，始免于惨酷的战禍。在这次事变中，我軍紀律及勇猛，大为列强所称赞。

(和田清：《中国史概說》下卷，第322—323頁，傅仲涛譯。)

## 四十九、宮崎市定：論义和团运动

光緒帝与康有为的維新运动，同时也就是中国的欧化运动，对于国粹主义者是一大冲击。这种运动不久归于失败，于是国粹主义者大为得势，其中，有一种称为义和团的秘密結社起来作乱。中国的秘密結社，由来很古。秘密結社之所以兴盛，是因为自唐、宋以来，政府就实行盐的专卖政策，售高价的盐于人民，以保障财政的收入。和政府专卖政策相对抗的就是人民的走私，但是走私是違法的，必然要受到官方的处罰，因此走私人需要秘密組織坚固的团体，以資互相扶助。这种团体往往信奉法律所禁止的宗教。加入这种秘密結社的，多是失业者；所以，每当失业者增多，秘密結社即随之壮大起来。因为中国的交通、运输及生产方式逐渐欧化，外国商品流入中国，使中国原来的产业受到打击，因此失业者驟然增加。义和团是在山东产生的秘密結社，有許多因运河交通蕭条而失业的工人参加，他們所奉信的宗教原来就受到政府的禁止和镇压；后来因为乘着排外攘夷的潮流，高喊扶清灭洋的口号，于是与保守派的势力勾結在一起，不久便壮大起来。

义和团起初在山东省，从事排外和排外貨运动。声称如果奉



信他們的教，念咒即可以不為外國槍炮所傷，用以煽惑愚民。他們搗毀教堂，殺害基督教徒。山東巡撫袁世凱預料將要引起嚴重的外交上的麻煩問題，因而加以鎮壓。於是暴徒即由山東流入北京和天津。

此時地方官及朝廷大臣中，亦有人贊成他們的口號，而加以保護，於是原來被人看做匪徒，為政府所鎮壓的義和團，現在却被當作義民而受到歡迎了。清政府在鴉片戰爭及“亞羅”號事件時，曾有利用人民的排外運動使外國人困窘的經驗；這次，西太后及朝廷大臣又在背後支持義和團，使之襲擊外國人，破壞鐵路，最後進入北京，圍攻外國使館區，圖謀把外國官吏和僑民逐出中國。

北京內城東南部外國公使館區域雖有少數剛到不久的衛兵，處于義和團包圍約七十天了。各國於是組織聯軍前往援救。聯軍占領大沽、天津後，即向北京前進。清政府要求聯軍撤退，各國不允，遂向各國宣戰（1900年）。

清廷同時諭令各地督撫，將境內一切外僑處死，來京勤王。各地督撫接到此諭，並不遵行。張之洞、劉坤一等長江流域總督宣布中立，以安各埠外僑之心，亦不派兵勤王。地方督撫此時敢不遵奉諭旨，表明清廷威信業已掃地。然而因此使戰爭仅限于北京一帶狹小地區，大部分領土未受影響，可謂不幸中之大幸事。

日、英、俄、美、德、法六國聯軍擊潰義和團與清兵，迫近北京城，西太后即同光緒帝逃往西安，聯軍於是占領北京城。在義和團圍攻使館之間，德國公使、日本外交官及其他人被殺，各地外僑亦有多人被殺。聯軍進城後，掠奪北京宮殿，復派遠征軍至直隸省（河北）各地，到處奸淫擄掠，其野蠻程度并不下于義和團，其中日本軍紀律比較嚴明，為中國官民所信賴。

清廷起用粵督李鴻章與各國講和。協議規定：中國處罰拳亂禍首，付出巨額賠款，向德、日謝罪，承認外國在北京、天津駐軍，然後恢復和平（1901）。其後各國中有某些國家認為此項賠款太多，乃將此款用於文化事業，亦有作為中國學生留學該國之經費者。日本與各國同樣有駐兵權，日本之華北駐屯軍即據此條約而產生者，其數目後來逐漸增加，遂成為此次事變之遠因。

此次戰亂的結果，清政府的國際地位日益降低。當事變之時，相傳西太后向各國宣戰，下諭圍攻使館，曾從宮中高台上了望圍攻情況，可見清廷對於此舉頗為重視。政府當時若真用全力攻打，占領使館當不成問題，然卒未攻陷，似不可解。據說是因為在朝京官並未切實地接受西太后此項詔諭之故。可見西太后雖為頑固派所推動，下此離奇的排外詔諭；可是此離奇的詔諭，不但地方督撫無人接受，即在朝京官亦等閑視之。如此，不但地方督撫違背朝廷意旨，即在朝京官也不服從命令，可見清廷逐漸陷於孤立地位了。

義和團的騷擾，很少波及南方各省。至於北方各省，其中以滿洲方面受影響為最大。帝俄以此為理由，出兵占領滿洲，日本在英國支持之下，屢次向帝俄抗議，促其撤兵。帝俄始終支吾其詞，不但不肯撤兵，反而日益加強其軍備，於是引起日俄戰爭。

（宮崎市定：《論义和团》，見京都大學編《東洋史》，第395—397頁，傅仲濤譯。）

## 五十、矢野仁一：論义和团运动

各種文獻記錄多述及中國人民對天主教種種怨恨不滿之情，

可見一般中國人民對於天主教確有刻骨仇恨，這是勿庸置疑的。因此，用一般人民的怨恨來說明義和拳匪之亂，當非錯誤。我亦認為此種說明並非錯誤。但是一般認為義和拳匪之亂的真相即是排斥天主教，把排斥天主教看做義和拳匪之亂的本質，以為只要說明人民仇恨天主教及基督教的情況等等，便說明了義和拳匪之亂，這種說法，我是不贊成的。

在義和拳匪之亂中，當然殺死了不少傳教士和教民，但也殺死了許多非傳教士和非教徒。這可說是些無辜受害之人。此類事件，以前也曾有過。例如同治9年(1870)天津教案中，殺死了法國領事以下非傳教士的法國人及俄國人等等。該教案發生後第二年，即同治10年(1871)，總理衙門給各國公使的照會中有如下的文句：“各處人民不問天主耶穌有無區別，而皆指為天主教也。不知西洋各國疆界有分，而概視為外國人也。禍端一啟，凡駐居中國之西人所在，皆為危境。”因此，即使是以排斥天主教為目標的仇教騷擾，人民決不會單從外國人中特別區別出基督教傳教士來加以排斥，其他外國人則不加排斥；同時也不會從基督教中特別只分出天主教來加以排斥，而不排斥耶穌教即新教。總之，不免常有毫無區別的殺害一切外國人的事實。因此，不能因為殺了與基督教無關的外國人，即斷言它不是以排斥基督教為目標的仇教運動。

美國人白郎吾所著《在舊中國的新勢力》一書中，有一章討論到傳教士的責任問題。他說：“中國的仇教運動，無可爭辯地是傳教士自己招惹的，然而，那都是些地方性的，互不聯繫的、孤立的、偶發性的事件；受害人數雖各有所不同，總之，是個人的或家族的，至多也不過是一村一莊的損害，還不是使全國人民狂亂起來的全民性的大騷擾。但是義和拳民為仇外的心理所驅使，在幾千個城鎮

中大肆虐杀；在这些城市中，还有许多不但没有传教士，而且没有教民的。由此看来，义和拳匪之乱的动机不能认为是排斥洋教。”这位美国人白郎吾除此书以外，还有各种著述。这部《在旧中国的新势力》和明恩溥的《中国在激变中》，以及萨威奇-兰德尔的《中国与联军》都是关于义和拳匪之乱的重要参考书。

假使排斥西教是义和拳匪之乱的动机，那就如白郎吾所述，无辜受害者未免太多了。

嘉庆年间的白莲教之乱，道光、咸丰、同治年间的长发贼之乱，俱可以看做是不断在中国发生的内乱中的大内乱。因为这两次内乱规模都非常大，可认为它们是特别的内乱。为什么只有白莲教之乱和长发贼之乱，酿成如此大的内乱呢？我总觉得这是需要特别研究的问题。同样的，我认为义和拳匪之乱是排斥天主教的运动和反对基督教的运动，是1860年以来不断在中国发生的仇教运动之一。因为它是一次规模非常大的仇教骚乱，所以从其骚乱规模非常大的角度看来，是一次特别的仇教骚乱。为什么只有义和拳匪之乱发展得如此巨大？为什么与基督教无关的人民被杀害了那么多呢？据白郎吾说：“这就是骚乱的动机不在于反对基督教的证据。中国人最恨的是外国商人、外国政治家，而不是传教士。传教士因为与此等可恨的外国商人、政治家恰好来自同一的外国，于是即被认为他们和此等可恨的外国人是一丘之貉，而受到连累之害。”白郎吾因为自己是传教士，就不免牵强地为传教士辩护。白郎吾认为那是排斥外国商人、外国政治家的运动，传教士只是遭受了牵连。但是在此次义和拳匪之乱中，在完全没有外国商人、外国政治家的地方传教士和教民被杀的例子也很多。所以，如果白郎吾的想法能够成立，那么，与其相反的想法也能成立。这就是说，

也可以认为这是排斥傳教士和教民的运动，而傳教士和教民以外的人只是受到連累。这种看法也許更为妥当。

然而我认为与其那样說，毋宁說在义和拳匪之乱当中，排斥基督教是一种口号。如同在这次南方国民革命运动中<sup>①</sup>取消不平等条約，打倒帝国主义是一种口号那样，排斥基督教也是一种口号。这种看法也許更正确吧。

如所周知，义和拳匪后来举起了扶清灭洋的旗帜。扶清灭洋是他們的口号，这是无可置疑的。既然扶清灭洋能够成为他們的口号，为什么排斥基督教就不能成为他們的口号？扶清灭洋是义和拳匪的口号，排斥基督教却不是口号而是真正的目标，这是一般的想法。我认为排斥基督教和扶清灭洋都是口号。

光緒 26 年 5 月 25 日，即 1900 年 6 月 21 日朝廷頒布一道有名的上諭。原来朝廷方面对于义和拳匪有剿与撫两种意見；义和拳匪是否應該予以援助，如果由于援助而与外国开战是否妥当？很难解决，因此在很久一段时间未能决定是剿是撫。至此，終于决定援助义和拳与外国宣战，而向天下布告与外国开战的理由。其中有下列的一段話：

“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澤，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道光、咸丰年間，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傳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請。初亦就我范围，遵我約束。詎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鴟張，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躪我民人，勒索我財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負其凶橫，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則欺压平民，大則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怨郁

<sup>①</sup> 指北伐战争。——譯者

結，人人欲得而甘心，此義勇（義和拳）焚燒教堂，屠殺教民所來由也。”

所謂“三十年來”，大概是光緒帝即位以來之意。這是指沙俄取伊犁，甲午戰後法國取雲南省南疆的江洪土司，即車里宜慰司所屬的土地，英國亦要求割讓雲南邊境的土地，德國向中國勒索膠州灣，沙俄勒索旅順大連，英國勒索威海衛，法國勒索廣州灣的租借權。又“小則欺壓平民”之語，似乎是指責外國干涉人民與教民間爭訟事件，袒護教民，欺壓人民，以及藐視中國禮教之意。由此上諭看來，義和拳匪之亂，似可看做是一種取消不平等條約的運動。原來，外國租借中國的領土，保護天主教，都是由於外國與中國訂立了條約，根據條約而來的行為。因此等行為欺壓了中國，所以發生了義和拳匪之亂，若果如此，則義和拳匪之亂即是一種取消不平等條約的運動。

不過上諭所述，乃是朝廷列舉一切外國的罪狀，以為開戰之理由，即是一種宣傳，不能說此即發生義和拳匪之亂的原因，它只是作為一種口號列舉出來。我認為排斥基督教也和這同樣是一種口號。

取消不平等條約和打倒帝國主義，現在已經成了全中國的要求，引起了非常大的騷擾。其引起騷擾，究竟原因何在？只說它是取消不平等條約、打倒帝國主義的運動，難道這樣就完全說明了它一切真相么？我認為若不把它和多年來在某種程度上為人民所承認的國民黨政權，及以俄羅斯為背景的共產黨這個具有熱烈實行力的勢力，和易于附和、易于煽動的多數無知的群眾這個事實聯繫起來加以考慮，即不能予以充分的說明。然而為了結合這些勢力，必須向一般人民提出正當的理由，取消不平等條約、打倒帝國主義

等口号。

义和拳匪之乱所以能成为如此大的騷扰，我仍认为是因为地方官吏如山东巡撫、后調任山西巡撫的毓賢等，政府方面的端郡王、庆亲王、剛毅等人的政治势力，及具有旺盛狂热的实于精神的义和拳教門（它的教义好坏是另一問題）的教团势力，和具有易于煽动、易于随声附和精神的多数群众相結合的緣故。如果不考虑这种結合，我认为即不能充分說明发生如此大的騷扰的原因所在。

义和拳匪之乱以前的一切仇教騷扰，其本质是否为所謂的仇教，即排斥基督教？对此，不能沒有疑問。当然它那些运动还没有义和拳教門这样狂热的教团势力参加进去，同时，政府的权力亦未与之結合。然而在此等仇教騷扰中，讀書人即士紳階級借排斥基督教的名义，煽动群众的情况，則甚为普遍，所以才成为騷扰。但是，此等士紳并没有象义和拳教門的热情，他們把群众煽动起来之后，自己却在旁边冷眼观望，因此未酿成太大的騷扰。我想，这就是那些仇教騷扰所以未酿成如同义和拳匪之乱那样大的騷扰的原因。

但是现在我必须指出的是，认为义和拳匪之乱为最后一个，以后中国就不再有任何仇教騷扰的发生，对此应作何解釋？我认为这是因为，在义和拳匪之乱以前，中国对于基督教尚有表示其反对的强烈的精神力量，对于中国文化，或者說中国人对于中国文化尚有自信心这种精神力量。但是經過义和拳匪之乱，中国已失去那种精神力量，不得不认为中国文化业已灭亡，或者說，中国人对于中国文化已經沒有自信心，因此后来即未发生仇教騷扰。这就是把义和拳匪之乱看做是中国人对于不承认或破坏中国礼教和文化的基督教或基督教文化的最后一次自卫运动，这就是把义和拳

匪之亂看做是最后一次仇教騷擾，也就是以排斥基督教為目標的仇教騷擾中的最后一次，而且是最大一次仇教騷擾的看法。

義和拳匪之亂以後，誠然沒有再發生直接以排斥基督教為目標或名義的所謂仇教騷擾，但是却常常發生標榜排美、排英或排日一類的騷擾，特別是象現在這樣，發生了一系列的標榜取消不平等條約、打倒帝國主義等等的排外運動。從其引起全國性的非常大的騷擾看來，似乎不能簡單地說：當年的義和拳匪之亂因為是以排斥基督教為目標的運動，致釀成大亂。在當年的義和拳匪之亂中義和拳教門這種狂熱的宗教團體確實成為運動的中心，今日雖沒有義和拳教門一類的宗教團體，卻發生了這樣大的騷擾。由此看來，義和拳教門這個宗教團體即義和拳匪這種東西難道不是和中國騷擾的本質沒有關係了嗎？我認為這種看法恰好是和認為今日中國騷擾<sup>①</sup>的本質與共產黨無關的說法完全相同。我認為騷擾的精神始終在中國磅礴地存在着，這種精神只要一有了名義，只要一有了向人民呼喚的即是可以向人民提出的正當名義，便立刻會產生騷擾；它只要和政治上的權利，和義和拳匪或是共產黨一類的有熱烈的實行力的勢力結合起來，便會成為非常大的騷擾。因此，我認為義和拳匪之亂的本質恐怕在於中國社會本身經常存在着騷擾的精神。

（矢野仁一：《論義和拳匪之亂的真相》，日本《史學雜誌》第38卷，第9期，1927年，第821—832頁，傅仲燁譯。）

① 指北伐戰爭。——譯者



## 第十四章 辛亥革命

編者按：这里选录资料三十一篇，代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的资产阶级反动学者对辛亥革命的論断。

1911年10月10日由于武昌起义而爆发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这次革命的导火线是争取铁路路权問題。资产阶级是辛亥革命的主要领导者。农民是这次革命的主要动力。农民充实了革命部队，支援了部队的军事行动，他们迫切要求摆脱清政府的封建压迫，从地主那里获得土地，积极参加了武昌起义。工人阶级也参加了这次革命，川汉铁路筑路工人就举行了响应武昌起义的武装暴动。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继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是一个重大的胜利。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是一个軟弱的阶级，它提不出一个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綱領，它没有广泛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在广大农村中造成一个大的变动，消灭封建主义的根基。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缺乏認識，在革命发生后，还幻想帝国主义可能帮助中国革命，没有积极去触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革命以后，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袁世凱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利用资产阶级的弱点，以北洋军队为本錢，拿君主立宪派分子当工具，攫取了革命的全部果实。资产阶级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

外国资产阶级反动学者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对辛亥革命也同

样加以歪曲和誣蔑。他們一致否认辛亥革命是阶级斗争，是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說辛亥革命是在西方文化影响之下由于人口过剩等傳統的原因而激起的一个新的分裂运动。他們完全抹煞辛亥革命的积极意义，例如，馬士說：武昌的一次暴动突然酿成革命。在汉口和汉阳当地及周圍一帶有一些战斗，結果是革命党占优势。中国其他各主要城市的乱事也接踵而起，这个与其說是革命、无宁說是总罢工性质的运动，在华中和华南一致取得了胜利。賴德烈說：西方的影响使傳統的王朝循环成为不可能了。新思想输入了，孙中山和其他的人不仅要求推翻清朝統治，而且要求建立共和代替君主专制。又說：如果有合适的领导，清朝也許能保持它的地位。但是事实上新思想对旧体制的压力太強大了。中国从此脱离了儒家帝国的君主政体。費正清說：分析辛亥革命为什么不能按西方的道路建立新国家的原因是极有意义的。当时联合起来的各种成分，除了推翻清政府以外，沒有共同的目标。反对帝国主义沒有成为一种促进团结的共同意志，民族意志迟不发展。革命党人沒有取得城市或乡村群众的支持。也沒有取得士紳阶级的合作。又說：中华民国由西方借过来的宪政議會和內閣的政治組織观念不能与中国的政治傳統結合起来。它們甚至不能成为傳播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哲学的工具。在这个期間移植西方制度的努力反使中国上了当，这似乎是明显的。克萊德說：甲午战争以后，列強在政治上、經濟上努力控制中国，削弱了清朝的威信。因之，各省反对北京的铁路国有政策，终于导致辛亥革命。又說：“叛乱”的类型是一系列地方性的，而且大部分是不流血的“叛变”，看来是沒有配合的，而且沒有统一的领导。又說：“叛乱”从武昌这个中心迅速地蔓延开来，但一般說来，北方仍忠于清政府。費納克說：人口問

題，1911年糧食不足，災荒頻仍，為一個大規模的革命準備了條件。又說：在中國，每一個這一類的運動（指革命運動）後面都存在著人口問題，這問題是由於人口對於生存手段的壓力太大而發生的。經濟上的不安，使人民在心理上易於接受革命者的宣傳。學生階級的興起推動了革命宣傳。鐵路國有問題是導致革命的直接原因。克勞斯說：辛亥革命的主要動機是愛國，人們把一切失敗和災禍都歸之於滿洲人的統治。辛亥革命是在偶然的情況下發生的，革命是在歐洲思想的強烈影響下完成的。辛亥革命並不是人民起義，群眾沒有參加革命，鐵路國有化是“叛亂”爆發的原因。傅吾康說：辛亥革命既與歷史上的改朝換代不同，又不是一个新的分裂的開始。它結束了二千多年來的儒家的世界國家和儒教。愛斯嘉拉說：辛亥革命是由傳統的原因所激起的，即吏治腐敗、人民生活悲慘、叛亂、以及外國的壓迫。比倫說：辛亥革命破壞了傳統的帝王權威而代之以獨裁政治，它要建立立憲國家和代議制度的企圖完全失敗了。清朝復亡的第一個後果是喪失邊疆地區，並將很快地引起中國本部與滿洲的分裂。辛亥革命對中國是一個真正的禍害，它將沉重地影響中國將來的命運。內藤湖南說：辛亥革命是以漢人為中心發動起來的，今後將以漢人為本位建立新國家。辛亥革命的結果，引起了各族人民對漢族的反抗。稻葉君山說：辛亥革命是恢復國權的思想，它是因歐美對華行動的刺激而產生的近世思想。白柳秀湖說：1909年設立的諮議局是宣傳革命思想的公立機關。辛亥年四川省人民知悉鐵路收歸國有計劃，認為這就是政府奪取省民應享受的利益把它交給外國人，因而發生猛烈的反對運動。矢野仁一說：辛亥革命不是人民自覺的要求。它最初好像只是種族主義的革命，但後來發現這會失去滿洲、蒙古、新疆、西

藏等地人民的支持，于是又說这不是种族主义的革命。一場不足道的革命使清朝灭亡了。因之，尽管灭了清朝，也不能实现真正的共和政治。革命党利用铁路国有的風潮，在武昌发动了“叛乱”，并不是武昌人民欢迎革命党的結果。清朝早已失去了支配世界的資格，同时也丧失了支配中国的資格。清朝实际上已經是軟弱无力了。和田清說：張之洞死后，清政府全为碌碌无能的滿洲貴族所占据，威信扫地。至此，不得不变更祖宗遺法，倡議新政，以維人心。因此，一般人民以激烈为进步，反对新政为頑固，失去威信的朝廷，无力鎮压此种趋势了。1911年革命党乘机起义于武昌。中国革命是由孙文一人领导而起的。他起初只想改革清朝旧政，以求挽回积弱之國勢。甲午以后，始有志于兴汉灭滿，主張用武力革命，以达到改革的目的。

外国資產階級反动学者在历史研究中歪曲和誣蔑辛亥革命的目的是要反对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維護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旧中国的統治；并在辛亥革命以后进一步制造借口，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边疆，瓜分中国領土，作种种辯解。

## 一、道格拉斯：論辛亥革命

一切都順利进行，而且当看来好象一个真正的新生和发展的时代已經显露曙光的时候，在揚子江流域升起的一朵烏云忽然变成一时淹沒全国的大洪水。1911年10月10日汉口地方当局发现了一个反清朝的阴謀。汉口是位于揚子江与汉水汇合处的一个大商业城市，离揚子江口約六百英里。某些阴謀者在汉口被逮捕，

还有更多的人在武昌被逮捕。武昌是在揚子江右岸，面对汉口，拥有二十万左右的居民的一个有城垣的城市。有三个据說是領头人立刻被斬首。这不仅不能吓唬人反而激起他們的同情的憤怒，結果在武昌发生了一个群众暴动。几千暴徒忽然攻击总督衙門而毀坏之。总督逃到江中一炮舰上，乃得免于死。武昌有二万駐軍，他們的訓練和装备相当好，他們的軍官曾在日本受訓練，或为在华的日本軍官所訓練，且在极强烈的程度上吸收了革命的和爱国的思想，少年中国派的政策就是以这种革命的和爱国的思想为基础的。这些軍官和士兵（他們是中国最有效率的軍隊之一）叛变了，他們与叛乱的人一致行动，不仅完全占領了武昌，而且也占領了汉阳及該地的兵工厂。汉阳与汉口都位于揚子江北岸，但为汉水所隔。开始时的一个暴动接着发展成为一个严重的革命，革命在数星期里不仅蔓延到富饒的揚子江流域而且蔓延到全中国，从北方的直隶到南方的广东，从东方的山东到西方的四川。革命党人行动的迅速和一致，只可能是长久和仔細組織的結果。南方大城市如广州和福州都加入他們的事业；甚至滿洲省城奉天對他們的同情也是显明的，他們从武汉（揚子江三鎮的总称）大本营宣布成立一个“軍政府”，其目的是欲為他們的國家取得自由，而且作为达到这个目的的一个主要手段，他們要推翻清朝。对一切欧洲人，他們保证生命財產的絕對安全。他們声明欲忠誠地遵守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間的一切条約。他們維持这样的紀律，以致他們軍隊的行为能为任何軍隊的模范。

中国經常有很多的秘密會社，其中突出的是拥有三百万會員的哥老會。他們的活動在揚子江流域特別显著，据說在揚子江流域和广州有一百多个會社，五百万會員。所有这些會社的公开宣

布的目的是推翻滿人的統治，建立一個共和政體。它們的會員中包括許多太平天國叛黨的后代，這些人有的是在國內，有的是在國外，特別是在澳大利亞、暹羅和海峽殖民地。在海峽殖民地的人當中，有許多人已經獲得大量財富，但是他們從未放棄對滿洲征服者的仇恨和推翻清朝的願望。這些會社總是靜待着機會。它們的主要組織者是孫逸仙。孫是中國人，他一生大部分時間在國外度過，他幾年前因為倫敦中國使館欲架走他而在英國獲得相當大的聲名。這些會社最近十年來籌集資金并作種種準備，以便當機會來的時候能抓住它。1911年初在廣州和長沙都發生過騷動，接着在四川省爆發了一件更為嚴重的事件。這件事是由於諮議局反對中央政府鐵路國有化計劃而造成的。這一切運動都被鎮壓了，可是它們留下不滿的種子。當武昌的兵變發生時，領導人在人力和金錢方面都獲得秘密會社的大量支持，南方各大城市公開宣布加入他們的事業來表示更積極的同情。革命黨人既然有了充分的人力，暫時也有錢，又擁有由三位被公認在訓練、經驗和品格方面是中國最好的將領（黃興、黎元洪、王德新）所領導的訓練得相當好的軍隊，而且，除了京城附近數省外，獲得了全中國的支持，因此在幾星期裏就象半世紀以前經過三年戰爭以後的太平軍一樣可怕了。一般居民都效法以前一小部分人所樹立的榜樣，現在幾乎是一致地趕快剪去由來以久的辮子，來表示他們的同情。這個運動的結果之一是日本制帽工業的大大增長，日本工廠日夜工作，以應付中國忽然發生的對於新式帽子的需要。

清政府從一開始就認識到革命運動的嚴重性。軍隊一經組成就立刻被派往漢口。但是，因為中國人在鐵路運輸上經驗很少，他們抵達行動地點太慢。他們只能把革命黨人驅逐出漢口和漢陽。

可是，叛乱者因这个挫折而失去的威信，由于几乎在同时占领南京而恢复。南京是中国的旧都，由一支满洲驻军防守。政府的焦虑，可以由它恳求袁世凯出山来协助得到证明。三年前，他们曾用一切冷酷的手段把袁赶走。

(道格拉斯：《欧洲与远东》，第438—441页，孙瑞芹译，吕浦校。)

## 二、琼斯：论辛亥革命

1908年，不幸的光绪死了，慈禧自己接着也死了。这个非凡的妇女保持了皇朝四十余年。她死后，皇朝迅速地崩溃了。宝座传给一个婴孩——溥仪，宣统皇帝，即满洲国目前名义上的统治者。摄政王(醇亲王)缺乏慈禧的聪明。她曾以废除禁止满、汉族通婚的法令及改变满族族人的特殊地位的办法来消除满、汉之间的隔膜。醇亲王将这项政策的极大部分推翻了，同时，他周围的人是一群贪污的满洲贵族。协助皇朝克服义和团危机的一群中国的能干官员中，李鸿章死于1901年，刘坤一死于1902年，张之洞死于1909年。袁世凯仍在，但是他的忠诚被破坏。醇亲王回忆袁世凯曾怎样对待光绪而把袁免职，这就疏远了袁世凯(他是近代化的北洋军队的领袖)，并且使摄政王没有真正能干的属员。

满清亲王们及属员的贪得无厌激起了群众的敌视而有利于革命党人，特别因为实际上对实现财政改革的诺言一无作为。旧日的流弊仍旧不改，而且政府的改革经常从未超出于纸上阶段。进步措施是断续无常的、不平衡的，这就足够动摇人心，而使反动派

反对政府，但不足以满足急进分子。1909年成立了一个财政整理委员会，但是因为各省官员与绅士坚决反对足以增加北京在各省的权力并剥夺各省支用税款或筹资兴办铁路及其他事业之权的任何改革，它不能有什么作为。

摄政王为贪婪的廷臣所包围，又为省自治的顽固精神所阻挠，只能有限度地依靠从外国回来的留学生。在这些留学生中，虽然有些属于康有为和梁启超所领导的君主立宪团体，但是比较多的人受到孙逸仙的影响，因此，他们是共和主义的使徒。孙逸仙于1905年在东京创立了同盟会，一个誓死欲推翻满清帝国的革命团体。当他在欧美旅行期间，孙逸仙逐渐发展了他后来以“三民主义”出名的主义。他的纲领包括推翻满人、建立民国、使中国摆脱外国人的控制及平均地权。他受到儒家理想、对于太平天国的回忆及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鼓舞；而且诉诸为地主和官员所压迫的群众及新爱国主义所激动的知识分子。孙逸仙在三个不同的方面毁灭了满人的政权。他把富裕的华侨（主要是他们出钱来支持他的运动）拉到他这方面；他用报纸向在外人管理的通商口岸租界中的中国人（他们不受满人管辖）传播革命思想。同时，他同秘密会社，特别是三点会和哥老会，取得联系。它们在中国到处都有会员，尤其在扬子江以南特别强大。孙逸仙以强调满人是异族及宣传他们的统治是中国必须摆脱的一种外族统治的办法来把方兴的民族主义运动的矛头转向他们。

.....

英国同中国合作设法扑灭烟毒。1906年下议院通过了一项反对印度鸦片贸易的议案。中国得此鼓励，向英国政府提出每年减少印度鸦片输出的建议，同时中国将取缔本国种植罂粟。根据这



些建議于1908年年初簽訂了一項協定，清政府得到一個強大輿論的支持，儘管既得利益集團竭力反對，但仍然使得罌粟的種植有了顯著的減少。1911年，英國又進一步同意每年減少印度對華鴉片貿易，至1917年為止；在同一時期內，中國也限制本國的鴉片生產。1912年1月在海牙簽訂了一項國際協定，禁止私運鴉片及其他毒品到中國。印度鴉片貿易于1917年後即行停止，但中國革命後的騷擾，使清政府取得了相當成功的一切禁煙工作前功盡棄。

禁煙政策增加了清政府的財政困難。政府不能支付它的經常費用，更談不到有錢來實現遠大的改革計劃。它的唯一可靠的稅源——關稅，為條約規定所限制，不能征收超出于百分之五的進口稅，而且關稅已經為支付對日本賠款而借的外債的償還及庚子賠款每年的分期付款而作了抵押。因此迫切需要借一筆外債，但是，因為中國的信用低，如果沒有關於外人監督的規定（如在擬議的幣制改革中及新鐵路的管理中聘用外國顧問，以及以外人管理作為借款擔保的新稅源）來作為擔保，則外國銀行家不肯貸款。列強的相互猜忌是拖延對中國作任何借款的另一個因素。但是1911年5月清政府與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締結了湖廣鐵路借款合同。在各省籌款興建鐵路的嘗試提供了侵吞公款及浪費的機會，因此新鐵路綫將為國家所有。這點激起了各省紳士和官員暴風雨般的反對，並且在四川爆發了叛亂。當煩惱的政府正在準備處理這件事的時候，漢口俄國租界于10月9日發生的炸彈爆炸事件揭露了在該地及武昌漢陽有一個廣泛的陰謀。次日革命黨人起來叛亂，許多軍隊參加進來，結果，三鎮落入他們手中。

革命以驚人的速度蔓延到揚子江下游及整個華南。在西北，西安被占，在該地滿人遭到了可怕的屠殺。慌慌失措的清政府懸

求袁世凱出山鎮壓革命，但是，他拒絕出山，除非被賦予全權并任命为內閣總理，因为他知道他的有訓練的軍隊能決定大局，他看到他可能成为中國唯我獨尊的一個人的機會。所以，他与叛亂者進行談判，也与列強進行談判，并且最后誘使攝政王辭職。袁的目的是一個立憲的帝制，他自己为嬰兒皇帝的攝政者，但是革命黨人堅持建立一個共和國。他們在南京成立一個臨時政府，且舉孫逸仙为總統，孫与袁都認識到，如果中國發生一個持久的戰爭，就有外國干涉的危險。日本亟欲干涉，表面上是为了支持帝制，但是，它为英國所遏制。英國贊成袁世凱，并且准备承認一個共和政体的政府。在這種情況下，孫逸仙宣布，如果袁能使滿清皇帝退位并附屬共和國，他将辭總統職以让位于袁。袁同意了，并依靠北方軍隊的支持，执行了这个計劃，滿清親王們无法反对他。1912年2月12日，嬰兒皇帝宣統退位，虽然他被允許有皇帝的虛号及在紫禁城內有一个“宮廷”。这样，不仅滿清皇朝崩潰了，而且在中国持續了二十一个世紀之久的帝國机构也崩潰了。

（琼斯：《中國》第2卷，第144—146頁，147—149頁，  
孫瑞芹譯，呂浦校。）

### 三、馬士：論辛亥革命

資政院第二次會議定于1911年10月舉行。在那月11日，武昌的一次暴動突然釀成爲革命。在漢口和漢陽當地及周圍一帶有一些戰鬥，結果是革命黨占優勢。中國其他各主要城市的亂事也接踵而起，這個與其說是革命、毋寧說是總罷工性質的運動，在華

中和华南一致取得了胜利。袁世凯现在奉召出山。朝廷给以最大的权力，以作保全朝代的万一之想。他控制着北方各省，甚至能够以武力收复汉口和汉阳；但是中国南部的革命党一致坚决的态度和清廷及贵族的优柔寡断与保守主义，结果使他已经开始的保全王朝作为一个君主立宪的元首的工作，成为泡影。康有为的信徒都被撤弃，孙中山的党人肩负起革命的责任；1912年2月12日皇帝退位，朝廷撤往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时曾经作过避难城的热河。

(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471—472頁。)

#### 四、宓亨利：論辛亥革命

1911年革命爆发以前的十五年中，孙逸仙在中国、印度支那、日本、夏威夷、美国和欧洲策划推翻满清，建立一个共和国。这年12月，孙当选为中国临时政府总统，他立刻从伦敦回国就职。在他抵达前，已经成立协议，规定他不久应辞职，由华北的守旧派有力人物袁世凯继任。

袁世凯曾在义和团叛乱时显过身手，因而使西方各国政府颇有好感地注意到他，但是同时在中国国内也为他造成了非难。慈禧太后死后，他受命为太子太保<sup>①</sup>，可是不久就失去权势，只有在中部各省的革命党已经显然难于控制的时候，他才受召回到北京。他对皇室忠诚到什么程度，是一件可以辩论的问题；至少有几个月

<sup>①</sup> 按太子太保为虚衔，袁世凯加这个虚衔是“道诏恩”的例行公事，不值一提。——译者

功夫，他好象是为滿人保持帝位，可是最后他还是放手不管，童年的皇帝也就宣告退位了。当时大家已經商量好，孙逸仙应当辞职，让位給袁世凱。这两个人物是 1916 年夏袁去世以前中国舞台上两个敌对的主要角色。現在他們两个虽然都已死了，但是他們所代表的局面、理論和思想，直到今天还构成斗争的原因之一。

1912 年 2 月 15 日，清帝退位后的第三日，袁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就結束了共和革命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迅速地开始。孙不久对袁的民主共和原則失去了任何可能有的幻想。1913 年夏他和他的革命党（国民党）卷入一次反对在北京的大总统的叛乱。这次叛乱沒有遇到什么困难就被压平了。有几个国民党領袖被当作卖国賊而加以放逐，可是国民党本身却躲过了法律上的譴責，而且繼續努力成立責任內閣。1913 年 11 月 4 日，袁世凱在国会选举他为实任的国家元首以后不到一个月，把国民党从国会中驅逐出去，国会因此不足法定人数，两个月之后就被解散了。尽管人們在抗議陰謀活动，袁仍然掌握大权。1915 年的一次成立立宪帝制并把袁拥上帝位的嘗試失敗了。这位总统终于在第二年的 6 月死去。

（密亨利：《近代远东国际关系史》，第 293—294 頁，  
孙瑞芹譯。）

## 五、賴德烈：論清政府的統治 与辛亥革命

在这里只需要把历史的基本情况作一个簡略的叙述就够了。象我們屢次所見到的，清朝自十八世紀末叶以来就已衰微；它的崩

潰很可能是由于慈禧的领导及有些能干汉人的忠诚而推迟。到了1901年，它的寿命差不多是已到尽头了。义和团的失败使它丧尽面子。光绪皇帝无能而且实际上是一个俘虏，皇位继承者的父亲是义和团最热忱支持者之一，而继承者自己是一个品貌不佳的浪子。1900年以后的新继承者是一个婴儿。

清室于1900年后企图改组政府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在行政机构中，从中央各部到行省的官制，作了重要的改革。对于新法典有了一个开端。旧有的文官科举制度取消了。代替它的是以中西课题为基础的一种新考试制度；凡欲入仕途的人必须经过这个考试。财政改革正在计划。陆军改组也在计划，而且一部分已经执行，在北方，特别是由袁世凯进行的。被派往欧美的一个考察团研究各国的政体。皇室答应给人民一部宪法，而且已采取步骤实行以民众为基础的一个代议制。諮議局、資政院先后于1909年、1910年相继召集。

如果有更合适的领导，清朝也许会做出所需要的安排而能保持它的地位。但是，事实是，新思想对旧体制来说是太强大了。皇太后于1908年11月15日去世；光绪皇帝比她先死。由于慈禧的死，皇室失掉一个最能干的人物。继承皇位者是一个婴儿。摄政王没有时代所需要的魄力和才干。在这种情况下之下，皇朝是不难被推翻的。

推翻清室的革命于1911年10月爆发于武汉。10月10日现在是纪念日。在这以前，在扬子江流域，特别在四川，为了一笔修建华南、华中及华西铁路的外债及随之而来的拟将铁路行政权更集中于北京的问题，发生了不安情况。到了1911年9月底，一个活跃的叛变在四川掀起来了。在汉口的一个意外事件，使一次更

广泛的起事未經成熟便爆发了。在武昌的軍隊，叛变后迫使他們的长官黎元洪为他們新运动的领导人。一个共和国宣布成立了。武汉三鎮迅速地落在起义者手中。武汉的起义来得这样出人意料之外，就是最热忱的反帝制的人也感到惊奇。

北京召回袁世凱协助它。袁于新統治开始后不久被免职，很可能因为他于 1898 年出卖摄政王的兄长，即先帝光緒。作为国内一支最强大軍隊的創立人，他似乎是不可缺的。他慎重其事地回答了慌張的求援召喚，而且只按他自己的条件才来的。如果他迅速行动，他也許能镇压了叛变。但是，事实是，他迁延了时日，结果是，虽然汉口于 10 月底被官軍收复，其間已有相当长的時間使革命获得进展。10、11 两月間各大城市和各省相继摆脱滿人的羈絆而成立独立政府。唯一有重要性的战事是在武汉（武昌、汉口及汉阳）和南京。有几处束手无策的滿洲駐防軍遭到屠杀。北京所做的让步毫无效果。在年底前，一个代表革命党人的临时參議会在南京召开（12 月 28 日），选举孙逸仙为民国总统。孙在革命爆发时在欧洲，但是最近在受到盛大欢迎中回到中国。

孙抵达前，袁与革命党人之間已开始談判。双方聪明的人努力挽救国家，以免发生进一步损伤元气的內战。部分是通过威胁，袁成功地說服宮廷明白大势已去；1912 年 2 月 12 日北京以年輕皇帝名义頒布上諭。在上諭中清室接受它的命运。宣統退位，袁受命組織共和国。共和党人同意，皇帝将終身保持他的尊号，每年受到一笔大的津貼，保持他的私有財產及一座宮殿的使用，光緒的墓由公家出資完成。允許滿、回、蒙及藏人与汉人一律平等，他們的各種称号与財產也都得到保障，为了保证和平，孙于几日內辞去总统职。在南京的共和国議会选袁代之。由于参加革命而已成为

一个民族英雄的黎元洪被选为副总统。清朝以极少的流血走过了它的前朝的道路。外表上统一的国家开始从事一个具有共和国形式的危险的实验。

(赖德烈：《中国人：他们的历史和文化》，第425—427页，孙瑞芹译。)

## 六、赖德烈：论西方的影响与辛亥革命

西方通过各种不同的方法向着中国渗入。在1910年和1911年前半年，除了外表上科举已成过去和教育与政府内部开始变动以外，中国文明的傳統结构本质上是原封未动。但是，西方仍旧在进迫着，一方面直接地，另一方面通过日本所代表的那种文化。天主教和基督教传教士和比较少的俄国正教传教士继续渗入中国。庚子年的严重挫折被证明只是暂时的。1911年基督教徒的人数，在每二百人中只占一个；这比十年前已增加了一倍。他们在中国本部各省和满洲都有。天主教比基督教开始工作早二百多年，所以他们的教徒仍超过基督教徒，但是后者在比例上正追上他们。传教士也已增加了，因为英伦三岛、欧洲大陆和北美洲的教会从壁垒的崩溃中看到一个机会和挑战。商业在增长。从1898年到1904的六年里，尽管经过义和团时期的中断，中国对外贸易的货币价值增长了大约一半。在贸易上，英国保持着领先地位，但是，这个地位为德国和日本贸易迅的速增长所威胁。日本轮船在扬子江和它的支流上开始成为英国轮船的劲敌。外国金融企业仍视中国为投资领域，而且继续认为铁路是有利可图的。一个英、法、德银

行团接洽了一笔发展华中铁路的借款。美国坚持应该让美国银行家加入。1911年它成功了，因此三国借款成为一个四国组合。这个借款有助于促进推翻满人统治的革命，而儒家式的帝制也完了。

慈禧的死使王朝丧失了最后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此后，大局迅速地陷入一个危机，象我们暗示那样。清朝显然在接近着它的末日。什么将要发生，绝不是那样清楚。如果不是由于西方的进入所引起的纠纷，很可能，大局的发展会符合于传统的方式。象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提醒我们自己那样，那个方式是相当一致的。为了了解它被废除以后所发生的事，我们必须再一次作个简述。每当一个朝代衰落，帝国为灾祸所侵袭的时候，认为在位的皇室已经丧失了天命的一种可以称为公论的信念，就广泛地传播开来。灾祸可能是自然的，如洪水和大旱，它们也可能是人为的，和显然由于行政腐败或缺乏效率。它们可能因为人口的增加而加剧了，这是早先在皇朝有才能的创业者励精图治下的升平岁月中所滋生的。土地现在不能再肩负养活增加的人口的担子，不安将增长。有野心的人会乘机作乱，每个人均企图代替统治的皇室而建立一个新时代。骚动和内战——有时是短的，有时拖得很长——将接着而来。间或有一个朝代会表现出意想不到的力量而获得新生命。这在汉朝中叶和唐朝倾复之前的一个半世纪都曾发生过。象我们所看到的，清朝曾经在十九世纪的第三个二十五年里得到一个“缓刑”的时间。但是，早晚竞争人中有一个会打胜他的敌人，包括现存的王朝在内，取得王座，并产生这样强的一个政府，使他的家庭能够继承几代。新朝代会改变和增加它从他前代所承继来的，但自公元二三百年来，即汉朝替代了短命而革命的秦朝以后，没有作过基本的或剧烈的变动。早在二十世纪前一个十年代里清朝的



軟弱就已經為眾所共見。人口增加了，惡政和軟弱到處盛行，無能和驕奢自私在那些曾經一度稱雄的滿洲征服者中間已成一般風氣。帝國一再在對外戰爭中遭到失敗。它的得免于瓜分和失去獨立不是由於王朝的力量，或它的外交技巧，而是由於列強間的猜忌和競爭。

但是，西方勢力的來臨使傳統方式的重演成為不可能了。新思想已經進來了。孫逸仙和其他人要求不僅推翻滿人，而且要以一個共和國代替帝制。這些是用各種方法來鼓吹的。希望保持帝制的溫和分子，堅持把已經答應了的仿行西方憲政體制貫徹下去，因此歷代相沿的制度的傳統持續，即使在繼滿清之後另立新朝的時候，也是不可能的。此外，各外國的存在也必須估計在內。

慈禧逝世時，清朝已經搖搖欲墜接近復亡，但並不是按照它的前代的方式。1907年所規劃的各省諮議局於1909年10月初次召開。在某一曾是保守中心的省份里，諮議局的房舍是一座簡陋的西式建築，立在本來是一排一排考棚、舊日舉行科舉考試的貢院原址上。它是一個變革的象徵。新的事物，只是被部分地理解，並且沒有保證可以久存的事物，已在曾經是舊秩序堅強據點的地方建立起來了。各省諮議局要求國會於兩年內召開而不必在原定的1917年。這個要求被拒絕了，但是資政院於1910年10月在北京首次集會，並要求從速召開國會時，攝政王仍作了讓步，答應把日期提前到1913年。這個讓步沒有滿足迫不及待的資政院。後者堅持應立刻召集國會，而且按照西方類似機構的方式，內閣，應該象西方君主立憲國家中的內閣一樣向它負責。

反對現存政權所引起的不安由於與外債有關係的行動而增長了。北京中央政府深信由各省出資來建築鐵路太慢且缺乏效率，

但如果所有的綫路在一个統一的、互相配合的基础上兴建和管理，則將更有利于国家。因此，它决定将铁路国有化，并首先对以四川省成都为起点的計劃綫和省公司已經开始兴建的接連揚子江南岸汉口对面的武昌同广州的綫实行这个方案。北京拟利用1911年春四国銀行团借款为建筑后一条铁路之用。地方上的反对迅速发展起来。这是部分由于傳統的地方主义，和反对中央政府擴張它的权力。它也是因为已經投資于铁路的当地富裕的人害怕会丧失所投入的金錢。欲推翻王朝的革命团体利用了这个机会。他們策划了起义。广州的一次起义立刻被粉碎。另一个在四川发生。具有战略意义的一次起义爆发于湖北省城武昌，它同两个姊妹城市汉口和汉阳共同組成武汉——中国本部中心的主要工业集中点和揚子江流域的樞紐。

武昌的叛变是在1911年10月10日晚間发生的，后来共和国称它双十节，并且紀念它作为民国的生日。它采取由一部分政府軍队向总督衙門攻击的方式。总督即刻逃走。起义者們說服了一位协統黎元洪作他們的首領。他們对他說：如不应允就要他性命，让他自己选择。他虽然不情願，也終於順从，出来指揮軍队。他們公布了一个告示，声明他們的目的是推翻滿人，和“光复汉族”即中国人“的权利”。他們也表示保护外人和基督教堂的目的，这样企图避免列强可能的任何干涉。武昌、汉阳和汉口四日內完全落在自称为民軍的手中。不久民軍直截了当地表示贊成一个共和国。

大局究竟如何一时还不分明。的确，双十日后一月里，南方大部分地区与革命党同命运，北方有些中心地点采取了同样立場，几个城市和省份宣布中立。重要商埠上海投入了革命且树立了一

个革命政权。許多城市中的滿人被屠杀。在那些地方的滿人理論上是保证在十七世紀时所造成的征服能够永久持續的駐防軍。在時間的过程中，从軍事上看来，他們已成为无用，只是靠政府的錢坐食而已。在大多数地方，他們沒有被饒恕；成千的男、女、小孩被屠杀；他們的财产被劫。滿人在恐慌中沮丧地請求不久前为他們免职的袁世凱出来协助。他以旧病——他革职时的表面理由——未愈为詞延迟出山，当他答应的时候，就像不久以后他所做的那样，那是完全依照他提出的条件。他統率国内最好的軍隊，其中大部分都是在他指揮之下訓練的。在袁复职前，軍隊已向叛乱中心的武汉三鎮移动。汉口从革命党人手中克复；不久汉阳也被收复。皇帝的顧問們也赶紧答应实行君主立宪的要求。贊成了一个文件的大綱，这文件虽然宣布皇朝的大統似应繼續，但規定了一个两院制的国会，一位由国会选举并向国会負責的总理，以及皇族中的成員不得充任总理和許多其他高位。袁世凱被皇帝提名为第一任內閣总理大臣，并奉命組織新政权。他接受了这一任务，在他的軍隊的支持下，看来他或者至少能够为改組过的帝制保住国家的一部分。列强拒絕給予任何一方以財政援助。12月初南京被国民党軍隊攻下，这个南方故都从而落于他們手中。几日后簽訂了休战协定。在这件事中黎元洪代表南方国民党軍隊。双方在上海召开了和平會議。

当和議在上海举行的时候，革命党人各派在南京开会，通过了一个民国宪法。1911年12月24日，在国外的孙逸仙抵达上海，五日后，几乎以全体一致的票当选为临时大總統。国民党軍隊总司令黎元洪当选为副總統。1912年1月1日孙抵南京宣誓推翻滿人，建立一个以民意为基础政府。然后再辞职让中国人民选他

們自己的總統。作为拒絕滿人統治的表示，拥护民国的人剪去他們的辮子——滿人加諸中国人的一种蓄发的方式。他們的軍隊強逼在他們管轄地区的人也都照样剪辮。

进一步的流血似乎已經避免了。國家的統一似乎已有保证，在2月初，太后（摄政王已于几星期前被迫退隱）頒布一道上諭，宣布王朝将于适当的保障下退位。并派袁世凱同民軍談判細則。袁遵从了。1912年2月12日正式退位式举行了。溥仪得保持皇帝的称号和北京皇宮的使用，且答应他一笔充分的退位金。清朝皇陵将受到保护，光緒皇帝的陵寢由国家完成。滿洲貴族仍保持他們的称号，至少有一段时间，滿洲軍隊即所謂八旗兵弁，仍将得到他們原有的薪餉。滿人与汉人平等（同为民国的公民）。中华民国宣布（汉、滿、蒙、回、藏）五族共和，孙中山抗議說，清朝沒有建立民国或为国家决定政体的权利，且坚持这只能由中国的人民来做。但是，为保证团结和国内的和平，他辞去临时大總統职位，并劝誘南京的參議院选举袁世凱代他。这样，中国开始了对它來說是一个从未經歷过的民国的試驗。

比民国的試驗更有意义的是君主政体的放棄。那个政体是中国自历史黎明时期以来就存在的，在公元三世紀以前，自汉朝早期以来，中国在理論上为儒家原則所統治。正統的儒家學說认为，除了与汉朝在同一世紀內的秦朝的短短插曲外，儒教自尧舜禹以来就是治国的基础，象我們所見，至少已經有二千多年，儒教构成中国文化的基础、它的最突出的特点和保持它的紐帶。儒教原則在决定行为準則上，在指导的政治理論的制定和保持上，以及支配那个主要社会单位家庭上都是首要的因素。現在不到十年里維持儒教的两个主要方法——科举和帝制被廢除了。随着它們的消失，儒教

也許要被致命地削弱。維持和恢復它的努力不是沒有的。一個時期，在它之下訓練出來的儒士保持了孔廟中傳統的儀式。孔廟是每個城市，甚至有些新式學校中常見的標志。如我們不久所見到，在下一年代中有兩次復辟的企圖，第一次是袁世凱干的，第二次的目的是欲恢復滿人的統治。但兩者均是短命的。在那個短短時間里中國已脫離了儒教的君主政體太遠了，而不容許它再復活，直到二十世紀中期共產主義勝利為止，到處有使民國支持儒教的努力。日本人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企圖在滿洲樹立一個傀儡國家時作了一個類似的嘗試。由於有一種有時被稱為“社會的落后性”的東西，儒家有堅持民族的習慣和道德標準的趨勢。深受儒教思想影響並且包含它的大部分看法的家庭，是又一個支柱。可是不管好壞，儒教在中國人的生活中是一個日益衰落的因素。隨着它的雕謝，一種意識形態的真空就出現了。怎樣去填補它呢？用基督教，用西方的自由人文主義，用赤裸裸的唯物主義，還是用民族主義？用一種這一切主義的不合邏輯但是可能的混合物嗎？或者是會有其他的意識形態？象我們所見到的，在1912年還沒有出現在地平綫上的共產主義，眼前似乎是成功了。可是這只是這場巨大的革命的一個階段，中國人已經卷入里面去了，最後的結果怎樣是沒有人能夠說得出的。

（賴德烈：《中國近代史》，第109—117頁，孫瑞芹譯。）

## 七、費正清：論辛亥革命

1911年4月廣州的一次革命企圖，隨着著名的七十二烈士的

殉難而被鎮壓下去。這是孫逸仙第十次的失敗。下一次的陰謀於1911年10月在漢口發動。陰謀由於一枚炸彈在革命黨人的貨棧中爆發而無意地被發現。這促使10月10日的起義提前出現。從此這個日子就被人們慶祝為民國的誕辰。

孫逸仙在這個期間正在美國旅行籌款。他接到了關於陰謀的一封信，但因為他已把密碼本先行寄出，結果他直等到二星期後才能譯出電報。他在一張報紙上讀到中國革命已為孫逸仙所發動，而且他將是中華民國的第一任總統的消息。

隨着普遍的、特別是四川的不穩定而來的10月10日的起事，是其他各省同樣起義的信號。華南華中各大中心地區的革命集團在幾日內均宣布他們的省脫離北京的滿清皇朝而獨立，這個反滿運動一旦發動就風靡全國，而且比較地沒有流血。可是革命黨人最後推翻皇朝的輕易成功是靠不住的，因為參加運動的各集團和階級不久就證明是除了反滿之處，很少有共同之處的。

孫逸仙的主要支援來自海外華僑中的新興的商人階級及國內的部分新學生和軍官階層。他的運動與國內另一個運動聯合起來。這個運動想在經濟發展上追求各省自主。在這個問題上，各省的領導的地主紳士和商界業已聯合，在滿清中央政府打算自上而下地實行改良的時候，起來反對這種為時已晚的努力。這種地方自治和帝制中央集權對立的整個問題，就在各省的諮議局和北京的資政院中提出來。這問題又因為關於發展鐵路，特別是籌集資金修建經過漢口通向四川的鐵路的爭執而尖銳化了。在這個鐵路問題上，各省領袖在公開言論上一致反對北京鐵路借款合同中所包含的外人控制的因素。實際上他們是因為中央政府的官吏們將在這些新發展上占去主要利潤的前景而不免妒忌。

因此，1911年的革命不仅代表孙逸仙和他的同人所提供的革命领导而已。衡以同样的尺度，孙虽然是革命的名义领导者，可是他对于革命背后力量的控制却是比较小的。1912年1月1日他在南京就民国临时大总统之职，但是经过种种考虑后，他决定于几周内下台让位给袁世凯，以使袁能成一个更适于接替满清皇帝地位的强有力的行政首脑。在这一点上，袁是华北新军的领袖，而且是在1911年12月清摄政王辞职的时候被召管理北京政府。从这里开始，袁能加强他的地位，成为有可能整顿国内秩序的唯一人物。他同孙谈判，但运用了拖延策略。

同时，时间是有益于袁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日益明白中国继续分裂只能招致外国侵略。由英国带头的各商业国家鼓动中国国内和平，因为他们怕与中国国境毗邻的日本和俄国可能干涉。革命党人自己知道这个危险，因而设法从袁方面取得保障民国的诺言。

北京的袁和南京的孙之间的谈判，不久达成了协议。1912年2月12日清帝正式逊位于中华民国临时总统袁世凯。在这个新职位上，袁须按照新宪法的规定，与一个国会和一个对国会负责的內閣进行工作。

这样，中华民国没有能解决它所面临的根本制度问题而成立起来以接替大清皇朝。临时大总统是一个代表中国政治中老派作风的一个军事领袖，一个能够为他的政权负起个人责任的强者。他不久就醉心于称帝的思想。与他结合在一起的是一个有国会和內閣的新式体制。这些机关据说是按照西方民主国家的样子代表了民意。可是这些新制度，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还很缺乏基础。

例如政党的观念，就是和皇帝通过他的官僚垄断政治组织来统治，而反对团体只能变成秘密会党才能存在的传统相反的。不

仅党綱作为一种团体組織的原則，对于个人領導是一种新的選擇；內閣向国会負責这观念本身就又是一种變則，因为閣員們同时又面对着大臣們須向国家元首效忠的儒家傳統。各省代表地主利益的旧式人物不习惯于参加解决国家問題，而通商口岸的新商人階級还不够强大足以支配社会，孙逸仙所領導的真正有近代意識的革命党人在中国群众中只构成极小部分。

袁作为元首稳步地巩固了他的地位。他把自己的私人拉入內閣，不顾宪法的精神，攻击并排斥孙逸仙的新政党，国民党（同盟会的继承者），且最后解散全部国会。在他的追隨者的策动下，他于1915年設法自立为皇帝，受到革命党人的反对阻撓后，放棄計劃，于1916年6月死了。他死后中国分裂为軍閥割据，且自1916年到1928年的十年期間受到分裂的危害，虽然北京政府繼續得到国际上的承认。

对于研究近代中国的学者來說，分析1911年的革命为什么不能按西方的道路建立新国家的原因是极有意义的。象已經說过的，起事当时联合起来的各種成分，除了推翻滿人以外沒有共同的目标。反对帝国主义还没有能成为一种促进团結的共同意志而广泛傳布，也沒有用它来作为一种动力。这事实无疑地說明一个更基本的因素，民族意識的迟迟不发展。而且革命党人在他們秘密策划中不能，而且也很少設法在城市和乡村里动员群众和爭取他們的支持。与革命党人曾經合作以抗北京的保守紳士階級在心中是反对革命的。他們欣然地承认袁能投入战場的优势的武装力量。此外，所有爱国的中国人在这个时候都怕外国的积极干涉。作为代替日本軍队进入北京的办法，他們倾向于默认支持袁世凱的由英国人带头并联合其他列强共同支持袁以稳定局势的努力。1913



年二千五百万英镑的善后借款(美国没有参加)表明了列强坚决支持当时袁所体现的稳定局面。

对于这种国外财政和国内武力的结合,孙逸仙不能有所作为。中华民国由西方借过来的宪政议会和内阁的政治组织观念不能与中国的政治传统结合起来。它们甚至不能成为传播孙博士三民主义革命哲学的一种有用工具。在这个期间移植西方制度的努力反使中国上了当,这似乎是明显的。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157—161页,孙瑞芹译。)

## 八、克萊德:論辛亥革命的背景

清朝的灭亡和袁世凯以中华民国总统的新的权力地位而兴起,不是完全由于袁在国内享有政治和军事的优势。民国和袁在其中的领导地位部分地是列强所造成的。从1908年起,甚至再早些,满清朝代的命运就取决于它的防止中国的政治、社会结构进一步崩溃、阻挡外国的追逐特权者及预防列强最后瓜分中国的能力。在1908至1912年间的那些危急的年头里,列强个别地及集体地均不能支持帝国政府的这些目的。事实上,列强在政治上及经济上努力控制中国的竞争削弱了所留下来给清朝的一点点威信而因此使各省反对北京的铁路国有政策。再者,英、俄、日等国都不赞成北京为西藏、蒙古、满洲等边疆地区所计划的改革(这些改革的目的是最后欲使这些地区进入一个统一的中国)。从1911年10月武昌叛乱到1912年2月12日的退位上谕为止,列强没有采取

任何措施來阻止清室政權的崩潰。相反地，它們却協助袁世凱實現其成為新共和國元首的野心。由於列強的強權利益及所承擔的義務的矛盾，袁世凱能在與南方共和黨人結束談判並升為總統以前依仗列強外交的和金融的支持。總而言之：

“列強肯允許袁世凱領導下的一個共和國存在，因為它們能同他討價還價，以政治上的承認及外國借款作為交換條件來承認現狀；這樣一個安排將不會有損於自主的西藏、新疆及外蒙，也不會有損於俄國和日本在滿洲的特殊地位，也不會有損於銀行團在中國財政的控制計劃。”

（克萊德：《遠東》，第365—366頁，孫瑞芹譯，呂浦校。）

## 九、克萊德：論金圓外交與 辛亥革命的興起

滿清朝代的崩潰，部分地是由於列強的默認。同樣，一個穩定的共和國的希望，大部分將要取決於列強的外交政策和財政政策。1912年的中國新共和國政府是“既沒有錢，而且它沒有支付的債務正日益增長。”中國欲求外國的財政援助是不可避免的，但這種援助同外國的政治控制分不開。應當回憶，1911年的革命是對1894—1895年中日戰爭以後外國在華爭奪特權（這種對於特權的爭奪其後日益加劇，直至革命爆發為止）的一種反應和抗議。其實，各國在政治和財政上的競爭是這樣大，以致它們自己開始贊成通過一個被稱為銀行團的國際銀行代理處來聯合向中國提供某些類

型的借款。这个代理处是由各国政府所指定的銀行家团体所組成的。这样,通过銀行团所提供的借款将受双重考驗;在經濟上能为銀行家所接受,在政治上能为列强所接受。銀行团在它 1909 年的萌芽阶段只包括英、法、德三国的銀行集团,它們当时正在提議为中国政府出資建筑联结华中和华南的湖广铁路。

湖广铁路計劃由汉口向南到广州,并由汉口向西进入四川。但是,当 1909 年春英、法、德三国銀团簽訂建筑这几条綫路的合同的时候,它們首先遭到美国的外交反对,后来又遭到俄国和日本的外交反对。早在 1898 年,代表美国利益的合兴公司从中国政府方面取得了建筑一条从汉口到广州的铁路的合同。后来,在 1904 年及 1905 年,中国、英国及法国政府承认美国資本有参加为建筑汉口至成都的另一条铁路而提供借款之权,但直至 1909 年“沒有任何美国金融企业曾表示过参加借款的願望”。但是,虽然美国金融家沒有表示要追求美国所取得的这些早期的特权或与欧洲在华的资本家相竞争,塔夫脫政府为了崇高政策的目的,决定他們应积极地参与这些活动。由于国务院的主动,以摩根公司为首的一个美国銀行团組成了,当这个銀行团要加入三国銀行团并参加湖广借款遭到反对的时候,塔夫脫总统直接向摄政王呼吁。塔夫脫对华中的政策,象以前在叙述滿洲的情况时已經指出的,是把美国資本注入中国,作为創造門戶开放政策及保持中国領土完整的一个手段。最后于革命的前夕,即 1911 年 5 月,美国銀团被准許加入銀行团,但是它所付出的代价是欧洲的痛恨。

随着革命的发展及中华民国的建立,銀行团的兴趣,至少在表面上,是在于以金錢供給北京貧穷的政府,以維持它自己及在全国創造稳定的条件。原則上,中华民国是通过国际金融合作来得到

协助。但是，在通向这个目标的道路上有許多障碍。俄国和日本虽然是向外国借款的国家，但也要求加入銀行团，它們的銀行团于1912年6月被准許加入銀行团。这里应当強調指出，这个扩大了六国銀行团不仅代表了投資銀行的利益，而且代表了各該国政府对于中国的政治利益。当这个較大的銀行团与北京政府恢复談判的时候，出現了新的困难。中国行政当局反对銀行团提出的几个要点。中国人认为銀行家所要求的貸款条件及他們所提出的对于使用借款的监督措施是太苛刻了。而且据中国政府及未被包括在各銀行团中的外国銀行家看来，銀行团事实上是企图創造一种壟断地位，以控制中国借款的市場。因此，当銀行团准备向中国垫付一笔巨額的善后借款的时候，北京政府設法与倫敦的独立銀行家接洽更有利的条件。

正当列强在北京进行这个复杂的政治的和財政的幕后操纵中間，威尔逊政府在华盛顿上台。胆小的美国銀行团詢問新政府它在向中国投資这方面是否会繼續享受国务院的积极支持。威尔逊总統于1913年3月18日回答表示，撤回官方对美国銀行团的支持，因为他发现拟議中的善后借款的监督措施“极近乎侵犯中国本身的行政独立”。塔夫脫曾把美国的銀行家推入中国，以保持門戶开放。威尔逊拒絕支持他們，因为他們的活动和其他銀行团的活动威胁了中国的独立。

善后借款合同于1913年4月26日簽訂了，美国沒有参加。通过这笔借款，誠然中国在穷困的时候获得了現款，但借款的談判是强权政治的一个显示。銀行团的目的是为了稳定新的中华民国，但孙逸仙认为善后借款是袁世凱欲用以消灭他的政党国民党的一种手段。袁自己也认为借款条件是与中国的行政完整不符合

的。最后，銀行团（它同中国是在政治問題上有关系的，而不是在財政問題上有关系）所造成的結果是“損害了而不是加强了中国的領土完整”。年輕而徒有其名的中华民国面临着—一个危險的童年时期。

（克萊德：《远东》，第 368—370 頁，孙瑞芹譯，呂浦校。）

## 十、克萊德：論辛亥革命

当清政府正在討論解决四川铁路糾紛的措施的时候，一件有极重大意义的事在揚子江流域中部发生。10月9日在汉口俄国租界里一个由孙逸仙的追随者所經營的炸彈厂里发生了爆炸。由于对这个事件的調查，几个共和革命党人被逮捕与处死。这些事件迫使汉口对岸的武昌的駐軍叛变。叛变的領袖們把他們的司令官黎元洪协統从他的床底下拖出来，要他在立刻死去或者領導叛变两者之間加以选择。黎协統是一个讲实际的人，虽然当时还不是一个革命党人，他选择了后者。在短期間里，揚子江中游三个主要城市——汉口、汉阳和武昌——落入叛徒手中。

叛乱从这个中心迅速地，特別在揚子江以南各省蔓延开来。虽然在北方某些地区如陝西、山东及直隶也发生叛乱，但一般說来，北方仍忠于清政府。叛乱的类型是一系列的地方性的，而且大部分是不流血的叛变，看来是沒有配合的，而且沒有統一的領導。革命計劃事先在汉口泄露了，分散在各地的革命党人不是根据一个預先規定的全国性的計劃行动着。当武昌方面的集团以邀請

已經宣布独立的各省派代表參加武昌革命委員會的辦法來使運動取得配合的時候，革命已經蔓延到上海。在上海暫時以一個廣東人、前駐美公使伍廷芳為領導的新叛黨政府企圖代表整個革命來說話。這樣，革命黨人之間的政治活動就開始出現了。上海集團為廣東人所控制，他們決定叛變的領導權不應保留在以武昌為中心的揚子江各省。幸而所有革命團體在主張滿人必須滾開這一點上是一致的。這一點和黎元洪願讓位於上海的所謂“軍政府”，阻止了一個公開的決裂並容許廣東人來領導。

（克萊德：《遠東》，第 361—362 頁，孫瑞芹譯，呂浦校。）

## 十一、費納克：論清政府預備立憲

如果沒有爆發了革命的 1911 年的話，則近代中國的偉大的一年應該是 1908 年，因為在這一年的清政府為建立立憲政體而採取了一些初步的措施，公布了《憲法大綱》，宣布了一個逐年籌備的方案，規定在九年以內召開國會；並批准各省諮議局章程，規定於一年以內設立各省諮議局。

在這裡只需要注意一下《憲法大綱》中所表示的觀點，它是同慈禧太后原來所表示的觀點相同的。這一點從下面所引的批准《憲法大綱》的上諭可以得到說明。“東西各國立憲政體，有成於下者，有成於上者。……成於上者，必先制定國家統治之大權，而後錫予人民開政之利益。……大凡立憲自上之國，統治根本，在於朝廷，宜使議院由憲法而生，不宜使憲法由議院而出。中國國體，自必用

欽定宪法，此一定不易之理。”因此主要的重点是放在获得君上的大权上，以保证“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必須承认，这对于使全国人民信服滿清政府历次宣言的誠意來說，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它終究是向前迈进了显著的一步。

制定一个历时九年的逐步改革的方案，是表示清政府的智慧，而不是表示它的缺乏誠意。这个方案表明，清政府認識到中国对于实行代議制政体是沒有准备的，在建立上层建筑以前应该仔細地打好基础。当然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解釋它——这个方案提供給滿清政府以喘息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內滿清政府可以复兴他們的統治。根据方案，在九年的时期中，每一年可以看到若干变革，如筹办地方自治，修訂法律，調查戶口，筹办府、州、县、乡、鎮巡警，推广簡易識字学塾以逐漸减少文官，編制預算并实行审計制度，公布宪法，公布皇室大典，頒布議院法，等等。整个方案于第九年結束，該年举行上下議院議員选举并設弼德院和內閣。当然所有这些改革都是必需的，如果誠意地实行，將可作为新政体的基础。然而，由于1908年以后局势混乱，或許也由于清政府对于改革缺乏真正的兴趣，这个方案中的許多措施仅仅停留在紙面上。

（費納克：《現代东洋史》，第209—210頁，呂浦譯。）

## 十二、費納克：論辛亥革命

在中国每一个这一类的运动<sup>①</sup>后面都存在着人口問題，这問

<sup>①</sup> 指革命运动。——譯者

題是由于人口对于生存手段的压力太大而发生的。“一个国家的人民盲目地相信，人生的首要义务是为了他自己和他的祖宗的安乐而生育尽可能多的男性后嗣，并一致地根据这个信仰而行动，这将不可避免地使其絕大部分的人民陷于极度的貧困，并使其政治陷于有規律的周期性的大規模变乱。”这个周期的开始阶段，人口同食物供应是平衡的。如在正常的生产情况之下，人口的数量迅速地增加。这样，平衡就被打破了，一部分人民不可避免地陷于飢餓或流为盜匪。由于盜匪和海盜的数目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多，作为生存竞争的一部分結果，公共的安全日益受到扰乱。如果政府是坚强的和有效率的，許多的盜匪被逮捕并处死，最后的灾难就可以延迟下去。然而，由于水災和旱災，正常的情况就变为不正常的情况。很多的人餓死或变为盜匪。如果盜匪被当局的坚强的手腕所控制并且死亡的人很多，那末食物供应和人口的平衡可以部分地得到恢复，而叛乱可以避免。如果当局軟弱，那末可能会发生大規模的叛乱，而斗争的結果，人口减少很多，食物和人口又可恢复平衡。在上述两种情况之下，都仅仅是一种暫时的解决。

前面已經指出，滿清政府在十九世紀已日趨衰弱，太平天国的叛乱部分地由于外国人的帮助始得扑灭。但是它对于人类生命的毁灭暫时地阻止了人口的增长；两次回民叛乱和許多次規模較小的叛乱也起了同样的作用。然而，这些叛乱纵然再加上若干次災荒（例如 1878 年的災荒，据估計就死亡了九百万人），对于人口的增长也不过是一种暫时的阻止而已。所有这些危机都順利渡过了，部分地是由于絕大部分的危机被限制于局部地区。虽然有这些叛乱和災荒，中国的人口仍然繼續增加，同时也增长着不安和不满。在 1910—1911 年，生产的正常情况又重新被水災所扰乱



了。中部各省的水災“是四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几百万人民无家可归，安徽和江苏二省的农作物在五年当中遭到三次破坏，增加了饥饉和疫病的恐怖。山东、浙江、江西和湖北等省也遭受到災荒，有的省是水災，有的省是旱災，因此在这七个省份（此处原文是七个省份——譯者）中受災荒影响的达六十万户和三百万人。这些人陷于饥餓，而且瀕于死亡……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的不满是很容易爆发为叛乱的”。在这里也可以指出，从外国輸入的人命神圣的观念使得中国采取較以前更为有力的种种救災的办法。因此人民得以免于餓死，但他們的生活并没有得到充分保证。这样，就比以前保存了更多的人命，使他們得以参加叛乱。

人口的壓力，除掉餓死和由于叛乱造成的死亡以外，还可用其他的办法予以解决。例如，十八省的多余人口曾移住到帝国的人口較为稀少的地区或到外国去。然而，对于移民的一个严重的障碍在于必需經常祭祀的祖先坟墓，——因为“定期地祭祀祖先的坟墓并于适当時間同他的父亲埋葬在一起，是每一个人的义务。因此多少世紀以来，大部分的人口都严格地局限于同一个地区”。在1900年以前使人口局限于一个地区的另一个原因是，地方与地方之間的移居很是困难。不过，虽然有这些障碍，人口已經开始从直隶省特别是从山东省移入滿洲了。很多人于春季移往北方，在秋收以后回乡，但留在滿洲安家立业的人則日益增多。这种移居的情况或許主要是由于京奉铁路和其他滿洲的铁路的建筑。当辛亥革命的时候，这种交通改善的情况还没有深入到另一个殖民区域的西北地区，因此没有大量的人移居到这些屬地去，虽然有少量的人从邻近的省份迁到那里。

同样的，南方諸省、特别是广东省的过多人口已經开始向海外

寻找出路。广东人比他們的揚子江以北的同胞們富于冒險性，同时他們同外面世界的接触也較早，这种接触的影响逐渐地吸引他們离开家乡。前面曾經提到过华工来到美国太平洋沿岸的情形和澳門的苦力买卖。后者被禁止了，而美国利用1880年和1890年的“排华律”对中国人关上了大門。自1830年至1911年，中国人向美国移民的总数为三十万人以上，在1911年中，中国人移居美国者为一千余人。由于在美国不能取得入境許可，中国人轉而移居夏威夷、菲律賓、馬來群島（新加坡、馬來亞联邦等等）和加拿大。向夏威夷的移民不久就被禁止了，1902年“排华律”的实施地区扩大到菲律賓。1903年，加拿大制定法律，对入境的中国人每人課人头稅五百美元，这就限制了中国的移民。在1911年中移居新加坡和馬來亞联邦的中国人約一百三十万人，但是在那个时候在海外的中国人的总数一定远远不足二百五十万人。即使仅以广东省的剩余人口而論，这个数字不过是一桶水中的一滴而已。然而，这在另一方面來說也有所帮助。在外的华侨能以数額較大的款項汇回家中，因而增强了他們的家庭的財力。这次的革命也是由于华侨在物质上的帮助，因为他們最慷慨地資助了革命的事业。

然而，这是很清楚的，不論是殖民或是移民，对于人口問題的解决，并不比饥荒和叛乱为有效，因为据估計，自1885至1911年中国的人口总数自三亿七千七百余万人增加到四亿三千余万人。因此，到1911年的时候，人口对于食物供应的压力已十分沉重，同时由于1910—1911年饥荒的情况，就为一个大规模的革命准备了条件。

革命的另一个經濟的因素是財政。在1900年以后，中国政府支出的費用不断地增高，因为推行改革計劃必須支出新的費用，这

些費用包括新軍的軍餉和裝備、建築鐵道和設立新的教育機關的費用等等。為了交付日本賠款而借用的外債須按期償付，須按期交付的庚子賠款的數字更為龐大。這些支出實際上已耗用了整個關稅收入以及其他幾種稅收，因此不能用這些稅收來應付一般的開支。於是政府不得不日益加重各種稅的徵收額並開征新稅，這就大大地增加了人民對於清政府的不滿。

這種經濟上的不安使人民在心情上，對於革命者的宣傳，比對於失望的臣民<sup>①</sup>的宣傳，更易于接受。在1898年改革者被驅逐出國以前，中國就有了一個革命黨。中國的改革分子和革命分子大部分集中在東京，他們所主張的綱領是不同的。改革者以康有為和他的大弟子梁啟超為首，宣傳君主立憲的學說，由於1905年以後在滿清倡導之下發展了立憲運動，這種學說僅僅使他們成為滿清的理論綱領的早期的提倡者。然而，他們在二十世紀頭十年內的活動無疑地有助於培養憲法改革的情緒，這種情緒通過各省諮議局和資政院表示出來，並且成為對滿清的一種強大的推動力量。革命者是由孫中山領導的，他們具有公開的反清目的。他們於1905年正式組成同盟會，並於1906、1907和1910年單獨在各地起事，而且倡導把1911年的暴動轉化為一個革命。

有一個時期革命者的隊伍大部分是從海外華僑當中吸收的，孫中山在海外各地旅行，對華僑宣講社會學說。但是在1905年以後更注意於在國內吸收會員。被吸收做會員的人一部分是曾經加入過或現在還加入於一個或一個以上的秘密團體的人，這些秘密團體是多年以來在揚子江以南繼續存在的。同盟會的努力集中於

① 指康梁維新派。——譯者

新軍，在那里吸收了大量的會員來從事于反滿、或至少是改革的事業，特別是在駐紮在漢口和南京的新軍中，發展的會員最多。至于在北方的軍隊中則沒有取得這樣的進展。

革命宣傳的第三個中心是新的學生階級。在1900年以後，特別是在1905年以後，大量的學生到國外去留學，有的學生到美國和歐洲去留學，希望花費幾年的時間以求精通一項西洋的學問。但是更多的學生是到日本去。在那里有些人開辦了學校，他們保證引導這些學生通過捷徑來學習西洋的學問，在幾個星期之內使他們準備好新的學科，在很多情況之下，這些留學生就落到這些人的掌握中去。由于他們的目的是在儘可能短的時間以內取得資格，以便回國後在政府機關中取得位置，所以很多的中國學生寧願進這些“專為中國人”開辦的速成學校，而不願花費幾年的時間進正規的日本學校去學習，而且這些正規學校也沒有足夠的空額可以容納所有的中國學生。由于他們只要繳納學費，就可以得到文憑，因此他們有很多空閒的時間，他們常常利用這些時間來同流亡在日本的革命者接觸。在回國以後，他們常常發現雖然他們有外國的文憑，可是並沒有政府機關的位置留給他們。因此他們對政府懷抱怨恨，因而對於繼續不斷地散播的革命的宣傳非常容易接受。雖然他們的學問最多只是懂得一些皮毛，但是他們具有外國的經驗的事實給予他們以某種地位，這種地位使他們成為有效的中心，從這些中心可以向外傳播革命的學說。這樣，除了革命運動的流亡在外國的領袖以外，在國內也逐漸地建立起了地方的領導機關。雖然有的留學生無疑地對於新的學問具有充實的基礎，但是更多的留學生對於共和主義以及一切不久即將成為真正重要的事物僅僅具有一些膚淺的知識。因此“中國新青年”的意義與其說是在於

它的启蒙作用，不如說是在于它对政治现状的不满。

如果不提到教会学校的影响，那末学生对于革命的关系就将不能完全地显示出来。这些教会学校一年一年地把它們的毕业生送到社会上来，在物质上更加扩大了“中国新青年”的队伍。如果說这些教会学校的很多毕业生都不滿意于他們的前途，他們准备参加于革命的事业，对于代議制政府順利实施的問題并不具有相当的知識，这就是沒有考虑到这些学校的标准。但是学生阶级，由于它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在 1911 年的时候充分地感受到新思想的影响，几乎以它的全部力量投入了革命运动，这个事实是有意义的。此外，在革命期間或革命以后建立起来的參議院中的激进分子，有很多是从教会学校毕业或是在教会学校讀过书的，这也是有意义的。同样值得注意的事实是：由于清政府在 1905 年以后企图把它的新的教育方案付諸实施，它不得不向教会学校和留学生团体物色教师。这样，由于滿清改革活动的直接結果，教会学校的影响范围更为扩大了。

我們可以注意到，交通的改进（通过邮政、电报和铁路系統的扩充）使革命学說的傳播和革命計劃的拟訂更为便利。我們也可以注意到中国国内报纸的迅速的成长，这种报纸主要是关心于討論改革問題的，而且它們公开地（虽然是小心地）遵循着在东京出版并秘密运入国内的革命派和改革派的报纸的領導。最为激进的报纸是在象上海这样地方的外国租界中发行的，因之是中国政府所不能控制的。

以上所述是几种基本的因素，这些因素引起了大規模的革命，而不是引起小規模的中途流产的叛乱。引起革命的一个更为直接的原因是 1909 至 1911 年間清政府的铁路政策。作为外国人在中

國爭奪特權的時期的一个反应,于一个显明的短暫的靜止以后,在中国发生了一个坚决的运动,要求由各省而不是由国家来建筑铁路,铁路企业使用中国的資金而不使用外国的資金。基本的問題是中央集权同地方分权的問題。但是地方分权制度的拥护者并没有以这个制度本质上的优点来为它辯护,因为由于畏惧外国人通过以資金供应全国系统的铁路的办法来达到控制中国铁路的目的,这个問題就复杂了。要求由各省建筑铁路,是1905年以后发展起来的“收回利权”运动的主要特色。湖广总督張之洞是扩充中国铁路系统的主要拥护者之一,但是他認識到外国人夺取特权的危險,因此他提出忠告說,須賦予各省以控制铁路之权。主要由于他的坚持,清政府将粵汉铁路交給有关省份去建筑,对于川汉铁路也采取了同样的政策。浙江省铁路局也成功地阻止了把沪杭甬铁路作为国家的铁路来建筑,虽然清政府为了履行于1898年所訂的契約,不得不向中英公司借債,以供建筑該路之用。

在1909年左右,不但是中央政府,就連張之洞也已經認識到由各省建筑铁路的政策的不智。第一、建筑铁路所需要的大量資金各省无法筹措。第二、常常在实际筹集到的資金用完了的时候,而铁路建筑計劃的相应的部分并没有完成,因为常常將資金移作其他用途,而且“揩油”是盛行的。因此,如果根本必需的铁路干綫需要建筑的話,中央政府必須再度把它們掌握到手中来。第三、政府当局更清楚地認識到交通对于加强中央权力的关系。在清政府的新铁道政策沒有实施以前,張之洞于1909年去世了,这是很不幸的,因为他获得各省的信任,而被任命为邮傳部尚書的人則不能获得各省的信任。然而,在他去世以前,以外国資金供应并由外国人監督建筑湖广铁路的初步談判已經完成了。

1911年年初，盛宣怀被任命为邮傳部尚书。铁路国有政策被积极地付诸实施。作为第一个步骤，向四国银行团借用一笔巨额借款以供建筑粤汉和川汉铁路的谈判继续进行并予以完成。同时又谈判一笔一千万美元<sup>①</sup>的“币制改革和振兴实业借款。”清政府要实现铁路借款的目的：第一步必须与受到影响的各省铁路公司达成协议。清政府签订了借款合同后，铁路将要通过的几个省都提出抗议，有的地方并且发生了暴动，因此清政府必须尽量地来抚慰各省的士绅。对于湖南、湖北两省所采取的解决办法，是以国家保利铁路股票照票面价额换取两省的公司股票。至于广东省，其公司股票价不及票面价额的五成，政府的解决办法是发给六成的国家保利股票，其余四成，发给国家无利股票。“鉴于情况的复杂，以及每一个铁路公司实际上都已破产的事实，政府的建议看来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宽宏大量的。”然而，对于四川省铁路公司的股票政府建议的解决办法是仅仅换回实际用于建筑铁路的股款，而不换回以特别征税的办法所募集的全部股款。四川铁路公司共募集了一千四百万两的股款。据估计，在这个总数中有一半可以用来认购政府的股票、兴办本省实业，或归还股东。在其余的七百万两中，几乎有一半是由于该公司的一位经理从事投机，在上海橡胶忽然畅销中亏蚀掉了。因此，政府建议发给四川铁路公司股东大约四百万两的国家保利股票。四川人民对于这个解决办法立刻提出抗议，这是通过由总督向皇上上奏折的方法来表示的。抗议以后，继之以消极的抵制。“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人民并拒绝缴纳捐税。”当局逮捕了若干反对运动的领袖，这引起了人民对于

<sup>①</sup> 原文为美元，——译者

總督衙門的攻擊，並引起了人民的積極的抵制。這是 1911 年 9 月間的事。清政府不使用一切可以調動的力量來撲滅這次的暴動，却採取了“綏靖”政策，這種政策雖然最後能獲得成功，但是却太緩慢了。清政府所以採取這種政策，可能是由於它感到力量不足，並由於它認識到反對鐵路國有政策的並不單單是四川省的人民。再者，清政府可能受到各方面對盛宣懷的不信任的影響。盛宣懷雖然是一個很有才干的人，但是由於他經理招商局和他在圓滑的李鴻章之下擔任過的若干職位，使他在財政上多少享有不好的名聲。一般人感覺到，雖然四川省鐵路公司的經理們從事於投機並濫用資金，可是由他來提議處分該省士紳，是有些不配的。

四川省叛亂的動機並不是反對清朝，因此革命的日期並不是從四川省爆發叛亂時開始，而是從 1911 年 10 月 10 日在漢口發生的一枚炸彈的偶然爆炸以後開始的。在那個時候，清政府正在企圖採取“綏靖”政策來收拾四川省的局勢。漢口的警察在研究了發生爆炸的地点以後，發現這是一個革命團體的總部，當時正在從事製造炸彈，他們並且獲得了載有當地革命者姓名的花名冊。當局逮捕並處決了該團體的幾個成員。由於這種情況並由於懼怕當局再採取進一步的行動，駐紮在武昌的軍隊起而叛亂，強迫他們的指揮官黎元洪上校擔任領導者。黎元洪本人以前並沒有被爭取到革命事業方面來，但是在他接受了指揮權以後，他表明了他是共和派的最可信賴的領袖之一。在若干次戰鬥以後，武昌的軍隊（由於在鄉間招募兵員而擴充了）除控制了武昌外，並且控制了漢口和漢陽，這樣就在華中的最大的中心確立了他們的地位。

革命的火焰迅速地向揚子江的上游和下游蔓延，並且蔓延到華南。在北方，山東省一度宣布獨立，雖然不久又回到清政府這一



边；而直隶有的部分地区又有不穩現象，主要是在軍隊中間。然而，北方的政府軍隊整个說來是仍然忠于政府的，而且除陝西省外，揚子江以北的局勢也安穩地处于政府的掌握之中。整个运动的外貌是一系列自发的独立叛乱，而不是一个計劃得很好的和互相配合的革命。这种情况可以部分地用革命的战略來說明它，显然地，革命的战略是在各个不同的中心試探革命的情緒，相信革命的火焰最后是会蔓延开來的。因此，早些时候在广州曾爆发了一次叛乱，这次叛乱被扑灭了，未曾蔓延开来。这种情况又可以用这样的事实來說明，即革命的信徒們有必要組成地方性的集团而不是組成全国性的集团，并被迫把他們的計劃建立在地方的基础之上。另外又有人认为，革命党人曾經拟訂了一个在較迟的日期由各地的革命团体协同努力的計劃，因此，当汉口的革命机关被發現时，当地的革命党人所采取的行动虽然是必需的，但对于其他革命团体的計劃說來，則是时机尚未成熟。不管这个情况的原因是什么，事实仍然是这样：这次革命是沒有共同的領導的，一直到比較晚的时候为止。原来的領導是集中在武昌的，虽然它对于其他各地的活动不能加以有效的控制。最后采取了步驟来統一革命运动，要求各个“独立的”省份派遣代表到武昌組成“代表联合会”，議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組織大綱》，这个組織大綱成为南京政府后来采用的《中华民国临时約法》的基础。

当叛乱蔓延到上海的时候，在那里建立了一个“軍政府”。这个政府立刻声明它有代表整个革命的权力。伍廷芳（前任駐美公使）担任了外交部长的职位，并且发表了一个宣言，陈述革命的目的并呼吁外国的同情。这个团体并且要求列强保持中立，并威胁說如果清政府被推翻，将不承认列强借給它的外債。上海政府这

种自命代表整个革命的态度，不久就使它同武昌政府发生冲突，特别是在达到南北議和的阶段时，上海同武昌在控制和平談判这一点上；仅仅由于黎元洪謙遜地允許領導權轉到上海集团的手里，才阻止了革命队伍中的分裂。上海集团之所以断然主張他們有代表整个革命的权利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他們决心要保证广东人对于新政权的控制，因为上海的領袖們是来自广东，而武昌的領袖們則是来自中部各省。

現在必須把我們的注意力轉回到北京。改革的推行由于 1911 年春季資政院休会而暫告停頓。資政院于 10 月 22 日即武昌爆发叛乱以后十天复会，它的第一个行动是要求清政府把盛宣怀革职，这样，对于铁路国有政策它就同各省站在同一个立場上。然后它对于政府展开攻击，因为政府沒有像它在夏季以前所許諾的那样組織一个真正的內閣。清政府仅仅把軍机处的名称改为內閣的名称，以实行它的諾言。資政院提出三个基本要求，請政府予以采納。这三个要求是：一、立即任命一个有能力的和有道德的人来組織一个責任內閣，皇室成員均不应参加；二、应宣布大赦一切政治犯，包括 1898 年流亡国外的改革論者在內；三、在制定宪法以前須与資政院协商。由于叛乱的蔓延，并由于駐扎在京奉铁路綫上的灤州的軍隊提出如清政府不接受这些要求就拒絕登車开赴南方，更使这些要求增加了力量。清政府于 10 月 30 日頒发了一系列的上諭，完全接受了这三个要求。資政院拟定了一套新的“宪法信条”，于 11 月 3 日得到清政府的同意。簡略地說，他們創設了一个权力很受限制的立宪的君主，皇帝所享有的地位大致同英国国王的地位相同。这样，在 11 月初，滿清在他們自己創設的資政院和反滿的革命的双重压迫下同意了放棄权力的实质，而力图保留皇

帝的尊号。

摄政王在作这些让步的时候同时也采取步骤用其他的办法来扑灭叛乱。走向这个方向的第一步是召回袁世凯。这是在清政府看到除袁世凯外再没有别的人能够应付革命这个明显的形势以后才这样办的。袁世凯是于10月14日被召回的，但是他推托宿恙未痊，兼患其他疾病，直至10月27日才复任官职。这个期间内谈判的结果，清政府接受了他的条件，几乎授与他以一个独裁者的权力。除任命他为湖广总督外，并给予他以节制调遣水陆各军的权力，在11月8日，他并被资政院选举为内阁总理。

他的主要目的显然是在获得一项解决办法，这项办法将保留皇帝的尊号而剥夺他一切的权力。有的人始终怀疑他是否有保存满清皇朝的愿望，但是可以得到的证据表明，只要皇帝愿意忠实地接受一个立宪君主的地位，他是忠于皇帝的。当然，在那个时候或是后来，他都不相信在中国能建立一个共和国。为了使统治者接受他心目中的地位，就必须使叛乱者继续获得某种进展。另一方面，必须用显示政府力量的办法来使革命者接受同样的地位。只有在接受了这样的假设以后，才可以解释为什么政府军队在汉口附近的战斗中得利以后又遭受了失败。

从军事的观点来看，只须说明这样的情况：政府军队有几次表现他们在指挥、训练和装备方面超过了黎元洪所领导的革命军（不久前由黄兴参与共同领导，黄兴是最早的革命者之一）。当袁世凯下定决心从事战斗时，他的军队接连地获得了胜利，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被允许向前推进以获得一次决定性的胜利。另一个发生激战的地点是南京。该处为一旧派指挥官名张勋者所控制，在革命者由于他的条件太高因而拒绝收买他以后，他表示仍然忠于满清。南

京被堅守了一些時候，但是最後被革命軍占領了，并被作為臨時的南方的首都。

（費納克：《現代東洋史》，第 213—223 頁，呂浦譯。）

### 十三、伯斯：論辛亥革命

差不多一個世紀，經濟上的艱難成為中國農民的經常的命運。雖然有旱災、飢荒、水災、戰爭和疾病，中國的人口仍然不斷地增加。普通農民的生活條件不但沒有日益改善，而且是日趨惡劣。他要繳納的捐稅增加了，但是從政府方面所獲得的保護和利益却愈來愈少。農民的困苦常常引起反對中央政府的政治權力的叛亂。

有兩次看來清朝滅亡的命運已經注定了：一次是 1860 年外國軍隊打進北京城的時候，一次是 1900 年聯軍把滿清朝廷驅逐到西安去的時候。在這兩個事件中，潛伏着的人民反對滿清皇朝的情緒是太弱了，並且是無組織的，不足以抗拒滿清恢復其統治。外國人的態度，是以它們本身的利益為根據，而不是以試圖對於中國人民的意見作任何分析為根據的，因此贊成滿清恢復其統治。

地下的反對勢力逐漸積蓄了充分的力量來推翻滿清皇朝。革命的秘密團體、海外的留學生（其數目由於庚子賠款的退還而有所增加）、注重西方政治理想的教會學校的畢業生，甚至常常連兵士本身都參加到反對清廷及其與外國財政家和鐵路公司的交易的浪潮中去。滿清被稱為外國主子的洋奴。

在1911年的初秋，暴动、罢工和一般的骚动加重了揚子江流域的持續了多年的禍患。在汉口俄国租界一个地下室里有一枚炸彈偶然地爆炸，泄露了一个謀叛者的巢穴，这些謀叛者获得充分的軍事上的支持。革命扩展到山东、直隶（河北）和华中等处。一个城市接着一个城市，一省接着一省都摆脱了滿清的羈軛并且成立了独立的政府。滿清在各地的駐軍常常被屠杀。在这一年的年底以前，代表各地革命党人的临时參議会在南京集会，1911年12月28日，选举孙中山（其时孙尚在歐洲）为临时大总统。

摄政王任命袁世凱为內閣总理，并授予他以镇压革命党人的权力。袁世凱击败了他們，但是选择了同他們談判和平和未来的合作的道路。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并将其政治权力交给袁世凱。清帝終身保持他的尊号，年支巨額的岁俸，并且繼續在一所皇宮中居住。滿、回、蒙、藏各族被給予同汉族平等的地位。

沒有好久，孙中山辞去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临时參議会在南京选举袁世凱继任。有史以前就已开始了的君主制度，几乎沒有經過一番掙扎就这样地灭亡了。中华民国創立之初沒有遇到中国人民或外国列强的坚决的反对。袁世凱很快地同他的国会爭吵起来，解散了那个无力的团体，并且依靠大量的軍人来支持他的地位。袁世凱利用特务和兵士来統治。在中国各地許多的地方軍閥崛起。他們把流氓招募到他們的队伍中，并且管理在他們控制地区內的財政。主要是根据霍浦金斯大学的古德諾博士的劝告，袁世凱試圖恢复帝制。伪造的电报雪片似地飞入北京，軍隊举行了一次全国范围的投票，投票的結果，当然是一致贊成袁世凱做皇帝。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市民大会，一致投票贊成实行帝制。所投的票是預先作好記号的，兵士們手持上好刺刀的枪在一旁監視着代表們在离开会场

以前是否已在票上妥当地签了名<sup>①</sup>。这个时候中国的政治是太混乱了，因此袁世凯不能利用这些策略以逃避其责任。全国各地叛乱如怒火一样地起来反对他，在混乱之中，在1916年，袁世凯死了。

（伯斯：《远东史》，第147—148页，吕浦译。）

#### 十四、爱斯嘉拉：論辛亥革命

革命已在进行中。它是由傳統的原因所激起的，即吏治的腐敗，人民悲慘的生活，叛乱的发生，以及外国的压迫。有些試行的改革不得人心，例如建立铁路的集中管理侵犯了省的自治。这种不得人心，正有利于革命分子。1911年10月10日武昌的军队叛变了；南方各省宣布了独立，不再服从中央政府；孙中山在南京建立了一个共和政府。朝廷召袁世凯入援。袁世凯是一个手腕高明的政客，他曾組織过军队，这就給他极大的便利与好处。在两个月期間內，革命运动繼續扩展，同时袁世凯和孙中山之間則进行协商。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二千二百年前由秦始皇建立的中华帝国，在第二十四个朝代灭亡之后，成为历史的陈述了。

（爱斯嘉拉：《中国的今昔》，第54页，張雁深译。）

#### 十五、杜巴比艾：論辛亥革命

因摄政王最近的措施引起华北方面的动搖。乃是受着不久以

<sup>①</sup> 作者此处将选举总统的情形与帝制投票混为一谈。——譯者

前在南方发生的几次内乱的奇妙的鼓励。

华南方面的内乱本来就不是为了单纯的改革等等问题而起的，明显的是一种革命运动。原来满洲朝廷是二三百年来统治着中国的外来民族所建立的王朝，现在是应该从满洲民族手里解放中国，建立共和国的时候了。

这一支革命的“十字军”受着革命导师孙文的鼓励，革命的发源地是在广东。孙文由革命前至革命期间始终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位革命导师，1866年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十三岁时，离开中国，在檀香山进美国学校读书，以后转入香港皇家学院，1885年毕业，然后在广州行医。同时热心研究社会学和经济学，后在美国和伦敦完成学业。他从极年青时即加入秘密结社，是一位不屈不挠的革命论者。

三合会，特别是哥老会为政治性的秘密结社，孙文在秘密结社的内部，作为南方各省动摇不定的革命工作的热烈的煽动者，是一位卓越的人物。他在国外访问过暹罗、马来亚、印度支那及其他华侨所在地。他又曾到过美国和欧洲。由于华侨及国内秘密结社的援助，他于1900年做好了建立国民党的基础工作。其后，孙中山和国民党的第一步工作是推翻满清王朝，其次是打倒北京派“共和主义者”及其首领袁世凯，其后又以相互的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的各军阀为敌方作斗争，直至1925年尚未获得最后胜利；孙中山逝世以前，还继续不断的进行紧张的斗争。

1911年初秋，南方派在广东及四川两地发动了革命，都是由辅佐孙文的同盟会会员所领导的。湖北、湖南两省因地处中国中部，所以同盟会认真的协助两湖人民进行这种阴谋，并且使他們开始反抗。其实后来即是在湖北省城武昌举起了革命的烽火。武昌面临

长江，位于大商业都市汉口的对岸，因为汉口亦有租界，不远就是工人集中地汉阳的关系，所以此地的叛乱分子不久即获得他们所需要的支持。此外，革命派在武昌守备队的骑士中也有不少的支持者。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守备队起义，起义的士兵逼迫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黎元洪出来领导革命。黎元洪毫无政治兼军事家的能力，只是被强迫，不得不听从部下的布置。起义的士兵们带着队伍向总督瑞澂衙门进攻，此时总督业已逃亡。两天后，汉阳及其兵工厂、武器、弹药全入于叛军之手。最后又占领了汉口。革命的第一步至此告一段落。既没有战斗也没有流血，官军只是给来到的人移交其场所而已。未有如此平稳的革命。

黎元洪在同盟会首领黄兴的协助之下，不久在武昌成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革命运动乃波及扬子江以北的山东、河南、山西等省，南京、上海、福州、广州等都市也起来响应。

满清朝廷面临这种广泛的革命运动感觉到危险，于是想起革命前摄政王接受政权完毕后，立即被疏远了的袁世凯。1911年10月14日下诏召回这位老练的政治家，任命他为湖广总督，镇压此次叛乱。精明的袁世凯正好乘此时机开始发挥其全部能力。得着满清朝廷的信任具有充分权力的袁世凯并不打算镇压革命运动，反而与革命首领交涉，和他们勾结。同时欺骗满洲朝廷说事情已经无法挽救了，劝告清廷自动退位，于是清朝乃告灭亡。简言之，他巧妙的利用互相反对的势力，离开了官军指挥者的地位，站在调解人的立场盗取革命初步的光荣成果。

袁世凯背弃自己曾经表面上拥护过的清室和信赖自己的革命军，他深知中国历代王朝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因而他现在却不得不



为自己寻找建立王朝的机会。

当袁世凯要出发去武昌的时候，即有此用意。所以他命令政府军对革命军停止战斗行为，而开始与革命军谈判。

(中略)

此时武昌的革命政府并未解除武装，都督黎元洪向汉口各国领事通告“共和政府”成立的消息。革命党强调在中国本部十八省中已有十四省赞成共和，宣告独立；并且每省正在各派代表一名往上海讨论组织新政府。事实上在上海设立了政府机构，由前驻华盛宣怀公使伍廷芳担任外交事务。

汉口的革命军部队和政府军间只偶尔有些小冲突，从未发生过一般所谓的战斗，并且即使在这些小冲突中，每次都是革命军失败了。11月28日，汉阳城为北军（政府军）所夺回。革命军为了恢复扬子江沿岸人民对于这种失败所感到的沮丧心理，决心进攻南京，因为南京是汉人王朝明朝的旧都。除了这种心理上以及历史上的原因以外，还有战略上的理由。南京是在长江中游，南北交通的中心，经过一度围攻之后，在1911年11月30日入于革命军手中，同时南北两军在汉阳成立了停战协定。

既然如此，双方相互间现在可以进行更有利的勾结。这边是黎元洪，那边是袁世凯，两人同意南北间设一协议会。上海召开和平会议，伍廷芳代表南方，唐绍仪代表北方，革命军方面早已声明不和清廷的代理人办交涉，于是唐不代表清室，而代表袁世凯。当十七省代表聚集于南京时，革命军方面的立场逐渐强硬起来。在由海外归国不久的孙文的权威之下，组织了“国民议会”，12月29日，国民议会选孙文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北京上海间的交涉延长至1912年1月。袁世凯估计满清王朝

已經喪失其存在的意義，於是盡力玩弄一切權術，陰謀使自己成為新政權的承受人。1912年2月12日，袁世凱得到了攝政王交來的清帝退位的詔書，這個詔書不是一種單純的退位宣言，實質上是把政權移交給袁世凱的證書。現在把這一有歷史意義的懿旨引述數行如下：“……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議于前，北方諸將亦主張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特奉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總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

根據第二件懿旨規定了帝室的地位。即是新政府保證皇室宗廟的祭祀，保留皇帝的稱號，皇帝不與聞一切政治。

至此，袁世凱完全獲得了勝利。1912年2月15日，懿旨頒布後第三日，南京的臨時大總統孫文亦辭職，南京的議會乃選袁世凱為南北統一的共和國臨時大總統，南方派雖然希望袁遷都南京，北方派則主張仍以北京為首都。袁借口易于控制滿、蒙叛亂的行為，反對遷都，其實不過是袁安于北洋軍閥之中心地的北京，而不願移動而已。

革命至此告一段落。滿清王朝業已消滅，其後以武昌起義的1911年10月10日為民國紀元的第一日，稱之為國慶日，每年須放假慶祝。革命雖然完畢，新政體並未因此獲得安定。因為袁世凱掌握着政權，只是出現了由于妥協而來的暫時的平靜。袁大總統死後，中國經過長期的內亂，建立真正的中央統一政府——雖不能說這時中國全部都穩定了——是1928年國民黨獲得政權之後的事。

（杜巴比艾：《中國近代史》，第17—22頁，傅仲濤譯。）

## 十六、比倫：論辛亥革命

中國革命受到沿海城市資產階級的支持，它的結果是建立共和國和袁世凱獨裁。如果我們計算一下這次革命的利害得失，我們便將看到，革命之所得完全等於零。要建立立憲國家和代議制度的企圖完全失敗了。革命唯一的政治後果是：破壞了滿清朝代，也就是說，破壞了傳統的皇室權威，而代之以獨裁政治。這種獨裁政治，無論由民族或由傳統言之，都是沒有根基的，因此使中國內戰頻仍，歲無寧日。當清朝遇到危機的時候，深知中國成敗之數的日本，是願意維持中國的君主制度的。英、美則贊成中國建立共和國。美國之所以如此，是出於共和的意識形態。它不了解，要使一個四億人口的帝國的政治傳統突然改變是不可能的，對於這四億居民，君主制度，和家庭一樣，是一種和中國一切道德、宗教觀念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制度。英國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因為它知道，帝制的破滅將削弱中國，使其不能抵禦西方的帝國主義。

中國的革命是極少數的熱衷於西方思想的人做出來的，和人民群众沒有任何關連。當時如果由沿海諸省組成一個共和國，有集中於開放口岸的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支持，這個共和國是可能成功的。但是列強極不願意承認當時由這些省份組成并建都在南京的這麼一個共和國，而是幫助袁世凱，使他以獨裁政治重建中國的統一。不但如此，中國大陸的廣大群眾都是農民，完全不知道代議制度為何物，對資產階級欲從叛離清廷而確切獲得的個人自由毫無興趣；他們沒有民族精神，也沒有和外國接觸，不可能作

为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基础。袁世凱把南方代表所組成的国民党粉碎的时候，共和国便和自由制度决裂，而成为独裁政治，其原因就在于此。

日本的革命是在历史发展的行程上和在天皇的庇翼下实现的。日本朝廷半宗教性的权威为帝国全体人民所接受。因此，它是一种民族的同时又是道德的和經濟的革新运动的黎明。至于中国的革命，則限于破坏傳統的法制，而仅仅以一种中国傳統上沒有根基的独裁政治去代替它，因此中国革命对中国來說是一种无可挽回的災害。中国为外族朝廷所統轄，这和日本相比，无疑处于較不利的地位。但是，自从1905年起，这个外族的朝代已經走上了改革的道路。这些改革如果不是那样受到粗暴的遏抑的話，当已經一步一步地为中国建立了嶄新的制度，而又不破坏中国所拥有的唯一力量：傳統。

中国企图建立一些和它的历史的演进格格不相入的制度，因而陷入了无政府的紛乱状态。它只有置身于列强桎梏之下，才有可能从这种紛乱的状态中解脫出来。清朝复亡的第一个后果是丧失蒙古和西藏，并将很快地引起中国和滿洲的分裂，以这个朝代为連鎖的帝国瓦解了。

在列强的面前，这使共和国远远不能使中国受到列强平等的对待，但却把中国交給列强管制——由一个国际銀行团进行管制，这种管制的严密在中国的帝国时代是未曾有过的。

因此，中国的革命，从它的发展來說，对中国是一个真正的禍害，它将沉重地影响中国将来的命运。

（比倫：《世界历史的巨流》第6卷，第22—23頁，張雁深摘譯。）

## 十七、高第：論辛亥革命的原因

1911年5月9日，朝廷降旨，把当时在建筑中的两条大铁路收归国家經營。这两条铁路即粵汉铁路和川汉铁路，原在邮傳部尚书盛宣怀的势力下。在这月間，他正向法、英、美、德商借两笔款，一笔是一千万英鎊以进行币制改革和开发滿洲，另一笔六百万英鎊，以建筑这两条铁路。日本供給一百万英鎊。朝廷又派前总督端方为督办粵汉川汉铁路大臣。摄政王这次的强力行动引起了地方尤其是四川的激烈反对。这就是群众叛乱的开始。这次叛乱开头完全不是反对清朝，但是当学生和普通乱民領头时便很快地带有了革命的性质。虽然革命是由四川开始了，但是四川并不是革新者最好的陣地。只是因为国家从总的政策着想试图把铁路收归国有，而地方主义的中国人都願意出錢給省里，而不願意出錢給整个国家。此外，整个国家已受到可怕的勒索，不但在铁路方面，而且在远征西藏事件上也飽受了勒索。因此，便反叛了。反叛的动机是由个人私利出发，而不是从改革出发，个人私利受到損害了。叛乱既已爆发，就必须平定，朝廷于是从湖北調兵到四川去。江汉人烟稠密，反而得到疏散了。1911年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成都的衙門受到了襲击。但是暴乱者被鎮压下去。这个运动的性质不久便变得奇怪了，傳教士們和教皇代表沙得容主教被迫逃到揚子江畔的重庆去。政府立即派遣端方和1907年被罢黜退居浙江的前两广总督岑春煊以及馮国璋將軍所部保定軍隊到四川去。

另一方面，在10月1日，革命者从广东来到了湖北省会武昌，

該城一部分軍隊已撤調四川。我們還記得，這座大城在太平天國的時候曾扮演如何重要的角色。它的地位正當漢水之口，控制該河及建築在該河和長江匯合處的两座城：漢陽和漢口。漢口是一個開放的和外國通商的埠口。在漢口的俄國租界，人們發現了一個炸彈製造廠；10月10日，武昌的當局打電報給北京，說已阻住了革命運動。翌日，10月11日，武昌的軍隊叛變，總督瑞澂在他的衙門里受到襲擊，逃到揚子江的一只炮艇上去。張彪將軍，系張之洞寵信之人，既無勛績，亦無本領，且為眾所厭惡，這次他也為叛軍追襲而逃走了，由其副手——無能的黎元洪將軍繼任。這些叛變實際上就是一篇“革命宣言”。10月12日，叛軍渡揚子江，占領漢陽兵工廠。翌日，占領漢口和京漢路的一部分。瑞澂和張彪被罷黜了。一直到這時候，孫中山尚在美國，和這些事情沒有任何關係。

革命運動從武昌沿着揚子江發展。人們看到，太平天國式的進軍又要重演了。11月4日，上海落入叛軍之手，两天後，江蘇的蘇州和浙江的杭州這兩個大城，亦為叛軍所占據。這些勝利使群眾迷醉了。10月24日湖南，31日雲南，11月10日福建，先後宣布共和國的成立。末了，廣州也反叛了；叛亂擴大到帝國的整個南部。人民並不懂得共和國是什麼意思，有什麼目的，揚子江的炮艦都歸附了叛軍，這就使不幸達於極點。

馮國璋將軍得到一個暫時的勝利，即在10月27日收復漢陽，28日收復漢口；漢口在戰鬥中被燒毀；但革命軍的這些失敗却由12月2日南京投降革命而得到了補償。防衛南京的清官是張勳（已逃）。端方在重慶與成都之間為自己的兵士所殺。趙爾丰也在12月中旬在成都被殺。第一次暴亂的發生地四川，確定地歸屬於革命方面了。

悲劇的第一幕是演完了！清朝政府應如何行動來重建它的威權呢？滿族的朝廷象瘋了，但又孱弱，一個小孩當皇帝，沒有人，沒有首領。慶親王繼承了恭親王的地位，但沒有本事；他是個平凡的人，而且年事已高，不能擔任活動的角色。無論如何，清廷在10月15日派進一鎮兵，由兵部尚書滿人蔭昌率領，沿京漢路南下到距漢口約一百公里的地方扎營；該軍在10月27日血戰擊敗叛軍，把舊城燒掉。同時，薩鎮冰提督帶着他的十六艘炮艦到了武昌。這兩人都受袁世凱節制。這時朝廷起用袁世凱，袁世凱在兩年前被攝政王罷黜，隱居河南。這時，清廷認為唯一能夠拯救朝廷的人就是他。

（高第：《中國通史》，第269—271頁，張雁深譯。）

## 十八、高第：論辛亥革命的意义

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帝國，宣布中華民國成立，以10月10日為一年一度的國慶。這次革命是最重要事件之一，不但從這個古國的歷史來看是如此，即從整個世界的歷史來看也是如此。列強應極謹慎細心地注視這個運動的發展，因為它遲早將在整個世界的政治上產生反應。雖然目前有極多問題與歐美利益攸關，但是對一個觀察家、哲學家、甚或政治家來說，無論現在或將來，沒有一個問題比遠東的問題更為重要了，觀察一個代表全球人口三分之一<sup>①</sup>的民族的政治與社會的轉變，不是不關重要的事。在中國，一

<sup>①</sup> 原文如此。——譯者

个在風雨中飄搖的朝代突然倒塌，而新朝代則于腐爛了的朝代的廢墟上建立起來，這定然不是第一次。不但如此，這個外族的朝代清朝和漢族的朝代明朝，二者的結尾，巧相類似，例如君權的式微、朝中朋黨無謂的傾軋、太監勢力的增大等等。一直到今天為止，奪得了權力的外族，如十三世紀的蒙古人和十七世紀的滿洲人，都未曾能夠改變這個國家的風俗和行政的一般性質。清代新設的行政機構，如 1732 年建立的用以猛烈打擊內閣的軍機處，如各部大臣數目增添一倍，即漢人之外又設滿人，如在全省首府設置滿族將軍一人，甚至如組織八旗軍等等，都不能使外族的因素占優勢。征服者結局為被征服者吞食了。只有到了近來還在被征服者背上垂着的辮子證明他們曾不得不屈服于外族的統治而已。加之，雖然清朝曾有一些偉大的皇帝如康熙和乾隆，但是自從十九世紀而後，在寶座上的只是一些懦弱之君，而且是每況愈下，一代不如一代，因而朝廷的命運就隨着一個目的明確、領導得宜的反叛運動的擺布，而無能為力了。就是康熙，也曾和漢人舊黨的叛亂做過激烈的鬥爭，有幾個秘密會社就是從康熙朝開始的。這些秘密會社自嘉慶朝（1796—1821）起便大事發展到可怖的程度。太平軍叛亂，據南京為京都；在十五年的期間（1849—1864）使帝國的軍隊裹足不前，如果清朝昨天的敵人——英國和法國——沒有援救它，而是幫助太平軍的話，清朝也許就要屈服了。但是人們看到，太平軍的首領天王已經發了瘋，他的黨人已變成了搶劫的群盜。中國的局勢是非常困難的，所以光緒皇帝本身在 1898 年試行改革；但是改革的企圖在他缺乏技巧的手中是註定要破產的。他的謀士們的缺乏經驗却和慈禧太后的堅強意志相遇了。但是，即使這次維新的企圖成功了，也不足以領導青年中國所期望的那種激烈的變革。



中国革命运动的原因，种类繁多。首先应当说是旧中国对它的征服者满洲人的仇恨。这种仇恨有公开的，有隐秘的，但却经常存在着。日本在对俄战争中所获得的辉煌胜利，证明黄种人是有可能战胜欧洲人的。日本人胜利的消息响遍了整个亚洲和印度，因为暹罗人、越南人、以及中国人在这里看到的是亚洲人的胜利。在这里，他们从绝望中看到了希望的曙光。黄色的中国人，成群结队地到东京去念书了；同时在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虽然嫌恶这个日出之帝国的侨民，但仍然邀请日本军官来改革它的军队，这不但是因为用日本军官做教练比用欧洲军官的费用便宜些，而且是因为他们获得了胜利。中国留学生不但学习科学文化，同时还从日本得到了进步的思想。还有一些中国留学生到法国去，吸收了卢梭和十八世纪的哲学，但却是生吞活剥而不能消化。有的到美国去，吸收了某一种自由的思想，并对这种自由的存在毫不置疑。所有这些“自愿的亡命者”学会了认识他们的国家积弱的根源。他们完全看到，他们已经过了时的文化不能和近代社会的进步并存；他们首先把他们之所以不如人归罪于满洲人。而满洲人只是一种旧传统的维持者；他们接受这种传统，为的是取得权力。中国为数众多的秘密结社，早已开始了推翻满清的工作，但是缺乏彼此间的协作。那些从西方学得自由和维新思想的改革者们使这些秘密会社采取了一致的行动。他们的到来，引起了满清整个腐烂的政府机构的倾塌。革命纯粹是一种自发的行动。革命党（即国民党）细心地做出它的计划，并在进程中巧妙地避免了外国的一切干涉。

在另一方面，满洲政府经过义和团的叛乱，在国民与外人的面前受到了削弱与羞辱。它企图以重整军备为救亡之道。它建筑了铁路。它甚至装出道德的外表，禁止种植罂粟。它就要墜入万丈

深淵，但是它悬崖勒馬的努力本身却在中国守旧古老人物中树起了敌人。铁道使大道上的旅店和商人破产。旧时大官出巡，随行人員浩浩蕩蕩；这些旅館和商人就靠他們生活。罌粟是鴉片的原料。云南的罌粟种植者們立即投向叛民，当革命运动正在展开时，重新种植罌粟。此外还有种种例子。我們可以說，中国革命一半是陈腐守旧党徒干的，一半是革新人物干的。正是这种利益的对立使中国的糾紛的解决更加困难了。

欲使尘世的利益和激烈的改革相融洽，良非易事。

只是那些对中国情况隔膜的人們才未曾預見到叛乱。甚至政府那些革新的努力本身，由于执行人缺乏技巧或忠誠致領導失当，已足为政府之患。因为对这些努力，改革者們认为不足，但在另一方面，却激起抱着旧傳統不放的人們的不滿。这些革新計劃远远不能巩固滿人的帝位，却使代表“青年中国”的党人和众多的古老守旧人物轉过来反对它們。代表“青年中国”的党人要人們相信他們有雄厚的势力，实际上他們的势力并不那么雄厚。这些敌对的分子联合了起来，再加上游民、流氓和海賊，就把滿清动摇着的大厦推倒了。

今天中国的革命不可与 1868 年日本的革命相比拟。日本人未曾推翻他們的帝国，未曾推翻他們的元首天皇，而是彻底推翻了宮中監督官即德川家的“將軍”。“將軍”自十七世紀以来把日本关闭起来，断絕一切对外交通。日本人也沒有拋棄长年的傳統，这个傳統过去曾使中国偉大，今天却完全成为維新計劃的障碍了。日本的书法和艺术是从外国学来的。把仿效中国的习惯改为仿效西洋，对日本是輕而易举的。因此，日本輕快地一跃而进入欧洲文明的境域，从那里采擷在新环境中对它最有用的东西。此外，日本从

它那强力的“軍事的貴族政治”取得了一种奇特的力量。这种“軍事的貴族政治”极度喜爱荣誉。与此相反，中国方面存在的却是历代沉迷于孔夫子的教义的一大群官吏；孔夫子的教义是道德的，然而却是卑屈的。中国开明之士完全了解，情况是应该加以改变的；但是他们却不太了解，广大的人民群众，狃于錮习甚深，絕不是简单的一张标語或过个三天就能够改变过来的。一直到今天为止，中国人虽然經過一些改革甚或革命的尝试，他們仍是依然故我。那末今天，让我们要求他們成为新人吧！噢！他們将能够放棄他們的馬褂，剪掉他們的长指甲，不再剃光头，放棄他們的布鞋或毡鞋，披上甲克短衣，穿上西洋褲子、留上头发，穿上光亮长靴；但是改变的将只是外表，基本的东西将不会改变。他們可以把政体变了，把衣冠改了，但将不可能在几个星期內改变民族的精神面貌。这个民族是多少世紀逐漸形成起来的，經歷过可怖的战争，忍受过外族的統治，但是它的文化較征服者們优越，所以它的文化一直到今天并没有受到任何严重的打击。使中国变化的，将不是在歐洲各国首都召开的宴会，也将不是那些脚沒踏过中国土地而要改变中国的人物所发表的火热但是空空洞洞的演說。

（高第：《中国通史》第4卷，第283—287頁，張雁深譯。）

## 十九、克劳斯：論辛亥革命

中国的革命在歐洲历史上沒有先例堪以比拟。它的背景和过程基本上与法国的革命不同，它的指导思想也与我們在歐洲最近

时期所发生的事件中的思想完全不同。

中国的革命也不能与 1868 年的日本明治維新相提并論，那个变革一举而导致一个中古的封建国家发展成为一个近代化的大国。在日本皇权 and 神道崇拜的恢复与立宪和欧化同时相輔而行。日本的革命象出于忠誠的一种革命，所以恰恰与中国的革命相反。

中国的革命从出发时起就缺乏政治上的共同感觉。反对皇室是基本思想，所有近代变革的努力都与此有关。

中国政府的特点經常是专制和民主同时共存的。除了帝制政体外，人民在他們家庭的組織是組成第二种力量而且是社会組織的实际基础。那个組織以皇座的統治者作为金字塔的向天尖頂，中国从来不是亚細亚暴君得以为所欲为的国家，象我們在前亚細亚时期所能見到的，这句话在一切时候都适用的：国家是为人民而不是为皇帝存在的。

中国革命的动机主要是一个爱国的动机。人們将一切損害和穷困都归咎于滿人的統治。随着它从滿人的統治中解放出来，中国就将依照民族意义获得名誉的恢复与刷新。

虽然如此，中国的革命并不是人民的起义。人口中的广大群众沒有参加这个运动。它是由留学生策动，借国内不逞分子的协助而进行的。

铁路国有化在四川所引起的騷动是叛乱爆发的原因，共和剧变是青年学生所煽动，——因軍队的附和而得到解决。群众在这事件中的作用主要是被动的。

中国推翻帝制后，由于內部的需要，必須模仿美洲国家的制度，即将包括在新共和国的各省发展成为一个联邦形式。这些省份以前在帝国范圍內已拥有相当大的独立自主，而現在則掌握了独

立割据国家的地位。各省的分裂必成为下一时期的命运。

但是，有一个主要原因使新中国的社会改革与地球上所有其他的革命不同，它虽然推翻了政治上的帝制而且改变了国家的体制，但是文化形式和人民的生活，一般说来仍没有改变。

中国国粹的稳固基础是儒家文化。这固然只有受过教育的人才完全意识到，可是它支配了人民生活的一切方面。它也能超出于国家崩溃的震撼之外，并对于未被了解的外国思想维护它的地位。

在儒家中帝制思想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前提。国家宗教需要有一个皇帝的人物作为它的最高的表现，按照一般的世界观的意义，帝王思想是不能打破的，它的生存甚至能比革命更长，所以它在共和国的中国已经证明仍是有力量。只要还有中国国粹的话，帝制原则作为整个文化结构的拱心石将仍充满生气。

最后一朝是由异族统治的这个原因，在中国革命运动中起了一个重要的作用。

根据文化原则看来，坐在皇位上的满人是个中国人。把他作为上天与人类之间的中间人来看，皇帝是一个高等人物，对他应予以半神的尊敬，因此，对于皇帝观念，拥有这个尊号的人是否属于异族是无关紧要的。

但是，在中国的民族意识中，满人是他们国家的敌人，是用暴力来取得外表上的权力。虽然满人征服中国以后在极大范围内已经接受了中国的文化，可是他们仍是北方的蛮夷，出身不明，没有历史传统的支持，中国人民一有机会必须摆脱他们的奴役。

开始时，曾为国家的幸福领导过一个幸运和成功的政府的异族皇朝，现在愈来愈失去权力和威信，它的政权就愈清楚地被感觉为强迫的异族统治。在强有力的统治者之下，当他们使国家成为

强大而有威信的时候，人民这种反抗未有所表示。因为中国人民在政治上总是漠不关心的，正如一切宗教狂热对他是陌生的一样。但是，随着政治和经济情势的恶化，人民对皇室的情绪必定同样程度地尖锐化。中国的民族观念联系到过去的明代而把明朝写在它的旗帜上，这是当然的。

反清复明是秘密会社的主要纲领，它的作用在国内引起了骚动。它的性质时常为人所误解；义和团运动的动机在欧洲特别受到一个完全错误的评介。

对欧洲人的仇视，在中国人决不是一个本来的而只是次要的动机。厌恶外国是与反抗本国政府连带出现。

中国人与欧洲人的初次接触，和他们在英法战争中所受到的经验，不足以使他们对外国发生同情。欧洲列强的干涉中日和平谈判及因此而引起的租借地和利益范围的要求，被理解为侵害东亚的权利。而政府的退让被视为威信的损失。

帝国政府在欧洲压力下不得不进行的改革，在对新需要还不能理解的人民中遇到反对，因此，反对不孚众望的皇朝的统治，在抗议一切外国的东西上面得到了一个表现。

这个反抗首先对传教士而发，是完全当然的，因为这些人对中国的人民来说主要是欧洲影响的代表，个别人物的错误举动，在欧洲人方面可能会增加冲突的材料。在两方缺乏谅解的情形之下，敌视就能容易地发生。

无论如何，义和团运动，象以前及后来所有仇外的暴动一样，不能被认为原来就是仇外或甚至仇耶稣的运动。它是反对皇朝的；外国人民，在人民看起来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皇朝过失的共同负责者。1900年混乱的原因完全是政治的，不是宗教的，宗教动机在中

国的重要性，一般地是往往高估了。

(克劳斯：《东亚史》第2卷，第194—197頁，孙瑞芹译。)

## 二十、克劳斯：再論辛亥革命

我們必須注意，不要只照革命的現象来判断今日中国生活的一切問題。暴力变动时期总是非常时期，而且会带不符合真相的非常情况。这对于曾遭到过非常激烈震撼的中国和日本，比對我們自己的范围更为适用。

没有一个真正中国人过分严肃地对待他本国的革命。它是一个外表的过程，基本上几乎没有触及国家根深蒂固的文化生活。政治上偶而的混乱在中国绝对不是什麼新的事情。随着每一个朝代的更換，激烈的內战发生。最近时期給十八行省带来的混乱是常常存在的，而且是通过有力的新秩序会消灭的。

中国革命，照它的卓越意义是一个在其他方面都健康的机构的病象。这个机构从发热的危机上没有受到永久的損害。在这点上，中国的革命是与法国的大革命基本上不同的。后者有极深刻的文化变革的后果。

这个革命的历史根源是在于以往政治和社会过程中。滿清皇朝整个历史是我們今日所經歷的革命的前提。事情不是突然而来的，一个长久的准备使事情成熟。动机不仅在于外国影响的輸入和受了歐洲傾向的傳染。原因首先在中国本身方面找，而且有一个悠久的历史发展。

改朝換代是不可避免的。推翻滿清可能沒有從歐洲來的任何影響也會發生。在日本就不同。幕府的廢除和天皇權力的恢復，事實上是出於同外國衝突所帶來的事情。這些事只與一個精神運動有關。

中國國家的整個制度於 1912 年被推翻，是由於偶然的情形。這個變更當然是在歐洲思想的劇烈影響下完成的。

革命在中國所起的作用是一個必然發展的作用。但是，它沒有象在歐洲那樣受到歌頌。中國在這樣一個疾病期間也沒有失去文化尺度。中國革命不是結束而是還在進行的——一個偉大過程的一階段。因此，我們不須在今日的共和國要看出未來中國將採取什麼具體的政體。在考慮舊中國政體時證明，這個共和國是一個絕對非中國的東西。許多證據使人有理由假定，它不能永遠維持下去。

每個革命使用激烈手段。這樣一個運動免不了會在各方面超出它的目標。過程中的精神興奮常常超出目的所需要的範圍。革命伸張到沒有健全理由要去的領域。所以，當然可以理解，隨著東亞政治和社會的徹底動搖，文化生活也受到影響，在國家組織、經濟和技术這樣徹底改變之下，思想和觀察也不免常常採用新的方式，使它為適應外形而現代化。

對某一階級的中國青年，他們與本國過去的文化關係似乎確已斷了。在這裡我們很可能看到不符合規律的例外現象。在我們判斷中，我們不應讓自己犯錯誤，因為在留學生中反對我們的恰恰是這些受到美國思想教育的少年中國的代表。他們絕不能代表中國的人民。

許多夸大的話會消失。一切過激運動最後將回到舊文化道路



的軌道。旧中国的国粹坚强地继续地活着，大部分没有为政治事态所触及和破坏，中国文化于革命后在它的决定性的特点上仍是不变。

传统的教育和旧的民族文化，对现代思想的进攻也会证明是胜利的，象它过去克服一切困难一样，它是一种消极力量，比任何一个外来的积极的打击都更坚强。民族精神，如果它真正是坚定的国民财富，是国民本质的表现，总会再兴起来和实现它的目的。

所以我们无需害怕，美国的思想在任何时候会取孔子的学说而代之。基于同样理由，我们也可以希望，德国的种族能从我们今日的困难中复活起来获得新生力量，并且德国的文化会顺利地克服我们今日所患的重病。

如果我们说中国和德国今日所遭遇的命运有惊人的相同的地方，则肯定不仅是一种辞令而已。我们无需作靠不住的比较；慎重地研究各种情况就会搞清楚这点。从了解两国之间有某种命运的关系上——这种关系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因为双方当然代表其他原因所造成的结果——也许能导致一部分相互的同情；这种同情显然存在于中德之间。

（克劳斯：《东亚史》，第2卷，第309—311页，孙瑞芹译。）

## 二十一、傅吾康：論辛亥革命的意义

辛亥革命和接着下来的共和国的建立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意义，而且这种意义在它的范围方面远远超出于欧洲国家内象法德

兩國帝制的推翻。在中國，1911年結束了二千年、或者是更長的基本上是一個繼續的發展。儒家的國家觀念在該國依靠一種更古老的思想，自我們的紀元開始以來就沒有受到嚴重的抵抗而統治着。在若干世紀的過程中，這個世界國家和世界觀，雖然在細節方面有些修改並獲得進一步的發展，但在它的基本原則上，如皇帝作為天子的地位和他的正統統治，從沒有在任何時候受到嚴重的動搖。就是臨時統治過中國的異族皇朝——通古斯、蒙古人、滿洲人——也進一步採取了中國的國家觀念。在十九世紀，由於新的情況才證明這個傳統觀念的不能持久，並說明，儒家對於世界國家的思想簡直是一個烏托邦。因此辛亥革命表明一個結構的確實崩潰。這個結構對外為西方帝國主義所動搖，在國內自太平革命以來——科舉的廢除不是一個不重要原因——逐漸從下面被挖掘以致腐朽。特別要注意的，辛亥革命不是象在中國所經歷過的許多改朝換代中之一個，雖然它有許多傳統的改朝換代的特点，並且在後來不久的時期中也曾企圖建立一個新的朝代。它也不是，象它開始時看起來可能的，在許多地方是一個新分裂時期的開端，從此一個地方的統治者就宣布他是天子的合法繼承者。它是一個二千多年長時期的結束，儒家的世界國家和儒教本身的不可挽回的壽終正寢。自1911年以來儒家國家和儒教是滅亡了。自從本世紀開始，特別自1911年以來，中國是處在一個極大的危機中，這個危機在範圍和影響上是世界歷史上很少出現的，但是它面對等於全歐洲人口的人數。一切傳統的政治、社會、精神和道德的原則，幾世紀以來被認為是不可侵犯的教條，無可懷疑的事實，甚至當然的東西，現在完全成為幻影了。在某種意義上，中國可以同一個老年人相比，這個人把他一生為一個固定思想服務，他相信這個思想是真理，而且在

这思想上完成了有意义的著作和成就，但在晚年他忽然明了，他所有的假定和思想是假的，且成为站不住脚的。辛亥革命的深远后果，在国内可能只有少数人了解。而且，孙逸仙和他的信徒充满着理想的和忘我的思想给予儒教国家的不能维持的腐烂结构以打击，使它灭亡的功绩应归于他们。因此，他们的活动主要是有破坏的意义。但是，他们不能把确信的、新鲜的东西代替崩溃的旧东西。他们建立共和国的思想，象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都是太理论性的，且没有估计到当时的情况。革命理论家对历史条件发生的可能性缺乏理解。他们几乎只在他们理论中而不是在实践生活中。当然，提出细心制作的完整的理论制度，不顾它们对中国是否能够行得通而进行讨论，自上古以来不是少见的，而且期待革命党人能在旧的瓦解的腐朽建筑上建立起一个新建筑，即使它仅仅是墙基，也是不合理的。和政治上无经验、理想的革命理论家相对立的，是政治上老练的、不择手段的拥兵自卫者，即所谓军阀和他们的追随者。其中以袁世凯最为能干。他有政治经验和技巧，了解过去的历史，且懂得最正确地估计当时的形势并为他自己利用它们所提供的种种可能。他掌握革命党人所缺乏的一切东西，但是他缺少革命的理想和责任感。他的行动不为任何思想和更崇高的目的服务，而只以他自己的野心和自己的权力愿望作他行为的准则。

随着皇朝和传统的国家思想的消失，把一个实际上是政治分裂局面的帝国长时期掩在一起的纽带也消失了。全国各地睡着的、分散的人民力量觉醒起来，获得新生命。新的势力中心常常成立在过去已经被认为是政治单位的地区。例如，四川是这样一个单位。同样的反对中央的独立愿望支配着其他各省，特别在处于边疆的各省，象广东、广西、云南、甘肃、陕西等。所谓外国的地区，如

西藏、新疆、蒙古及滿洲，于 1911 年后不久事实上独立。革命导致了一段經常有內战的时期，在这段期間里，地方間的矛盾、意識形态的矛盾，起了至少一样强大的作用，如果不是更强大的話。孙逸仙主要为了这个緣故辞去了总統职，因为他意識到他将不能使中国团结一致。华中和华南各省的当权人也許会承认他为总統，——至少在法律上，——但是北方各省反对他。袁世凱像是一般所希望能保持国家統一的唯一人物。他只是部分地成功；他的就任总統形成了內战时期的前奏。因此，帝制的推翻，作为国家宪法革命是大革命和与此有关的痛苦的第一阶段。中国在以后的十年里，将处于这个大革命的預兆之中。

（傅吾康：《一百年来中国革命，1851—1949 年》，第 114—118 頁，孙瑞芹譯。）

## 二十二、內藤湖南：論辛亥革命的本質及其後果

今日的革命当然是以汉人为中心发动起来的，但是发动革命的南方人現已失敗，从側面出来篡夺革命果实的袁世凱即将統治中国，今后将建立以汉人为主体的新国家，这就是現存的革命的本質。我們試推想，为了汉人的利益主体而建立起来的新国家将如何統治五大民族。当南方革命初起时，特别是鼓吹革命思想有力人士章炳麟等，一方面有恢复汉人曾經統治过的土地的想法，另一方面又有要恢复例如安南、朝鮮一类的藩屬的观念。但是向南方人积极地鼓吹革命思想的基本方針，只有反滿的一种思想。因此，

起初革命軍是大有要屠殺滿洲人的趨勢。現在雖然高唱五族共和論，多少變更了一些當初的方針；然而在漢人過份自夸其文明，自恃其能力的情况下，即使統制了五大民族，究竟能否做到五族平等，尊重各民族的風俗習慣文化，把各民族看做和自己是同等的民族，却是疑問。所以五族共和結局只是以漢人為主體，把其他民族隸屬在漢人底下的論調而已。因此，即使在今天，一方面雖然高唱五族共和之說，可是另一方面，北京的中央政府主要由什麼人組成的呢？都是漢人，當然為了控制清朝遺留下來的滿洲八旗人士，也有任命若干滿洲人為都統官的事實；但是並無人想把此次新興的國家政治符合於異族的利益。現在中華民國主要人物當中，顯然無人具有如同古代蒙古人那樣雄偉的气度，務必使他們所統治的廣大領土上的各個異族發揮所長，而以公平的态度統治各民族。如此看來，無論如何總是漢人的作風。

其結果，會引起其他各民族對漢人的反抗，各懷獨立之志是必然的，已將其民族的大多數移入關內，自己原來的根據地反而為中國的移民所奪去的滿洲民族，雖不得不和中國人同化，以圖其生存，但是蒙古、西藏、還有突厥民族，從清朝以來即隸屬於中國，到了壓在自己頭上的壓力一松，當然會立刻獨立起來。原來蒙古人、西藏人服從中國，是服從滿洲皇帝；因為滿洲皇帝統治着中國，他們才隸屬於中國，他們根本沒有想到要服從漢人所建立的國家。因此滿洲朝廷一倒，各異族的領土當然就會分裂出去。蒙古人高唱獨立，西藏依靠英國，當然是可能的事。或者象現在的內蒙那樣靠近中國本土的民族，或者來北京等地長期生活的異族人民，在感情上亦許難于急忙離開。但是中國政府如果日益傾向於民主，就會日益失去對於異族的統治力。五族共和的牌子今日在事實上已

毫无意义。袁世凱等政府当局亦許作为一时的政策，要討好蒙古王公或西藏的喇嘛，可以搞好个人关系。但是大势已趋向于解体。此等民族如能建立自己的国家，又当別論；如不能建立，結局只有依靠邻近他們的强国，暫時間建立其国家，即是：外蒙依靠苏联，西藏依靠英国。

（內藤湖南：《新支那論》，第71—75頁，傅仲涛譯。）

## 二十三、稻叶君山：論辛亥革命

康有为的戊戌变法，是一种合法的改革，企图在君权之下实行庶政革新，但归于失敗。继其后的癸夷党誤与拳匪打成一片，不但主权沒有因此强化，反而遭到了那样的失敗，我們現在要观察与此二者完全不同的南北共有的恢复国权的思想。

恢复国权思想，是因欧美对华行动的刺激而产生的近代思想。长江的刘、張两位总督不必說，爭着把学生送到日本，向新兴日本学习，也是这种思想表现之一。东京的留学生一时达到了一万余名。同时革命党对这些学生的宣傳很是激烈，留学生們都不願踏实的学习欧美文化，只是为激烈的革命思想所感染。这当然不是刘、張两位总督豫料所及。

革命思想及其行动，可說是孙文的首倡。……（略）

和孙文鼓吹革命同时，有浙江余姚章太炎一派<sup>①</sup>提倡排滿兴汉思想。此等学者所提倡的思想是置重点于国学，与我国的本居、

<sup>①</sup> 章太炎是余杭人，此处誤作余姚。——譯者

平田等的傾向相似。本居、平田等文学中虽未直接鼓吹，然其文学則充滿了尊王賤霸的思想，不久即走上倒幕之途了。章太炎一派的国粹思想是提倡汉学，因而提高并强化了汉族的自尊心。特别因为他出身于浙江，而采用史学于排满思想之中。史学淵源于浙东，其先輩是明末有名的志士黃宗羲。他曾来我国长崎，請援軍恢复故国，其著作《明夷待訪录》頗受尊重。康有为虽不如何重視此书，然梁启超却視為聖經宝典（此种思想为梁后来虛君共和說的根基）。自戊戌政变以来，相继往橫濱、东京亡命的中国人甚多，章后来亦为亡命者之一。然章与康、梁极不一致。章是革命党，认为合法的改革全无希望，欲兴汉，結局是要推翻清朝。但是他們并不想和孙文一派立即取得联系。章純然是一位学者，其学术是以汉族的思想为基础，他指出以前他們的祖先所受之于滿清的屈辱的历史，喚起同志們的觉悟和决心。作为国学家看来，他是左氏派，排斥公羊。他所組織的“光复会”以《苏报》为机关报，蔡元培、吳稚暉等人俱为同志中的錚錚者。章的文章极为激烈，他为他的弟子蜀人鄒容所著的《革命軍》一书作序。又在其机关报《苏报》上撰文贊賞它。因此得禍，而被捕入獄。不久被釋，逃来东京。我們承认孙文首倡革命，可是当时的青年和現代的青年不同，似乎不贊同直接由西洋輸入的三民主义，认为章太炎的文学对青年有很大的刺激。可是直接的爆炸行为，乃是孙文的特长，湖南的黃兴及宋教仁等协助此种行动。由于他們两人的斡旋，此等革命党遂因結起来，在东京新組織“中国革命同盟会”，統一了革命战綫，办《民报》为其机关杂志，章太炎被推为主笔，时在日俄战争之后。

（稻叶君山：《支那近世史讲话》，第307—310頁，傅仲涛譯。）

## 二十四、稻叶君山：論武昌起义

清末突然爆发了收回权利的热潮。其实不是突然的，收回外国人投资修筑铁路权和矿山采掘权的运动，是随着多数留日学生归国而高涨起来的。各地方铁路都要收回，其中主要的有华南华中方面的铁路，这是机智的革命党人所不能忽略的。政府当然不能不知道此等民间的趋向，他们只是收此等铁路为国有，加以根本的改革，并增加其利用率而已。邮传部尚书盛宣怀支持政府此种意见，主张要实现此政策，必须依靠外债。宣统3年(1911年)夏，首先颁发上谕，宣布大借外债以及干线铁路国有化。于是川、鄂、湘、粤四省人民相继发起反对运动。人民说：“我们为收回铁路，已经倾尽了我们的财力；今又因一片上谕，忽然要把我们的铁路夺归依靠外债的国有，即等于夺去我四省人民的生命财产，而授之于外国人。”他们选派人民代表到中央政府，迫其收回成命。一方面，在四川一带实行罢市、罢课、商民供奉德宗(光绪)的神位举哀。但是中央政府对此等反对运动置之不理，进行预定的收回川粤汉铁路详细办法，罢免署理四川总督王人文，逮捕保路同志会长等十余人。因此人民相率往衙门，要求释放；因卫兵刺杀人民数十名，以致发生暴动。另一方面，各省諮議局附和四川風潮，批評铁路国有的不妥；浙江省諮議局竟通电主张应杀盛宣怀、四川新总督赵尔丰以谢天下。于是風云又紧，政府打算起用对于四川人有声望的岑春煊，催令速赴四川，岑春煊至武昌，与总督瑞澂相见，意见不合，返回上海。……四川内乱至9月犹未平息，政府遂调遣武汉驻军往四川省镇压。



革命党預期乘政府調遣軍隊入川之際，密往武漢集合。10月9日，漢口俄國租界革命黨秘制炸彈爆炸，黨員為俄國巡捕所捕。因此牽連到武昌的多數黨人被捕，黨員名冊被沒收了，黨員有被一网打盡之虞。革命黨本來預定10月16日起義，事情既危急至此，乃刻不容緩，入夜，遂于武昌城一角起火，城兵起來響應，交戰兩点多鐘，武昌城即入于革命軍之手中。總督瑞澂、統制張彪僅以身免。漢陽一帶相繼陷落，至13日，陸軍第二十一混成協協統黎元洪被推為鄂軍都督，以湖北諮議局為都督府，舉湯化龍為民政部長，發出中華民國軍政府成立的布告。

（稻叶君山：《支那近世史講話》，第317—319頁，傅仲濤譯。）

## 二十五、白柳秀湖：論辛亥革命

此時，民間要求開設國會的呼聲日益高漲，政府於是亦不得不隨此潮流，宣布1909年9月，設立相當于日本府縣議會的諮議局，表示政府有準備開設國會之決心，但是其所謂的諮議局，真正揭開幕來一看，即顯現其為宣傳革命思想的依法成立的機關的色彩，各省諮議局俱提出速開國會之主張，全國諮議局更進而聯合起來，組織開設國會促進團，派代表前往北京，向攝政王提出請願書。醇親王乃于翌年再設資政院，以求緩和民意。所謂資政院，是由各省諮議局選出的議員與欽選議員共同組成的一種立法機關，成為將來開設國會的基础。

可是這資政院到了1910年9月揭開幕來一看，也顯現其為了

民权运动而設置的依法成立的机关的色彩，刚一开会，便全体一致通过要求即时開設国会，声势猛烈地向政府建議。摄政王見此可怕的形势，知道再也不能逡巡迟疑，不得已乃宣布三年后即宣統4年頒布宪法，宣統5年開設国会。

1911年(宣統3年)，中国初次由新官制組織責任內閣。在总理大臣之下設协理大臣二人；設相当于十部长官的十大臣，而其所任命的大臣十三名中，有九名是滿洲人，只有四名是汉人，然其九名滿洲人中有五名是皇族。其毫无新政的意义，一望可知，一般称之为“亲貴內閣”，认为此內閣完全是继承专制政权之旧套，建設新中国于此絕望。

宣統3年(1911年)成立責任內閣，郵傳大臣盛宣怀和英、美、德、法四国銀行团締結借款合同，計劃以其資金的一部分收买民营铁路实行铁路国有。当时拟收归国有的第一目标为川汉铁路，其次为粵汉铁路，所謂川汉铁路是联络湖北与四川的铁路，原归商股創办的川汉铁路公司修筑。

四川省人民知道政府有把铁路收归国有的計劃，认为这是政府夺取省民应享有的利益，把它交給外国人，因而发生了猛烈的反对运动，此时公司的当局向民間夸大的宣傳铁路收归国有后政府将要受到外国种种的压迫和欺侮，以及铁路国有种种的危險，不啻在熊熊燃燒着的猛火上加油。政府知道四川省人民反对铁路国有案不是一件平常的小事，立刻派兵加以鎮压。同年9月，四川总督赵尔丰立即逮捕其首魁。不久，成都全城发生暴动，赵尔丰为民众所击杀。奉命率軍入川鎮压暴动的湖广总督端方<sup>①</sup>，于入川中途为

<sup>①</sup> 端方当时为督办粵汉川汉铁路大臣，前此曾任两江总督。当时湖广总督为瑞澂。——譯者

民軍所阻，遇害。

此时宋教仁联络并领导长江流域各革命团体，他看见四川省发生暴动，其势日益猛烈，认为此机不可失，通知原来与他有联系的武昌方面的军人，秘密预备举兵。他们在汉口某小胡同内设立炸弹制造所，预定在10月6日中秋节月明之夜起事。因为准备不充分，延期十日，计划在10月15、16日大举起义，可是到了10月9日午后六时，该炸弹秘密制造所，由于党员不留意，忽然发出霹靂似的声音爆炸起来，炸掉了房顶，一时火光烛天。因此，起义事被暴露，有同志二十三人被捕，同时被搜去了载有多数军人的党员名簿，同志曾一度预备立刻逃往上海，以期他日再举。可是想到在兵营内的军人同志，却不可就此罢手，便立刻集合未被逮捕的同志们，在10日夜不顾一切地毅然起事。城内的工兵营首先取下肩章，臂缠白布，举起烽火以为集合同志的信号。步、骑、炮等各营兵士见此，俱起来响应，一时势如怒涛，喊声连天的冲往驻防此地的旗人营盘，不久就占领了军械局。

当时的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尚在武昌，他是一个宽厚笃实的武人，颇有声望。革命党人首先推此人为革命军的总帅，以期收揽武汉一带的民心。当晚更深，两三位党员率领一营兵士，突然闯入黎元洪营内，以手枪拟其胸间，强迫黎元洪答应为革命军总帅。革命军听见黎元洪肯出来领导革命，士气大振。于是兵士争先冲往总督衙门。此时总督及统制俱已闻风逃走，武昌省城即毫无困难的落入革命军手中。中国政府后来以此日为中华民国的国庆节，因是10月10日，故又称之为双十节。

革命军占领省城后，黎元洪即被推为都督，湖北諮議局长湯化龙为行政部长，称革命政府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宣告独立，并以此

通告各国，同时改宣統3年为黄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翌年1月，孙文在南方举行大总统就任典礼时，复改元为中华民国紀元元年，这时是我明治45年（大正元年）。

革命軍占領了武昌之后，立即进而夺取武昌对岸的汉阳、汉口，巩固其北伐的地位。革命軍在武昌起义的成功，立即影响到全国，在湖南、江西两省的同志，首先树立起独立的旗帜。后来各省随之响应，大約在一个月間，約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地区，背叛了北京政府，参加到軍政府方面来。

（白柳秀湖：《明治、大正国民史》，《世界雄飞編》，第97—104頁，傅仲涛譯。）

## 二十六、矢野仁一：論辛亥革命

宣統3年8月19日（公元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倡乱于武昌，攻击軍械局，火燒总督署，終于占領了武昌，成为革命軍的根据地。这并不是武昌人民欢迎革命党的結果，而是因为四川省反对铁路国有化的騷扰扩大了，四川保路会会长、諮議局局长、副局长等人民代表遭到监禁，为了要求釋放他們而拥至总督署的人群同卫队发生了冲突，同时成都四周十余州县的民团、匪团等大肆燒搶劫掠，包圍省城，抗拒官兵，几乎形成叛乱状态。此报飞傳各地，一时人心动蕩，形势不稳。革命党就利用这个时机在武昌发动了叛乱。另一方面，对革命毫无理解的武昌駐軍，受到革命党煽动而归附了革命党。革命党之所以能够占据武昌使其成为革命的根据地，原因就在这里。而四川省民团、匪团等的变乱，无疑也是受了

革命党的煽动。武昌起事的前一天(阴历8月18日),在汉口俄国租界的中国人住宅里发生了炸弹爆炸事件,暴露了革命党徒的密谋;同时,在武昌发现了起事的传单,也加重了官民对于革命党的恐惧心理。18日发现革命党的密谋以后,总督瑞澂和统制张彪只是一味地到处捕捉革命党徒,根本没有想到19日会发生变乱。变乱是19日夜間在城内首先由工兵队发动的,辘重兵响应了。瑞澂、张彪等人为其党徒之众和来势之猛而大为震惊,加以他们事前对于革命党活动范围之广早已心怀恐惧,因而在仓促之間连布防备战的勇气也没有,就仓惶逃往汉口去了。于是,武昌未费吹灰之力,就被革命军占领了。这对于革命党来说,真是意外的成功。革命军推举清军协统黎元洪为鄂军大都督。如果统制张彪不曾逃跑,革命军一定会把张彪推举出来。因为黎元洪是想逃而没有逃掉才被推举出来的,并不是因为他对革命主义有理解,赞成革命主义或者响应了革命党而被推举出来的。

汉阳在武昌起事的第二天,汉口在第三天,相继归于革命军之手。革命党把这说成是光复,但是,并不是这里的人民赞成革命的主义,欢迎了革命党,这是勿庸多说的。

然而四川反对铁路国有的骚扰竟然扩大到这样程度,传播得这样广,以致引起人心动荡,招致官民对于革命党的恐怖心理;同时,革命党竟能把军队拉到自己这方面来,这些事本身已足以说明满清朝廷早已丧失了支配人心的威望。其结果,使武昌在瞬息之間归于革命军之手,这一事实,岂不是更向人民揭露了清廷的软弱无力和不足依恃吗?

清朝早已丧失了其支配世界的资格,同时也丧失了其支配中国的资格。它不但失去了收揽人心的尊严,同时也失去了收揽人

心的能力。滿洲旗兵，既不英勇，又無義烈精神，毫不足恃。自順治、康熙、雍正、乾隆以來，朝廷雖然幾度發出上諭，申明對滿漢兩族不加歧視，然而實際上總是不能放棄其保持滿漢平衡的政策，滿漢歧視，依然存在。尤其到清末實行新政的時候，更感到有必要在形式上加強滿人的地位，以為朝廷的屏藩，來維持清朝的統治。在我看來，這正是因為滿洲的地位實際上已經衰頹，所以朝廷才感到有必要在形式上勉強地來鞏固自己的地位。但是，不論在形式上怎樣加強，只要自己不能真正的強盛起來，這種做法只能激起漢人的排滿情緒，別無其他任何效果。當時，不但滿洲旗兵事實上已經軟弱無力，又沒有忠烈精神，更嚴重的是朝廷違背了對人民實行立憲的諾言，組織了所謂皇族內閣，甚至在這皇族內閣中身居要職的親王們都沒有為清朝的宗廟社稷殉節的精神。在這種情況下，還要維持滿漢平衡，組織什麼皇族內閣，究竟有什麼益處呢？

如上所述，清朝實際上已經是軟弱無力了。它究竟軟弱到了什麼程度呢？我們僅僅看看下列事實就可以窺見一斑了：武昌事發之後，在倉促中不得不將煞費氣力準備好的秋季大演習（操練）停止下來，而令陸軍大臣蔭昌率領陸軍，海軍大臣薩鎮冰率領海軍前往征討；又於8月22日（公元10月13日）發下上諭，“所有被脅士兵，如非甘心從逆，即行設法收撫。”這樣上諭，會給人民這樣一種感覺：即或參加了革命軍，一旦官軍的形勢好轉時還可以歸順回來，這就大有為革命軍助長聲勢的可能，當時的清廷連這樣嚴重的後果都來不及做充分的估計了。另外，還起用袁世凱為湖廣總督，督辦剿撫事宜。僅僅這幾件事，就可以看出當時的清廷是怎樣的昏愾無能了。

（矢野仁一：《近代支那論》，第535—538頁，鄭念之譯。）

## 二十七、矢野仁一：論辛亥革命的意義

……經過上述許多周折，滿清朝廷終於滅亡了。清朝的滅亡，並不是基於人民的自覺和要求——認為帝制不行，若不實行共和政體，廣大人民的幸福和利益就得不到保證——的結果。

不能顧全廣大人民的幸福和利益，固然是中國帝制的一大缺點；但是，清末的革命却不是由於廣大人民認識到這種缺點，為了替廣大人民謀福利，必須實現共和制，革命並不是基於這種要求而發動起來的，它最初好像只是種族主義的革命，但後來發見種族主義會失去滿洲、蒙古、回疆、西藏等地人民的支持，於是又說這不是種族主義的革命，只是要推翻滿清朝廷的統治和滿族的優越權。革命軍在最初着手組織臨時政府的時候，就打算推舉明明知道是對於共和制毫無理解、而且是清朝奸臣的袁世凱為大總統，孫文在當選為大總統的當天就打電報給袁世凱，說了下面一些奉承的話：“公方以旋轉乾坤自任，即知億兆囑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雖暫時承乏，而虛位以待之心，終可大白於將來。望早定大計，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等等。如果不這樣做，革命黨在當時連一個共和政治的虛名也樹立不起來。

繼8月19日的武昌亂後，9月1日（陽曆10月22日）湖南長沙，2日江西九江，4日陝西西安，9日山西太原，10日江西南昌，13日（陽曆11月3日）上海，14日江蘇蘇州、浙江杭州及貴州，17日江蘇鎮江及廣西，18日安徽安慶及福建，19日廣東，23日山東，10月2日（陽曆11月21日）四川重慶，7日四川成都等地相繼宣告獨立。

革命軍雖說不出旬月之間光復了十多个省份，但絕不是这十余省的人民渴望共和政治，站到革命軍这方面来抵抗官軍，因而从清政府的統治下独立出来；只不过是為了免受革命軍的侵扰或攻击，才做为自卫的手段，宣告自己不再接受革命軍所反对的清政府的节制而已。

就是这样毫不足道的“革命”竟然使大清皇朝灭亡了。而其所以灭亡，正是因为清朝的帝制本身已經腐朽不堪，而实质上早已自行灭亡了。

中国的帝制确是具有不能維持广大人民福祉和利益的弊病。但是，如果真是为了这个原因而激起了人民的义憤和有志之士的觉醒，以致推翻了滿清皇朝，兴起了共和制，那么其結果應該出現真正的共和制，并鏟除多年来帝制的积弊，使广大人民的幸福和利益得到保证。但实际上并不如此。而是一场毫不足道的革命使清朝灭亡了。因此，尽管灭了滿清朝廷，但不能实现真正的共和制；仅有共和制的虛名，而不能鏟除帝制的积弊，不能保证广大人民的利益和幸福，帝制时代的旧态，竟然成为帝制的遺產而原封不动地留傳給这个空有虛名的共和政体了。

（矢野仁一：《近代支那論》，第 559—561 頁，鄒念之譯。）

## 二十八、和田清：論清末的改革与 辛亥革命的背景

清朝既为英法联軍所敗，始漸悟洋夷之可怕。乃設总理各国



事务衙門，統办从来委之于地方大吏的外交和通商事务；設同文館，广方言館及其他学校，培养翻譯人材；购入西洋兵器船艦，設海軍衙門，創設海軍；雇佣西洋人，使之訓練海軍人材；頗致力于采取西洋文明的所长。但是此等措施只是曾國藩、李鴻章等一部分有識人士的嘗試，且仅限于軍事外交方面，故未能收得充分效果。但是中国过于地大，多数人民不但尙无文化教育，并且原来的积习及旧文化过于根深蒂固，故不能迅速地采用新文化。因此，德宗及康有为的改革政策在群众中孤立起来，終于失敗。义和团乱后，中国受到沉重的打击，原来的頑固派至此亦觉悟起来。西太后还在西安之时，刘坤一、張之洞等早有請求变法的会奏，清廷亦宣言願意改革。此后革新詔令紛紛降下，大有戊戌变法再度来临之概。及至鑾輿回京之后，乃效法日本，改革教育制度。廢科举，任用学校出身者，以代替科举出身者；参照各国法制，修改原来的規章制度；廢止不需要的旧官厅，設立时势所必需的新官厅。特別自日俄战后，认为日本的胜利在于立宪政治，因而决定采用立宪政体，宣布預备立宪。由我国聘請顧問，着手改革一般法律和官制。

不幸光緒 34 年(1908 年)10 月德宗及西太后相继去世，德宗之弟醇亲王之子年仅三岁的溥仪嗣位，是为宣統帝，其父醇亲王为摄政。先是，負有天下重望的李鴻章在义和团善后交涉中死去；刘坤一不久亦死；至是袁世凱又被罢免，最后剩下的張之洞不久亦死。于是朝廷全为碌碌无能的滿洲貴族所占据，毫无威信。原来清朝更以不变祖宗遺法为原則，至是不得不揭出新政的主張，以維系民心。因此一般人民以激烈的意見为进步，反对此种新政者謂之頑固，已失威信的朝廷遂无力鎮压此种趨勢。朝廷本已約定十年后開設国会，民論則要求提前召开。在各省開設作为地方議會基础

的諮議局，在北京開設作為國會基礎的資政院，俱變為表達民意或煽動人民壓迫朝廷的機關。朝廷不勝其壓力，只好縮短開設國會期限為四年，規定三年後開設，人民復要求一年後召開，於是引起無故誹謗朝廷的破壞性的風潮。鐵路收歸國有令一出，各地人民騷然反對。由於四川省人民的反抗，引起了暴動。宣統3年（1911年）8月<sup>①</sup>，革命黨乘機起義於武昌，全國響應。清帝乃於翌年（1912年）2月退位，一切政權交還中國人民，是謂之辛亥革命。清朝自太祖即位起至此年止，共傳十二代二百九十七年；世祖入關後，共傳十代二百六十九年<sup>②</sup>而亡。

（和田清：《中國史概說》下卷，第328—330頁，傅仲壽譯。）

## 二十九、和田清：論辛亥革命

中國革命是由孫文一人領導而起。……他起初只想改革清朝舊政，以求挽回積弱的國勢，曾上書李鴻章，獻策改革；及至甲午戰爭敗績之後，始有志於滅滿興漢，主張用武力革命，以求達到改革的目的，於是聯合同志，創立興中會，與秘密結社的會黨握手；屢次作小規模的舉兵，俱不成功；反而作為叛徒逃亡國外，到日本創立革命同盟會。此時正是光緒31年（1905年）的夏天，日俄戰爭之

① 是陰曆，陽曆是10月。——譯者

② 清世祖入關為1644年，辛亥革命為1911年，其退位詔雖頒於公曆1912年2月12日，但在舊曆依然為宣統3年12月25日，故清自世祖入關至其滅亡為二百六十八年，並非二百六十九年。——譯者

后，中国留日学生云集东京，故便于发展同志。是时，南洋及其他海外华侨均怀有新思想，同情于革命。起初，在戊戌政变之后（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之徒，俱亡命于日本，組織保皇党。呼号革新清廷；因为排斥孙文等革命派，两者之間斗争相当激烈。不久，胜利归于革命派。孙文原来坚持复兴汉族的民族主义，后来对于美国人所鼓吹的民主主义亦深有理解。在亡命国外，游历欧美之間，又深感資本主义的弊害，赞成社会主义的主張，加以自己独特的解释，名之为民生主义；連同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及民生主义总称之为三民主义。后来三民主义进一步发展而成为民国革命的指导原則。

革命思想后来渐次扩展，特別广泛的傳播于学生和軍人之間。宣統3年（1911年）因铁路国有問題引起人民反对政府的風潮，四川及其他地方发生了暴动。8月19日（阳历10月10日），新軍在武昌起义。豎立了革命的大旗，不过革命軍起于仓猝之間，并无周密准备，力量也很脆弱。可是革命时机已熟，不久四方响应，清朝乃面临于严重的危机。清廷一时仓皇失措，不得已再度起用罢免已久的梟雄袁世凱，使之收拾局面。袁世凱本是新軍的創建者，北洋軍閥的首魁，当戊戌政变时，曾依附西太后，出卖光緒帝。因此，光緒帝之弟醇亲王为摄政时，乃逐黜之。現在时局既然十分严重，又缺乏挽救此危險局面的人材，不得不悬請袁氏出山。但是袁世凱原来对于清朝并无忠誠之心；及至再度被清廷重用，眼看权力集于己身，便一面遣其部将镇压革命，一面又与革命軍领导人讲和。

先是，武昌革命一旦爆发，孙文适在美国游历，得报后，立即归国；其年12月經各省代表會議之推举，就任为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大

總統，明年改元為中華民國元年。廢除陰曆，改用陽曆，亦在此時。不過此時革命軍並無實力，既缺乏資財，亦無裝備，只是糾集一群烏合之眾。因此，孫文決心與袁世凱進行交涉，乃以清帝退位，建立共和制為條件，自己辭退臨時大總統之職，讓位於袁世凱。袁世凱既擁有軍政大權，便一方面壓迫革命黨，他方面復剪除清廷的強硬派，遂由官軍將領聯名通電，迫清帝退位。清帝至此業已進退失據，直至翌年2月12日乃以保持其帝號，接受歲俸等優待條件為唯一自慰而宣告退位。孫文乃於2月15日辭職，袁世凱繼任為臨時大總統，至是清朝三百年的社稷宣告滅亡，共和國乃正式成立。

（和田清：《中國史概說》下卷，第353—356頁，傅仲濤譯。）

### 三十、小竹文夫：論辛亥革命

保守派在義和團事件中既遭受到一大打擊，政治改革的主張於是作為反保守的意見盛行于世了。翌年，張之洞與劉坤一会奏，聯名提出關於變法的意見。會奏中徹底地批評從來中國政治的腐敗，他們主張，若要改良中國政治，必須採用西洋文化，以日本為模範，實行改良政治，培養人材。於是清廷決定再度進行改革，頒發各種施行新政的命令，這和戊戌新政的命令大同小異，其主張廢止科舉，採用學校出身者，則又比戊戌變法更進一步。然而戊戌變法是出於中國自覺自願的改革，此次改革却是受了各國驅逐反動勢力的要求，即是受了外國勢力的壓迫，不得已的改革。因此，其內容雖然急進，但并不熱心。朝廷的方針並不是真正要實行改革，只

想如何挽回已失的民心，維持清朝的統治而已。根据新政策去日本等国留学的青年，一旦得到了新知識，便来指摘本国政治的缺点，痛恨清政府欺騙人民的新政与腐朽无能的行为。于是，人們深切地感觉到要改革中国的政治，必須首先革滿清政府的命。就在此时，同情于革命的青年乃在日本东京組織中国同盟会，从事于推翻滿清政府的运动。

先是，有孙文等广东人所組織的兴中会，黄兴、宋教仁等湖南人所組織的华兴会，及章炳麟等浙江人所組織的光复会等团体。不过此等团体起初势力頗为微弱，革命的目标也不明确；到了光緒31年(1905)日俄战争結束之后，他們即在东京集会，重新树立革命的目标，拟定革命的具体計劃，合并为中国同盟会，以孙文为总理，黄兴为协理，通过四項決議<sup>①</sup>：(一)推翻滿清政府，(二)树立共和政体，(三)維持世界和平，(四)实现土地公有。其内部組織分为：外交、內政、軍政、联络、言論五个部分<sup>②</sup>；并另行組織暗杀团，发行《民报》，以为宣傳主义及其政綱的机关。

革命目标至此已經明确，他們主張对内要实现自长发賊之乱以来日益尖銳化的民族主义；推翻滿洲統治，树立共和政体，实现土地公有制，以求貢獻于和平。推翻滿清政府，就是民族主义；树立共和政体，就是民权主义；实现土地公有制，就是民生主义。总称此三者为三民主义。

当时的留学生，加入同盟会者甚多，《民报》上所登載的章炳麟等精彩的論文，使将近一万名留学生卷入革命的热潮之中。同盟会不但在国外向留学生呼吁，并且也向国内发表各种宣言。同盟会

<sup>①</sup> 应指誓詞(1)驅除韃虜，(2)恢复中华，(3)建立民国，(4)平均地权。——譯者

<sup>②</sup> 此处系指干事部內所分五部：总务、交际、政事、理財、文事。——譯者

成立一年之后，加入者超过一万人，各省相继成立分会，于是革命的狂瀾日盛一日，中国各地从此不断地发生革命事件，不断地发生暗杀大官的事件，另一方面要求制定宪法，速开国会的改良运动亦在此时开展起来了。

滿清政府一方面对于革命思想加以严重的压制，一方面又不得不发出預备立宪的上諭，以图和緩人心，但是这对于一心要推翻滿洲朝廷的革命狂瀾毫无效果。不久，滿洲朝廷的光緒帝与西太后不幸相继去世，光緒帝之弟醇亲王之子溥仪，三岁即帝位，是为宣統帝。是时醇亲王出任摄政，清廷当时失去了中心人物，令人发生一种空虛之感。宣統元年（1909年），足以調和滿汉感情的張之洞亦病死，这对于清廷更为不幸。

各地要求从速頒布宪法、開設国会的呼声日益高漲，摄政王迫不得已答应将于宣統3年成立責任內閣，宣統4年頒布宪法，宣統5年開設国会。然而宣統3年成立的新內閣中，醇亲王自任总理<sup>①</sup>，此外十一名大臣中，汉人只有四名，七名是滿人；七名滿人中有五名是皇族。因此，汉人称此內閣为皇族內閣，越发加深了种族的反感，他們怒罵清廷的欺騙，并認識到当此外患日深之时，为了保卫国家的独立，决不能把政权交給如此自私自利的滿洲朝廷，及至新內閣发表大借外債以實現铁路国有政策，于是輿論大嘩，认为清朝至今断送了不少的权利于外国人，現在又要借铁路国有政策拍卖铁路。各地高呼收回國家已失权利，掀起反对运动，特别是在四川，为了川汉铁路問題发生了总督与人民的冲突。一时省城罢市，学生罢課；其后官兵亦加入暴徒之中，風云日益紧急，革命党乘

<sup>①</sup> 当时內閣总理大臣是庆亲王奕劻，并非醇亲王。——譯者

在武昌的湖广总督端方带武汉驻军入川镇压之际，约期起义。事泄，乃于宣统3年8月19日即新历10月10日，在武昌起义，共推官军协统黎元洪为革命军都督。

不久，全国各地响应，纷纷宣布独立或掀起叛乱。至11月底，宣布独立者有：安徽、广西、贵州、广东、山东各省，及长沙、九江、西安、杭州、重庆、成都等城市。去成都镇压暴动的端方亦在中途被害。不久，在武昌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1月召集各省代表，到会者只有十一省代表，共二十四名，在汉口开第一次各省代表会议，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纲。

武昌叛乱的消息达到北京后，清廷震惊，立命陆军大臣蔭昌前往讨伐，然其所率领的新军毫无斗志，反而战败，无法可想。于是只有起用已被罢免但仍为北方军界的领袖并拥有巨大势力的袁世凯。乃派特使到项城<sup>①</sup>，请袁出山，而付与讨伐的全权，清朝的命运于是落入其掌握之中。袁世凯乃命馮国璋及段祺瑞前往讨伐，立即夺回汉口、汉阳，革命军逃往南京<sup>②</sup>，然袁世凯密令按兵汉阳，不再追击；并且对于革命军进攻南京，亦不发兵；反而请英国领事为中介，设法与革命军妥协。革命军不久攻陷南京，树立南京政府，推孙文为临时大总统，正式改国号为中华民国，以五色旗为国旗。又改阴历为阳历，以宣统3年11月即西历1912年1月为民国元年1月。对于袁的妥协方案，孙文在达成了“袁使清帝退位，孙举袁为大总统，接受共和政治”的密约条件下，表示同意。

袁世凯此种态度，实有负于清朝之委托；而推举军阀巨头为新国家的总统，孙文的态度亦有背于革命的精神。可是当时情势对

① 袁世凯虽为项城人，但其时则居于彰德。——译者

② 是武昌。——译者

于袁說來，民心確已脫離清朝，革命的趨勢是不可阻遏的；對於孫說來，共和的大勢雖已風靡全國，但實際上革命軍的武力尚屬薄弱，基礎未固，所以雙方不得不作了如此妥協。

（小竹文夫：《現代支那史》，第49—54頁，傅仲濤譯。）

### 三十一、宮崎市定：論辛亥革命

光緒帝與康有為一派所進行的戊戌變法即穩健的改良運動既已失敗，接着便發生其反面的義和團排外運動，使中國陷於更加不利的境地。現在留給中國的唯一救亡辦法就是發動革命，推翻清朝。這就是說，排外運動既使中國瀕於危亡，於是革命運動便代替排外運動興起來了。在日俄戰爭之後，曾有多數學生為求新知識到日本及其他各國去留學。他們親眼看到近代先進各國的社會無不驚嘆。和陳腐的中國舊社會對比一下，他們幾乎全部抱有急進的革命思想，孫文便是革命運動的領導者。

孫文與康有為俱為廣東省人，康有為出身於讀書人階級，所以抱有改良思想，孫文出身於平民階級，青年時代在檀香山生活，即投身於革命運動。中國自古以來，就有革命思想；但是以前所謂革命，只是改朝換代，社會制度並沒有改變；西洋式的革命思想則始於孫文。孫文起初是以美、法的革命思想為主，加入一些社會主義的思想，制成了三民主義的革命綱領；在日本召集同志，組織了中國革命同盟會。

日俄戰爭喚醒了清朝保守的統治者西太后及其左右的迷夢，



他們认为小日本之所以战胜大俄罗斯，是因为日本采用立宪政体，俄国采用专制政体。因此清朝如果采用立宪政体，亦可立即成为强国。于是清政府派大臣往各国考察立宪政治，根据他們的报告，宣布中国亦須預备立宪。民間对于清政府此种預备立宪运动不满，进一步发起了立宪促进运动。这种运动表面上是立宪运动，其实有些地方是伪装的革命运动。清朝决定采用立宪政体可惜太迟，人民已經前进一步，正在准备革命。

西太后在清末十年間，掌握着清朝的实权，她在七十四岁那年与光緒帝几乎同时死去。后来光緒帝的侄儿宣統，三岁即位，其父醇亲王摄政（1908年）。当时的重要政治家中，袁世凱已从朝中逐出；張之洞已死，清政府完全陷于軟弱无能的状态；既不能采用新制度，又不能整理旧制度，只是在旧制度上增加一点新的制度，因而財政陷于困难。为了打开財政困难的局面，不得不从外国借債。要借外債，需要有确实的担保。于是政府借口全国铁路国有化，收买一切商办已成及未成的铁路，以全国铁路为担保，向外国借債；用此借来的資金，在統一的計劃之下在內地修筑铁路。一切商办铁路公司都反对政府这种主張，他們认为此等資金如被政府挪用于其他方面，将来只有一些外債留給人民負担，而中国铁路均将成为外国人的产业。

四川铁路公司早已获得修筑川汉铁路的权利，然并未有敷設一哩铁軌。它的铁路修筑权現在要被收归国有，因而在四川等地引起了猛烈的反对运动，并发生了暴动。

湖北省新軍与此暴动相呼应，在湖北省城武昌，豎起叛旗，推黎元洪为都督，組織中华民国軍政府，占領包括武昌与长江对岸的汉口及汉阳在內的所謂武汉三鎮为根据地。上海与此几乎同时亦

发生革命，革命軍不久占領南京。各地方当局接到武昌起义消息之后都发生动摇；各省在其有势力的軍政人員領導之下，相繼宣布独立，或宣布中立，或进一步与革命軍合作(1911年)。

(宮崎市定：《論辛亥革命》，見京都大学編《东洋史》，第400—401頁，傅仲涛譯。)

## 第十五章 五四运动

编者按：这里选录资料七篇，代表欧美和日本的资产阶级反动学者对五四运动的看法。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为反对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拒绝取消二十一条、收回山东被日本夺去的权利等正义要求而发动的爱国运动。它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开始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后来发展为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广大群众运动。它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主义的运动。五四运动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废止二十一条条件”、“抵制日货”等口号而外，在文化方面的口号是要求民主和科学，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中传播了中国必须实现社会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观点，并以此开始在工人中间进行宣传、组织活动。五四运动是中国民主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从此以后，中国的民主革命就成为中国工人阶级所领导的革命，并且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部分。

外国资产阶级反动学者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对五四运动的论断是和我们针锋相对的。他们对五四运动作了种种曲解，强调五四运动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与科学影响之下的所谓中国文艺复

兴运动。他们否认俄国十月革命对五四运动的影响，否认五四运动是群众性的爱国运动，歪曲运动的阶级内容，夸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运动中的作用，说什么“学生”掌握着运动的领导权，企图抹杀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运动中的作用并否认五四运动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例如赖德烈说：五四运动是西方影响下的新思潮。它用批判的精神对待一切文化思想，不问它是来自西方或东方的。中国人的思想许多世纪以来第一次摆脱传统的束缚而得自由发展。得到解放的学生的思想为全世界的思潮所激动。费正清说：五四运动是由知识分子所领导的。官吏与士绅与运动无关，新军人或新政客也没有领导这个运动。知识分子在运动中很快就得到商人、产业工人、手工业者和其他类似的组织的支持。五四运动把科学与民主的新文化思想和新爱国主义纳入一个共同的反帝纲领之中了，中国读书人阶级在中国近代史上对中国的命运担负起更重大的责任了。他们努力通过学生的组织，使他们的影响达到乡村里的普通人民。这可以说中国的学者为了一个共同的事业与农民接触的开端。佐野袈裟美说：五四运动这样的群众运动，表现出时代的特色，学生掌握着运动的领导权。小竹文夫说：这次运动原来是青年知识分子出于改造中国的热忱，愤恨政府政党的软弱，感到自己有责任而掀起来的。不过有时完全放棄自己的学业，也有类似于疯狂的行动。

外国反动学者歪曲五四运动的形象，否认五四运动是反帝爱国运动，抹杀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把五四运动描绘成资产阶级的“文艺复兴”运动，其目的归根到底还是要掩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反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企图从思想上瓦解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意志。

## 一、賴德烈：論五四运动

对于基督教事业有极深影响的第五个新运动有各种不同的名称，如文艺复兴、新思想、新文化或新潮。虽然它只是中国正在經歷的变迁的一个方面，但是它是重要的，因为它与思想有关系，且主要是影响知識分子的。旧的科举制度的消灭使人們对旧类型的教育失去了主要的刺激。中国人的思想許多世紀以来第一次不受过去成規所拘束而得到自由发展。得到解放的学生的思想为来自全世界的潮流所激动。外国书籍大量翻譯出来，新式学校迅速增加，这些学校除了教授中国的課程外，并教授西方科目。数千学生到外国去留学。他們从日本、欧洲和美国归来，热烈地带回来新穎的見解和思想。来自其他国家的讲学的人，特别是美国的杜威与英国的罗素，在中国作广泛的訪問，且受到了广大听众的热烈欢迎。

到了1919年，这个运动已有相当的进展。国立北京大学成为运动的中心，但是它的影响是全国性的。当时北大的校长为蔡元培。蔡氏在旧政权下是一位翰林，曾被誣蔑为一个急进派，且曾在德国呆过几年。

文艺复兴运动不容易予以描写，因为它的拥护者已經作了許多記載，且它所表現的方式极多。而且在这里作一个全面叙述也超出了本书的范圍。总的說来，它是批判性的檢查一切过去留下来的思想——不管是来自西方的或东方的——的一个尝试。沒有一种制度、風俗或信念是太神圣或太古老的而可以不受怀疑。新

思想受到歡迎，但是，——至少在理論上——它們為科學方法所考驗，每一個違反思想自由或言論自由的行為引起憤慨，一切限制中國主權及外人貶低中國文化的事遭到堅強的反對。許多學會出現了，從事於討論和宣傳這種新精神，其中以少年中國學會、合作學會、哲學會及文藝復興會為最著名，全國青年在談，在想。

舊的文言體被白話所替代，白話是一種高尚的官話，它在說那種話的地方都能為人所了解。這一個革命被人歡迎為象近代歐洲語言代替拉丁語一樣的偉大。胡適和他的幾位朋友於1917年開始這項改革，儘管受到批評，到了1920年，這項改革已經獲得這樣的力量，以致教育部命令各小學教授白話文。的確，白話已成為新學生階級的文字媒介。幾百種雜誌用白話體裁出版，其中主要者有《新青年》及許多書和小冊子。與用白話來創造文學的運動相聯系的——如果那種文學要為一般人所了解，則這種企圖是必要的——是企圖採用一種官話作為全國的語言，特別是在不說官話的地區。學校里教授這種官話，以期它不久能通行而有助於國家的統一。

新潮的其他方面是新文學方式的創造——包括新體詩——無數學會的組織、哲學的熱烈討論——幾乎所有中、西學派都被審查——及一種脫離已經確立的社会制度和風俗的願望。婦女，特別是女學生，要求更多的自由。學生們常常懷疑老一代的理論標準。他們常常堅持安排他們自己的婚姻而不要由他們的父母代庖。他們經常不安於他們教師的管理，並且要求在辦理他們的學校方面有發言權。學生罷課成為學校生活中最突出而最經常的特點之一，在政治上極活躍的激烈愛國的学生運動與文藝復興有密切的聯系，而且象它一樣，以國立北京大學為其大本營。

新潮不仅以不容忍外人控制而且也以内政改革的热情为其特点。它的拥护者反对軍閥的統治，认为孙逸仙是一个理想的人物，并且是国民党的热誠贊助人。他們公开地表示致力于进步，希望群众在經濟、政治、社会及教育方面有更大的机会，其中有些人鼓吹民主，其他人为俄国共产主义所吸引，但大部分人贊成普及教育。文艺复兴是一个沸騰的新生活，急切地、怀疑地、非常爱国地、渴望地、急进地、要求建立一个摆脱旧束縛和不容忍新束縛的新国家，但往往是不实际的、不成熟的、不稳定的，对观察家来說是个迷惑，为有些外国人所称赞，但也为其他外国人所譴責。中国文化数世紀以来从沒有处在一个象現在这样大的流动状态中，如果从前曾有过的話。許多农业地区及內地比較小的中心还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在大城市中旧規矩、旧习惯、旧信仰和旧制度已經消失，而且沒有稳定的东西起而代之。

（賴德烈：《基督教在华布道史》，第 691—694 頁，孙瑞芹譯，呂浦校。）

## 二、費正清：論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是中国給予 1919 年 5 月 4 日北京学生以示威方式举行的知識分子运动的名字。这个名詞已經推广来代表中国讀書人階級在那个日期前后年代思想和活动的整个发展。这个知識分子运动从它的历史背景說来，是 1925 到 1928 年的成功的国民党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准备。因此，如果欲适当地理解它，我們必須以中华民国第一个十年代的軍閥混战、工业化和方兴未艾的爱国主

义为标志的背景来观察五四运动。

三种情况影响了 1911 年到 1921 年这十年。第一，皇朝的中央权力已经完了，但没有同样有力的东西能取而代之。因此自上而下的改革或镇压的力量松弛，而地方上变动和革新的机会增大了。其次，列强们完全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所牵制住了，中国的工业有了比较不受外国商业竞争而得自由发展的一个喘息时间。第三，世界大战给日本以一个政治侵略的机会，日人于 1914 年把德人驱逐出山东后，于 1915 年向中国提出它的臭名远扬的二十一条要求。这个以武力威胁作后盾的厚颜无耻的外交，巩固了日人在山东和东北的地位，但不能做到使日人在中国建立一个保护国。在这个过程中，它激起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达到一个新的高潮。

当然，中国的新的民族主义深深植根于它旧有文化上的自傲，这等于是一种“文化主义”，它是如此的深厚，以致无须明说，就可以采取的。中国一直就是人所共知的天下。近代的中国人一旦与那些不仅打破了中国的优越感、而且事实上威胁它的生存的各个爱国的民族相接触，它就可以近在手边地吸取一个爱国主义的巨大源泉了。

**軍閥主义** 軍閥主义是一个老式的政治现象。它基于这事实，即苦力军队容易征募，而且中国的各省中有许多有自然的地理边界，易于造成能比较地独立于外来的权力之外的军事割据。东有崇山、西南有黄河、北面有在蒙古的万里长城的山西省，就是一个根据地理边界自成单位的最好范例。山西省从 1911 年到 1949 年几乎没有间断地在一个軍閥所谓“模范督軍”的统治下，是不足为奇的。其他軍閥地区都以关键性的经济地域为中心，像广州盆



地，四川的成都平原或上海和南京周圍的长江下游。

各个軍閥的目的是欲利用这些地理基地来扩大他的軍隊和經濟資源，征服他的竞争者，并借此照傳統方式继承天命。企图遵照这种习惯形式的軍事領袖們，就他們的出身說来，代表了两个皇朝交替中間时期的社会流动性。在这个时期的十二个主要軍閥中，一个以小販，另一个以琴师起家，两个出身于行伍，一个曾是土匪，另外一个苦力。所有这些人中最著名的也許是基督教將軍馮玉祥，他受莫德博士的影响，信奉卫理公会系統的基督教，且对他的士兵树立儉朴生活和严格紀律的榜样，他是一个体格非常高大、魁偉而健壯的人，他以农民出身引为自豪，且以他个人为表率の品德統率他的軍隊。他用一个救火水龙头對他們施行洗礼的傳說可能是不正确的，但是，关于他的这个及其他的民間傳說证明，他是一个非常富有活力的人物。馮时常改換他的盟友，在变幻无常的軍閥派系中先在这边作战，后来又倒向那一边，这正是大家爭夺权力的象征。1925—1926年間他接受俄国人援助。1927年他与蔣介石联合，但1929年又反对他。最后他成为馮元帥。国民党的一个空有荣誉但无实权的俘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不得不把他的時間花在研究书法上。

在軍閥期間混战的高潮中，孙逸仙曾屡次設法通过利用軍閥的途徑来达到他的革命目标。他不久对西方議會制度的功能失去幻想。1914年他从中国政界党派間徒然无用的竞争中退出来，再一次組織一个忠于他个人的秘密革命党，借以完成革命未完成的任務。1917年，他由中国海軍的主要部分陪隨赴广州，企图同当地軍閥合作。虽然他起初遭到挫折，但他仍繼續用軍事方法統一中国。1920年夏，他与广东督軍合作打广西督軍。1922年初他发动

他首次的但是流产的北伐战役，循着七十年以前太平軍所走的同样路綫进入湖南。

在和軍閥們竞争，与他們当中的某一些人合作对抗另一些人的老一套的努力中，孙也反对当时流行着的联邦思想。这个概念，在近代中国，根据同美国的經驗所作的类比而有时被提出来。1922年曾有一个普遍的“联省自治运动”。当时的知識分子爭辯說，在中国，民主必須在省議会的基础上发展，然后一个全国性政府才能在联邦路綫上建立起来。軍閥支持一个联邦宪法作为他們自己地方自治的基础。但是，一个显著的事实是，这种联邦运动的邏輯和表面的适应性是无用的。人們可以推測，中国沒有效法美国十三州的外国榜样是为了两个主要原因。第一，“天无二日，地无二主”傳統的巨大重負支配了政治思想和政治野心。第二，外国干涉中国的危險动員了一切民族主义力量支持国家統一，而这个統一可以在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下实现。

**新工人階級** 这个时期的民族主义部分地从中国大城市中发达的工业得到它的推动力。第一次世界大战給中国工业一个扩大生产的机会。中国在早先开始的基础上，在紡織、面粉制造、火柴、卷烟、水泥、罐頭食品及类似的大規模商品生产中发展了它自己的工业。重工业及高度技术性的生产方式仍被推迟。但是，使用廉價手工劳动力照料紗錠或挑选烟叶逐漸发展了。新的重要城市如济南、徐州及郑州在铁路交叉点成长起来。上海、天津及汉口成为有一个工厂劳动階級的真正工业中心。

大小工业城市的成长，开始为乡村的农民群众提供了就业的选择机会。新城市和通向那里的铁路为农民的生活上的束縛开辟

了一条出路，例如一个农民的儿子不必再那样地以完全依靠他的家境、特别是对父亲尽孝来作为唯一能达到美好生活的道路。同样地，受惯男性统治的农村妇女因为有了工厂工资的方式，而得到一条可以由她们选择的可靠道路。中国的旧家庭制度开始崩溃了。

如果我们回忆一下家庭怎样曾经不仅是一个社会的而也是经济的制度，每一个农民家庭都自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单位而理想地活动着，那末，这个过程的极重要的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家庭的成员，耕种他们自己的土地，共同管理他们的家，设法尽可能少地依靠外界来维持安全。习惯和环境久已推行了家庭结合和讲身分的个人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每一个人找到他被命运所安排的位置。但是，工业城市的新生活是以完全不同的组织原则，以职能而不是以身分为基础的。那赚工资的个人，可以成为自生自养的经济单位，而不是家庭。而且个人的就业和失业都须依照劳动市场上的与个人无关的标准，不必牵涉到私人的或家庭的关系。没有人应当把一个工业城市中不熟练工人的生活理想化。要点是这种新的生活尽管有一切的流弊，究竟在旧的之外提供了可以选择的东西。不仅于此，它产生了一个新的人民的阶级，对于他们，旧的忠诚和习惯不复适用，一个新生的无产阶级，准备矢忠于群众运动，例如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

**新商人阶级** 城市的成长对中国的商人阶级有最直接的影响；十九世纪的通商口岸已经为他们开辟了一个有机会的新时代。“买办”这名词（起源于葡萄牙文），在中国沿海的洋涇浜英文中已经久已通用，意思是指代表外国商人在中国作一切活动的“总经

理”而言。通商口岸外國洋行的買辦，不久便效法那些直到 1842 年還在廣州國際貿易中中國一邊壟斷着的著名行商的榜樣，凭着他們自己的能力成為商人。這個新商人階級在外人的保護下成長起來。它是照外人的方式訓練的；而且在治外法權制度下常常因為適用外人的法律的運用而受到保護，這個商人階級在它的後一階段中，開始以中國近代官吏的庇護來代替外人的庇護。

在中國與外國的貿易中，因貨物和幣制上的價值差異，為中國中間商人投機倒把的天才造成了大好機會。中國商人的資本大量集中於通商口岸，這些商人吸收了西方思想，開始共同感覺到對民族獨立和統一的關懷。這種關懷也是其他國家近代資產階級的特點。

這個在中國商人階級中日益成長的愛國主義的一個證據是，越來越多地使用抵制外貨的辦法。在中國人生活中抵制外貨是一個廣泛利用的消極抵抗或非暴力強迫的方式，通過它，有組織的團體如商會能對官吏運用他們的影響。在二十世紀它們開始被用來作為反外的手段。1905 年廣州商會發起抵制美貨，抗議美國排斥華工。1908 年廣東人又為了一個外交事件而抵制日本，表示愛國的憤慨。1915 年的二十一條要求激起了一個全國性的抵制日貨、提倡中國貨和扶助中國工業的運動。這個運動在幾個月里對日本貿易有了顯著的效果。

**新讀書人階級** 所有這些因素在 1919 年都是在幕後的。這一年的五四運動給了他們以知識上的方向和領導。知識階級現在在短時間內擔起中國革命的積極領導。這反映了一個事實，即中國的問題如此重大，對它進行分析和了解，現在比任何時候更成為

有效行动的先决条件。1898年立宪改革运动和1911年以后议会运动的失败，说明了只模仿西方不足以改造中国。可是，1895年败于日本的民族耻辱、1901年的辛丑条约和1915年的二十一条要求，加深了中国社会必须以某种最根本的变革来复兴和改造的认识。

在这个复兴问题上被攻击的一点是文言文，在二十世纪仍用着约在耶稣时期创造的一种书法和辞汇。在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人的心理中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问题的是，这个文字，像拉丁文在西方一样，是否已成为过时而不足应付近代需要的了。像所有文字一样，汉语是那些研究它的人的产物，也是他们的创造者。像日语，它也开始吸收近代的专门名词。基本问题不是文言文能否作为近代学术之用的专门问题，而是它能否作为书写的媒介传播于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中的社会问题。

既然中国书写的文字曾是上层阶级享受中国文化果实并维持它在社会上支配地位的工具之一，则文字改革和它所可能促成的识字运动，也就成为中国革命中的一个基本问题。

语言革命中的第一阶段是在书写方式中引用日常的白话，这是欧洲在文艺复兴时所采取的步骤，当时各国的土语替代了拉丁文。在中国，著名学者和作家、后来以中国战时大使为美国人所熟知的胡适博士担任领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他在康奈尔和哥伦比亚大学作学生时，他主张用白话作为研究学问和一切交接之用的书面媒介，许多其他的人加入了这革命运动，运动否认文言文有优越价值，且使儒家经典成为学者的参考书而不再是每个学生记诵的课本。白话的使用迅速地推广，这意味着经典的专制已经打破了。

胡適是杜威和實驗主義者的學生。他也成為鼓吹科學思想和批評方法的一個領導人。科學在專門研究中的價值久已無可否認。作為一種思想方式，它的应用於中國文學批評和歷史研究，標誌着在革命過程中前進了一步。新學者有力地攻擊中國古代歷史中的神話和傳說，並且重新估價經典的正確性。

隨着科學而來的是民主。它是新學的另外一個口號。在傳布科學和民主的新主義中，一個富家的兒子陳獨秀，擔任領導。他曾在法國吸收法國革命的傳統，歸國後於1915年在上海創辦一本雜誌，名《新青年》。不久以後，在各城市興起的類似的學報上，革命年代的學者們爭辯和討論着應用西方思想於中國的舊文化的問題。胡適主張對一切事物採取批評態度，及一個健全的个人主義的必要。陳獨秀像梁啟超一樣，以人權和社會不等的名義攻擊儒家。這些學者針對着中國社會的根源，指出一條通向倫理革命的道路。

自1917年起，這一知識上的醞釀，集中於北京大學（一般簡稱北大）。北大校長蔡元培是一個勇敢的思想 and 言論自由的鼓吹者。他邀請陳獨秀任文學院院長，胡適任教授（毛澤東大約在這時候為北大圖書館助理）。有了這個領導，五四運動發源于北大是不足為奇的。

**學生運動** 1919年的五四事件是因為凡爾賽和約制訂人把以前德國在山東的特權留於日本手中的決定所激起來的。聽到這個決定後，大約有北大和北京其他學校的五千學生在天安門前舉行群眾示威。他們焚燒了一個親日官員的住宅，抓到並痛打了中國駐日公使。警察毆打了他們。他們接着號召學生罷課，拍電報給

别处的学生，組織爱国的小队散发傳单并在市民中演說。类似的游行在天津、上海、南京、汉口、福州、广州及其他地点举行了。有几个学生被杀死，其他学生受伤，監獄不久充滿着示威的人。

抗議精神蔓延到商人中，他們罢市加入运动。罢市于1919年6月蔓延到各主要中心。这个运动发展成为抵制日貨，且发生了同日侨的冲突。爱国学生有一年多繼續了摧毁日本在中国的市場的鼓动工作并对市場发生了相当影响。在这个期間，由新近組織的工会举行了罢工。这些工会参加了中国未曾有过的民族感情的最广泛的表现。

这个运动令人吃惊的是，官吏和紳士这一傳統的統治階級固然像料想得到的那样，与运动无甚关系，但运动的領導也不在新軍人或新政客之中。它是由知識分子所領導，而且他們迅速地受到零售商人、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組織和类似团体的支持。运动特别有意义的是在这里，它把科学和民主的新文化思想和新爱国主义置于一个反帝綱領中的共同焦点上。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知識階級現在比以前更多的对于中国的命运担負起了責任，且努力通过他們的学生組織达到乡村里的平民。如果說这是使中国学者在一个共同事业中与农民接触的近代努力的开端，不是言过其实的。

（費正清：《美国与中国》，第163—171頁，孙瑞芹譯。）

### 三、小竹文夫：論五四运动

民国以来，政局虽然紛乱，但在一般知識分子間却掀起了一种

新思想新文化运动，表示着今后中国发展的方向。它对于自清末以来即已动摇的傳統思想、傳統文化，下个总结；对于民国以来尚未找到的新思想新文化給以启发。此文化上的启发，由其經過看来，不难設想是站在全面的反抗或否定傳統的旧思想、旧文化的立場上。此种新思想不久受到一般社会的欢迎，特别是以民国 8 年（后面所說的）五四运动为轉折点，成为社会一般的潮流；更进而成为不但是在思想上，并且在政治上、社会上各方面要求建設新中国的学生群众运动。因为五四运动对于扩大这个运动有划时期的作用，所以俗称这次新文化新思想运动为五四运动。

领导五四运动的新思想新文化运动的先驅者是陈独秀及胡适等。陈独秀从民国 4 年以来，就創刊《新青年》杂志（該刊初名《青年》，1916 年 9 月改名为《新青年》。），运用其独特的尖銳犀利的文笔，开始向儒教进行正面的攻击。因为他大致采取着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立場，所以他觉得儒教現在只是封建时代的遺物，对于新中国只能成为使社会返回到旧时代的反动工具，对于新时代的前途是沒有任何价值的。他对于当时因袁世凱祭天、祭孔令而起的尊孔运动，揭穿其尊孔与袁氏帝制的关系，加以批判或攻击，不遺余力。他认为孔教應該即速排除；而且我們只有排除孔教，才能达到革新中国的道德和国家革命的目的。

胡适自民国 5、6 年以来即提倡文学革命。他主張用文字叙述自己的思想、表达自己的感情时，不要徒然舞弄一些难解的死板板的古文，只要用現代的口語就够了。他的主張虽不是和思想直接有关，却是和接受思想、表达思想有关的，而且是全面的排斥傳統的古語古文的意見。他觉得因为用死文字作詩文，所以很久以来中国就沒有有生命的文学。因此只有用口語自由写作，才能是



真正的文学，这正是今后中国应该采用的方法。林琴南等古文派学者反对这提倡口語即白話文运动。但是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贊成这运动，尤其是北京大学国文科教授錢玄同，还进一步主張廢棄汉字，采用羅馬字。但是政府亦感觉到有統一文字及語音的必要，所以尽力計劃統一國語，規定标准音。民国7年政府公布新造的表示國音的音符。即注音字母，文学革命論者即主張需要普及注音字母，并企图使用注音字母来普及并提高普通教育。

此等反对傳統文化論者企图推翻傳統的旧文化、建立新文化的思想基础，乃是象陈独秀和胡适等所宣布的民主主义与科学主义。此处所謂的民主主义，不单是政治上的，可以理解为对于社会上經濟上一切文化方面的自由主义、平等主义、个人主义、大众主义。所謂的科学主义，除了是單純的學問方法以外，还应理解为彻底的克服形而上学，发现最高的唯一真理的工具。关于民主主义陈、胡二人的意見完全相同；不过关于科学主义的观点，两者由于性格的不同与所受教育的关系，虽然是同样主張科学主义，其所主張的內容却不相同。这就是說，陈独秀主張上文所說的馬克思唯物史观的方法为唯一的科学方法，胡适則主張以英美哲学的实验主义的方法为唯一的科学方法。

五四运动发端于民国8年（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团反对巴黎和会对于山东問題的決定，立即傳播到全国範圍的一次学生群众运动。先是，日本以德国为敌国，参加了欧洲大战，占領了德国租借地胶州灣。民国4年，中日間进行交涉，5月遂簽訂了協約。这就是一般所謂的二十一条問題，此条約在中国引起了劇烈的冲動，因此，在上海組織了对日同志会，許多留学生都紛紛回国，

从事于排日运动。于是各地均发生了排斥日货、破坏日本商店的暴行，中国民间舆论一时哗然。不久，中国也参加了欧洲大战。在大战終了之后，中国代表在巴黎召开的善后会议巴黎和会席上，以中国参战为理由，主张应该把山东直接交还给中国，没有为会议所采纳，只是按照日本的主张，决定用中日交涉的形式交还给中国。此消息传到北京之后，乃于上述的5月4日，北京学生团拿着“还我青岛”等等的旗子举行大示威运动，烧毁被视为亲日派的大官曹汝霖的住宅。打伤章宗祥，因而当局逮捕了三十余名的学生。于是再度举行示威运动，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罢免曹汝霖等，并实行罢课。此次学生运动立即蔓延到全国各地，天津、济南、上海、杭州、开封、武昌、安庆等处的学校都相继罢课，各地成立了学生会。因此，北京政府迫于不得已，释放被捕的学生，下令罢免曹汝霖等的官职。于是，学生认为他们的示威运动有左右政治的力量。此后，在上海组织了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统辖全国学生会，以期统一学生的行动，于是学生们对于国家的政治外交问题，突然起来高呼恢复主权，进行排外活动。此次运动的发生，是青年知识分子出于改造中国的主张，愤恨政府政党的软弱，感觉到自己有责任进行改造的缘故。但是，他们有时完全放弃自己的学业，也有类似于疯狂的行动。

以此次五四运动为转折点，上述民主主义及科学主义鲜明地表现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根源，并成为一般青年知识分子的主要思潮。但是在唯物史观科学主义与实验主义科学主义之间，当然是后者受着一般社会的欢迎，至少在表面上，实验主义获得了绝对的胜利。民国8年至10年，美国的杜威，11年英国的罗素，应中国的招聘，前往中国各地站在实验哲学的立场上讲演各种问题，也是

由于这个原故。然而中国的唯物史观的科学主义也受着俄国十月革命的刺激，其后又受到苏联援助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宣言的影响，至少在一部分青年之间拥有热心的信徒。这派易与实际运动结合的人士，于民国9年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中心，在苏联援助之下组织了中国共产党。

在关于旧中国的改造和新中国的建设问题上，除了对外需要高呼收回主权，要求民族平等以外，对内也需要在思想、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进行改造。因此，学生运动以后也从事于内部的各种实际的改造运动，对于中国社会作出一些伟大的贡献。

至于思想上的改造运动，是要从传统的旧思想的束缚下面完全挣脱或解放出来。因此各地的孔庙被破坏，多变为小学或兵营。对于这种现象，辜鸿铭、梁漱溟等主张，西洋有科学的物质文明，而东洋也有独特的精神文明，对于祖国的文化毫无认识而完全抛弃它是不对的。但是学生们仍多数趋向于新思想，他们在政治上希望有完全的民主政治，因而攻击阻碍民主政治的军阀官僚，在社会上高呼个性解放，排斥家庭制度，要求妇女解放，其结果，原来的家庭制度和纪律放松了；实行男女同校和文明结婚。以前穿着长裙在深闺里的妇女们，现在穿着短裙放足走到街头上来了。男子留短发，女子剪去髻发的风气普及全国，也是在这时候。

乘此社会潮流，从新以中国革命为目标出现的乃是中国国民党。今后的政局将以此中国国民党和同样以中国革命为目标的中国共产党的分离与合作为中心，展开出来。

（小竹文夫：《现代支那史》，第61—68页，傅仲涛译。）

#### 四、佐野袈裟美：論五四运动

第一次欧洲大战发生后数年间，中国民族工业有了飞跃的发展。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也逐渐形成，并壮大起来。在此时期发生五四运动这样的民众运动，是不足为奇的。表现这个时代特色的，乃是学生掌握着运动的领导权。

当巴黎和会开会时，中国关于山东问题的要求没有被和会所接受，这个消息传到中国以后，中国民众大失所望，不平之气立刻爆发起来。亲日派曹汝霖、陆宗輿、章宗祥等成为攻击的目标。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十三校的学生代表，午前在法政专门学校开会<sup>①</sup>，讨论支援外交办法，午后男女学生三千余人集会于天安门前广场，举行示威运动，决定由天安门到日本公使馆去示威，但为警察所阻，乃改道冲往交通总长曹汝霖私宅，曹汝霖闻此消息，便立刻跳墙逃走。此时，驻日公使章宗祥适在场，受到学生的质问，为学生殴伤甚重。学生们放火烧毁曹宅后，乃行退出，途中有学生三十余名被捕。北京总商会支持这次的学生行动，从此以后，排斥日货运动即进入高潮，它对于中国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是有利的。这个运动继续了一年有余，日本对华贸易受到了很大损失，对华输出减少了百分之四十。

北京学生向总统提出请愿书，请求罢免曹、陆、章三人，但是没

---

<sup>①</sup> 当时开会场所是北京大学法科，并非法政专门学校。——译者

被政府采納。于是在北京組織北京学生联合会，学生运动因此日益壮大起来。5月25日全体学生举行罢課，与政府展开斗争，北京的学生运动，立即影响到全国各地，各地学生也团结起来举行罢課。北京学生联合会复派委員前往各地加以煽动，因此运动发生后不到两星期，长江一带各大都市都成立了学生联合会。6月初，上海学生会在上海商会支援下举行大规模的罢課、罢市，北京政府不得已乃釋放被捕的学生，罢免曹汝霖。6月19日，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此次五四运动遂成为群众性的民族革命运动的先驅。

（佐野袈婆美：《支那近百年史》下卷，第500—501頁，傅仲涛譯。）

## 第十六章 其他

編者按：这里选录了六篇資料。

第一篇費正清的作品反映美国资产阶级反动学者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科学的。他們把旧中国的为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服务的历史著作当做所謂真正的历史科学著作，誣蔑解放以后的中国历史科学是“为了宣傳目的的教条主义作品”，其目的仍是反对中国的人民革命和共产主义事业。外国反动学者为了维护帝国主义的政治与經濟，不仅反对中国人民民主专政，而且恶毒地攻击中国的文化教育科学事业，反对中国的历史科学研究。

第二篇是日本反动学者三上次男在日本中等学校历史教科书里写的关于中国近代历史部分。第三篇是市古宙三写的近十年来日本历史学界研究中国近代现代史的概况。第四篇是北村敬直写的日本历史学界研究中国社会經濟史的概况。第五篇是加藤祐三写的1959年日本研究中国现代史的綜合报导。解放以前日本反动学者歪曲和捏造中国历史，对中国极尽誣蔑之能事。他們把中国人民看做天生的奴僕，把中国历史說成自古以来就是異族統治中国的历史。解放以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日益扩大。日本资产阶级学者对中国历史的看法自然也不得不随之而改变。他們的語調也改变了。从这几篇报导里可以看出：日本历史学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用了很大的力量从事中国近代、现代史的研究。他們研究的范围已經从国际关系史扩大到中国的政治、經濟、

軍事、外交和文化科学史方面去了。他們的历史观点也隨之而发生变化。日本資產階級学者中間一部分政治上傾向于民主主义、历史研究中企图从科学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人数在增长着。絕大部分的日本資產階級学者在政治上幻想中立，在历史研究中也改变了过去蔑視中国的論調，但仍在坚持資產階級的反动观点。另外一部分日本反动的頑固派学者則追隨于美帝国主义御用学者例如費正清等人之后，繼續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以前的陈腔濫調，誣蔑中国历史，为美国和日本的特垄断資本服务。

近年来日本历史学界的情况是如此，欧美資本主义国家历史学界也反映出同样的傾向。外国資產階級的中国历史研究是为帝国主义特垄断資本服务的。研究中国历史的外国資產階級学者鉴于中国人民力量的強大，已經不能再襲用过去的陈腔濫調“研究”中国历史，国际形势迫使他們不得不改变論調。他們的論調改变了，但是他們的反动本质却絲毫也沒有改变。

第六篇郝克欧的《中国历史参考文献評論》是美国历史学会历史教师服务处为美国中学历史教师編写的丛刊之一。作者站在反动的立場上向美国中学教师介紹了有关中国历史研究的各个方面的西文資料和西方国家的中国历史研究的趨勢。

今天在東風压倒西風的情勢之下，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美国資產階級再也不能忽視中国問題。这本小冊子的作者也不得不承认：“时至今日，研究中国历史已經成为美国历史学界最有前途和最能做出成績的学科之一了”。自然，美国資產階級的中国历史研究同我們的中国历史研究有本质的区别。我們研究中国历史是要闡明中国社会发展的規律，揭示导向共产主义的图景，为社会主义建設事业服务。美国資產階級研究中国历史是要否认中国社

会发展的規律，抹煞中国历史上的人民群众、階級矛盾和階級斗争，否认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它是彻头彻尾为壟断資本反动势力服务的。

美国資产階級学者論述中国近代現代史时更是极尽歪曲、捏造和誣蔑之能事。这本小册子的作者把美国历史学界的流氓、反共专家吳克 (Richard L. Walker) 称做是研究中国現代史的唯一“学者”，頌揚吳克的反动著作，甚至說：吳克“以分析的态度，用新聞的笔調和口誅笔伐的語气”叙述了1949年以来中国的历史。我們从这一点也不难窺見美国資产階級的中國历史研究的反动本质。

## 一、費正清：論解放后中国的历史学

毛澤东在应用馬列主义于中国“具体实践”中表現創造性到什么程度，也許是一个很帶学术性的問題。每一位把思想从一种文化介紹到另一种文化的人，单只就介紹这一行动來說，就必須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独创的革新者；而在移植一种行为方式时，他又必須在实践上具有更大的創造性，如果不是在理論上的話。

在口語方面，毛氏的素朴的訓誡里穿插着中国經典、俚語式的諺語和比喻。他斥責“坐山观虎斗”的騎墙派和那些以为与农民辯論是“对牛彈琴”的目中无人的干部。凡是曾經繞道避开孳生蛆虫的糞坑的人，沒有一个能不体会毛氏对于又臭又深的中国反动派的糞坑的憎惡。引证孔子的明訓并不一定会推进儒学，但是它有助于使共产主义适应于中国的环境。



在理論方面，毛氏在繼續曲解和擺弄共產主義原則來適應當地需要。我們已經在第十三章內提到由於中國的環境，毛氏怎樣在早期對於列寧主義的修正中，以農民無產階級代替了真正的城市勞工階級。再者斯大林曾說過，蘇聯經過“無產階級專政”階段來達到社會主義的經驗，為進入社會主義提供了唯一道路，這必須為東歐的人民民主國家和可能所有其它國家所遵循。但是中國共產黨人在1949年後鎮定地否認了這種專政的必要，主張無產階級只要在一個統一戰綫和聯合政府中保持領導地位就可導致中國到社會主義，而且能夠通過一個逐漸的、說服的、非暴力的、並不怎樣象列寧和斯大林所假定的那種以暴力突變的改造來辦到。1956年蘇共第二十屆代表大會中接受的“許多道路通向社會主義”的原則給了毛和鐵托修正馬列主義以根據，而且也證實了北京引為自豪的要求把中國作為亞洲應遵循的典範的主張。這樣，中俄意識形態上的團結一致只是以足以加速馬列主義分裂的讓步為代價而得到保持。

同國際共產主義的結合和社會的改造也需要重寫中國的近代歷史。新秩序刺激了以文件來研究新課題，又刺激了考古學中的突出的成就。在北京出現了許多卷的寶貴的历史文件和未必可信的历史文章，主要都是馬列主義中的顯著題目——農民起義，早期資本主義萌芽、历史分期問題、帝國主義的侵略。在這個期間，历史已在有力的教條主義基礎上，為了宣傳目的而重新作了解釋。內中大部分是以誹謗美國的記錄為目的，例如，說我們的海盜或商人販運了鴉片。我們曾參預策劃了英法的“第二次鴉片戰爭”，我們幫助了反動的異族滿人鎮壓太平天國所領導的人民革命，因此我們只答應可以從我們對中國人民的商業剝削中征收僅足在財政上

維持清朝以奴役他們的关税。中国被屈辱地拖进了象作家胡繩所謂的帝国主义世界秩序(国际法)之中。我們的教士为他們的信徒取得特权地位,但这并不能在人民的义憤中保护他們,因此西方各国支持了中国的封建秩序,封建秩序也反过来帮助他們来吮吸中国人民的膏血。

胡繩說：“曾國藩可以算是中国政治史上第一个亲美派的官僚”，因为他派送学生到美国留学；但是，这种无耻的“向外人学习”只能为他們的侵略鋪平道路，西方“决不会让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英国和美国鼓励日本帝国主义抵銷俄国的擴張、我們的門戶开放政策只是一种想要在掠夺中国时平分一份的要求。同样地，在关于改良主义运动、义和团事变、袁世凱的軍閥主义以至最后的但不是最不重要的关于蔣介石的历史解釋中，充滿了半真半假的話、正义的憤慨和受屈之感。

这样解釋的毛病不是不真实(有些似乎是真实的,有些不是),而在于其所含的敌意。現代的历史家們可以列出一張相当长的单子,列举中国对于西方的有根据的控訴,包括某些西方侨民在他們当时庇蔭在治外法权下的生活里几乎觉察不到的情况。但是事情实际上并不全是黑暗的,也不是片面的。我們如果想要中美和平,必須在原則上承认这点。

既然,在北京对历史的看法上,資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一个主要成分,則我們对于把我們指派为什么角色,应当不会感觉奇怪。日本充当了民族敌人,这有助于中国共产党的掌握大权。一旦我們的軍事力量代替了日本,我們也会接充同样的角色。斯大林的策略需要这样。朝鮮证实了它。人們奇怪,如果沒有美国来充当头号民族敌人,北京会怎样搞下去。無論如何,这个姿态有便

于摧毁美国在中国生活中的残余影响，包括以前在美国训练的教育家、基督教领导人及职业工作人员。它也无疑地反映中国共产党人的偏窄的世界观，他们同外国的接触几乎完全限于苏联集团。这反过来给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以更小的外交上的回旋余地——既然被指为中国革命的民族敌人，我们自然不能以毫无批评的友好来回答。解决分歧，包括相互承认，必定是一件双方的事；它的获致不完全取决于我们。

在六亿人民心目中系统地灌输引起人们仇恨的半真半假的历史是使人非常不安的，特别是我们已经被标志为长期的敌人。还有一个令人同样不安的事实是，美国公众在他们现阶段关于中国历史的知識中，不能分清真理和半真理。在我们能够建设性地批评，或者在共产党解释中国近代史时保护我们自己以前，我们在国内还有工作应当作。

（費正清：《美国与中国》，第303—306頁，孙瑞芹译。）

## 二、三上次男：論中国近代历史

（战后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里的中国近代史）

**鴉片战争** 十八世紀末叶，首先在英国发生产业革命，毛織物及其他各种制品如同流水一般不断的制造出来，英国商人把这种制造出来的布匹及西洋杂货运到远东，卖给中国人；中国人却不要这样的商品，所以銷路不好。反之，英国人却从中国买进大量的茶、絲綢、棉花、陶磁器等，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西洋人生活上的必需

品，所以在十八世紀后期以前的貿易，只是英国片面性的輸入貿易，英国于是有大量現銀流入中国，因而苦于現銀不足。这时英国和殖民地印度間的貿易繁盛起来，迫切需要增加輸出，他們眼見印度盛产鴉片，遂将鴉片卖给中国，用以减少現銀的流出。

鴉片是一种从罌粟采取的劇烈的麻醉药原料。象吸烟卷似的吸食鴉片，一刹时就会使人起暢快之感，可是不久便会上癮，使吸鴉片的人成为无用的人。从十八世紀末叶起，輸入中国的鴉片逐年增加，同时吸鴉片的习惯亦蔓延于全国。及至十九世紀，鴉片的輸入額漸次超过茶的輸出額。这样就反过来，中国的現銀便流出国外了。因此，至1830年中国国内的現銀就不足，銀价飞漲。以銀为基本貨幣的中国經濟，因此陷于困难，人民生活亦感痛苦。加之鴉片中毒者日漸加多。为鴉片所苦恼的政府，屢次严禁吸食和販賣鴉片，惟无效果。后来政府决定强制禁止輸入鴉片，1839年派林則徐为两广总督，沒收英国商人的鴉片，并且禁止通商。<sup>①</sup>

此种措置是由以貿易向屬国施恩惠的中国式思想产生出来的，它和以貿易为商业的英国式想法完全冲突。憤怒的英国政府于是决定以武力来解决問題。1840年，以新式海軍来进攻中国，溯揚子江而上，迫于南京城下。清朝战敗，不得已乃締結南京条約。在条約中規定：割香港于英国，賠款，开上海、广州等五口为商埠（南京条約）。

中国与西洋站在平等的立場上訂立条約，乃以此为始。以中国为世界中心的傳統政治思想，于是开始垮台，中国遂成为世界各

<sup>①</sup> 后来中国也栽种鴉片。到民国以后，法律上虽然禁止了，可是軍閥爭种鴉片以为重要的財源。

国中的一分子,开始在国际舞台上迈出其第一步。

**“亚罗”号战争** 虽然締結了南京条約,中国此时仍不是承认西洋各国为平等的国家,只以条約为一种和睦手段,并不想遵守条約。于是英国以中国官兵逮捕具有英国船籍的“亚罗”号船上的中国人为理由,和傳教士在云南<sup>①</sup>被杀害的法国联合起来,于1856年(咸丰6年)又进攻中国。1860年占領首都北京,在北京訂立了媾和条約(北京条約)。在此条約中,中国再次确认平等的国交和貿易自由,并且以九龙予英,許可基督教傳教。乘此次事件由北方侵入的沙俄,夺去黑龙江北岸(1858年的璦琿条約)及濱海州一带(1860年的北京条約)。沙俄在新取得的土地上建立了海参崴,以此为向太平洋方面发展的基地。

中国至此暴露了外强中乾的真相,因此后来西洋各国往往以瑣碎事故即向中国提出种种要求,开始搶去中国的土地和各种权利。

**太平天国的叛乱** 中国南部地方从古以来反对政府的風气就很盛,到了十九世紀中叶,此風更加高漲,时常在一些地方发生暴动和叛乱。

“亚罗”号战争发生前六年,即1850年,在广西省的金田发生了一次和以前性质非常不同的叛乱。叛軍首領洪秀全自称是耶穌的弟弟,号召打倒清朝,建立基督教的天国,高唱均分土地、减免租稅,为这样的口号所引誘的貧农踊跃地参加叛乱。

---

① 云南为广西之誤。——譯者

洪秀全的军队北进，出现于汉口，由此顺扬子江而下，占领南京（1853年），一部分军队更往华北进击。于是他的势力以华南为中心遍及十六省。他们改南京为天京，以之为首都，自称太平天国。政府军对于叛乱毫不起镇压作用。加之，在叛乱最盛的时候，还发生了“亚罗”号战争（1856—1860年），政府军队只是东逃西跑。此时，起而与太平天国对抗，进而与之作战者是湖南地方官僚地主所组织的乡土自卫军（团练—湘军）。

为卓越的指挥者曾国藩所率领的湘军，和逐渐组织起来的扬子江中游地方的自卫军（李鸿章的淮军）联合，攻打太平天国军。

太平天国无视中国社会的实情，主张建立均产、男女同权、自由博爱的社会。然而此种社会当时在中国是不可能实现的。加之，在其内部发生了丑恶的内讧，军队也堕落了，一般民众都不喜欢太平天国军了。曾国藩等所率领的乡勇便开始压制了太平天国军。

以上海、广州等通商口岸为根据地的外国势力，起初共同反对于他们不利的满清，并且对于提倡基督教主义的叛乱军表示好感。但是随着岁月的消逝，渐渐明白了太平天国军是妨碍通商贸易的不好对付的集团，因此，就反过来站到镇压太平天国军的方面来了。英国人戈登率领持有优良武器的义勇军（常胜军），积极地攻击太平天国军，就在此时。1864年（同治3年）太平天国在内部腐败和曾国藩等军夹攻之下，结束了前后十五年的历史，洪秀全自杀了。<sup>①</sup>

### 西洋机械文明的输入 此次大叛乱为中国官僚地主阶级率领

<sup>①</sup> 太平天国军又称长发贼。这是因为他们为了表示脱离清朝的控制，废弃清朝人民标记的辮发，蓄长发的缘故。

的乡勇所镇压。政府军毫无用处。中国一般知识分子明白中国社会有传统的良风美俗是应该保持的。中国人里面开始产生了民族的自觉心。满洲王朝认识到此等事实，及至叛乱结束，即以重要地位给汉族官僚领导者曾国藩等，命他们改造中国。具有君主专制国传统思想的官僚地主阶级曾国藩等用旧式的方法整顿政治，整肃吏治，安定民心，以求恢复治安。但是他们经过种种事件，接触着外国优越的近代文明，便明白仅仅用旧式方法是不能富国强兵，不能抵抗外国的。武器、机械都是外国的好。于是他们采取西洋的机械文明，振兴军需工业，以求改造中国（洋务运动）。1862年他们在安庆开始建立兵工厂，其后建立兵工厂和造船所于各地，接着又购进军舰，建立海军。派遣留学生往德、法，使之学习军事和技术。建立外国语学校（京师同文馆）和轮船公司（招商局）亦在此时。其后，政府亦采用挖煤技术，1878年（光绪4年）建立了织布工厂，1881年（光绪7年）初敷设铁路。

同治时代主要是曾国藩负政治责任。此时人民生活比较安定，西洋各国亦忙于普奥战争（1866年），普法战争（1870—1871年）以及其他欧洲自己的问题，因此中国和西洋各国并未发生任何问题（同治中兴）。在此时代，西洋各国还不断寻找机会来争夺各种必要的特权，以求扩展其本国的贸易和势力，于通商口岸建设等于自己领土的区域（租界），外国人发生的问题不服从中国的法律而受该国的领事的裁判（领事裁判权），外国人管理税关（海关行政权），是其特权的二三例而已。

**各领地的丧失** 中国官僚卓越的领袖曾国藩死后不久，政治就失去了安定，国内秩序大乱。在曾死去的前后，西洋各国竞相涌

進中國，開始獵取殖民地。1884年的中法戰爭使中國失去了安南的宗主權，第二次英緬戰爭（1886年）失去緬甸的宗主權，在大約十年後的甲午戰爭（1894—1895）失去了朝鮮的宗主權，並割去了台灣、澎湖列島及遼東半島<sup>①</sup>。從來中國被評為“睡獅”，似乎還有些可怕，在此次戰爭中暴露出缺點後，各國即毫無顧慮地侵略中國了。

**權利與勢力範圍** 你們在前章學習過，從此時代起西洋的經濟機構變成了金融資本體制。因此西洋金融資本家們受着帝國主義政策的後援，開始向中國投資了。由1885年以來，西洋各國的銀行團把資本或生產資料給予財政困難的滿清政府（借款）以索取鐵路修築權、礦山採掘權、或是產業經營權、海關徵稅權等為報酬。

為了經濟的侵略，在政治上亦需有立足點。1896年，西洋各國以各種理由，在有利的條件之下，租借了山東省的膠洲灣（德國），遼東半島的旅順、大連（沙俄），山東半島的威海衛、香港對岸的九龍半島（英國），又於1899年租借了雷州半島的廣州灣（法國）。獲得了租借地的各國便以此為根據地，進行經濟侵略，並獲得了由此通往內地的鐵路修築權，和鐵路沿綫的礦山採掘權。先進各國的經濟侵略甚為猛烈，因此引起強國間丑惡的鬥爭。十九世紀末葉，各國在中國乃劃分勢力範圍，英國以揚子江沿岸、法國以廣東、廣西、雲南三省，沙俄以萬里長城以北，德國以山東地方、日本以台灣的对岸福建省為勢力範圍，避免相互間的利害衝突。

美國對中國抱有特別的關懷，開始侵略中國比較晚，約在1898年菲律賓成為美國領土之後。然此時英、法、德、沙俄、日各國已在

<sup>①</sup> 因為沙俄和德、法三國反對把遼東半島給日本，所以1895年日本把它還給了中國（三國干涉）。



中国撒下了势力网，因此，1899年美国主張必須尊重中国的領土完整，世界任何国家必須在相同的条件上和中国办交涉（領土保全、門戶开放、机会均等）。美国維持此政策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的末年。

于是一进入二十世紀，各国在中国的利害关系更加复杂化，引起政治上的对立。英国和日本同盟（1902年），沙俄与法国結合，互相对抗。中国的独立在各国势力均衡上处于勉强維持的状态。

**发生政体改革运动——戊戌政变** 在甲午战争失敗之后，虽然在如此守旧的中国，明白世界大势的人终于增加了；于是产生改革政治体制，拯救国家与民族危机的运动。在他们里面，康有为主張效法日本明治維新，各方面采取西洋文明，在政治上尤須廢止君主专制，改为君主立宪制。<sup>①</sup> 孙文主張民主制，实行基本的政治改革。

忧虑中国前途的光緒皇帝听了康有为的意見，1898年召康入北京，命他改革政治。然而长期以来即掌握着政权的多数滿洲貴族統治階級，不喜欢变更政体，并且害怕因新人物上台而丧失自己的势力，圍繞着光緒皇帝的继母西太后（1835—1908），掀起猛烈的反对运动。因此，改革仅仅历时一百天即告失敗，光緒帝被幽禁，康有为逃往日本，許多改革派的人都被处死刑（戊戌政变）。不明白时代潮流的中国此时好象是漂流在波浪上的沒有舵的船。

**反动的排外运动——义和团事件** 改革失敗后，以滿洲貴族

<sup>①</sup> 他的改革方針叫做“变法自强的改革”。

为中心的反动的西太后一派掌握了政权。政府的措施比以前更专制更排外，竭力保持满洲王朝的势力。在此反时代的运动中，山东省起了排斥外国人的一大暴动（1899—1900，光緒 25—26 年）。它是所謂义和团的一种宗教秘密結社所組織起来的，起初是农民暴动，不知不觉之間由于政府暗中指使即变为排外运动，由华北弥漫于满洲一带。受害的八国（日、英、美、法、俄、德、意、奥）联合出兵，占領首都北京。其結果，中国不得不賠償巨額的賠款（1901年），以收入最多的盐稅和關稅为抵押品，政府的財政因此陷于窘境。

但是在此期間，受着先进各国猛烈的經濟侵略影响，中国人的产业資本（民族資本）亦发展起来，产生了近代的紡織工业和制粉工业。

**宣布開設国会** 西太后一派虽然頑固，至此亦知道排外和专制是反时代潮流的。他們想采取西洋各种制度，实行君主立宪，以求复兴国势，廢止有长久历史而現已弊病百出的科举制度，采用学校出身者为官吏，建立受近代軍事訓練的軍隊，使司法部独立，制定新的刑法，为实行新政作好准备。1908 年，更进一步发表了成为立宪国家基础的宪法大綱。宣布十年后開設国会，中央建立諮政院以为開設国会前的議事机关，地方各省亦建立了諮議局，以求和緩輿論。

**辛亥革命——滿清灭亡** 1908 年光緒帝与西太后相继死去，幼年的宣統帝即位。立宪促进运动日漸旺盛，广泛深刻地傳播于民間。然而仍迷恋于专制政治的滿洲朝廷缺乏足够与此适应的热誠，国民于是抛棄了滿洲出身的专制政治統治者。革命运动日漸

高漲，孫文就是革命運動的領袖。

孫文起初是希望成立君主立憲的改良主義者；他憤恨甲午戰後中國悲慘的國情和滿清朝廷的腐敗無能，從十九世紀末便從事革命運動，以求推翻滿清王朝，建立共和制。他的運動常遭失敗，在進行革命時，即已提倡三民主義為革命理論。三民主義目的是推翻滿清專制封建王朝，建立共和的民族國家。它是主張把這個國家提高到和西洋各國處於平等地位的民族主義，給人民以政治上平等地位的民權主義，消滅經濟和生活上的不平等現象的民生主義等三個主義構成的革命理論。三民主義起初由於打倒滿洲王朝的需要而強調了民族主義；其後隨着中國政治和社會情勢的變化，不斷改變並發展。這個主義在國民黨統治時代始終是中國政治理論的基礎，和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論亦有聯繫。

孫文的革命運動，不但傳播於一般對政府的措施不滿的民眾間，並且傳播於具有外國新知識的留學生之間。不但如此，在外國的因為祖國積弱一貫遭遇到種種壓迫的華僑，和受着外國強大資本的壓迫無法活動的民族資本家也站到革命陣營中來了。軍隊中亦有革命的同志。

1911年（宣統3年），政府要在外國資本援助之下，收鐵路為國有。民族資本家和一般民眾聞此消息，立即起來猛烈地展開反對運動。不久，四川發生暴動。政府派遣軍隊前往鎮壓。10月10日便在揚子江中游的武昌駐防軍（協統黎元洪）中爆發了革命。以此為導火綫，革命運動便風靡十三省，派去鎮壓革命的將領們亦棄絕了滿洲朝廷（辛亥革命）。清帝不得不於1912年（宣統4年）退位，清朝遂告滅亡，中華民國乃從此誕生，長久繼續下來的舊君主專制政治於此結束，新的民主共和政治乃開始建立。

**革命的停滯** 1911年10月，在武汉发生的革命终于成功，1912年2月宣統帝退位，清朝于是垮台。

此年1月，革命派宣告成立汉、滿、蒙、回、藏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定都南京。于是召集国会，頒布临时約法，选革命領袖孙文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8月，革命派的中国同盟会改名为国民党，成为公开的政党。

然而此时实际統治中国的是清朝以来的軍閥和官僚，不是革命派。清朝一倒，軍閥的巨头袁世凱即建立共和政府于北京。势力尚軟弱的南京政府为建立疆土辽阔的中国統一政府，不得和北京政府妥协，把临时大总统的地位让給袁世凱。革命派在推翻清朝方面虽是成功了，以后却没有照預定的計劃执行。

**袁世凱的帝政計劃** 軍閥的代表者袁世凱一旦做了临时大总统，便利用此地位来扩張自己的势力。他毫不关心民主政治，首先迁新首都于他的根据地北京，随意操纵国会，撕毀临时約法，解散国民党(民国2年，1913年)，并以暴力压迫革命派，孙文等于是逃到海外去了。袁又向外国，即五大国借二千五百万鎊的資金，給种种权利以为交換品，用以买得各国的欢心，于是大事扩張自己的势力，最后企图复活帝政，自己做皇帝。

此种計劃一經暴露出来，不但是革命派反对，受外国資本压迫的民族資本家亦起来反对，南方各省不久掀起猛烈的反对运动，同时，不喜欢中国有坚强中央政府的外国亦起来干涉。因此他的帝政計劃完全失敗，1916年(民国5年)6月袁世凱在失望中去世。

**軍閥斗争** 袁世凱死后，北京政府即成为軍閥爭夺政权的場所。此后十余年間，中国陷于軍閥混战局面，外国亦与各軍閥勾結，为擴張自己的势力而互相斗争。軍閥是一种代表封建的势力。既有封建軍閥存在，中国便不能民主化，民众的痛苦只有日漸增加。爭夺北京政权的軍閥有段祺瑞、馮国璋、曹錕、吳佩孚、張作霖、馮玉祥等。

**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其影响的扩大** 由清末至民国初年，资本主义各国乘中国发生政治上的混乱，日益加强并扩大其对中国的控制。他們以租界和租借地为根据地，向中国内地进行侵略。首都北京屯駐了外国軍隊，重要港口中停泊着外国軍艦。中国的司法权不可能审判外国人。外蒙古事实上已成为俄国的保护国，西藏已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

甲午战争（1894—1895）以后，各国間爭夺特权的竞争甚为激烈。为調节此种竞争，1910年（清宣統2年）英、美、德、法四国联合組織国际銀行团（后来美国退出，日本与沙俄加入）壟断借款。銀行团自中华民国建立后，积极地給軍閥提供資本、生产資料或武器，日益助长其內乱。

自1914年起，开始了世界第一次大战。在大战期中，西洋各国无兼顧中国的余力，日本即乘机积极侵略中国。因为日本是協約国的一員，夺取德国的租借地胶州灣之后，即于1915年（民国4年）乘欧美各国无力东顧之时，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条，以求获取滿、蒙和山东等方面的权利。中国政府起初拒絕此要求，日本即提出最后通牒，强迫中国承认，日本终于继承了德国在山东方面的权利，延长辽东半島的租借权及滿铁經營权九十九年，此外还获得了

各種權利。後來日本又與軍閥勾結，搶走各種權利。第一次世界大戰完畢後(1918)，西洋各國再度到中國來尋求利益。

**走向近代化的文化運動** 民國初期十餘年間，內有軍閥混戰，外有帝國主義各國乘機侵入，隨心所欲進行侵略。即是在此混亂時期，以政治和社會近代化、民主化為目標的工作，和尋求中國自主獨立的運動仍不斷地熱烈進行着。負擔其先鋒任務的是推翻封建思想和文學，企圖建立近代的國民文學，即1916年(民國5年)以來所進行的文化運動(文學革命)。民國初年，袁世凱為了實現他的政治野心而尊重儒教，因此發生了以儒教為國教的運動。北京大學教授陳獨秀、胡適等針對此運動猛烈地批判了以儒教為中心的傳統文化，並痛斥儒教為專制主義思想上的堡壘，是奴隸思想。

他們的主張立即傳播於進步的人士之間，從此儒教漸失權威。他們用西洋的“民主主義”和“科學”來代替舊文化。為了直接或間接地學習新文化，中國政府曾派遣多數留學生去美國和日本。民國前後的留日學生中有蔣介石、汪兆銘、魯迅、郭沫若等。西洋思想和文化即已輸入中國。此時，美國杜威的實用主義思想因有和中國人的思想相通的一面，故在中國的思想和教育方面起了重大的影響，於是各方面都採取了科學的、實驗主義的措施。

1922年採用了美國學制中的許多要素，亦為其影響之一。自古以來在法律上是男子附屬品的婦女地位提高了，1919年以後，大學開始男女同校，1931年，民法上規定男女平權。

**尊重口語的運動(白話運動)**亦為文學革命目標之一。他們主張不用難解的古文古語來表現一切思想和感情；必須用現代人使用的口語即白話來表現。此運動對於當時的文化界亦有所推動，產

生了口語文学（白話文学），报纸杂志也开始使用口語。其后又被采入国民教育中，1920年即規定国語以北京語为标准。因使用白話文，文化方逐渐普及于民众之間。1921年出版的魯迅（1881—1936年）的《阿Q正傳》是初期白話文学代表的作品之一，描写一个叫做阿Q的貧农的生活，生动地表达出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面貌。

文学革命对于学术方面亦不能无所影响。代表清朝的学風的考据学，受着西洋实证主义学風的影响，更进一步发展起来，产生了更科学的、更实证的研究中国旧文化的風气。在古代史中留下了重要著作的王国維是其先驅者，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綱》，顾颉刚所編的《古史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論文集）等，是其成果之一。以前隐藏在神秘的影子里面的古代面貌渐次明朗，中国的真面目于是开始显露出来。

**产业亦因此发展** 中国产生民族工业是在甲午战争（1894—1895年）以后，以揚子江为中心出现了紡紗、織布、繅絲、面粉、火柴等工厂。然而当时产业資本仍不发达，加之因为先进的生产工具所制造出来的大量的外国制造品，在低廉的关税和各种特权保护之下，以低廉的价格輸入中国，民族工业无从发展。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后，外国商品暂时沒有輸入。中国資本家所办的工业（民族工业）乃有发展的好机会。紡織业及其他面粉，榨油，火柴等工厂，逐渐在通商口岸以及揚子江沿岸各城市中建立。但是如此急速的发展并未繼續到很长的时期，大战終了之后不多时，各国再度向中国进行侵略，勾結軍閥进行傾銷，来擴張其商品的銷路。正在发展途中的中国民族工业受此压迫，于是再度遭受摧殘，切身感受到外国資本压迫的某些民族資本家因此起来高呼反对帝国主

义。中国民族产业虽然遭遇此种困难，发展虽然很慢，还是不断成长起来。与民族产业发展的同时，近代的银行业亦有所增加，1911年（宣統3年）只有七家，1919年即增加到六十家。

**反帝运动的兴起** 新中国逐渐壮大起来的知識分子和民族资本家，随着社会和經濟的新发展，同时希望政治民主化和从外国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因而开始发生生气磅礴的反帝运动。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終了，要求民族独立、平等的呼声普及全世界，中国亦为了恢复实际上的独立，向巴黎和会提出各种要求。但是这种要求沒有被采納，悲憤填膺的北京学生，于1919年（民国8年），高呼打倒当时侵略中国最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排日），和收回已为外国所掠夺的各项权益、收回主权，开始作猛烈的示威运动（五四运动）。运动不久扩展到全国，商人、工人都参加进去，进行罢工和排貨。五四运动以后，反对帝国主义、要求收回主权的运动日益热烈起来。1921年（民国10年）在华盛顿召开了軍备縮小會議（华盛顿會議），中国在會議上要求确认主权和保全領土及行政权。自巴黎會議以来中国一直在努力貫徹这些要求，其目标主要放在对付日本。美国支持此項要求，各国亦承认，因而締結了九国公約。这样，由日本收回了山东地方的利益，并且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結果，收回了德国和奥、匈国的权益，接着由于俄国革命的結果，俄国又把該国的权益还給了中國。

**国民党的活动** 反对帝国主义的呼声，同时亦为要求国内政治近代化的呼声，孙文的革命派乘着此潮流又在南方重新开始活动。先是，1913年（民国2年）袁世凱解散国民党，国民党人員亡命



于日本，組織了中华革命党，伺机再起；1917年（民国6年），孙文回广州，建立第一个革命政府（广东軍政府）。其后他們又改中华革命党之名，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組織中国国民党，結成以中国民主化为目标的政治社团，开始活动（1919年，民国8年）。至1925年（民国14年）止，孙文在广州建立了三次政府，与北方的軍閥政府对抗，逐漸伸張其势力。在这期間，1921年在苏联十月革命影响之下产生了中国共产党。

**国民革命的进展** 希望实现强有力的民主統一政府的呼声，不但是从进步的知識分子、和民族資本家或华侨中，并且从都市的工人和农村的农民中也发出来了。孙文所率領的国民党面临这发展的好时机，即开始活动。加之，1917年俄国革命的成功，鼓励了他們。孙文为了革命势力的发展，认为有强化党組織的必要，乃于1924年（民国13年）采取早已产生出来的苏联的制度，改为委員制，把大权交給委員，使之發揮党的作用。不但如此，还采納苏联提議和这年輕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握手，又允許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員加入国民党（联俄容共），也决定做农民与工人的朋友（扶助工农）。为了适应进步的政治情势而修改了三民主义及五权宪法的内容，乃根据此内容发表宣言，以建設民主的国民政府，打倒軍閥和反对帝国主义为当前的斗争目标。

**大革命时代** 1925年（民国14年），孙文到北京来，不久死于北京。蔣介石、汪兆銘等其后继承了孙文的革命事业。1926年，国民党决定統一全国，蔣介石率領国民革命軍，由广州出发（1926年7月），向北方进军（北伐）。长期以来苦于軍閥政治的民众，欢迎

他們。蔣介石击败各地的軍閥，占領了揚子江中游的武汉，順流而下，打下了南京和上海（1927年，民国16年3月）。

在此期間，武汉地方建立了以汪精卫为領導的容共武汉政府。

占領南京上海的蔣介石，此时受到很大的阻碍。自改組以来，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和外国帝国主义进行着反帝斗争。然而此等事件，是以上海为根据地的大民族資本家（浙江財閥）和外国資本家所最反对的。并且此两种势力很大，如无他們的支持，要在短时期內統一中国却是困难。他終于决定和共产党分家，实行政变，鎮压共产党，同时設立国民政府于南京（民国16年4月）。武汉政府不久也倒了，国民党的性质和以前亦有所变化。

后来党軍繼續往华北进击，逐北京政府的張作霖于关外，占領北京（1928年，民国17年）。这样，十八省的土地大致处于国民政府統治之下，其后滿洲亦参加进去（1928，民国17年）。全国的統一暫告完成，列强承认南京的国民政府。其后南京政府在蔣介石領導之下，努力于中央集权的統一，可是，各地再度产生了新軍閥的势力，国民政府的命令沒有貫徹下去，反复进行軍閥混战。

**对日战争——滿洲事变** 民国以来，由于日益壮大的文化、社会运动和革命派的政治活动，人民的民族自觉心亦日漸扩大，于是产生了反对帝国主义运动和收回主权运动。国民革命一开始，此种运动即进一步高漲起来，各地于是发生猛烈的反帝运动（五卅事件及其他）。英国和日本是主要的反对目标。其結果，英国交还了租界的一部分和威海卫的租借权（1930），在1929年（民国18年）以后，各国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权。

日俄战争以来，日本在滿洲有許多特殊权益，投資額亦达到十

七亿元，收回主权运动一伸入满洲，即引起以此为中心的各种糾紛。日本帝国主义乃用高压手段加以抑制，同时用武力开始进行积极的侵略。其結果，1931年(民国20年，昭和6年)发生了满洲事变，战火延燒到上海。在此期間，日本在满洲树立了傀儡政权，自己却掌握其实权。中国虽然发生了猛烈的抗日运动，然而此时毛澤东所率领的共产党势力复活起来，占据江西的瑞金开始活动，引起了内战，因此国民政府为了镇压共产党，于1933年(民国22年，昭和8年)一度和日本締結停战协定。其后政府軍圍攻共产党，并逐之于陕西，又因英、美的經濟援助及德、意的軍事援助，进行了經濟、軍事上一系列的强化工作。

**資本主义的进攻** 民族資本虽然遭遇到各种困难，仍是漸次发展起来。特别是1927年，国民党政府和最大的民族資本家浙江財閥紧密合作之后，民族資本家的利益即处于政府保护之下，因此民族資本家一面和外国資本家作战，一面繼續其強韌的进展。1928年創立国立中央銀行，即成为国家金融的中心。

**币制改革——銀本位制的廢棄和法币的制定** 1930年初期，中国的产业、經濟頗为繁荣。因为世界上多数国家采用了金本位制，銀价下降，所以現銀便集中于这时候唯一采用銀本位制的中国。可是不久，各国廢棄金本位制，尤其是因为美国实行收买白銀，所以从1932年起，中国的現銀流出国外，終于发生了严重的金融恐慌。国民政府为了摆脱这一危机，在英、美援助之下，进行划时期的币制改革。1935年，規定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銀行(其后加入中国农民銀行)的紙币为法定紙币(法币)，可以用来納稅或进行

其他一切交易。此后即一概不使用銀币，又整理了以前所使用的各种貨币。政府通过此种作法，进行了全国經濟上的統一，进而从事于經濟建設。由于币制改革的結果，英、美經濟势力即深深地渗入中国金融資本中来了。

**經濟建設** 經濟建設的重点放在农村的复兴，民族工业的复兴，交通設施的整理。素来被輕視的农村，因为連年受軍閥的統治，并且受商品經濟强烈的影响，陷于严重的雕敝，因此，政府降低租稅和佃租，改良农业技术，进行水利事业；或者組織农村合作社，使农村金融流通等等，安定了农村的經濟。与此同时，在都市方面，輕工业以外，还兴办了重工业；交通方面使粤汉（广州—汉口），浙贛（杭州—南昌）两条铁路全部通車，使隴海路（宝鸡—海州）往西延长到宝鸡。又特別致力于修筑汽車公路。这样，把中国各地連結起来，促进了产业的发展，同时亦使国民政府的势力深入各地。

**文化运动** 滿洲事变以后，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討論同时高涨起来。随着政治理論的討論，1934年，产生了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企图采取中国固有文化的长处，把它和現代生活相結合，以此提高社会生活，发揚民族精神，以整齐、清洁、簡單、朴素为日常生活的四大基本原則；以儒教道德的礼义廉耻为其根基，蔣介石亲自进行領導。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在此后的文学界和思想界中成为两大中心。

**中日战争** 中国在滿洲事变中丧失滿洲以后，排日感情深入

于国民的各阶层之中。可是，自滿洲事变之后，日本在政治上經濟上侵略中国的主权比以前更甚，因此中国人民更加痛恨日本，到处发生排日运动。当此时期，国民党圍攻陝西方面的共产党，1936年（民国 25 年）西安发生了监禁蔣介石事件（西安事件），以此为轉折点，就停止了对共产党的攻击，共同携手抵抗日本，結成抗日統一战綫，日华两国的对立于是日益深刻。1937 年在北京南部发生了芦沟桥事件，以此为导火綫，爆发中日战争。在日本攻击之下，中国失陷了首都南京以及北京、上海、武昌、汉口、广州等其他許多华北、华南、华中的重要城市，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退到内地进行抗战。因为和英、美、苏联結成了友好关系，所以受到了外交、軍事、經濟等各方面的援助。当此时期，在日本軍占領下的南京，以汪兆銘为中心的傀儡政权不久宣告成立。重庆国民政府仍在繼續其艰苦的抗战。

**太平洋战争以后** 1937 年以来，日本陷于与中国作持久战争的泥淖里，感受到痛苦，急求解决。因而企图把中国周圍的各地控制在它的支配之下，以此为据点来压制中国；并且希望把原料供应放到自己的政治控制之下。此种行动和在此一带有直接利益关系的英、美、荷兰等各国引起正面的冲突，于是发生了太平洋战争（1941 年，民国 30 年）。重庆政府和美、英同盟来抵抗日本，1943 年，与此两国締結了平等互利的新的条約，全面地廢棄了曾經使中国人民痛苦的租界設置权，領事裁判权，以及中国給与各国的种种特权。进行頗久的取消不平等条約运动，至此收得了成果，中国开始和欧美各国站在平等的地位。

中国在太平洋战争后，成为联合国的五大理事国之一，在国际

間占了重要的地位。可是在国内因为没有抗日的共同目标，因此国民党和共产党再度分裂，开始内战。毛泽东这时高唱与马克思主义同调的新民主主义论，并领导共产党势力开始逐渐控制华北的农村。国民党对此加以压迫，把它赶到西北去了，1947年（民国36年）1月，在国民党领导之下颁布了宪法，成为立宪国家。以此为基础，改组了国民政府，1948年（民国37年）5月国民大会选蒋介石为第一任大总统。

虽然取消了不平等条约，成立了立宪国家，中国人民大众的生活一点也没有得到改善。内战继续下去，经济界因为通货膨胀陷于混乱，国民对于国民党的信仰一天天地日渐下降，共产党的势力即乘此时机复行兴盛起来，1949年10月，反过来压迫国民党，把国民政府赶到边境去，10月，以北京为首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三上次男：《世界史》下卷，第114—125页、第141—142页，傅仲涛译。）

### 三、市古宙三：近十年来日本历史 学界研究中国近、现代史 的一般状况

关于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历史，分为两个阶段来加以掌握较为适宜。一为近代，即自鸦片战争起至五四运动止；一为现代，即五四运动以后。

先来看看日本研究近代中国的一般动态：

1937年以前，日本关于近代中国的研究，和研究近代以前的中

国的那种活跃状况比较起来,实在是很冷落的。在此期间内,研究近代中国的人,可说仅有矢野仁一先生一人。这种状况,在1937—1945年的战争年代中并没有什么改变,只是除矢野而外又增加了两三个从事研究工作的人而已。但是战争结束之后,情况发生了突然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仅表现在从事考证性研究工作的人数有了急速的增加,同时还表现在研究领域有了显著的扩大。这是一个突出的现象。战前的研究,大抵局限在国际关系方面;与此相较,战后的研究,则不是单纯地从国际关系方面来研究中国的问题,而是把中国内部的政治、社会、经济等问题从中国的历史发展当中来加以分析和掌握。从事这种研究的人数显然增多了。产生这种新倾向的原因,并不在于日本人把中国看成帝国主义侵略的对象,而是在于日本人认为中国是完成了巨大的社会变革的国家,因而对中国本身的发展抱有十分的关切。

其次,按照时代顺序来看看近年来日本关于近代中国的研究,究竟取得了哪些主要的成果。

揭开中国近代史序幕的,是鸦片战争和“亚罗”号战争<sup>①</sup>。首先着手研究这两次战争的,是矢野仁一。他的研究成果<sup>②</sup>,今天仍不失为认识这两次战争全豹的最好的文献。当然,他的研究在今天看来,无论在方法上或史料上都不是一点没有缺点的。为了弥补这些缺点或不足,藤田正典<sup>③</sup>和衛藤藩吉<sup>④</sup>两人用新的观点来分

① 按即第二次鸦片战争。——译者

② 指矢野仁一所著《鸦片战争与香港》(东京1939年版)和《“亚罗”号战争与圆明园》(东京1939年版)。——译者

③ 藤田正典:《十七、八世纪间的中英通商关系》,见《东亚论丛》,1939年第1期。

④ 衛藤藩吉:《鸦片战争以前英国商人的性质》,见《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三卷,1952年;《炮舰政策的形成》,见《国际法外交杂志》,第53卷,第3期,1954年。

析鴉片战争以前的中英关系。藤田通过中英印的三角贸易说明了十七、十八世纪间的中英关系；衛藤则注意到英国地方贸易商人在中英贸易中的活跃，从而论述了：进入十九世纪以后，英国地方贸易商人掌握了广东贸易的领导权，终于迫使东印度公司放弃了它对贸易的垄断权，并以武力迫使中国开放了门户。

鸦片战争的结果，中国跟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从那以后，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期间内，中国一直呻吟在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之中。关于不平等条约的研究，过去日本仅仅在租界问题方面稍有可观的成绩，<sup>①</sup>但是最近以来试图通过外交折冲的研究来分析中国官员的行动方式的人相当增多了。植田捷雄<sup>②</sup>和坂野正高<sup>③</sup>两人从清政府的对外交涉中分析了这方面的問題；河野一夫<sup>④</sup>也做了同样的尝试，他研究了义和团运动中李鸿章和荣禄的行径；此外，矢澤利彦还通过教案来分析了中国官员的活动方式<sup>⑤</sup>。

鸦片战争，在广东方面的中国人之间种下了反英感情。因此，从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期间，广东地区不断发生排英事件。鈴木中正<sup>⑥</sup>和寺廣映雄<sup>⑦</sup>两人都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但两

① 指植田捷雄所著《关于中国租界的研究》，东京1941年版。——译者

② 植田捷雄：《鸦片战争与清末官民的諸形象》，见《国际法外交杂志》，第50卷，第3期，1951年。

③ 坂野正高：《清末官员在外交交涉中的行动方式》见《国际法外交杂志》，第48卷，第4—6期，1949年；《一八四八年青浦事件的考察》，见《东京都立大学人文科学》，第2卷，1954年。

④ 河野一夫：《关于李鸿章》，见《历史教育》，第5卷，第1—3期，1957年；《义和团运动中荣禄的行径》，见《历史教育》，第4卷，第1—3期，1956年。

⑤ 矢澤利彦：《关于长江流域教案的考察》，见《近代中国研究》，第1卷，1958年。

⑥ 鈴木中正：《清末攘外运动之起源》，见《史学杂志》，第62编，第10期，1953年。

⑦ 寺廣映雄：《广东的抗英运动》，见《大阪学艺大学人文科学》，第3卷，1954年。



人的見解并不一致。鈴木认为这些排外运动主要是乡紳的活动，寺廣則注意到当时民众的排外运动具有反官府的意义。

鴉片战争敗北以后，清政府虽仍拒絕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員，但自第二次鴉片战争再度敗北后，客观情况已不容許它再繼續保持这种态度了。因此，清政府便在北京条約簽訂后不久的1861年1月，設立了相当于外交部的总理衙門。关于外交部的設立，乍看起来虽然似乎无足輕重，但在当时的中国來說，却是一件大事情。坂野正高从当时中国的国内政治和国际局势等方面縝密地分析了总理衙門的設立經過，并探討了当时中国内部的势力关系和西欧列强的势力关系以及双方面勾心斗角的形势。<sup>①</sup>

鴉片战争和第二次鴉片战争，是十九世紀中叶从外部震撼这个古老中国的事件，同时期內，在国内也同样发生了使这个老大帝国的基础趋于动摇的事件，这就是太平天国之乱。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在就总的情况看来比較貧弱的日本关于近代中国的研究領域中，應該說是进行得較早的一項，而1950—1954年之間又更加旺盛起来，河鱈源治<sup>②</sup>、波多野善大<sup>③</sup>、增井經夫<sup>④</sup>和市古宙

① 坂野正高：《設立总理衙門的背景》，見《国际法外交杂志》，第51卷，第4—5期和52卷，第3期，1953年；《天津条約签字后清国外务机构的动摇》，見《国际法外交杂志》，第55卷，第6期和第56卷，第1期，1957年；《总理衙門的設立过程》，見《近代中国研究》，第1卷，1958年。

② 河鱈源治：《天朝田亩制度之成立》，見《东洋学报》，第33卷，第2期，1951年；《太平天国設置乡官的实情》，見《东方学論集》，第1卷，1954年；《太平天国的乡官設置及其背景》，見《史学杂志》第63卷，第6期，1954年。

③ 波多野善大：《关于太平天国的二三問題》，見《历史学研究》，第150号，1951年。

④ 增井經夫：《太平天国》，东京1951年版。

三<sup>①</sup>等人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通读这些著作，可以看出作者们对于太平天国的看法是不一致的：市古把太平天国看成是以周官为模范的运动，他认为这种运动所招致的结果只能是神权国家，绝不会产生新的中国。与此相对立的是增井经夫，增井认为若把太平天国的许多问题分割开来加以局部的观察，诚然都是些陈旧的东西；但若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通盘的分析，其中却存在着一种新的内容——这就是与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的联系。河内源治则利用丰富的资料研究了太平天国的土地制度和乡官制度，他同市古一样，也指出了太平天国各种制度的陈腐性，其与市古不同之处，在于他想从太平天国运动中找出某些新的内容。

自从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以后，在中国兴起了一种想把西洋的武器、弹药以及科学技术等输入中国的运动，这被称为“洋务运动”。这一运动的首倡者可说是林则徐，最有力的推动者可说是李鸿章。

田中正美<sup>②</sup>通过林则徐的禁烟意见分析了他的态度和思想；小野信尔<sup>③</sup>则分析了李鸿章进行政治活动的经济背景，认为支持他的是以上海为中心的绅商。当时，李鸿章有一个最得手和最有能力的幕僚名叫冯桂芬。关于这个人的生平和著述，百濑弘<sup>④</sup>进行了研究。此外，小野川秀美<sup>⑤</sup>还通过洋务派通盘的活动分析了

① 市古宙三：《太平天国的修改诏书》，见《东洋学报》，第33卷，第2期，1951年；《太平天国的赞美诗》，见《和田博士六十诞辰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1951年版。

② 田中正美：《反鸦片论者的立场》，见《东洋史学论集》，第4卷，1955年。

③ 小野信尔：《李鸿章的登台》，见《东洋史研究》，第16卷，第2期，1957年。

④ 百濑弘：《冯桂芬及其著述》，见《东亚论丛》，第2卷，1940年。

⑤ 小野川秀美：《清末的洋务派运动》，见《东洋史研究》，第10卷，第6期，1950年。

这种思想的发生、发展和演变过程及其与变法思想的区别所在。

洋务派在表面上标榜的目标是：富国强兵，使中国富强起来；但其结果却表现在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中的惨败。关于中日战争的原因，本应从中国和日本双方面来加以考察，但日本人的研究总是容易偏重于日本的立场。鉴于这种缺陷，北村敬直<sup>①</sup>通过李鸿章等洋务派为了对抗日本侵略朝鲜而展开的种种活动分析了甲午战争以前中国的内部状况。田保桥濑<sup>②</sup>更仔细地综述了当时朝鲜的内部情况以及日中两国以朝鲜为中心的抗争，明确了甲午战争的原因，并进而探索了甲午战争中的国际关系。田保桥濑的研究都是以日本为中心进行的，矢野仁一<sup>③</sup>则以中国为中心，分析了从甲午战争到义和团之间的国际关系。甲午战争的结果，日本在中国获得了不少特权，其中有在中国的通商口岸经营企业的权利。有人怀疑这种权利是日本模仿外国而获得的，波多野善大否定了这种疑问，他认为这是日本根据自己的想法而获得的<sup>④</sup>。佐佐木正哉<sup>⑤</sup>则分析了这个时期使用“过炉银”进行交易的营口商人的性格。

甲午战争的结果，促使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痛切感到不但要吸收西洋文明，同时还必须吸收西洋的政治制度。这些人被称为

---

① 北村敬直：《从清国方面来看中日战争》，见《史林》，第35卷，第4期，1953年。

② 田保桥濑：《近代日朝关系研究》，共2卷，京城（汉城）1940年版；《日清战役外交史研究》，东京1950年版。

③ 矢野仁一：《日清役后支那外交史》，京都1937年版。

④ 波多野善大：《马关条约第六条第四款的成立背景》，见《近代中国研究》，第1卷，1958年。

⑤ 佐佐木正哉：《关于营口商人的研究》，见《近代中国研究》，第1卷，1958年。

变法派或維新派。野村浩一<sup>①</sup>沿着直到变法派巨头康有为为止的中国学問的傳統和体系分析了变法維新思想；小野川秀美<sup>②</sup>則論述了清末变法論的成立过程及其所受进化論的影响。野村和小野川两人虽都承认了变法維新思想具有某些进步意义（原文为近代性）；然而板野长八<sup>③</sup>却在分析了康、梁的大同学說以后，认为他們的思想归根到底还是屬於近代以前的范疇。

以甲午战争以后西欧列强在中国爭夺利权为主题的研究，在日本是很少見的。里井彦七郎<sup>④</sup>通过教案分析了外国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指出了他們的帝国主义性质和作用，并进而探索了教民的形成过程及其階級构成。

可以认定：义和团运动是历次教案中最大的一次。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为数匪少。江口朴郎<sup>⑤</sup>在对这次运动加以概述之后，強調說这是中国民族主义勃兴的标志；市古宙三<sup>⑥</sup>却強調了它的匪徒式的会党性格，认为这一运动不过是單純的、盲目的排外运动而已。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松村祐次<sup>⑦</sup>的一系列的研究。松村认为义

---

① 野村浩一：《清末公羊学的形成与康有为学的历史意义》，見《国家学会杂志》，第71卷，第7期和第72卷，第1—2期，1957—1958年。

② 小野川秀美：《清末变法論之成立》，見《东方学报》，第20卷，京都，1950年；《清末的思想与进化論》，見《东方学报》，第21卷，京都，1952年。

③ 板野长八：《康有为的大同思想》，見《近代中国研究》，1948年；《梁启超的大同思想》，見《和田博士六十誕辰紀念东洋史論丛》，东京1951年版。

④ 里井彦七郎：《十九世紀中国仇教运动的一側面》，見《东洋史研究》，第13卷，第1、2、4期，1954年。

⑤ 江口朴郎：《关于义和团事件的意义》，見《历史学研究》，第150期，1951年。

⑥ 市古宙三：《义和拳的性格》，見《近代中国研究》，1948年。

⑦ 松村祐次：《义和拳乱——一九〇〇年的政治背景》，見《一橋論丛》，第26卷，

和团是由初期的乡团性組織发展到反满的会党性組織，后来又轉化成得到滿清政府承认的义和团，他想通过义和团来搞清当时中国的社会經濟状态。此外，还有田保橋潔<sup>①</sup>的关于义和团运动初期列强出兵問題的研究。

1900年，当义和团在北方跟八国联軍作战的时候，揚子江中游地域兴起了以唐才常为首的自立軍。永井寬己<sup>②</sup>和菊池貴晴<sup>③</sup>两人都以此为主题进行了研究。两人的看法虽然稍有不同，但在这次事件标志着变法派对清廷感到絕望而逐渐轉化为革命派的过渡时期这一点上，两人的看法却是一致的。章炳麟就是在此时期內由立宪派轉化为革命派的一人，小野川秀美<sup>④</sup>和島田虔次<sup>⑤</sup>两人对他的思想进行了深刻而犀利的分析研究。

1900年以后，培育中国革命运动的是日本，但是中国人在日本的革命活动却遭到了日本政府的彈压，致使革命充滿了苦难的历程。永井寬己<sup>⑥</sup>的研究，弄清了这方面的問題。

关于革命派在中国的活动情况，虽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課題，

---

第5期，1951年；《义和团乱的社会經濟背景》，見《一橋論叢》，第28卷，第4期，1952年；《义和拳乱、清廷、列强——从平原事件到涑水事件》，見一橋大学研究年報《經濟研究》，第1卷，1954年；《涑水事件与列国出兵》，見《一橋大学創立八十周年紀念論文集》，下卷，1955年。

① 田保橋潔：《义和拳与日俄》，見《东西交涉史論》下卷，1939年。

② 永井寬己：《唐才常与自立軍起义》，見《日本历史》，第85—86期，1955年。

③ 菊池貴晴：《唐才常的自立軍起义》，見《历史学研究》，第170期，1954年。

④ 小野川秀美：《章炳麟的民族思想》，見《东洋史研究》，第13卷，第1—3期和第14卷，第3期，1954—1955年。

⑤ 島田虔次：《关于章炳麟》，見《思想》，第407—408期，1958年。

⑥ 永井寬己：《所謂清国留学生取締規則事件的性格》，見《信州大学紀要》第2卷，1952年；《陈天华的生涯》，見《史学杂志》，第65卷，第11期，1956年。

但取材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却不多见。波多野善大对清末各地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加以概观，想由此搞清清末的阶级关系<sup>①</sup>。他的另外两篇文章，还对北方的北洋陆军和南方的新军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两方面的士兵都是破产贫雇农民的子弟，而前者变为袁世凯的私兵，后者成了革命的骨干；并进而得出这样的结论：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虽然对农民问题缺乏具体的理解和实际的解决办法，但却能以农民和新军为基础并将两者结合起来，使其成为革命的群众组织<sup>②</sup>。此外，波多野还分析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当时的民生主义以平均地权为其基本内容——，指出这是受了穆勒的影响<sup>③</sup>。永井宽己对此提出了另外一种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孙文的民生主义思想是受了日本明治年间土地社会主义者宫崎民藏的影响<sup>④</sup>。其他，还有北山康夫<sup>⑤</sup>的研究，他搞清了武昌革命派的系统。

对比起来，关于立宪派的研究较之关于革命派的研究反而更为活跃。菊池贵晴<sup>⑥</sup>分析了当时的抵制美货运动和抵制日货运

① 波多野善大：《辛亥革命前夕的农民起义》，见《东洋史研究》，第13卷，第1—2期，1954年。

② 波多野善大：《北洋军阀的成立过程》，见《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第5卷，1953年；《民国革命运动中的新军——以广东新军的叛乱为中心》，见《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第8卷，1954年；《民国革命与新军——以武昌新军为中心》，见《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第14卷，1956年。

③ 波多野善大：《关于初期孙文的〈平均地权〉》，见《社会经济史学》，第21卷，第5—6期，1956年。

④ 永井宽己：《关于孙文初期民生主义思想的形成》，见《日本历史》，第99、101期，1956年。

⑤ 北山康夫：《关于武昌起义》，见《大阪学艺大学纪要》，第6期，1957年。

⑥ 菊池贵晴：《抵制美货运动的意义》，见《历史学研究》，第193期，1956年；《第二次丸事件的抵制日货》，见《历史学研究》，第209期，1957年。

动，指出了当时对收回利权运动抱有积极态度的并非革命派，而是资产阶级立宪派。藤井正夫<sup>①</sup>同样研究了铁道问题，提出了与菊池相同的看法，但他又进一步阐述了资产阶级立宪派因为铁道问题而逐渐转向革命的过程。此外，内田直作<sup>②</sup>也通过铁道问题对中国资产阶级进行了分析研究，他指出由商人转化而成的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阐述了他们之所以未能承担起辛亥革命领导责任的原因。上列诸种论述，都是通过抵制外货运动或铁道问题来对中国资产阶级进行的分析研究，野泽丰<sup>③</sup>则想要通过对资产阶级立宪派巨头张謇的分析来阐明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性质。

1911年，清政府决定实行干线铁路国有化政策，构成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线，首先四川省发生了暴动，继于10月10日武昌掀起了革命。波野多善大<sup>④</sup>认为铁道国有令的背后，包藏着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企图扩展汉阳铁厂的个人野心以及清政府要向铁路寻求财源的打算。田中正美<sup>⑤</sup>和市古宙三<sup>⑥</sup>也都研究了四川暴动，田中认

① 藤井正夫：《清末江浙铁路问题与资产阶级势力的侧面观》，见《历史学研究》，第183期，1955年。

② 内田直作：《粤汉铁路风潮的经过——辛亥革命的侧面观》，见《一桥论丛》，第32卷，第4期，1954年。

③ 野泽丰：《中国半殖民地化与企业的命运——张謇的企业经营及其政治活动》，见《东洋史学论集》，第4卷，1955年。

④ 波多野善大：《清末的铁道国有化政策及其背景》，见《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第17卷，1957年。

⑤ 田中正美：《关于清末四川暴动发端之管见》，见《史潮》，第44期，1951年。

⑥ 市古宙三：《四川保路运动的首脑部》，见《御茶之水女子大学人文科学纪要》，第6卷，1955年；《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见《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4期（原作用英文发表的）。

为铁路问题之所以仅在四川一省惹起暴动，其原因在于铁路收回办法对四川来说，较之对其他各省更为不利；市古则历述了自铁路问题发生以后直到四川独立为止的经过，由此阐明了四川政权终于被立宪派和军人所把持。

关于民国初年的研究，几乎等于空白。仅有里井彦七郎<sup>①</sup>和新岛淳良<sup>②</sup>以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和陈独秀的思想为主题进行的研究；再有野泽丰<sup>③</sup>研究了中日实业公司，阐述了民国初年中国政界的势力关系及其与日本的联系等问题。

其次，再来看看始于五四运动的现代中国的研究情况。

关于这一时期的研究，战前铃江言一、橘樸、田中忠夫和波多野善大等人甚为活跃，一时颇呈壮观。及至战后，情况稍有变化，反觉不如研究近代中国那样活跃了。这可能是因为战后日本国内的资料散置各处，而現地研究又无法进行的缘故。但自最近以来，关于这一时期的研究又重新抬起头来，只是研究的主题大都以中共为对象，这是很惹人注目的。

在中共初期的研究上留下较多成果的是石川忠雄<sup>④</sup>。石川忠

① 里井彦七郎：《李大钊的出发点——以〈言治〉期的政论为中心》，见《史林》，第40卷，第3期，1957年。

② 新岛淳良：《五四时代陈独秀的思想》，见《思想》，第380期，1956年。

③ 野泽丰：《民国初期的政治过程与日本的对华投资——特别以中日实业公司的设立为中心》，见《东京教育大学纪要史学论》，1958年。

④ 石川忠雄：《第一次国共合作与第三国际》，见《法学研究》，第28卷，第11期，1955年；《武汉时代的中国共产党》，见《亚细亚研究》，第1卷，第3期，1955年；《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共产党》，见《法学研究》，第27卷，第8期，1954年；《李立三路线的考察》，见《法学研究》，第26卷，第7、9期，1953年；《李立三路线与苏联留学生派》，见《法学研究》，第29卷，第5期，1956年。



雄和三上諦听<sup>①</sup>两人都研究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共产党与第三国际的关系，并进而就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共——对革命所采取的基本策略及其基础与现状等进行了分析，明确了当时中共与第三国际的关系；继之，又探讨了以城市工作为重点的“李立三路线”，认为取李立三而代之掌握了中共实权的苏联留学生派基本上也是城市工作重点主义，与“李立三路线”并无若何区别，从而认定李立三与苏联留学生派之间的斗争，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争夺权力的纷争而已。

总起来说，石川始终强调一点说：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是以共产国际的指令为依据的；松村祐次<sup>②</sup>则玩味了中共正式文件中出现的“封建”与“反封建”等词句的涵义，认为这不单纯是由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发展阶段论所产生的理论，而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实践纲领；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斗争方向并非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从中国的客观现实出发的。此外，今堀诚二<sup>③</sup>还从毛泽东的著作——从领导湖南农民运动时期起直到江西苏维埃革命政权成立止——中分析了毛泽东的阶级分析观点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显著发展，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取得的。一般认为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政治、战略方针起了很大作用的结果。因此，卫藤藩吉<sup>④</sup>就对这一政治、战略方针的成立过程进行了研

<sup>①</sup> 三上諦听著《关于第三国际的秘密指令——罗越提交汪精卫的》，见《史泉》，第三卷，1955年；《武汉时代第三国际对中共的领导》，见《关西大学文学论集》，1955年。

<sup>②</sup> 松村祐次：《中国共产党公开文件中出现的〈封建〉、〈反封建〉的涵义》，见《一桥论丛》，第32卷，第4期，1954年。

<sup>③</sup> 今堀诚二：《毛泽东的阶级分析的历史发展》，见《史学研究》，第63期，1956年。

<sup>④</sup> 卫藤藩吉：《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见《亚细亚研究》，第3卷，第1期，1956年。

究。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借助于其土地政策之处自然也很多。因此，古島和雄<sup>①</sup>就沿着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和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土地政策的发展过程，闡述了解放后土地政策的演进。

与上列論述相反的是藤田正典<sup>②</sup>。他从精神方面探索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在抗日战争期間内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并且終于从1942年开始的第一次整風运动中找出了这个原因。最后，与上列許多著述的主题稍有不同的，是山本澄子<sup>③</sup>的研究，她論述了从二十世紀开头起直到目前的三自爱国运动为止的中国基督教所走过的道路。

（市古宙三：《中国：現代》，見国际历史学会議日本国内委員会編：《日本历史学的发展和現狀》〔1959年〕，第311—321頁，鄭念之譯。）

#### 四、北村敬直：論近代中国社会 經濟史研究

##### （一）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状况，到現在为止已有几篇較完整的

① 古島和雄：《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的土地政策》，見《东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9—10期，1956年；《中国的土地改革与富农問題》，見《社会科学研究》，第9卷，第1期，1957年。

② 藤田正典：《第一次整風运动的历史背景》，見《历史学研究》，第316期，1958年。

③ 山本澄子：《关于中国基督教会的自立运动》，見《近代中国研究》，第1卷，1958年。

学界展望发表。除《史学杂志》上每年一度的評介以外，最詳細的恐怕应推历史学研究会編纂的《历史学的成果与課題》了。其第一册出版于1949年，在这一册中，細井昌治以《中国革命史》为題介绍了从战时到战后1949年間关于中国革命史的研究状况。細井在这篇文章中引述了平野义太郎在战前发表的文章中提到的《研究中国的两个立場》，即：《半封建的軍事帝国主义者的中国研究》和《真正科学的中国研究》。細井指出，只有后者才是战后日本人研究中国問題的正确态度，并提醒我們应对此加以反省。誠如細井所說：中国的近代史和現代史是“至今一脉相承的中国革命的历史”，尽管某些个别专题不能一律算是正规的革命史，然而每一个研究者如果不把自己的立場自觉地放在这条基本路綫上，那么“真正的、科学的中国研究”将是不可能推进的。

細井的上述指摘已經过去五年了。今天看来，我們在这个意义上的近代中国研究，的确已取得了相当的进展。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华崗的《五四运动史》等已經翻譯成日文出版，《毛澤东选集》、《刘少奇著作集》等的日譯本也已相继問世；另一方面，中国研究所的岩村三千夫、野原四郎、尾崎庄太郎、幼方直吉等人的著作、論文及其他启蒙性的介紹文章等等，为数也很可观；还有其他专题研究等不在少数。《历史学的成果与課題》第二册以下各册对这些著述大体都已做了介紹。在第二册中关于現代中国部分由藤原彰执笔，篇幅較小，稍嫌簡略。第三册（1951年度）、第四册（1952年度）、第五册（1953年度）中的关于中国近代史部分，分別由里井彦七郎、小島晋治和中村义执笔，这三人都以較細井昌治更寬的眼界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成果做了广泛的介紹。这五册《成果与課題》，虽因执笔者不同而色采各異，但其基本立場却自細井

以来始終未变。通讀这五册《学界展望》，可以使我們从一个固定的角度了解战后日本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流。

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界展望》来看，还有一份不容忽視的出色文献是原东京商科大学一桥新聞部編輯的《經濟学研究指南》第4卷《东洋經濟史篇》(1950年版)。其中的《中国近代經濟史》部分是村松祐次执笔的。村松的文章虽以經濟史为主题，但其实际內容却广泛牵涉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全部領域。文章按照鴉片战争以后各个不同时期的历史順序，就其研究上的关键性問題、必需資料以及参考书类等等都做了較广泛的介紹。村松在这篇著述的开宗明义第一章里就叙述了“研究的现状与主题”，他把过去关于近代中国的研究分为：(1)、外交史、政治史；(2)、法律、經濟制度史；(3)、社会經濟史等三大部类。他指出：(1)、(2)兩項研究，主要是从注意外国方面的研究出发——也就是站在“注意列强各国的对华侵略以及中国怎样降低到半殖民地地位”这一立場上进行的；第(3)項社会經濟史的研究，所注意的問題却与上述兩項不同，“几乎是完全按照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发展阶段論的阶段分析的方法”，也就是站在追求“变革的理論”的立場上进行的。作者以此扼要地說明了社会經濟史研究在战前的发展状况。正如村松所說的那样：社会經濟史的研究与国际政治史的研究本是近代中国研究中不可分割的两个側面，但在实际的研究当中却被截然分割开了。这是战前日本研究近代中国的一大缺陷。当然，这种缺陷在战后已被觉察，从而正在努力弥补这道鴻沟。关于弥补这种缺陷的許多具体的研究成果，只好让历史学研究会編的《成果与課題》去分別加以介紹；这里只想指出：随着新中国的成长而在中国陸續发表的許多近代史著作，如范文瀾的《中国近代史》(上編第

一分册，1951年）、华崗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第一卷增訂本，1951年）、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1952年）、特别是陈伯达的《中国四大家族》（1949年，日譯本有两种，創元社版和青木文庫版）和許滌新的《官僚資本論》（1952年，青木文庫）等等，对我们克服上述缺陷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尽管如此，这种缺陷直到现在还依然存在着，并且还仍在阻碍着我们对近代中国研究的向前发展，其主要原因恐怕是为克服这种缺陷所做的努力仅在政治史方面收到成效，而在社会經濟史方面尚未看出成果所致。村松曾說：“虛心地闡明中国近代經濟社会的結構和变化，还是明日的課題。”看来这話还适合于今天的情况。

但是，尽管說在社会經濟史研究方面关于克服上述缺陷尚未做出有效的貢獻，但这决不是說社会經濟研究工作完全未做这种努力。战后十年来，关于近代中国社会經濟的研究，成績还是很不小的，而且大部分的作品都以革命前的旧中国为对象。这些成績的积累，无疑将会为今后研究的开展打下巩固的基础。因此，本文为避免与上述两种学界展望重复，特从社会經濟史的角度，就其能够推动今后的近代中国研究向前发展者，对过去的研究成果略加剖視。

## （二）

战后，为中国社会經濟研究提供重要綫索的，是战时进行的許多农村实况調查。关于中国农村的实况調查，在战前，中国人自己也做了不少工作，写下了許多报告。另外，还有众所周知的卜凱的調查和旧滿铁調查部的調查，数量也很可观。这些战前的調查报

告資料几乎全为天野元之助所蒐集、整理，成为他的两部大作（《支那农业經濟論》，上、中两卷，1940年、1942年版；《中国农业的諸問題》，上、下两卷，1952年、1953年版）出版了。战争期間进行的傳統习惯調查，比起战前的調查規模更加龐大，內容更加充实。这些傳統习惯調查大致有两个系統，一为末弘严太郎領導的华北农村傳統习惯調查，另一为林惠海和福武直两人进行的华中、江南农村实况調查。

华北的农村調查計劃是在1939年拟訂的。自1940到1942年間在河北、山东两省选定数县，由旧东亚研究所和滿铁調查部共同按計劃执行，到1943年調查中斷了。調查报告已打成鉛印本一百十四輯，于1951年方始整理付印，已定名为《中国农村傳統习惯調查》由岩波书店出版，1952年出了第一卷，1953年出了第二卷，預定全书共出七卷。已出的两卷是河北省順义县的調查，第一卷的內容是概況、家族、村落等項，第二卷是租佃关系、土地买卖、农村金融及交易、水利、課賦捐稅（包括土地所有权和地契）等項。我們不能隱諱这次調查在性质上是为日本的侵华战争服务的。但是这些調查工作的目的，却正如末弘在闡明这些調查工作的目的时所說的那樣：进行这些調查的目的并不在于“获得立法上乃至行政上的参考資料，而在于具体了解中国大众究竟是在什么样的傳統习惯下过着社会生活？也就是要掌握中国社会傳統的习俗，用以恰如其分地闡明中国社会的特点。”因此，当时的調查工作是在极力摆脱軍事政治瓜葛、力图站在純粹客观的科学立場上，本着研究者的学术良心进行的。这一点，与該书編委会主委仁井田陞在序言中所說的与平野义太郎在該书題記中所說的完全一样。該书把从中国农民口中得来的許多事实，几乎未加任何雕琢、原封不动地

用問答体裁編纂而成，因而利用起来恐怕要費很大气力，但却能讀到农民最生动而朴实的答問，所以做为原始資料的价值极高。

其次，林惠海和福武直两人的实况調查，是以江苏省苏州近郊的农村为对象，自 1939 至 1943 年間前后分六次进行的。調查結果，已經作为林惠海的《华中江南农村社会制度研究》（上卷于 1953 年出版，下卷未出）和福武直的《中国农村社会构造》第一部《华中农村社会构造》（1946 年）出版了。我們通过上列实况調查所能掌握的情况，从地域上来看，不过数县，而且又都是中国开化較早的地区；但是作为原始資料来看，确已超过战前水平。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

实际調查資料中，还有仁井田陞的关于北京行会的調查研究。这是仁井田陞和今堀誠二、奥野信太郎等三人自 1942 至 1944 年間前后三次进行的。調查結果尚未发表。仁井田陞却利用这些資料做了分析研究，連續发表了《北京的工商业行会及其沿革》（《东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一册，1943 年）、《北京的工商业者及其联合組織》（《法律时报》，第 16 卷，第 1 期，1944 年）；战后接着又发表了《北京工商业行会的宗教、乡里性結合关系》（見《近代中国研究》，1948 年）、《北京行会的佣工和徒弟制度》（見《現代社会学的諸問題》1949 年）、《北京的工商业行会与职业道德》（見《东洋文化》，第 1 卷，1950 年）、《北京回族工商业者及其联合組織》。（見《回教圈》，第 8 卷，第 6 期，1944 年）等等。其后，作者又对这些論文加以整理补充，編纂成书，定名为《中国社会与行会》于 1951 年出版了。今堀誠二除与仁井田陞一道調查了北京的工商业行会組織外，还对內蒙及华北其他地区做了調查，調查資料也未发表，但他却根据这些資料写出了下列許多論文：《河东盐业行会組織的研究》（見

《史学杂志》，第 55 編，第 9—10 期及第 56 編，第 1 期，1944—1945 年）、《近代开封的商业行会——解体过程中封建社会的面貌》（見《东洋社会》，1948 年）、《中国封建工商业的机构——从生产关系上看內蒙的城市与农村》（見《东洋文化》，第 3 期，1950 年）、《中国工商业行会的素描——內蒙农村机构向行会的过渡》（見《史学研究紀念論丛》，1950 年）、《中国行会、商人的結構》（見《近代中国的社会与經濟》，1951 年）、《中国工匠行会的結構——在小商品生产阶段中的历史作用》（見《社会經濟史学》，第 18 卷，第 1—2 期，1952 年）、《鄂尔多斯（河套）地区的封建大土地所有》（《史学研究》，第 52 期，1953 年）等等。另有单行本《北平市民的自治团体》（1947 年）和《中国社会的結構》（1953 年）两个单行本出版。关于中国行会問題，根岸信的研究也是不容忽視的。根岸信在战前曾以《中国行会之研究》一书而名馳一时，战后仍多方蒐集資料，繼續研究，先后发表了下列許多专著：《上海的行会》（1951 年）、《中国的行会》（1953 年）、《商业活动的傳統习惯調查报告——合股的研究》（1943 年）、《中国社会的指导阶层》（1947 年）、《买办制度的研究》（1949 年）等等。

当然，战时进行的各項調查，实际上絕不止于上列几种；但在战后十年間，推动日本对中国的研究向前发展、并为今后的研究打下基础的，包括天野元之助、根岸信等人的著作在內，可說就是上列三种实况調查以及以这些調查为根据的許多著述了。

### (三)

上面列举的許多实况調查，为战后日本的中国社会經濟研究



打开了一种新的局面。特别是华北农村傳統习惯調查，由于涉及到法学、經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各个方面的問題，所以利用的人数較多，随着調查的进展或部分調查报告的打印利用，弄清了许多新問題；以此为基础的許多专题研究也相继問世。到目前为止，利用这些調查資料进行研究并发表了著述的人，除上举的仁井田、平野、天野、福武、今堀、根岸諸人外，还有旗田巍、内田智雄、戒能通孝、柏祐賢、八木芳之助、山崎武雄、石田文次郎、清水金二郎、小沼正、川野重任、德田良治、村松祐次、杉之原舜一、中村治兵衛、鹽見金五郎等人。关于这一方面的論文目录，《中国农村傳統习惯調查》第一卷中載有目录索引，可供参考。

由于这些調查資料的影响，在战后日本的中国社会經济研究中大体上出現了两种不同的見解。一种是以調查結果所证实的中国社会經济的特征为重点，也就是強調中国社会經济的个性的意見。代表这种意見的，有戒能通孝的《土地法研究的备忘录》、《支那土地法慣例序說——华北农村的土地所有权及其具体性质》(两文均見《法律社会学的諸問題》，1943年)，福武直的《中国农村社会的結構》(1946年)和《中国村落的社会生活》(1947年)，柏祐賢的《华北的农村社会——結構与发展》(1944年)和《經济秩序个性論——中国經济研究》(共三卷，1946—1948年)等。戒能的著作，是站在法律社会学的立場上研究中国土地法慣例的；福武則在社会学的立場对华北、华中农村社会的社会組織进行了分析；柏祐賢更在农业經济学的立場上分析了中国的农业經济。三人的专业范围各不相同，研究的对象也互不一致，但却得出一个共同的想法。这就是他們对于把中国社会經济理解为封建性的这种看法表示怀疑。他們用对封建社会經济这一概念的狭义解釋、用对西歐封建

制或日本封建制的基础知識來對中國社會經濟做比較分析，因而指出中國社會經濟具有西歐或日本封建制所沒有的特色。根據傳統習慣調查的結果已經得到證明的許多事實來看，中國社會經濟中誠然具有西歐或日本封建制所沒有的特異性質——例如在社會結合方面沒有封建性的上下關係，農村共同體組織中表現出令人難以想像的彈性，徹底的諸子均分祖遺財產的繼承制度，以及類似貨幣經濟的自給自足經濟在农村的滲透程度等等。但是，這些現象都不足以表現中國社會經濟的近代性。對於近代性這一概念，他們也採取了西歐市民社會的近代性來作注腳，他們在這種前提下分析的結果，就認為中國的社會和經濟既不是近代性的，同時也不能適用封建性這一概念。於是就把中國社會和經濟的特異的秩序和性質特別強調出來了。抱有同樣觀點的，還有村松祐次的《中國經濟的社會形態與制度》（1949年），安達生恒的《商業資本與中國經濟——關於中國經濟近代化的一種研究》（1953年）。村松的書，作為一本中國經濟的概論來看，確實是一部體系完整的著作，也不像上列三人那樣強調“中國的個性”，但在承認中國經濟的結構中存在着中國獨有的個性這一點上却是與上列三人相同的。村松對於中國經濟是沿着資本主義化、社會主義化這條單線的圖譜式道路發展的這一觀點抱着否定的態度。村松的這種看法同樣還表現在他的其他著作中，如：《中國的自由與資本主義》（見《東洋文化》，第6卷，1951年）、《義和團之亂——1900年的政治經濟背景》（《一橋論叢》，第26卷之5，1951年）、《義和團之亂的社會經濟背景》（《一橋論叢》，第28卷之4，1953年）。安達生恒在其上述著作中，提出了商業資本作為闡述中國經濟的鎖鑰，他從農業、工業和金融的關係中分析了商業資本的基礎、機能及其實況。可說是

用商业资本来对中国经济加以概括分析的一本优秀著作。安達的基本观点也同样是强调中国经济的个性的。他另有《内蒙长城地区农业的发展与天主教》(见《人文科学》,第1—3期,1946年)、《天主教村开拓小史——内蒙丰镇县玫瑰营子村调查报告》(见《自然与文化》,第2期,1951年)等论文发表。

另一种见解是:事实上充分承认上述各种特殊现象是西欧或日本封建制所没有的,可以看成是中国社会经济的特点;但又认为对于封建制这一概念不应单纯地按照西欧的方式做狭义的解释,而应给予更广义的理解,他们试图在这一基础上把具有上述特点的中国社会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安放到世界史的背景中,为它确定适当的地位,也就是要用世界史的发展规律来分析中国的社会经济。这种见解的代表者,可说是仁井田陞、今堀誠二和旗田巍等人。近年来仁井田陞关于这方面的著作,除上述的《中国社会与行会》一书外,还有《华北农村家庭分裂之实况》(见《东洋文化研究》,第4辑,1947年)、《中国家长的权威与家族内部的奴隶家族——家族劳动力的规律》(见《中国的家庭与官僚》,1948年)、《中国主妇的地位及其管家权》(见《国家学会杂志》,第61编,第4—5期,1947年)、《中国农村的离婚法惯例——丈夫专权的离婚及其限制》(见《中国研究》,第2辑,1947年)、《支那近世同族部落的械斗》(见《小野博士六十诞辰纪念东洋农业经济史研究》,1948年)、《中国农业社会的家长权威》(见《近代中国社会与经济》,1951年)、《中国农村社会的家族共产制》(见《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2期,1951年)、《中国社会的〈封建〉与封建制度》(见《东洋文化》,第5期,1951年)、《中国的家长权力的结构》(见《法律社会学》,第4辑,1953年)等论文多篇。著者把这些论文加以补充、归纳和整理,分

別編成《中国的农村家族》(1952年)、《中国法制史》(1952年)、《中国社会的法与倫理》(1954年)三部专著出版了。关于今堀誠二的著作，前面已經說过了。仁井田和今堀两人想用世界史的发展規律来分析中国社会，因而把中国社会規定为封建制；至于前面說过的可以作为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的許多特殊現象，他們认为應該当做阻碍中国封建制向更完全的阶段发展的、自古傳留下来的一种家长奴隶制的殘余来理解。旗田的看法，与仁井田和今堀两人稍有不同，但从世界史的背景中考察中国社会，这是双方一致的立場。关于这一問題，旗田发表了下列許多論著：《华北村落自治的形态——着重于村公会的构成》(見《加藤博士六十誕辰紀念东洋史集說》(1941年)、《华北农村的〈开叶子〉慣例，附：拾落穗、打柴草——村落共同体关系的再探討》(見《史学杂志》，第58編，第4期，1949年)、《华北村落合作关系的历史性质——〈看青〉的发展过程》(見《历史学研究》，第139期，1949年)、《中国的专制主义与〈村落共同体理論〉》(見《中国研究》，第13輯，1950年)、《中国土地改革的历史性格》(見《东洋文化》，第4卷，1950年)、《封建社会的农民斗争——东洋》(見《日本史研究》，第13期，1951年)、《中国社会的封建性——封建社会的村落与中国的村庄》(見《封建遺制》，1951年)等等。

当然，上述两种見解都不是从馬克思主义立場出发的。特别是前一种強調中国社会經濟秩序的“个性”的那种看法，更对战前那些搬用馬克思主义理論来对中国社会經濟所做的图譜化、公式化的分析，具有反駁的意义。本文开头已經說过，中国近代史的核心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从这一角度来看，尽管上述見解的高度理論性和实证性应予承认，但用这种理論却很难把中国革命的各种

前提条件总结出来。上述的后一种见解——也就是仁井田、今堀、旗田等人的见解，虽然认识到中国革命史在中国近代史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但因在研究中采取了社会学的分析方法，所以在从发展的角度确切地掌握中国革命的诸多前提条件上，也未必是成功的。这一点，在战后也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但是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另一条线索的，是战前关于满洲经济的研究。这项研究工作，主要是由当时以“满铁”调查课为中心的许多研究者之手进行的。不容讳言，旧满铁调查课是日本进行大陆侵略政策的先遣机关，因而在研究上受到一定束缚，这是不足为奇的；但是那些研究人员在对中国经济结构的分析方法上却较多的依据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从满铁调查月报、调查报告、调查资料、满洲评论、满洲经济年报及其他有关刊物中，可以发现多数论文分明接受了当时日本的资本主义论争或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影响。这项满洲经济研究，当然随着日本的战败和“满铁”的消灭而停顿了，但在战后还留下一道余波，这就是岸本英太郎的《满洲的近代资本——劳动力形成史序说》（见《历史学研究》，第124、125期，1946—1947年）。这篇文章是在山田盛太郎的《日本资本主义分析》和《大塚史学》的强烈影响下写成的，虽然结论未必正确，但却为今后的研究提出了一条引线，这是不能忽视的。此外，还有尾崎庄太郎的《东亚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本质》（见《历史评论》，第3卷，第1期，1948年）、《中国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历史特点》（见《中国研究》，第3辑，1948年）、《中国农村社会的近代化过程》（见《社会结构史体系》，第7卷，1950年）等论著，也必须一并列出，以供查阅。

#### (四)

上面介紹的中国近代社会經濟研究，范围过于狹窄了，以下再把前面尚未接触到的比較重要的著作稍加列举。

关于中国社会經濟問題的一般性研究，首先應該提出的是山名正孝的专著《中国經濟結構的研究——經濟变动的主流与結構上的前提》的出版(1954年)。这本书从用結構論的方法来掌握中国經濟由旧中国向新中国的变动过程这一見地出发，对政治条件、自然条件、倫理、科学技术、社会組織等所給予經濟結構的各种限制做了构造論的分析，想由此找出中国經濟的个性和特征，是作者对中国經濟的設想的一个部分。該书虽然没有能接触到經濟結構的内部分析，但是作为中国經濟的一般性論述来看，却不失为一本体系完整的好书，可以跟前面介紹过的村松祐次的《中国經濟之社会形态与制度》一书相媲美。山名除这本专著外，还有《中国經濟結構論之一問題》(見《商大論集》，第2輯，1950年)、《东洋社会的結構》(見《研究与資料》，第25輯，1949年)等数篇論文发表。此外應該举出的，还有大橋育英的《东洋經濟之論理》(見《农业綜合研究》，2—1，1948年)和安達生恒的《中国資本的性质——就其与非近代性的关联来考察》(見《封建遺制》，1951年)两篇文章。关于战后中国經濟的研究，有仁尾一郎的《中国通貨膨脹的发展与官僚壟断資本——蔣政权的成立、兴隆与沒落的經濟背景》(鉛印版，1949年)，渡边长雄的《中国資本主义与战后經濟——国共經濟体制的比較研究》(1950年)，另外还有很多介紹和解說性的文章散見各种刊物，不及一一列举。关于中国社会問題的研究，有尾崎秀实

的《中国社会的基本問題》(1949年),这虽然是作者战前发表的論文的再版,但也相当重要。还有东洋文化研究会編的《东洋的世家与官僚》(1948年)和仁井田陞等人的《东洋社会倫理的性格》(1948年)两部专著出版;論文方面,有松本善海的《旧中国社会特质論的探討》(見《东洋文化研究》,第9—10輯,1948—1949年)、伊藤迪的《东洋社会的范疇》(見《商学論集》17—1,1948年)、《怎样分析东方社会》(見《商学論集》,18—1,1949年)、級方直吉的《亚洲社会与古代社会》(見《大学季刊》2,1947年)、飯塚浩二的《东洋社会与人間类型——試論东洋社会的停滞性》(見《世界評論》第2—3,1947年)、《东洋社会与近代社会的联系》(見《历史》1—2,1948年)等多篇。在分析或介紹韦伯的东方社会理論方面,有小口偉一的《东方社会的咒术的构成——韦伯的东方社会論的基础——》(見《社会圈》,2—4,1948年),青山秀夫的《韦伯的中国社会观序說——韦伯与内藤湖南先生》(見《东光》,4、6,1948年)、《韦伯中国社会論的一个片段》(見《人間美学》,7,1948年)。在黑格尔的介紹分析方面,有戶頃重基的《黑格尔眼中的东方世界》一文(見《思想》,307号,1950年)值得提出。关于特殊性問題的研究,有岩村忍的《中国回教社会的結構》(見《社会結構史体系》,5—6,1949—1950年)。其他还有仁井田陞編的《近代中国研究》(1948年)和《近代中国的社会与經濟》(1951年)两本論文集出版。

农业問題的研究方面,除天野元之助的《封建遺制与中国农村》(見《封建遺制》,1951年)、《海南島土地买卖慣例与同族先买权問題》(見《东方学报》,京都,1953年)、大橋育英的《中国的稻谷耕作》(見《农业綜合研究》4—3,1950年)、福島要一的《华北农业的技术水平》(見《东洋文化》,4,1950年)等四篇外,还有几篇論证农业技

术問題的文章发表。土地制度的研究方面,有清水金二郎的《地契研究——东北华北的土地慣例》(1945年)、《滿洲地契制度之研究》(1946年)、《中国的永佃权》(見《政法研究》,第1卷,第4期,1950年)、渡边幸三的《南京不动产买卖契的研究》(見《东方学报》,京都,1953年)、爱甲勝矢的《滿洲私人土地所有权的成立过程》(見《农业綜合研究》,6卷4期,1952年)等多篇。关于农村、农村社会及家族制度等問題的研究,除中村治兵衛的《华北农村的村費——現代中国土地財政之一研究》(見《現代中国的社会与經濟》,1951年)、《中国的兄弟分家与农业經營》(見《农业綜合研究》,8卷1期,1954年)、城島国弘的《中国农村社会生产关系序說》(見《經濟科学》,第2—4期,1952年)、林惠海的《中国农家均分田产諸子继承的研究》(見《現代社会学的諸問題》,1949年)、筑島謙三的《家族主义之道德——环繞中国农村的調查結果》(見《东洋文化》,5,1951年)等多篇外,还有清水盛光的专著《中国乡村社会論》(1951年)出版,这是从历史角度上所做的分析研究。清水除这本专著外还发表了下列多篇专题論文:《中国乡村在农耕作业中表现的通力合作形式》(見《人文科学》,第2—3期,1948年)、《中国的〈看青〉与〈拾落穗〉的习俗》(見《东光》,第7号,1949年)、《中国乡村在水利灌溉方面所表现的通力合作形式》(見《东方学报》,京都版,第18輯,1950年)。内田智雄是前述华北农村傳統习惯調查的参加者之一,他利用調查資料写了不少著作,除专著《中国农村的家族与信仰》(1948年)外,还有下列許多論文发表:《家族制度与〈輩行〉的研究》(見《支那学》,第10卷,第4期,1942年)、《冥婚攷》(見《支那学》,第11卷,第3期,1944年)、《华北农村的訴訟事件》(見《东光》,第4期,1948年)、《义子——华北地区过继养子的习俗》(見《东洋史研究》,第10



卷,第3期,1948年)、《中国农村的結婚与世代問題》(見《同志社法学》,第1—2期,1949年)、《中国的基层裁判机关——以河北省順义县承审处为中心》(見《同志社法学》,第5期,1950年)、《中国农村家族祭祖的意义》(見《同志社法学》,第6期,1950年)、《中国农村家族分居原因之考察》(見《同志社法学》,第8期,1951年)、《中国农村的土地(先买权)》(見《同志社法学》,第10期、第13期,1951年、1952年)、《华北农村的同族祭祖仪式》(見《东方学报》,京都版,第22期,1953年)等等。以华北农村傳統习惯調查資料为根据写成的論文,此外还有很多,《中国农村傳統习惯調查》第一卷中載有論文目录,可供参考,这里就不多介紹了。其他关于家族制度方面的研究,有牧野巽的《支那家族之研究》(1944年版)、《广东的合族祠与合族譜》(見《近代中国研究》,1948年)、《中国的家族制度与朱子家礼》(見《中国随笔》,3,1948年)、滋賀秀三的《中国家族法論》(1950年)、《中国家族法补考(一)》(見《国家学会杂志》,第67編,第5—6期,1953年)、大山彦一的《中国人的家族制度——东亚諸民族的社会学的考察》(1952年)等多篇,还有清水盛光的专著《中国族产制度考》(1949年)出版。

工矿业方面,一般性的研究,有遊部久藏的《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見《近代中国的社会与經濟》,1951年)、石川滋的《中国經济发展的量的把握》(見《东洋文化》,第8期,1952年)。两篇都是統計性的研究。島恭彦的《中国内地社会的技术与劳动》(1946年)一书,以四川省的盐业为对象,试图探索在不太受外国近代技术影响的条件下,中国的土法工业具有怎样的发展前途和发展限度,是一項頗饒兴趣的研究。关于民族資本問題,有藤井正夫的《中国民族資本家系譜》(見《新中国》,第2卷,第9期,1947年)、濱口

峰夫的《中国民族資本向工业資本发展的困难性》(見《中国文化》，第3期，1948年)、尾崎庄太郎的《中国的抗战建国与民族資本的动向》(見《中国研究》，第1期，1947年)、《中国民族資本的进步性与动摇性》(見《中国研究》，第12期，1950年)。关于企业经营問題，有岡部利良的《中国企业經營中的人的关系——以华商紡織工业的組織管理为中心》(見《人文科学》，第1卷，第3期，1946年)。关于工矿企业的劳动問題，有遊部久藏的《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1948年)、中村孝俊的《华北的矿山劳动》(1945年)和戶田义郎的《中国工业劳动論》(1950年)出版。戶田的书是战前发表的許多論文的輯集。中国的把头制度作为封建性的劳动制度来看是很惹人注意的。关于这个問題，有中村孝俊的《把头制度的研究》(1944年)、幼方直吉的《劳动力的亚洲形态——以把头制为中心》(見《社会》，第3卷，第7期，1948年)、松島静雄的《作为劳动者集团的把头制》(見《人文科学的諸問題》，1949年)等专题論文发表。关于工人运动，除鈴木言一的战前著作《中国解放斗争史》一书已經再版(1953年)发行外，还出版了鹽脇幸四郎的《中国劳工运动史》(上下两卷，1949年)。两者都具有很高的資料价值。关于其他特殊問題的研究，有吉田先邦的論文《中国的鋼铁》(見《学艺》，第5卷，第5期，1948年)发表。

关于金融貨幣問題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香川峻一郎的《錢庄資本論》(1948年)和宮下忠雄的《中国币制之特殊研究——近代中国的銀两制度》(1953年)两部专著的出版。宮下还发表了两篇論文：一为《中国派生的銀两制度之两种形态——銀币秤量銀两制度与銀币兑价銀两制度》(見《国民經濟杂志》，第84編，第4期，1951年)，另一为《中华苏維埃的貨幣与貨幣政策》(見《国民經濟杂志》，

第86編,第8期,1952年)。关于战后中国的通貨膨脹問題,前面介紹过的仁尾一郎的《中国通貨膨脹的发展与官僚壟断資本——蔣政权的成立、兴隆与沒落的經濟背景》和渡边长雄的《中国通貨膨脹的基本性格》(見《中国研究》,第6輯,1949年)两篇文章,观点較为明确。另外还有宮下忠雄的《中国的通貨与通貨膨脹》(見《中国文化》,第3卷,1947年)、經濟安定本部編的《中国通貨膨脹的分析——通貨膨脹下的貿易的探討》(1947年)、《中国币制改革的解說与資料》(1948年)等等。他如穗積文雄的《中国历史上的通貨膨脹》(見《經濟論丛》,第64編,第1、2、3期,1949年)、《中国历史上的通貨收縮》(見《經濟論丛》,第66編,第1、2、3期,1950年),和曾我部靜雄的《紙币发达史》(1951年)等論文,都是从历史角度来对中国金融貨幣問題所做的分析研究。

关于商业問題,除內田直作的《中国商业秩序的基础》(見《一橋論丛》,第22卷,第2期,1949年)一文外,还有下列几篇研究“牙行”的专题論文发表:上坂曾三的《中国經紀商业机构的(牙行)业序說》(見《早稻田商业》,21—9,1946年)、《中国牙行制度的发生与发展》(見《早稻田商业》,第73期,1947年)、小沼正的《华北农村市集的(牙行)——做为征稅机构来看》(見《和田博士六十誕辰紀念东洋史論丛》,1951年)。

关于交通問題,战争期間出版了滿铁調查部編的《华中的民船业》(1943年),是一部很詳細的調查資料;战后則仅发表了宮崎市定的《招商局略史——中国的壟断汽輪公司》(見《东洋史研究》,第11卷,第2期,1951年)和內田直作的《粵汉铁路風潮的經過——辛亥革命的側面观》(見《一橋論丛》,根岸博士紀念号,1954年)两篇論文。关于貿易問題的研究,情况也同样寥落,除战后中国貿易

問題的解說性文章外，仅有上坂曾三的《中国貿易机构之研究》（1949年）和松田智雄的《英国資本与东洋——东洋貿易的前期性与近代性》（1950年）两部著作出版。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欧美方面較為活跃，具体情况，請看次节。至于外国投資和財政問題的研究，战后几无所見。其他特殊性問題的研究，有波多野善大的《中国官僚商业高利貸的性质——以清末两淮盐商之二例为中心》（見《东洋史研究》，第11卷，第3期，1951年）、牧野巽的《华中华南平原土著民族的远程貿易》（見《东方学》第5期，1952年）两篇論文。

战后的华侨問題研究，主要对象已經轉移到留日华侨方面来了。除內田直作的大著《日本华侨社会之研究》一书（1949年）业已出版外，散見于各种刊物上的还有下列一些論文：內田直作的《日本华侨社会之发展——中华总商会成立前后的情况》（見《一橋論丛》，第18卷，第4期，1947年）、米澤秀夫的《旅日华侨的历史考察》（見《中国》，第2輯，1948年）、增田米治的《在日华侨經濟的結構》（同上刊）。另外，华文杂志《华侨文化》上还以《留日华侨經濟的綜合分析》为題譯載了內田直作等人关于华侨經濟問題的研究著作。关于南洋华侨問題，已发表的有內田直作的《华侨資本之前期性质——以馬来亚陆佑財閥为中心》（見《东洋文化》，第7卷，1951年）和井出和泰的《南洋华侨的历史背景》（見《拓大論集》，4，1951年）两篇。

人口問題方面，有鈴木中正的《关于近代中国的人口論》（見《爱知大学文学論丛》，1，1949年）。关于行会問題，根岸信除前面介紹过的著作外还发表了一篇論文《上海的錢业行会》（見《一橋論丛》，22—1，1949年），另外还有白山友正的《中国的行会及其壟断政策》（見《学艺》，2卷2期，1950年）、總方直吉的《帮、同乡

会、同业公会及其轉化》(見《近代中国的社会与經濟》，1951年)两篇。关于秘密結社問題，已見的文章有：石川滋的《四川省的哥老会》(見《中国研究所报》，第7卷，1947年)、酒井忠夫的《現代中国的秘密結社》(見《近代中国研究》，1948年)、稻叶誠一的《清代的秘密結社》(見《斯文》，5，1952年)、上妻隆兴的《〈会党〉論》(見《山口經濟学杂志》，3卷2期，1952年)等多篇。

上述情况，是根据笔者本人的有限知識所做的粗略的介紹，遺漏的重要論文，为数当不在少；而且，最近以来关于三十年代以后的中国解放区 and 新中国社会經濟的研究，日漸活跃，虽然正規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見，但是有关論文的发表，为数已相当可观。本稿本应加以介紹，但以不屬于笔者的职責范围，只好割爱了。

### (五)

其次，再看看战后欧美关于中国社会經濟的研究状况，并就其中之較重要者略加介紹。

首先应该举出的，是葛德石的經濟地理著作《亚細亚的土地与人民》(1949年)。如所周知，葛德石在战前早已以《中国的地理基础》(1934年)一书与我們成了旧相識。关于农业問題，有著名的卜凯的两篇文章《中国土地問題的理論与实际》(1949年)和《中国农业的若干基本問題》(1947年)，都是短小之作。还有費孝通和張之毅两人合著的《乡土中国》(1945年)，沈宗瀚的《中国的农业資源》(1951年)，这是一本大部头的著作。另外，还有張培剛的《农业与工业化》(1949年)。和貝尔肖的《远东的农业复兴》(1947年)。关于战后中国和亚洲的經濟問題，亞細亚远东經濟委员会和太平

洋学会都有不少調查报告資料发表，为篇幅所限，不能一一介紹。关于农村和家族制度的研究，除兰欧格的《中国的家庭与社会》（1946年，日譯本見岩波現代丛书）和雷維的《近代中国的家庭革命》（1949年）两部著名的著作外，还有下列許多著述发表：楊懋春的《山东省的一个农村》（1945年）、湯普孙的《中国乡村生活方式的兴起与建設》（1949年）、海朋启的《中国西部的家庭生活》（1948年）、馮汉驥的《中国的氏族制度》（1948年）、林耀华的《金翼——中国家族的社会学的研究》（1948年）、胡先进的《中国的共同血族集团及其机能》（1948年）、許煥光的《中国的家庭》（1949年）等等。关于工业問題，战时史国衡发表了《中国已进入机械时代——关于中国战时工业劳动力的研究》（1944年），战后刘大鈞又发表了《中国經濟的稳定与复兴》（1948年）。关于西方企业对东方的影响，有凱貝的《西方經濟在东方的影响》（1952年），亚倫和杜尼松两人合著的《东方經濟发展中的西方企业》（1954年）等。此外，还有不少以西方国家向中国及东方各国伸張势力为中心的国际关系方面的論著发表，不及一一备載。关于劳动問題，虽有韦尔斯的《中国工人运动》（1945年）和陈达的《中国政府的劳动政策及其在工业和劳动中的反应》（1949年）等篇，但是今天看来已經显得内容不够充实了。

其次在貿易方面，关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研究，有魏尔巴的《东印度公司和英帝国在远东》（1945年）、李德的《商业与征服》（1947年）两书出版。关于中英貿易問題，有格林堡的《英国貿易与中国的开放》（1951年）一书問世；关于海关問題，有魏尔特的《赫德与中国海关》（1950年）出版。关于交通問題，虽有罗秋的著作《中国的国有铁路》（1949年）和金士堡的論文《滿洲铁路的发展》











































































































































































































































































